

京沪播迁:现代文学中心转移的场域观察

蒋进国

(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浙江杭州310018)

摘要:1927年前后,大批在京作家陆续播迁上海,现代文学中心南移。时间、空间、历史事件与作家迁徙轨迹的交织,使文人播迁具有文学地理学和场域发生学的多维意义。北伐鼎革后,文人避难于沪而非南京,此现象不能被简单“指认”。文化北京陷落与文学魔都凸显,既非同时,亦非同因。京沪文化格局消长与场域重组,塑造了现代文学的黄金时代格局,彰显了文学场域构型与知识分子生存方式、政治权力、文化资本、文学消费等诸多要素之间的张力关系,完成了从传统市民空间到都市空间的文学特质转型,上海“地方性知识”亦得以拓展为一种中国都市生存景观。

关键词:文人播迁;文学中心;场域;北京;上海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1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01-05

1927年前后,中国现代文学第一个十年的帝都时代落幕,第二个十年的魔都时代开启。1927年不仅是文学史时间转捩点,还具有“空间迁移”的文学地理学意义,更提供了透视现代文学场域构型之良机。此年前后,大批文人离京,文学帝都陷落,文学魔都升起。“30年代前后新文学中心南移上海”^{[1]203},或文人“逃离北京”现象^{[2]119},包含创作和传播的诸多因素,其“地域意义却是不言而喻的”^{[3]108}。自30年代“京海论争”始,对现代文学的空间观察一直持续。当代学界在此论题上也多有创获,但对京沪播迁话题,多现象“指认”而少场域观察。有学者指出,20年代末北京文学中心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丧失,30年代末上海文学中心因南京陷落而星散。^{[4]8}而自古以来中国文学地域和中心的空间展开路径已经说明,文学中心并非皆随首都流转。文人齐聚上海而非南京的事实背后,尚有诸多历史细节亟待梳理。由此,还原1927年前后京沪两地的地缘政治和文学场域构型,考察30年代京沪文化格局及其重组历程,即成题中应有之义。

一、首善之都成寂寞“古战场”

文学中心位移是社会场域变迁的结果。文化资源的集中度是相对的,文学中心和若干文学副中心之间的地位也并非一成不变。探讨众多文人1927年前后殊途同归之原因,需从梳理北京2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乱局开始。

北京成为中国新文学乃至新文化运动的中心,当然得益于帝都政治符号对知识分子的极大吸引力,以及北京数百年来积淀的都市世俗社会和市民文化形态。但现代北京文化场域之肯綮,乃是北京大学这样的现代文化教育机构“为文化转型期的知识分子精英提供了新的生存空间”^{[5]82}。现代大学是一个非常独特的文化空间:管理和运作相对自立,薪俸保障相对稳定,对社会世俗力量有足够的过滤净化能力,新思潮拥趸众多。大学校园是20世纪前叶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生存的核心场域。新式知识分子留学回国后,多在大学谋得教职。蔡元培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教育理念,用模范人物整饬学风的务实作风,以及“某籍某系”人际纽带,使得北大网罗大批知识精英。新文学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和实

收稿日期:2020-09-12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现代自由主义文学思潮研究(1917—1949)”(16BZW140)

作者简介:蒋进国(1980—),男,河南固始人,文学博士,中国计量大学人文与外语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践者,大都在京高校任教或求学。除了留学知识精英,沈雁冰、张恨水、叶绍钧、沈从文、丁玲等全国各地的文化和文学人才都向北京汇聚,他们为官、教书、求学、编刊、办报、当记者、组沙龙、立社群,笔耕不辍,论争不止,佳作不断。

这种文学场域被日益恶化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态逐渐解构。其一,体制布局和经济基础溃败。当局随意裁撤合并高校布局,拖欠薪资,学潮蜂起,知识分子治学和生活环境恶化。1924年2月,教育部颁布《国立大学条例》,遭北京学界强烈反对。11月,女师大爆发学潮、校潮继而政潮,因此而受牵连的林语堂和鲁迅被当局通缉,后相继南下。北伐逼近,北洋军阀控制范围萎缩,财源渐枯,拖欠高校经费愈甚。张作霖进京后,政权如走马灯般更迭。政府职能部门的工资都难以为继,更不提大学薪俸。教授们请愿、游行、静坐和呼号,到最后“每个月也只能领到三几成薪水,一般人生活非常狼狈”^{[6]142}。生活条件每况愈下,一时间人心浮动,许多人开始“逃荒”。

其二,舆论钳制日紧,人身安全难保。三一八惨案后,大量文人遭到段祺瑞政府通缉和逮捕。徐志摩回忆说,大屠杀的情景让人感到如在梦魇中一般,被杀害的不仅仅是那些年轻的学生,他自己内心也遭受了致命打击。想到国务院门前的断臂残肢,他就感到难以名状的悲哀和愤慨。“这深刻的难受在我是无名的,是不能完全解释的。”^{[7]5}在血腥屠杀面前,他不知所措。惨案之后,师生更加决绝地投入到反列强、争民权的运动中,引发当局更严苛的镇压。奉系入京后,实施恐怖绞杀,压制舆论更甚。《晨报》主笔邵飘萍、《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被害,《语丝》《现代评论》等新学学期刊也被迫陆续停刊。邵、林被抓后不经审讯连夜枪决,林语堂顿感“北洋政府是开始下毒手了”,在院子里预备绳梯,待遭遇不测时“跳墙逃走”^{[8]99}。他听闻“那时又有一张名单要捕杀五十个激烈的教授,我就是其中之一”,先后在法国医院和友人家躲避一月,“有一日早晨,我便携家眷悄然离开北京了”^{[9]5-6}。即将自美返京的胡适收到国内好友快信,被告知此时北京如“法国革命时代的 Reign of terror”,“这期的《现代评论》也被删去两篇论文,这种怪现象是中国报纸的历史上第一次看见”。北京的言论自由和人身自由均无保障,普通民众噤若寒蝉,报纸被开天窗,一片空白,无话可说,从北京收发的书信和电报都要受到严格的审查,有不少人无故被捕。^{[10]421}此后,李大钊就义,苏联使馆被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王荷波等18人被秘密杀害。五四运动发源地“显得寂寞荒凉

的古战场的情景”^{[11]132},已经不适合现代知识分子容身。1928年12月,身处上海的徐志摩发表小说《死城》哀叹京城落寞,主人公廉枫在北京寒冷的冬夜里闲逛,误入埋葬外国人遗骸的坟山,看守坟山的老人说:“听说有钱的人都搬走了,往南,往东南,发财的,升官的,全去了。……北京就像一个死城,没有气了。”^{[12]69}徐志摩用哀伤的笔调,描摹出贫病交加的底层人和颓败衰微的帝都。

其三,知识共同体逐渐涣散。1920年2月,前期因私德被罢免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回沪续编《新青年》后,新文化阵营罅隙益深。1923年1月,北大罗文干被捕,蔡元培以彭允彝干涉司法独立蹂躏人权为由辞职离京,久不北上理事。新文化阵营先失阵地《新青年》,再走领袖蔡元培,北大内部文人纷争渐显,派系摩擦加剧,同仁分道,文化共同体加速溃散。1924年5月,上海《小说月报》发表鲁迅小说《在酒楼上》,主人公吕纬甫曾是革命时代的振臂前驱者,新文化运动退潮之后生计无着,被迫教授自己曾大加讨伐的“子曰诗云”。他热血不再,双目无神,在酒楼上迂缓沉醉。孤独彷徨中,鲁迅渴望地下的岩浆奔突而出,地火烧尽一切腐朽。危局中,胡适去国,林语堂、鲁迅南下,闻一多云游,徐志摩隐于沪,“北京的文艺界星流云散,更谈不上什么门户之争了”^{[13]356}。曾经群贤毕至的文化古都,渐失往日风采。

二、1927:文学“魔都”的凸显

早在1927年4月国民政府定都南京之前,北京失却文学中心就已基本尘埃落定。文学场域流转是渐进过程,可能无法找到京沪播迁的标志性事件或精确时间点。大体而言,现代文学中心南迁与1927年前后新地缘政治诞生紧密相关。国民政府新鼎南京后三个月,蒋介石在上海特别市成立“训词”中说:“上海特别市乃东亚第一特别市,无论中国军事、经济、交通等问题,无不以上海特别市为根据。……上海之进步退步,关系全国盛衰,本党成败。”^[14]离京到沪,似乎是文人的必然选择,但这种简单的“指认”逻辑,掩盖了历史的复杂细节。实际上,许多文人南下早于国民党定都南京,他们既非安居南京,也非直奔沪上。例如,1926年林语堂和鲁迅先后南下厦门大学,二人多地辗转才于次年9月和10月到沪定居。1927年11月,林语堂任职“国立中央研究院”,鲁迅当年12月起受聘南京“大学院”。二人居沪,可能顾及就职便捷,但他们离京与南京无关。

至此有两个疑问:为何不去新都?为何不避四一二政变屠场?南京对地缘政治的渲染不遗余力,“北平实为近世中华民族衰落的场所,亦可称为

反革命势力的巢穴”，南京则是集中“全国人才，经济，工作的绝好地点”^[15]⁵。但现代知识分子并未齐集南京，而是聚拢上海，原因可能有二：第一，政治风险考量。现代文人对张作霖在北京的白色恐怖心有余悸，而南京为兵家必争之地，更不敢贸然趋近。早在四一二政变前数周，蒋介石已经下令各地清党，南京、广州、厦门、南昌等各地形势趋紧，惨案频发。上海反共清洗则因其惨烈之最而凸显于历史。鲁迅在广州目睹清党变成“人肉的筵宴”，革命变成杀戮，战士被“噼噼啪啪地拍手拍死”^[16]⁴⁶⁵。值得注意的是，四一二大搜捕主要发生在租界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虽然配合了蒋介石绞杀共产党人，但仅限于防止有人躲避追捕藏匿其间而用路障封锁租界，以及获准杜月笙和白崇禧的武装通过租界道路。^[17]⁶²⁸这次屠杀说明，在国内军事强人最严酷的杀伐面前，租界亦似为相对安全之地。晚清以来，治外法权让租界成“飞地”，国内政令不及。上海扼江濒海，水陆交通便捷，遇险易脱身，一直是近代以来知识分子的避难所。1926年10月徐志摩与陆小曼婚后离京南下，12月因孙传芳与北伐军交战而避乱到沪。1927年2月，北伐炮声逼近南京，“时局起了变化，国民革命北伐逐步逼近南京”^[6]¹³⁰。不久，新婚燕尔的梁实秋从南京仓皇抵沪。胡适自美回国途中，从友人电报得知上海屠戮消息后，在日本观察时局数十日后才回沪，屡次谢绝南京、武汉政客邀约，隐居租界，埋首著述。

第二，完备的城市文化场域构型。文学创作的场域结构包括物质层面的生活条件、出版印刷机构、书刊发行和流通平台，以及精神形态的市民读者群审美取向、文学思潮和价值观念、艺术家群体精神风貌等。日本作家村松梢风在1924年面世的《魔都》一书中，曾详尽描写了在这座城市的生活体验。洋场的时髦生活、报馆书店林立的街道、成熟的市民文化消费群体等场域要素，在国内乃至远东均首屈一指。此点学界有较多研究，不赘述^[5]。北京欠薪，广州亦差强人意。1927年1月，徐志摩致信胡适说，丁文江病倒在医院，张君勱从政治大学辞职，傅斯年准备去中山大学谋生，“老傅去，一半为钱，那又何必”^[18]²⁷⁸。离京之后，知识分子星散各地，几番勾留，最终大都来沪。

最具“京沪播迁”特质的社团非新月社莫属。在京新月社骨干几乎“整建制”到沪，新月书店成立，《新月》月刊付梓。以北京大学教员为主干、以新月社为核心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几乎齐聚上海，“徐志摩、丁西林、叶公超、闻一多、饶子离等都是在

这时候先后到了上海。胡适之先生也是这时候到了上海居住”^[6]¹⁴²。1927年8月3日，安顿上海的徐志摩，致信留守北京的周作人：“在北京的朋友纷纷南下，老兄似乎是硕果仅存的了。”^[19]¹⁹⁶血腥清洗后上海暂得平静，东北易帜后南京国民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自由主义文学思潮暂获相对稳定的政治环境。

30年代上海吸纳的知识分子中，离京文人只占一部分。除鲁迅和新月派，此间从海外和全国各地聚集上海的知识分子还包括：北伐回归的茅盾、郭沫若、阳翰笙、蒋光慈、钱杏邨、李一氓、孟超等，日本留学归来的刘呐鸥、夏衍、冯乃超、朱镜我、李初梨等，英美留学回国的刘英士、潘光旦等，法国留学归来的巴金，北京南下的沈从文、冯雪峰、胡也频、丁玲等，江南小镇来沪游学的施蛰存、戴望舒、杜衡、叶灵凤、张天翼等，滇缅边地北上的艾芜，东北漂泊到沪的萧红和萧军，自四川出夔门的沙汀，甚至前线受伤的瞿秋白。“中国近代文化史的版图上，出现了一次蔚为壮观的新文化人大迁徙，其主要目的地或驻足点即上海。”^[20]¹³由是，京畿文坛陷落之时，晚清以来一直是中国文学副中心的上海凸显出来。

北伐后，北平知识界依然纷扰。国民政府一边加大对上海统治力度，一边对北平进行新的政治定位，并继续改组高校布局。1928年7月，国民政府设立北平大学区，拟9月合并各校，北京大学学生宣布武力护校。鲁迅感叹道：“闻北京各校，非常纷纭，什么敢死队之类，亦均具备，真是无话可说也。”^[21]¹³⁹九一八事变前后，北平愈加萧条。留京的周作人说，这座城市“不但不是国都，而且还变成了边塞”^[22]¹⁷。1933年后，“京派”与“海派”论争数年，在京留守文人和上海文人之间的笔战似无高下，却体现了新旧文化中心交替过程中京海文学场域的紧密互动，更印证了魔都取代帝都成为30年代中国文学中心的不争事实。

三、京沪播迁的文学场域发生学

中国现代史上规模最大的文人大迁徙，具有文学史和文化史的多重意义。京沪播迁曾被赋予理所当然的“指认”逻辑，简化为历史的偶然流转，其背后的复杂性往往被忽视。因此，应尽可能接近历史现场，用“分析”理路去探究京沪播迁的文学地理学和文学场域发生学价值。

首先，从文学空间流动和文学场域生成而言，旧文学中心衰落与新文学中心凸显既非同时，亦非同因。中国历史上存在文学中心与政治中心分离而趋向多元化的阶段。安史之乱后，中唐时代的文化版图向江南转移，众多文学家在政治中心以外建立文

学地位。近代以来的文学中心区域亦有发生在边缘地带之倾向,甚至部分现代文学萌生空间发生在东京这样的域外区域。^[23]¹¹⁰⁻¹¹¹文学中心的播迁与重大历史事件关系紧密,但并非紧随首都流转。京沪播迁几乎与国民革命北伐同步,沪渝更迭与抗战全面爆发基本一致,但北京文学中心因国民政府定都南京而丧失之论并不严谨。一个明显的事实是,北京文学中心陷落的主要原因是各系军阀对作家生存权的剥夺,触发事件是北伐。而上海文学中心凸显的主要原因是租界业已具备的政治、经济、地理和文化条件,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只是巩固上海文学中心的外部原因之一。京、沪、渝三城分别在20、30和40年代为都,上海而非南京成为30年代文学的中心,正说明文学场域空间构型与政治权力、文化资本、文学消费之间的复杂张力关系。不宁唯是,文学传达的人性维度、文学创作的灵感和资源,本质上无法被地域、时代和种族所限。文人播迁与文学中心转移确是耐人寻味的奇妙现象。

第二,从知识分子角色身份来看,社会政治格局对作家生存方式影响甚巨。中国现代文学场域与政治话语之间一直存在张力结构。自梁任公《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始,现代文学即被捆绑于民族国家话语体系中。碎片化现代历史语境和军事强人政治生态面前,知识分子如“一个不小心将手指插进历史车轮中的儿童”^[24]²²,无助又无力。胡适深切体会其中滋味:“学者遇着‘老虎’,学者唯有失败而已!”^[25]³⁴⁹王纲解纽,科举废除,强人割据,杀伐不断,留给“书生”的生存选项并不多。他们趋时鹜新亦颠沛流离,清高傲骨亦不得不为稻粱谋。有学者将知识分子大迁徙称之为文人从“仕途经济”走向职业空间,从“庙堂知识分子”蜕变为一个以近代知识生产体系为存身空间,拥有文化权利的社会阶层的历史过程。^[20]⁴京沪播迁见证了中国现代文化中心的地域流向,彰显了现代中国政治和军事格局对文化空间的深入影响,投射出现代知识分子在时代洪流中颠沛流离的历史背影,也凸显了现代文人从乡土走向都市,从“谋取功名”到“鬻文为生”的生活方式转型。

第三,就文学史构型而言,文人群体播迁带来文化中心的转移和文学格局新变,给上海文学带来了巨大创获,开启了中国现代文学三足鼎立的黄金时代。新月社、创造社等众多文学社群在上海继续分化、重组和更新,诞生了诸多30年代文坛上举足轻重的社群和流派。各类作家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多元交织的文学空间。^[26]现代文学史所谓“左翼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民族主义文学”三足鼎立之势

也就在此时形成。此文学格局深深影响了中国现代文学,以至于学界时常以此阐释新中国成立前的文学空间布局。历史风云际会,让时间、空间和作家群体密集交织,使30年代上海与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大多数经典作品、作家、社团和文学思潮紧密勾连。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文学特质而言,中国现代文学完成了从传统市民文化空间到现代都市文化空间的转型。由京到沪,文人勾连了两座不同文化内涵的城市。郁达夫1927年在《创造月刊》上抱怨说:“我现在又回到纳污藏垢的上海来了,这上海当然也是和旁的人类杂处的地方一样,处处是阴谋,处处是陷阱。”^[27]徐志摩对上海的都市生活也别有一番体味,他飞翔的诗心为弄堂市井所困,感觉犹如在铁笼子里关着,“人生的悲惨愈来愈明显了,想着真想往空外逃”^[19]²⁵²。除此二人,不少左翼作家的上海生活体验也不佳。但毋庸置疑,上海提供给现代作家迥异于北京的现代都市体验。无论是文本内部的喧嚣、慵懒、颓废、困顿、欲望,抑或商品拜物教等批判性视野,还是迅捷的中外信息交换、便利的公共文化空间、发达的出版印刷业、商品化的文学消费体系等现代都市“文化工业”和“印刷资本主义”景观,都为现代文学注入新特质和新样态。一时间,上海的文学团体林立,书局报馆鳞次开张,书籍杂志栉比付梓,电影、戏院、书场、咖啡馆等公共文化空间如雨后春笋,出现了现代文学史上最富活力和创造力的文学场域。在这里,政治、经济和文学之间关系最紧密,作家、出版家、市场和读者互动最频繁。文学场域流转为新文学提供了一种与五四时期不同的都市生存空间和文化空间,成为强化文学与政治和商业关系的重要中介。^[5]⁸¹城市文化的桥接和融合无疑为现代文学提供了更为丰富的内涵,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京沪形象,成为无数经典作品的潜在语境和主体意象。30年代上海文学景观具有极其丰富和复杂的样貌,除了主流革命文学,还有鸳蝴旧派,张子平的三角恋爱,《真善美》的“上海气”和“法国沙龙风”,现代派《无轨电车》的“多色光线”等。魔都体验已不再是“地方性知识”,俨然成为现代文学黄金时代的全国性景观。

当然,北京并未因文人南迁而永久丧失其文化中心地位,它依然焕发持久魅力。随着30年代北京文化生态改善,国民党当局在上海舆论钳制力度渐大,部分当年被迫离京的文人陆续返京。但无法想象,若无京沪生活经历,鲁迅、徐志摩、梁实秋、林语堂、沈从文是何种文学面目。南下抑或北上,地理空间变换赋予作家远距离审视一座城市的机会,进而

有了“‘京派’是官的帮闲,‘海派’则是商的帮忙”^{[28]453}的精准论断,才有了湘西这样令人无限神往的都市对立面。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而言,在沪“情形当然是相当狼狈”^{[9]132},但他们的上海岁月,是苟全性命的“逃荒”之旅,亦是“鬻文为生”的权宜之计,更可谓萍踪偶聚升“新月”,功不唐捐终入海。

参考文献:

- [1]朱栋霖,丁帆,朱晓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册[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12.
- [2]王建伟.逃离北京:1926年前后知识分子群体的南下潮流[J].广东社会科学,2013(3).
- [3]赵学勇,孟绍勇.“文学中心”的转移与当代文学“新方向”的确立[J].山西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1).
- [4]方维保.民国文化中心与现代文学生成关系论纲[J].海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6).
- [5]张林杰.文化中心的迁移与30年代文学的都市生存空间[J].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0(6).
- [6]梁实秋.梁实秋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6.
- [7]韩石山,伍渔.徐志摩评说八十年[C].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8.
- [8]林语堂.林语堂自传[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5.
- [9]子通.林语堂评说七十年[C].北京:中国华侨出版社,2003.
- [10]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胡适来往书信选:上[C].北京:中华书局,1979.
- [11]蔡元培.中国新文学大系导论集[C].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45.
- [12]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5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13]梁实秋.梁实秋文集:第6卷[M].厦门:鹭江出版社,

2002.

- [14]蒋介石.上海特别市成立大会上的训词[N].申报,1927-07-08(1).
- [15]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宣传部.国都南京的认识[C].1929.
- [16]鲁迅.鲁迅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17]费正清.剑桥中华民国史:上卷[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
- [18]虞坤林.志摩的信[C].上海:学林出版社,2004.
- [19]徐志摩.徐志摩全集:第6卷[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5.
- [20]叶中强.上海社会与文人生活(1843—1945)[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 [21]鲁迅.鲁迅全集:第1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 [22]姜德明.北京乎:上[C].北京:三联书店,1992.
- [23]陈引驰.地域与中心:中国文学展开的空间观察[J].社会科学,2005(2).
- [24]马克·里拉.当知识分子遇到政治[M].邓晓菁,王笑红,译.北京:新星出版社,2010.
- [25]胡适.胡适全集:第21卷[M].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 [26]王晓渔.知识分子的“内战”:现代上海的文化场域(1927—1930)[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 [27]郁达夫.关于编辑、介绍以及私事等等[J].创造月刊,1927(2).
- [28]鲁迅.鲁迅全集:第5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The Shift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enter and Writers Migration between Beijing and Shanghai

JIANG Jinguo

(College of the Humanities and Foreign Languages, China Jil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Zhejiang 310018, China)

Abstract: The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center has transferred to Shanghai, resulting in a large number of writers escaped from Beijing, by the deterioration of the cultural ecology of Beijing around 1927. The social, political, cultural factors and individual migration routes merged together on this historical turning point. The most outstanding writer, including the liberal intellectuals, has gradually moved to Shanghai. In this period, the literary field and cultural pattern of two cities has reconstructed, the modern writers lifestyle has changed, the three pillars of literary parts has formed. The literary characteristics completed the transformation from traditional folk culture to the modern urban culture, and Shanghai local knowledge has also turned into national experience.

Key words: migration of Intellectuals; literary center; field; Beijing; Shanghai

戏剧题材小说《青衣》与《霸王别姬》比较论

王俊虎, 陈楠

(延安大学文学院, 陕西延安 716000)

摘要:戏剧元素作为重要的文化资源,经常被作家运用于小说创作中。毕飞宇的《青衣》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作为戏剧题材小说中的优秀作品,通过戏剧舞台表现出迥异的时代特征,透视戏剧舞台名伶的求戏之路与性格命运,建构起不同的文学主题,彰显出别样的艺术风格。两位作家看似刻画戏剧演员的悲剧人生,实则描摹世间百态甚至历史宿命,一定程度上表现出个人与时代的紧密联系,以及对女性悲剧命运的省思与叩问。

关键词:《青衣》;《霸王别姬》;戏剧题材小说;女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2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06-05

就当代作家来说,几乎每个知名作家都有他的“文学原乡”,比如莫言的山东高密、贾平凹的陕西商州、迟子建的东北黑土地,这些作家习惯于从故乡汲取养料,撷取显在的或隐秘的文化密码。这些文化密码很多时候表现为地方方言,而最富于声色且兼具观赏性的方言类型则是当地戏曲小调等,比如秦腔、昆曲、京剧。于是,在富于中国特色和地缘文化的小说书写中,尤其是在表现城市与乡村、现代与传统的冲突时,地方戏曲这种民间文化形态便成为许多作家青睐的小说文本底色。莫言在《檀香刑》中广泛描绘和谱写的“猫腔”、贾平凹表达乡村乡土文明没落的《秦腔》、陈彦以地方戏曲秦腔为背景书写中国社会40年风雨交叠的《主角》等等,都是如此。

但同时,戏曲作为传统的文化资源,它在小说文本里承载着更广阔深远的意义。因为戏曲演员一旦成为作家描绘的重心,那么戏曲可能就只是辅助作家完成对个人、人生、社会的认识与看法。毕飞宇的《青衣》和李碧华的《霸王别姬》就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与此同时作家创作的独特性及小说本身奇异的表现力使得两部作品在叙事时间的跨度、表现重

点、价值吁求、艺术风格等方面各有千秋,因此这两者才有了比较的缘由和价值。

一、岁月静好与时局动荡

时间和空间一向是建构小说文本的重要因素,当文本中的故事时间早于作家的写作时间时,那这个小说往往就会带有历史感和纪实感,反之则会带有超现实感。而《青衣》和《霸王别姬》很明显都是写作时间居于故事时间之后。

《青衣》讲的是饰演嫦娥的青衣演员筱燕秋时过二十年重返《奔月》舞台的故事,故事发生于20世纪90年代,通过插叙的方式穿插1958年《奔月》下马和1979年《奔月》刚爆红时的片段。《青衣》文本中的1990年代,如那时中国社会的现实一样,商业浪潮席卷着浮躁、物欲与拜金主义。可“熄火”二十年的《奔月》为什么能在这个时刻重登舞台?凭借的就是烟厂老板“钱还有几个”的物质基础以及“要建设精神文明”^{[1][12]}的思想觉悟。资本指名让筱燕秋再次登台演出,被拯救的不仅是筱燕秋个人,更是整个剧团。一时间烟厂老板成了拯救整个剧团不景气状况的“菩萨”和“伟人”。只是这时的筱燕秋已经40岁,即便嗓音依旧如初,对于青衣行当来

收稿日期:2020-10-09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延安文艺与现代中国研究”(18ZDA280)

作者简介:王俊虎(1974—),男,陕西大荔人,文学博士后,延安大学文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说最美的身段和容貌都不复存在,她的重返舞台之路也因此变得艰辛曲折,但这更像是她一个人的挣扎和困顿,因为整个社会是在大踏步前进的。社会安定、经济繁荣,处于这个和平时代,能有幸重返舞台,个人有再多困难也都要克服。何况筱燕秋一心只想演嫦娥,她坚持认为“我就是嫦娥”^{[1]125},甚至不愿意任何人站在舞台上演嫦娥。筱燕秋不惜和师父李雪芬抢嫦娥,和徒弟春来抢嫦娥,甚至近乎癫狂地拿热水泼了师父李雪芬。

但这是毕飞宇为她设定的和平年代,“小说家对叙事的文本机制的把握,首先表现在对时间的有效利用上”^{[2]275}。因为倘若换一个年代,筱燕秋受到的惩罚可能就是直接驱逐出剧团,甚至被“流放”,她也不会有重返舞台的机会,毕飞宇想要表现的筱燕秋的“那种抑制感,那种痛,那种不甘”^{[3]32}也就无从下手。正是周遭的一切安宁稳定,筱燕秋的欲壑难填、野心勃勃才会显得那么鹤立鸡群,人物身上的悲凉与无奈才愈加深重。小说中人物命运的悲喜祸福永远少不了时代背景的共谋,或者说,人物行为举止的可憎可恨可喜可悲的各种形态均是在时代的映衬下才凸显出来的。

反观《霸王别姬》,围绕着男旦程蝶衣和师哥段小楼一生的爱恨情仇展开叙述。李碧华从1929年记录到1984年,时间跨度较大,而且这段时间正是中国历史上风起云涌的时间,从日本侵略到抗日战争再到国共内战、新中国成立、“文革”十年,以及改革开放,时代的动荡不安、波诡云谲呈现在每一个人身上。以作者着墨最多的程蝶衣为例,程蝶衣九岁被母亲送到戏班学唱戏,十二岁时被前朝公公狎嬉,正当红时失身于台下的“霸王”袁四爷,日本侵略中国时他为救师哥给日本人唱戏,“文革”时又被打倒、下放到甘肃酒泉,但这些还只是最粗略的其漫长人生节点的罗列,程蝶衣实际上受到的戕害和打压远超于此。

徐岱在《小说叙事学》中讲:“时间的跨度也是一个功能手段,其实质决定着故事的密度。一般来说,跨度越大密度可以(而且也必然显得)相对变小。”^{[2]284}确实,作家一挥笔写就程蝶衣、段小楼等人物的大半生,因为所涉时间跨度过大,作家不可能对每件事情精雕细琢,往往是通过场景设定氛围和建构文本;并且“在一定范围内,故事中的时间如果在向上属于‘过去’,便常会赋予文本一种感伤色彩”^{[2]281}。由此,动荡不安的时代加上人物颠沛流离、求而不得的命运,使得《霸王别姬》在众所周知的虞姬与霸王感情纠葛的交织之外,深层次上想表

达的是动荡的时代以及权力结构对普通人人生的解构和颠覆。小说结尾,李碧华对1997年香港回归事件的提及,表明她已经将文本提到历史范畴,在她看似绮丽凄艳又漫不经心的语言风格下,实际上是想要揭示时代生活并追问历史的。

在《青衣》中,毕飞宇更是在利用时代背景——通过时代的岁月静好,映照筱燕秋等人物的生存困境和生活痛感;《霸王别姬》则反其道而行之,李碧华建构程蝶衣、段小楼等人物,是为了借他们的个体宿命来表现时代的波诡云谲。相同的是,两部作品都在通过各自的方式展示着时代与人物关系的密切,为小说文本服务,为作家想要传递的思想和意识服务。时代的真实面貌离不开具体的人物来彰显,人物也在时代的映衬下才真实可感。

二、宿命难违与伤痕弥合

或许是出于对戏子属于“三教九流”的传统观念的考量,《青衣》和《霸王别姬》中作家都对主人公唱戏的缘由进行了阐释,但由于两部作品各有其关注的重心,因此主人公唱戏的原因也不甚相同。《青衣》中这样描述筱燕秋的出场:“天生就是一个古典的怨妇,她的运眼、行腔、吐字、归音和甩动的水袖弥漫着一股先天的悲剧性。”^{[1]113}剧团的老团长说她“命中就有两根青衣的水袖”^{[1]114}。筱燕秋就像是为演嫦娥而生的。嫦娥是什么人?中国传统神话中因吃错药飞天升仙、居于清冷的广寒宫的人。嫦娥的命运就是悲剧的,筱燕秋的行为举止也同样弥漫着悲剧性。在毕飞宇的笔下,筱燕秋“像一台空调,凉飕飕地只会放冷气”^{[1]123},总是给人凛冽冰冷、不好接近的感觉。她似乎对什么都提不起兴趣,与丈夫面瓜的婚姻是她的无奈之选,对女儿也并不喜爱,她唯一感兴趣的只有演嫦娥,她生命的活力和生机都复现于得知自己要重返舞台的时刻。毕飞宇对筱燕秋这种嫦娥宿命的设定,将筱燕秋接下来不惜一切代价为登台做准备的举动都合理化了。筱燕秋拼命吃药减肥、打胎,都是为了演嫦娥。她上了台,就不愿意下台,也不管剧团A档B档演员轮换着演的规定,霸占着舞台,她坚持认为她才是嫦娥。

毕飞宇说:“人身上最迷人的东西有两样:一、性格;二、命运。它们深不可测。它们构成了现实的与虚拟的双重世界。”^{[3]49}显然,性格就是现实世界,命运是虚拟世界。就筱燕秋来说,她清冷偏执,似乎是她的性格决定了她的命运。但实际上,“命运才是性格”^{[3]31}。筱燕秋出于对嫦娥清冷幽怨形象的执念,才会对师父李雪芬扮演的英姿飒爽的嫦娥横加嘲讽,甚至向师父泼热水;她出于重返舞台的渴

望,才会自愿用身体跟老板做交换;她出于对“我才是嫦娥”信念的坚定不移,才会出尔反尔霸占舞台。她的性格绝不是决定她命运的先导,因为她明明孤高冷傲,不太可能做出那些事,反而是她的宿命决定了她的性格,是命运把筱燕秋一步步推至台前的,她是唱青衣的料子,“是嫦娥”^{[1]197}。但现实的荒诞也就在于此,“每个人都渴望实现自己,但恰恰心想事成”^{[3]31},戏台上的筱燕秋虽然像极了嫦娥,但其实“这个世上没有嫦娥,化妆师给谁上妆谁才是嫦娥”^{[1]202}。徒弟春来更年轻,身段婀娜,上了妆的春来其嫦娥扮相同样好看,春来才更像嫦娥。

在筱燕秋身上,几乎完整地显示了宿命的不可违性,说是冥冥之中也好,偶然恰巧也罢,总之,正是由许多个偶然的凑巧,才构成了宿命的必然。我们能对世界做出的唯一解释就是虚无与荒诞,而荒诞正是来自命运的偶然性。如同“吃错药是嫦娥的命运,女人的命运,人的命运”^{[1]192},事物的发展很多时候都有外力的不可抗因素,我们唯一能做的就是接受,无论是痛苦还是幸福。命中注定筱燕秋要演嫦娥,同时注定她演不了永久的嫦娥,她只能不甘,只能悔恨。但从另一种维度来说,正是这种悔恨和不甘,让她像极了吃错药独守寂寞的真嫦娥。相比之下,《霸王别姬》中男旦程蝶衣的舞台之路就没有什么宿命可言,更像是为一生伤痕的修补缝合。程蝶衣九岁被母亲送进戏班,被师父逼着学戏并唱“我本是女娇娥,又不是男儿郎”^{[4]29-30},在师父的规训下,程蝶衣渐渐开始认同他的女性身份。后又被倪老公狎嬉,他的心理性别基本动摇为女性性别。加上师哥段小楼对程蝶衣照顾有加,师哥是台上的“霸王”,程蝶衣是“虞姬”,程蝶衣在舞台情境的潜移默化下,就认定师哥段小楼是他可以一生相守的人。他并没有打算说出这个秘密,只想默默与段小楼台上台下互相照顾,相伴一生。直到段小楼遇见了妓女菊仙,并且与菊仙结为夫妻时,程蝶衣的嫉妒潜滋暗长,开始与菊仙明争暗斗。可他的生理性别注定了在现实里菊仙才是那个能陪伴霸王的真虞姬,三人的感情纠葛至此牵绊一生。

不同于筱燕秋命中注定般地为戏痴狂,程蝶衣是因爱而迷戏的,刚进戏班时程蝶衣处处被人排斥,他盼着母亲来接他,是段小楼(小石头)的关心和疼爱支撑着程蝶衣在戏班待下去。程蝶衣在段小楼那里能得到类似于母亲般的呵护和安全感,他是因为喜欢师哥段小楼,才喜欢唱戏。童年时被母亲抛弃的伤痛,使得程蝶衣终其一生都在寻找一种可以依附的安全感。这种安全感他只有在台上演虞姬时才

能找到,所以当菊仙和段小楼在生活里夫唱妇随时,程蝶衣选择了更加“疯魔”地唱戏,一来他可以沉浸在戏里,始终以“虞姬”的身份和“霸王”在一起;二来他可以麻痹自己,逃避“霸王”已和菊仙在一起的现实。破“四旧”时,程蝶衣拒不上交戏服行头,外人看来觉得他是戏痴戏魔,其实他是对爱情的誓死守卫,他始终觉得自己穿上戏服就是虞姬,“只有在台上,才找到寄托。他的感情,都在台上掏空了”^{[4]147}。唱戏成了他弥合伤痕拥抱爱情的唯一手段和工具,他只有在台上时爱情才圆满。当1980年代程蝶衣和段小楼在香港久别重逢时,程蝶衣又要求合唱一曲,他要圆梦,圆“我这辈子就是想当虞姬”^{[4]248}的梦。程蝶衣的舞台之路更多的是爱情的感召与催化,他对唱戏的热忱完全是他对爱情期望值的投射。这也符合李碧华一贯的写作主题,在言情圣手李碧华的小说里,永远都离不开情欲纠葛。但无论是筱燕秋那样天生的青衣胚子,还是程蝶衣这样因追求爱情将自己毕生都沉浸在戏剧舞台中的戏嗜,都显示了戏剧能带给舞台名伶生命诗意和激情的享受,也因此她们为唱戏做出的斗争和反抗才显得令人敬畏和心疼。

三、女性关怀与社会观照

毕飞宇曾在访谈里说,“筱燕秋是一个我必须面对的女人”^{[3]31},筱燕秋对作者的意义在于无视筱燕秋就是无视生活。因为筱燕秋的经历和命运包罗着世间生命困境的真相,尤其是女性身份体认和欲望追求的真相。筱燕秋痛苦、不甘、冰冷、霸道,她对什么都不在乎,除了演嫦娥。同样地,毕飞宇的名作《玉米》中的玉米也是在追逐自己想要的权力,甚至不惜利用自己的身体达到目的。但毕飞宇女性人物形象画廊中的她们,面目并不可憎,反而令人心生悲悯。毕飞宇擅于刻画这些女性的心理,他认为自己“‘久久望着’的其实还是人的命运,准确地说,我们的命运,我们心灵的命运,我们尊严的命运,我们婚姻的命运,我们性的命运”^{[3]20}。

而人类的命运,尤其是人类命运的悲剧性,往往是通过女性——这个社会中的第二性彰显出来的。长久以来,性别观念的因袭和制度的偏颇决定着女性身上总是伴随着更多的伤痛与烙印。女性群体在社会中的弱势地位,让她们时常处于性别藩篱之中,她们更容易被社会的权利结构所挟持。所以当个人的命运在小说中呈现出来时,往往就已经涵盖了跟女性密切相关的婚姻、心灵、尊严等多个方面。筱燕秋对烟厂老板主动献身,是因为老板的钱和权才让她有了复出的可能,她需要报答,这是行当里的潜规则,

“从古到今反正都是这样的”^{[1]165}。筱燕秋的欲望诱引她被权力异化,春来也同样如此,她们都得依偎在“伟人”身边,她们的职业性质和性别决定了她们要取悦权力、取悦金钱,这是她们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毕飞宇慨叹筱燕秋的命运,筱燕秋最终“只能站在冬天的风里,向漫天的雪花抒发她无泪的哭”^{[3]31}。

筱燕秋是青衣,“是女人的极致境界”^{[1]151}。正因如此,筱燕秋的人物形象才更具有张力,她的妥协与迎合、偏执与反抗都显得真实且珍贵。“中国女性特有的韧性使她们在做出某种努力的时候,通身洋溢着无力回天还挣扎、到了黄河不死心的悲剧气氛。”^{[3]32}毕飞宇试图用一个筱燕秋反映千万个女人,他想表现的是一种女性追逐理想但受困于社会环境或自身因素的抓挠感。他在筱燕秋身上投注了更多的女性关怀,并未以男权视角嘲讽筱燕秋为实现理想所做的妥协与苟且之事,他始终悲悯地注视着筱燕秋。

无独有偶,《霸王别姬》里不仅刻画了菊仙这样的真女性,还塑造了程蝶衣这样具有女性化心理和思维的男性。某种程度上,菊仙和程蝶衣都是真虞姬,她们都甘于并敢于为霸王而死,她们对段小楼的爱热烈而赤诚,只是这个霸王有些懦弱,不够勇敢。菊仙虽是青楼女子,但她丝毫不媚权贵,她坚定地追随段小楼,洗尽铅华,渴望过平凡夫妻的生活。段小楼为了保护菊仙的安全以让她死心,故意说“我不爱这婊子!我离婚!”^{[4]215}时,菊仙毅然决然地选择穿着红嫁衣自缢。她用死来证明自己的真心和清白,“君王意气尽,贱妾何聊生”^{[4]217},这是菊仙对爱情的执着,更是许多中国传统女性节烈观的写照。李碧华塑造这样一个善良勇敢的节烈女性,字里行间也洋溢着李碧华对她的尊重与敬佩。但无论菊仙还是程蝶衣,李碧华着重凸显的是:他们都是时代的注脚,他们的一生正好纠缠于中国社会一段政权更迭、动荡不安的社会历史时期。他(她)们无权无势,生存艰难。菊仙被赵七爷戏耍,程蝶衣给袁四爷当像姑,他们规避不了权利的迫害。他们既是社会的底层人物,也是时代的牺牲品。就连程蝶衣身边的侍从小四也不能逃离这样的怪圈。开始小四对程蝶衣毕恭毕敬,当“文革”来临时,小四摇身一变成了红卫兵,是他把程蝶衣等人拽下了戏台,斗到了谷底。权力是能够异化人的,也同时迫害人。

李碧华的作品时常披着爱情的外衣,实际探讨的却是关于人性、命运、历史等深邃主题,“许多严肃文学探讨的二元对立的范畴——个人与体制、边缘与中心、男权与女权等问题,在她的作品中都有了

流行文化的诠释方式”^[5]。正因如此,她的作品可以接近大众的真实思维,她用心理独白式的文字和狭邪的语言风格消解着严肃庄重的宏大叙事,让读者易于接受,又不失丰厚的内涵。文学作品的宿命就是被看,而且看的人越多越好,只有先达到这个目的,文学才可能施展它洗涤心灵引发思考的效用。李碧华显然深谙此理,她的作品受众很广。就创作普通读者喜闻乐见的小说来讲,李碧华无疑是成功的。但她也不忘作家承担的社会使命,她的小说关照的是整个社会。《霸王别姬》中,对程蝶衣刚进戏班时就被母亲剁掉骰指の設定,隐喻着香港曾被切割给英国当殖民地的历史处境。小说末尾在不经意间讨论1997年香港的回归问题,也是李碧华的一贯特色,她擅于“把对于香港自己历史的追问引领到对于祖国历史的关注中去,激发出一部分香港人的民族意识和爱国情怀”^[6]。因此相比《青衣》,《霸王别姬》关注的重点更多是对一个时代的思考,是对社会与历史的审视。毕飞宇倾向于对女性命运这个点进行深度挖掘,李碧华侧重于言说社会、时代与人性。

四、诗意流淌与电影质感

《青衣》和《霸王别姬》都是有鲜明艺术风格的小说,《青衣》虽然讲的是筱燕秋的悲剧,但却显得唯美,意境悠长,几乎处处都弥漫着诗意。因为毕飞宇最早是个诗人,他在写作时一直非常关注“生存以及诗意地生存”^[7],其小说不经意间就会流露出诗意。嫦娥奔月本就是动人的神话传说,毕飞宇塑造出筱燕秋这样具有清冷孤傲气质的人物,让她去演《奔月》,当嫦娥,再恰当不过了。

二十年来筱燕秋始终以一种“我就是嫦娥”的自觉,保持着嗓音的流转、音域的宽广,她的理想就是当嫦娥,她丝毫不顾及嫦娥这个人物本身的虚拟性,这种想成仙的追求本身就是富有诗意的。筱燕秋在台上表演时,宛若“嫦娥置身于仙境,长河即落,晓星将沉,嫦娥遥望着人间,寂寞在嫦娥的胸中无声地翻涌,碧海青天放大了她的寂寞”^{[1]192}。

毕飞宇用准确而生动的描写勾勒出一幅广袤无垠的夜空图,嫦娥、晓星等意象的运用更为小说增添一股庄重又悲凉的气氛,唯有夜空广阔才凸显出独自伫立的嫦娥的落寞和孤单。这样诗意化的描述在《青衣》中俯拾即是,它们在表达主旨方面常有一种“模糊的精确,开阔的精微”^[8]的独特力量。小说最后筱燕秋在大雪纷飞中边唱边舞,她裤管上流下来的液滴将白雪砸出一块块黑污,原本是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忽然间邪恶与肮脏就裸露出来,这种黑与白的对比,语言的反转氤氲着独特的艺术美感,也

让人物形象更有张力,情绪韵致立马就有了。

相比《青衣》的诗意先行,《霸王别姬》则是戏剧张力先行,它的画面感、镜头感都极强。小说开篇,为了点明故事发生的时空背景,写到报童吆喝着“东北军戒严了,日本鬼子开打了”^{[4]5},紧接着作者又介绍老北京天桥上的各种小吃摊子,老北京卤煮、盆儿糕、火烧等各种京味儿美食,还介绍各种变戏法、说书、练气功的杂耍,生动形象的画面可视可闻可感,刺激着读者的感官与想象,使得文本描述的场景立马在读者眼前铺展开来。李碧华不仅注重具体场景、画面的塑造,还在小说中创造很多电影镜头中的转场和蒙太奇效果。比如程蝶衣进戏班头一年被师父带着去寺庙里拜神讨赏,他和师兄弟一起叩首,身旁的段小楼跪时还是童颜,等头抬起,“只见他一张年青俊朗的脸,器宇轩昂”^{[4]59},李碧华只用一句话“一下、两下,芳华暗换”^{[4]59},就把十年光阴的流转表述出来,巧思出众,堪比电影镜头的蒙太奇效果。小说中大量的对白串起故事的情节,语言的精准使对白不仅展现了人物心理,还像是电影分镜头的说明。

李碧华擅于描绘热闹的场景,人声鼎沸的感觉被李碧华写得活色生香,而且越是人多的场景,越是能把每个人的眼神动作都刻画得独一无二,特色鲜明有辨识度。据说李碧华在写《霸王别姬》之前做了大量的史料查阅工作,这才使其描绘的画面真切熟稔。小说画面的生动具体,为它之后转变成电影画面提供了巨大便利。一般来说,改编电影跟原著小说往往貌合神离,但《霸王别姬》的改编电影和原著小说的主要情节完全是契合的,且《霸王别姬》电影夺得了多个国际电影大奖。这除了说明导演能够

领悟小说的内涵和深意,也说明小说本身有着很好的电影质感。李碧华的小说总有爱情母题,文字风格偏世俗化,叙述的视觉化倾向、故事性强的特征共同“使得李碧华的小说充满了戏剧张力,搬上银幕,总能牵动观众的情绪”^{[4]264}。

《青衣》和《霸王别姬》都是戏剧题材小说的优秀作品,由于作者毕飞宇与李碧华生活的地域文化与自身的生命体验不同,以及作品叙事模式与表现主体的不同,导致两部作品在故事的时间跨度、艺术风格、对主人公追求舞台之路缘由的叙述等方面也都迥然不同。两位作家均立足于中国传统文化,从民间资源和文化传统入手,各自将笔下戏剧名伶对舞台的追求之路进行了极富个性的书写,为读者呈现了同一戏剧文化元素下截然不同的故事模本,也彰显了戏剧人物悲剧不同的表现方式。

参考文献:

- [1] 毕飞宇. 名家中篇小说典藏: 青衣[M]. 杭州: 浙江文艺出版社, 2011.
- [2] 徐岱. 小说叙事学[M].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0.
- [3] 毕飞宇. 沿途的秘密[M]. 北京: 昆仑出版社, 2002.
- [4] 李碧华. 霸王别姬[M].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93.
- [5] 黄静. 徘徊在雅俗之间: 香港作家李碧华小说论[J]. 华文文学, 2008(6).
- [6] 吕冰心. 一个人, 一座城市[D]. 合肥: 安徽大学, 2005.
- [7] 张钧. 小说的立场: 新生代作家访谈录[M].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2.
- [8] 毕飞宇, 汪政. 语言的宿命[J]. 南方文坛, 2002(4).

(责任编辑 刘海燕)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Drama – theme Novel *Qingyi* and *Farewell My Concubine*

WANG Junhu, CHEN Nan

(College of Literature, Yan' An University, Yan' An, Shaanxi 716000, China)

Abstract: As an important cultural resource, drama elements are often used by different writers in novel creation. As the excellent works of drama theme novels, Bi Feiyu's *Qingyi* and Li Bihua's *Farewell My Concubine* are excellent works of drama – theme novels. Through the dramatic stage, they show different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perspective the way of seeking drama and the character and destiny of the famous actors on the opera stage, construct different literary themes and show different artistic styles. The two writers seem to depict the tragic life of dramatic actors, but in fact they describe the world's various situations and even historical destiny. To a certain extent, they show the clos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dividuals and the times, as well as the reflection and inquiry of women's tragic fate.

Key words: blue clothes; farewell to the concubine; drama – theme novels; women; comparison

老舍戏剧创作的个人与时代渊源

董克林

(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江苏无锡214000)

摘要:老舍的文艺创作,自抗战由小说转向剧作后,戏剧创作成为他的文学创作主线。为抗敌救亡,他投笔“梨园”,“举戏为枪”。1949年以后,他从“海归”之初的心有余悸到敢于冒险,再到潜心剧作,在“双百方针”、政策引领、“集体创作”、自我审视中,及时调整剧作生存空间,探寻历史与艺术真实统一的“戏”,坚守并践行着自己的“戏剧梦”,为东方舞台增添了一抹彩虹。

关键词:戏剧梦;戏剧抗战;新中国政策剧;人民艺术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3

中图分类号:I207.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11-06

老舍是创造了东方舞台奇迹的戏剧大家,他有着与世界戏剧大师相同的品质。既有个性天赋又与时代心有灵犀,用舞台阐释真理与光明、揭露丑陋与罪恶,为世人搭建了经典剧院。老舍“戏”的突出特点,是作者托起一群小人,取一派俗语方言,举重若轻地走上了戏剧舞台。老舍铸就经典的过程中,时代召唤与作者内心呼应,他勇立潮头,自觉担负起洞察历史和现实的责任,悉心褒扬真善美,掀开遮挡丑恶的那层面纱,竭力修复人们本应阳光却出现了残缺的那部分人性。为抗战,老舍偶入“梨园”,同时也是他天赋与志愿之必然。新中国建立,老舍为祖国旧貌变新颜而欢呼雀跃,钟情人民舞台。两个时代中的老舍,做到了以国家和民族需要为己任。特别是老舍以回到新中国作为自己剧作的新起点,在政治高度空前的时代背景中探寻戏剧艺术与政策框架的平衡,于雷池内探寻自己心中的“戏”台。老舍将人民艺术与戏剧夙愿融为一体的创作事实,让世人看到了他的梨园笔锋饱含了一个东方文人的良心与以小人物为“戏”的东方舞台。

一、老舍创作转向“梨园”的御敌性、大众性与志愿性

老舍首入“梨园”始于1938年,处女作是《残雾》。该剧揭露陪都的国民党沿袭封建恶习而暴露出的光怪陆离现象,寓意要拨开当局和人们心头的

雾霾,唤醒国人共同抗日。从此,老舍紧贴抗战需要,将小说名家搁置一边,笔端落在了戏剧之园。

老舍首入“梨园”有以下主要特点。

(一)具有创作转向的御敌性

首先,老舍把参加抗战当成个人报效国家的使命。我国自古为民族大义而牺牲个人利益的仁人志士举不胜举,抗战时期亦是如此。此时作家转向通俗文艺创作的,老舍是杰出代表。他不顾妻儿,只身奔赴抗战中心,指出:“我们必须先对得起民族与国家。有了国家,才有文艺者,才有文艺。国亡,纵有莎士比亚与歌德,依然是奴隶。”^{[1]213}与文艺工作者共勉,强调国家与个人、文艺与国难的荣损利害关系。老舍在抗战中自觉担负起文艺抗战的时代使命,用实际行动来实现抗战的个人价值,彰显个人“必须参战”的御敌性。老舍在艺术上心仪莎翁、歌德,在抗战危难中力行作家担当,践行“艺术家的心是时代的心,把时代忘了的,那心便是一块顽石”^{[2]313}。

其次,老舍投“戏”从戎,用戏剧作为御敌利器。老舍高举“文协”旗帜,力推戏剧抗战,完全丢掉小说家身价,举“戏”为枪:“在抗战期间已无个人所言,个人写作的荣誉应当改作服从——服从时代与社会的紧急命令。”^{[1]102}在残酷战争的当时,时代与社会对文艺的命令是什么?绝不是端庄典雅的剧场舞台,更

收稿日期:2020-11-12

作者简介:董克林(1958—),男,河南夏邑人,南京信息工程大学滨江学院教授,研究方向:老舍研究。

不是靡靡音乐咖啡厅,而是亟须为我军将士鼓足士气、提振精神的一呼百应、立竿见影的精神食粮。那么,在刀光剑影、一片血腥的前线,何种体裁、形式与内容更可取,更容易凝聚人心、鼓舞士气?老舍认为,曲艺既说唱又表演,脍炙人口,最适合军民大众文化接受口味,最容易走进军民心里。因此,老舍选取“戏”作为自己御敌武器。但是,战场“戏”台而非经典剧场,具有演出环境的“裸露”性、演出内容的“杀敌”性、演出效果的“鼓动”性。老舍正是在这种前线将士急需的特殊戏台上,取传统曲艺的“俗”,去传递同频共振的精神,努力践行以“戏”为抢的御敌性。

再次,老舍实现了用“戏”台抗战的个人和文艺价值。老舍“为正义而写,为抗战而写,自觉为抗战摇旗呐喊,将创作视为谋求民族独立的有力武器”^{[3]34},使出了一个文人的洪荒之力,做到了“文人总是有良心的”^{[1]201}。老舍踏着前线战鼓节拍,紧贴军民浴血奋战的战场而运笔,喜也通俗、痛也通俗,勇做战时文艺弄潮儿,搭起一个个抗战戏台,擂响了“京腔大韵”的战鼓,实现了用戏台抗战的个人价值。老舍的“戏”台,悲伤显血性,笑声含剑影,俗剧草根情,戏剧成为士兵奋勇杀敌的精神食粮,实现了用“戏”台参战的文艺价值。

(二)具有创作转向的大众性

首先,老舍的抗战剧体裁是大众性的。老舍认为:“抗战需要戏剧,戏剧必须抗战,二者相依相成,无可分离。”^{[4]233}“我们既是为‘宣传’,我们就应该放下‘艺术不艺术’这个问题。”^{[4]213}只要艺术能鼓舞、凝聚军民心气儿、能做“刀枪”,就是“好艺术”。就抗战文艺与时尚艺术之间的关系、抗战急需的通俗文艺与阳春白雪孰轻孰重等问题,老舍自有独到见解。老舍将耳熟能详的植根于北京街头巷尾的曲艺作为抗战剧体裁,用带有民族的、地域的、经久不衰的表演技巧,大众喜闻乐见的说唱形式献给军民,增强文艺的战时感染力。为此,老舍选取的剧作原则是:“抗战第一,艺术第二。”“抗战第一”就是大众性为先。大众性文艺作品就是要用文艺感染力鼓舞动员国人手挽手、肩并肩地奋勇杀敌。“救国是我们的天职,文艺是我们的本领,这二者必须并在一起,以救国的工作产生救国的文章。”^{[4]113}老舍送戏剧、鼓词、快板、相声、话剧、诗歌等到抗战前线,直观生动的表演形式使说唱内容立竿见影地与战士、民众的情感产生共鸣,用脍炙人口的“段子”产生凝聚人心、奋勇杀敌的文艺力量。

其次,老舍在通俗与艺术之间取长补短,使其有机结合。第一,通俗性与艺术性相结合。“通俗文

艺必须成为文艺;通俗而不文艺,正如雅典而不文艺,都必失败。”^{[4]191}表演场地是战场,露天日光胜似舞台灯光,京韵大鼓、快板的音、调、节奏胜似剧场音响;说唱音调押韵和谐,朗朗上口,与“音响”和腔和韵,胜似剧场台词。相声说学逗唱,寓庄于谐,乃雅俗并存之艺术,更容易与听众共鸣互动。这些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戏”,本身就是民间艺术,只是这些土得掉渣儿的街头艺术用另一种形式代替了剧场舞台的综合元素罢了。经过老舍加工的这些“戏”,通俗中有文艺、文艺中有通俗,二者相得益彰。在通俗题材基础上推陈出新,创造出有价值的抗战文艺。第二,戏曲性与欣赏性相结合。老舍说:“戏剧是必须表演的,因而也就更适合于宣传。”^{[4]207}俗话说,“算子上的窝窝,捡熟的拿”。对老舍来说,最熟的“窝窝”,莫过地方曲艺。老舍既为单弦、大鼓、梆子撰写演词,又将这些艺术元素穿插到抗战剧里,使得表演、说词、琴鼓、节奏交融,鼓弦声声,腔韵悦耳,和声“交响”。传统戏曲的一腔、一调、一嗓门,一举、一动、一眼神,惹得军民欢喜,戏毕意犹未尽。老舍的京味儿“窝窝”放进抗战“戏”台,填充抗战文化心理、抗战文化艺术和抗战民族语言,融戏剧鼓动与欣赏接受为一体,上演“大刀向鬼子头上砍去”的故事。通过具有欣赏性的“戏”,达到易接受、易鼓舞,戏与人、人与戏“身临其境”的效果。第三,故事性与写意性相结合。老舍的抗战舞台设在战场前沿,编剧选取的故事为真人真事,事迹生动感人。正因为故事内容来源于现场,来源于军民,来源于真实,表演才能与军民零距离对接,故事的意义才会放大与延伸。“战场”即“戏”台,“戏”台即“战场”。将士英勇善战、流血牺牲的事迹变成“戏”声飞入战士心中:一刀一枪充满杀敌寓意,一草一木饱含民族深情。既有身临其境、声泪俱下的场面,又有超越舞台、凝聚人心的气氛,更有战场“舞台”深邃的寓意。其想象和意境空间广阔而深远,舞台“六七人百万雄兵”,产生“戏”境满满、激情无限、立竿见影的效果。

(三)伴有崇尚戏剧的志愿性

老舍戏剧抗战的志愿性综可上鉴。这里的志愿性,是指老舍对戏剧的喜爱与崇拜。首先,老舍的戏剧志愿是一个多种因素的综合体。老舍具有多才多艺的满族代际传承,北京街头巷尾“下里艺人”的曲艺熏染,自身独具戏剧天才的潜质,文艺复兴眼界大开的启蒙,其父“爱国优先”的红色“家训”,等等,老舍崇尚戏剧的志愿是一个融内外因、家庭、民族、环境、阅历等因素的综合体,包括天、地、人与戏而形成

的四性合一的“戏”愿。其次,老舍有一小“秘密”与大“志愿”。他曾把戏剧称作“神的游戏”并“秘密”创作,他的《神的游戏》写于1934年10月,而创作转向是在1937年之后。《残雾》是公演,而小“秘密”是轶闻,是试验,是“头胎”,是老舍心底“戏事”。老舍说:“我作过戏剧,这只有我与字纸篓知道。”^{[5]39}老舍把戏稿丢进纸篓,此“秘密”作者知、天地知、纸篓及那N页“弃墨”知。这一“秘密”见证了老舍心中的戏剧志愿由来已久,其转向剧作绝非一时心血来潮,而是有着作者深深的思想、感情和艺术根源的。最后,老舍的志愿与时代结上了“戏”缘。老舍如同莎翁乃“时代的灵魂”、但丁“新时代最初的一位诗人”等文学大家创作出经典巨著那样,具有与时代同呼吸共命运的鲜明特征。老舍的爱国良心一遇抗战大时代,就撞出了戏剧艺术的火花。老舍首入“梨园”,既实现一个文人爱国的诺言,为军民“送戏送粮”,又剧作“试水”,为自己心中的“戏”打上了“抗战”的烙印。

老舍还有一个“好剧本”的志愿。1938至1944年之间,老舍完成剧作11部,还创作了鼓词、坠子、快板、相声、数来宝等139首。抗战作品“战戏连台”为老舍带来了“热身”实践,但在艺术效果上,特别是小说式戏剧入“梨园”,出于“应急”,差距在所难免。而对心中具有“秘密”的老舍来说,“战戏”意犹未尽,内心深藏“遥望好戏在险峰”的登攀愿望和梦想。老舍说:“等到太平的时候,恢复了安静生活,再好好地去写一两个像样子的剧本。”^{[4]346}并表达出再创精品的愿望:“我可是有个志愿——希望能写出一本好的剧本来。”^{[1]355}为完成此愿,老舍自勉:多读书,顶好到外国去读几年书;有戏必看,养眼;去剧团做二年职员;学演戏,扮个角色。此“勉”于1944年初,他新添《谁先到了重庆》、《王老虎》(与赵清阁、萧亦五合作)、《桃李春风》(与赵清阁合作)三部抗战剧(共九部话剧剧本)之后,在老舍看来,台上体验艺术、台下体验生活、吸收“西洋”养分等,想从“现身”舞台中,实现对戏剧艺术的“说法”。如此一番自勉,足以说明老舍心中的小“秘密”早已向文艺复兴经典剧作看齐了,并有意要创作出世人瞩目的东方之“戏”。可见,如此小“秘密”已经达到了戏比天大、“剧作等身”的高度。至此,老舍创作好剧本的愿望迫不及待,“戏”势待发,备“戏”上弦,在寻找着能装入时代与艺术并成为经典的舞台。

1946年初,老舍与曹禺赴美讲学。老舍此行旨在再添西洋艺术体验,进一步打磨戏剧“金刚钻”,为创作好剧本增添能量。

二、老舍再入“梨园”的雪耻性、冒险性与舞台性

1949年,身在异乡的老舍被社会主义新中国深深吸引。他回国后创作《方珍珠》,再入“梨园”。“方剧”描写了民间艺人经历新旧社会两重天所形成的巨大落差,说明社会主义制度让人民重获天日,有了新生。尽管该剧是抗战胜利的喜悦曳引了老舍咀嚼成功果实的记忆隧道,也是新中国一洗华夏百年耻辱的现实令其沉浸在高奏凯歌的兴奋之中。

新社会的强劲东风,深深地打动着老舍。主观上,他感受到一种理想的舞台离自己越来越近了;客观上,关于新中国老百姓的戏也在源源不断地涌进他的创作视界。但是,一位“海归”文人的思想变化即使再神速,也需要过程。此时的老舍,由仰慕,到心有余悸,再到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光明中,他看到了崭新的人民舞台和文艺的希望,让他产生了敢于冒险的创作精神和力量。

(一)老舍再入“梨园”具有雪耻性

新中国成立的喜讯对远在美国的老舍的心灵产生了前所未有的震动,老舍翘首以盼,聆听从祖国飞来的每一段电波,对“生我养我”且换了人间的天涯故土遐想万千,渴望亲吻故乡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东方“电波”清澈而光明,老舍感受到一种洗刷百年耻辱的中国人的光荣。东方曙光的魅力不仅令老舍怦然心动,也鼓槌似的敲击着他志愿报效祖国的心灵。他期待着用手中的笔描绘神州大地的峥嵘岁月,去赞美新中国,去反思历史沧桑中的民族苦难。

尽管老舍已经被崭新的共和国吸引,但单凭隔海耳闻,实差一见。老舍记忆中的华夏耻辱、“帝官封”的淫威、老国民“愚、弱、贫、散、私”缺点等,导致老舍遥望祖国的期望值未及神州大地沧桑巨变的高度,也实际低于令自己魂牵梦萦的那片故土所发生的质的变化与飞跃。因此,老舍满怀豪情回国之时,仍存一丝后顾之忧。自拟约法,不谈政治,不开会,不演讲。对喝过旧社会苦水的老舍来说,有点顾虑乃情理之中。

老舍回国再返“梨园”,喜逢华夏涅槃新生,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迭起,人民有了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英雄气概,新文化建设的强劲东风为老舍带来了触及灵魂、脱胎换骨般的震撼。他回国耳闻目睹到的是“换了人间”的事实,他万分感慨,国家变了,社会变了,人们的精神面貌也变了。如老舍感慨:“啊,我是刚入了国门,却感到家一样的温暖!”“现在,我才又还原为人,在人的社会里活着。”^{[1]415}这正是老舍盼望已久的国家和民族,正是老舍所要看到的时代与国度。“大时代需有伟大艺术作品”^{[4]110},老舍

脑海里的旧版记忆几乎被完全颠覆了,一种理想的舞台使得老舍的“三不主义”迅速褪色,“躲进小楼”的顾虑变成亟须走进现实生活、服务社会主义建设的热情,要用“剧艺”描绘新中国新时代。

(二)老舍再入“梨园”具有冒险性

老舍在空前的文艺政策洪流中,快速进入奋不顾身和奋笔疾书状态,他的笔锋温度与神州大地旧貌换新颜的现实高度契合,在书写社会主义新人新事新作品时,存在着冒险性。

他写《龙须沟》是个最大的冒险。因为剧本的主题及思想、艺术取向、主流意识形态等时代色彩对作者创作形成了诸多压力。国内百废待兴,社会主义建设浪潮汹涌澎湃。境内外敌特猖獗,飞蝇绕耳;国际帝国主义妄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此时的人民政权,经受着生死考验。在如此敏感期,一位作家为国家、为人民谱写赞歌,政策站位的角度、高度是否符合时代要求,思想与艺术能否为人民群众喜闻乐见,是功臣还是罪人,这是老舍“最大冒险”。

是冒险,还是明哲保身?老舍选取了前者。冒险对一个名作家来说意味着什么不言而喻。但是,当一个人对自己的民族和所追求的事业深深眷恋时,是无所畏惧、没有后顾之忧的。此时此地,老舍心中既有自己向往光明与正义的初心与眼见为实的新时代完全对标接轨事实,又充盈着讴歌人民的情感和舍身忘我的拼劲。他面对冒险,勇往直前。老舍说:“冒险有时候是由热忱激发出来的行动,不顾成败而勇往直前。”^{[4]554}

老舍敢于冒险的力量出处多源。第一,攀登舞台高峰的力量。老舍说:“戏剧是文艺中最难的。世界上一个世纪也许不产生一个戏剧家,因为戏剧家的天才不仅限于明白人生和文艺,而且还须明白舞台上的诀窍。”^{[6]137}老舍在作家践行文艺时代责任与著作等身的精神激励下,决心写出好剧本。一种为时代献身、为艺术献身、为舞台献身的崇高追求成为老舍冒险的力量。第二,确定了文艺创作坐标。老舍回国激动兴奋的同时,保持着一份宁静与淡定,他要审时度势看清找准创作的定位与方向。他研读了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确立“文艺要为政治服务”的思想,既能保证沿着社会主义文艺轨道进行剧本创作,又能在特定的时代环境里攀登自己心中既定舞台的高度。第三,民族复兴梦想的力量。老舍出身贫寒,青少年时正值国弱民穷,国家记忆多为伤痛。近代华夏复兴仅仅是有识之士前仆后继所留下的一个个“折戟”符号与血染遗愿。当东方巨龙站立,他期望的国家和民族的模样正在

成为现实,既给老舍带来了心灵慰藉和剧作源泉,又给予老舍作一个新中国文人的底气和光荣。第四,满汉文化根脉。老舍饱经满汉文化滋养,血液里流淌的满汉文艺细胞是铁质的,一种血性、敢拼敢打的底色成为老舍冒险的力量。因此,恤民与爱国的老舍要用文艺妙笔来浇灌戏剧新花。爱国国新、爱民族面貌新、爱戏剧梨园新。崭新的眼界为老舍注入了无穷的冒险动力。“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历史一去不复返了。人格回归是老舍冒险创作的动力,以至于老舍回国仅俩月,不仅谋划戏剧,还创作了鼓词、相声、散文、文评等十二篇。

(三)老舍再入“梨园”具有舞台性

老舍回国以话剧《方珍珠》打头炮,再次表露了追寻“梨园”的路子在他心中是情有独钟、“戏”性鲜明的。而之后老舍在十七年的创作生涯中,几乎是以话(戏)剧为主打,为了实现心中的“戏”梦,可谓志向已立,矢志不渝。

老舍不断审视自己的剧作,以求探索舞台艺术。这种审视与探索,既“瞻前”又“顾后”,既“探索”又“追求”。“瞻前”乃世界文坛巨匠及经典是老舍心中永恒的标杆,“顾后”乃抗战剧的艺术差距是老舍需要弥补的短板;“探索”是将西方话剧“写实”与中国戏曲“写意”相结合,是老舍“拿来”经典剧作“洋为中用”的借鉴;“追求”是老舍的志愿,立志在当代戏剧史上抒写一个大大的感叹号,为实现中国作家“戏剧等身”而进行的不懈奋斗。例如,老舍赴美深造,就是在探索中收获“他山之石”。“老舍和曹禺还对当时美国的文艺状况,用心做了考察。他们大量观摩了那里的舞剧、广播剧、音乐剧和话剧。”^{[2]412}如此广泛、深入、系统地了解美国文艺和各种剧艺,老舍的煞费苦心可见一斑。而对心中有戏怀揣梦想的老舍来说,此番“文艺深造”增添了“洋剧”元素。通过诸如此类的国内外、梨园内外“汲取营养”及剧作研判等N次舞台艺术积累,为老舍铺就了攀登东方舞台的一级级台阶。

老舍的舞台由政策方向、承担任务、集体创作与戏剧目标等因素所支撑。政策方向是指老舍在“文艺为政治服务”的原则框架中,找准戏剧创作的坐标。承担任务包括分配任务与主动接受。与老舍在抗战时偶然接受任务速写《残雾》相比,社会主义文学创作与当年尝试话剧时的政策高度、思想深度具有刚性差别。《龙须沟》是老舍主动请缨,《春华秋实》《西望长安》等为任务分配。集体创作是指作家必须遵循社会主义文艺创作模式,老舍一向谦和,注意听取意见。如《茶馆》的幕数、幕与幕之间的数来

宝等,是老舍听取了同行专家建议而形成的。这种创作模式,在一定程度上帮助老舍在接受任务、深入生活、升华艺术“三结合”中对戏剧舞台进行深入探索。老舍先后担任文坛要职,其文艺思想必须紧跟政策变化,并实现对新作品的选取与创作。为了保持剧作的进步性、时效性和人民性,老舍要在创作全过程牢牢把握变化中的政策方向,确保标准的剧作角度与定位。因此,老舍在“政治挂帅”的创作环境约束中,心中始终装着自己的戏剧目标,努力探索具有个性特色的戏剧舞台艺术。

老舍的舞台具有自成一体的特点。

首先,老舍的舞台背景是时代。老舍眼中的“六亿神州”一片勃勃生机,国人以崭新的精神风貌昂首阔步在社会主义大道上。这既是新社会现实大舞台,又是作者内心的大舞台,两个舞台需要在作者的笔端珠联璧合。因为,社会主义舞台时代背景具有“新、高、深”的特点。“新”是指这个舞台是一张白纸,亟须在上面书写最美“戏”卷;“高”是指作家的政策站位要高,要有图解政策的前瞻性、准确性、先进性;“深”是指剧本的中心思想必须深刻,要有宣传人、打动人、教育人的深度。这些特点对老舍来说,有机遇,有了实现戏剧梦想的舞台;有动力,要创作出好剧本;有挑战,要么是英雄要么是罪人;有压力,有在政策刀刃上跳出文艺之舞的难度。一系列因素同时左右着老舍,他只能在紧跟政策、尽情歌颂、完成宣传的框架中,把握好艺术与各种框架的交叉与平衡,书写新中国大舞台的艺术风采。老舍自觉接受条条框框的约束,踏着时代的节拍,用舞台展现旧社会不堪回首的岁月与新社会可歌可泣的时代,展现新旧社会里老百姓的今与昔。老舍舞台还原了时代,时代照亮了老舍舞台。

其次,老舍的舞台人物是芸芸众生。“六亿神州尽舜尧”,人民当家做主的奇迹似甘露滋润着老舍的内心世界,亿万人民群众所迸发出的巨大建设力量,使老舍习惯书写小人物的笔端自然倾向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劳动者。作者在这个时期选取舞台小人物,用了直接赞美和对比赞美的方法。用《龙须沟》“舞台”22个人物,直接赞美了政府为民造福的事实。其中,主人公在两种社会的不同命运,对比赞美了新社会。该剧是老舍深入实地考察并与内心感受相结合的成果,也由此获“人民艺术家”殊荣。用《方珍珠》“舞台”27个人物,特别是“破风筝”一家人在两种社会里的巨大反差,取得了对比赞美新社会的效果。用《茶馆》“舞台”50个人物与世纪风云变化,对比赞美了社会主义的光明。老舍舞台选择

了百姓,百姓钟情老舍舞台。

最后,老舍的舞台以小见大。老舍的舞台以小人物的命运起伏反映时代变迁和社会性质的变化。《方珍珠》民间艺人、“破风筝”一家人、《龙须沟》曲艺艺人程疯子等小人物的命运之变,表现出新社会“为了人”与旧社会“压榨人”的本质不同,厘清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事实与文学创作相统一的逻辑关系。老舍的舞台以小场地为大社会,反映了时代历史沧桑巨变。《龙须沟》以新旧社会两重天的事实,赞扬人民政府为民造福的初心与宗旨。小小《茶馆》,茶余饭后,言谈举止勾画出三段历史画面,反映了半个世纪的社会大事件、历史大变迁。老舍聚焦社会真实生活,并使之与戏剧舞台在真情实感上对接,在梳理人性真善美与撕开假恶丑面具中,突出艺术来源于生活的真实价值,用自然生活情节、极俗的民间语言烘托出“真实”的剧场氛围。他通过社会底层一个个活生生的小人物在历史变迁中的生命轨迹及思想变化,在特定的“故事”或“事件”框架中,把旧社会的阴暗、历史变迁和新中国的辉煌一幕幕搬上舞台,产生台上台下、戏里戏外多重共鸣的艺术效果。老舍的“戏”与舞台共鸣,与观众共鸣,与历史共鸣,与社会时代共鸣,与原汁原味的生活共鸣,与未来共鸣。老舍舞台诠释了社会真实,社会真实填充了老舍舞台。

三、余记

老舍此入“梨园”,由“三不”到“冒险”,再到奋不顾身,紧贴时代脉搏,迸发出一种超常剧作力量:“奋笔疾书”。此种力量既是服务大时代所需,又是作者瞄准戏剧目标、运筹帷幄之有的放矢。此“的”是归国体验,时代给力和志在必得的综合体。这样的“的”是老舍对经典艺术的渴望与戏剧创作的谋篇布阵,也是作者胸有成竹、喷薄而出的剧作激流。老舍为新中国讴歌,为劳动者点赞,不愧为时代和人民的“作家”。“人民艺术家”成为老舍再次开启戏剧“志愿”的“开门红”和信誉“天平”,成为让老舍恪守文学品质人民性的文艺东风,也成为引领老舍攀登戏剧高峰的路径。

老舍笔耕“梨园”,奋笔疾书了一串串“矢”,他高频率按动戏剧艺术的“快门”,抓拍了社会主义建设多彩画面和大时代涌现出来的一个个闪光的人物。1951年到1961年,老舍创作、改写话剧有:《一家代表》《生日》《春华秋实》《青年突击队》《西望长安》《茶馆》《红大院》《女店员》《全家福》《荷珠配》《宝船》《神拳》等12部。其他剧本有:《人同此心》《婚姻法》《柳树井》《大家评理》《十五贯》《消灭病

菌》《苹果车》《杨家将》《青霞丹雪》《青蛙骑手》《拉郎配》等 11 部。作品涉及思想改造、大跃进、三反五反、政治运动,有关政策、法律,破案等,人物有工人、市民、解放军及历史和现实中正反各种人物。这些“矢”蕴含着老舍戏剧创作的多种结合,即新道德与旧道德、文艺性与通俗性、戏剧性与欣赏性、舶来性与原创性的有机结合。这些“矢”博采东西,用“简笔画”似的中国原创,带着与时代的“和声”,带着志在必得戏剧大师的心境,带着戏剧创作质与量的飞跃,把作者内心流淌出来的艺术甘泉献给祖国和人民,献给戏剧和舞台。

研究老舍两闯“梨园”的个人与时代原因时,必须充分理解老舍一生具有爱国、恤民的品德,必须充分理解老舍深谙一个世纪才出一个戏剧家的难度,心中始终装着自己的“戏剧梦”。在此两个框架基础上,厘清两个问题,一是分析老舍剧作的个人与时代渊源,抗战与新中国的成立为老舍提供了戏剧起步和成熟的机遇与舞台,进一步探究老舍的“戏剧梦”在抗战“宣传剧”和新中国成立后“政策”图解剧的优劣和剧艺进步过程;二是必须清楚老舍由小说名家转向戏剧创作,新中国成立后继续倾情戏剧创作,时代平台因素是客观的,也是受限制的,个人志愿是矢志不移的。老舍既有被火红的年代感染而迸发出的激情,又有政策如何打磨剧作艺术所产生的影响。作者两入“梨园”,偶然中有必然。偶然是指作者相遇抗战时代,由抗战舞台起步,新中国“换了

人间”的奇迹催促他为祖国、为人民、为舞台而献身;必然是指老舍深谙戏剧家的分量,心中有一个戏剧梦想,作者将笔端落在戏剧舞台是实现心中梦想的必然之举。因为,老舍的“人民艺术家”带着政府为民办实事、作家为民而书写的使命,《茶馆》之所以香飘世界,是因为它所展现的“帝官封”黑暗时代是与社会主义制度相映衬出来的。

因此,老舍“戏剧梦”启航也好,探索、完善剧艺也罢,都是作者攀登戏剧高峰所经历的过程而已。至于老舍体验到的酸甜苦辣,同时期其他作者都会有所感受,只是角度、深浅有异,对创作生涯乃至人生会产生重大影响。但是,老舍剧作最珍贵的是他对“戏剧梦”矢志不渝,他的“戏”台光照人间。

参考文献:

- [1]老舍.努力,努力,再努力[M]//老舍全集:第十四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2]关纪新.老舍评传[M].北京:北京出版社,2019.
- [3]孔焕周.论老舍抗战时期的话剧创作[J].文艺理论与批判,2004(5).
- [4]老舍.抗战戏剧的发展与困难[M]//老舍全集:第十七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5]老舍.神的游戏[M]//老舍全集:第十五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 [6]老舍.第十四讲 戏剧[M]//老舍全集:第十六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Personal and Times Origin of Lao She's Drama Creation

DONG Kelin

(Binjiang College, Nanjing University of Information Science & Technology, Wuxi, Jiangsu 214000, China)

Abstract: Since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Lao She's literary and creative genre, had changed from novel to drama creation, and drama creation had become his main line of literary creation. In order to fight against the enemy and save China, Lao She devoted himself in the world of drama and treated dramas as his weapons. In 1949, he returned from abroad. From lingering fear to daring to take risks, and then to devoting himself to the drama, he adjusted the living space of drama timely in the “Double hundred Policy”, policy guidance, “collective creation” and self-examination, explored the “drama” of the real unification of history and art, adhered to and practiced his “drama dream”, and added a rainbow to the eastern stage.

Key words: drama dream; drama in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drama under policies of New China; art of people

丰子恺漫画里的“童心”教育观探析

李 信

(集美大学 美术与设计学院,福建 厦门 361021)

摘要:在丰子恺的漫画里,呈现了找回童心、保护童心、放飞童心的“童心”教育理念,其“童心”的主要内涵是:纯洁、自由、充满生机的开明心;想象丰富、与世共舞的自然心;强健、朴实、灵感的心;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正人心。在以开明心、自然心、艺术心、正人心为目标宗旨或方法原则构成的“童心”教育实践和艺术创作里,构成了丰子恺独到而深刻的“童心”教育观。“童心”教育观对我们的当代教育尤其是美术教育,颇具借鉴意义。

关键词:丰子恺;漫画图像;童心;教育观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4

中图分类号:G6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17-05

在现当代中国教育普及的地方,丰子恺(1898—1975)几乎可谓是家喻户晓的画家、文学家、艺术教育家。《丰子恺图传》说:“丰子恺一生几乎涉猎了文学艺术的全部领域,对绘画、音乐、文学、书法、金石、装帧、工艺、建筑等均有研究,而且卓然成家;创作编译出版了约180多种图书,在美学艺术教育领域也很有建树,是现代艺术史、美学史上少有的全才、奇才。”^{[1]13-15}

的确,作为多方面成就卓著的文艺巨匠,丰子恺一生不仅创作甚丰,且在流传后世的150多种著作中,漫画图书就有50余本。更为重要的是,丰子恺创作的漫画笔法简洁明了,风格鲜明且题材殊众,将说理传情融为一体,意味无穷,即使在今天,也依然能让人品出新的味道来。毫无疑问,这种超越时间的艺术魅力,不仅与今天的基础美术教育理念相呼应,而且具有很高的研究价值。

一、丰子恺“童心”教育取向的基因

回溯来路,丰子恺基于美术教育的“童心”教育思想和取向,既有其自身不断探索的主观因素,同时也离不开客观条件的作用和启发。就客观条件而

言,丰子恺的艺术人生和美术教育的历练,与两个人关系密切:一个是李叔同,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教育家和艺术家;一个是夏丏尊,中国新文学运动的先驱、文学家和翻译家。这两位先生相互之间既是挚友,同时也是丰子恺1914年考入浙江省第一师范学校时的恩师。丰子恺曾撰文追忆两位先生,认为弘一法师将他带到了艺术的道路上,是自己信念的人生导师,一辈子最佩服并得其很大帮助的人;同时强调,两位先生形同父母,前者给他了“父亲的教育”,后者则给他了“母亲的教育”,虽然他们的教育方式完全不同,但却赢得了他和学生们完全相同的敬爱。比如夏丏尊先生“一切从学生出发”的教育理念,不仅深刻地影响了他,让他能够更真切地领悟童心的真善美,而且这种超越时代的教育理念,在其后来被再版30余次的译作《爱的教育》(1924),以及创办的《中学生》(1930)期刊风行全国、深入人心并选入国文教材则都是最好的确证。据此不难发现,两位导师不仅将丰子恺带到了艺术道路上,同时在精神上、思想上培养了他的人格,使之对教育的理念产生了独到的见解,从而启发和型塑了他的美术教育观。

丰子恺教育观的形成,还必须提到在20世纪初

收稿日期:2020-08-30

基金项目:集美大学研究生教改项目“研究生实验艺术教学创作思维与评价机制研究”(YJG1915)

作者简介:李信(1996—),女,福建福清人,集美大学美术与设计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美术学、美术学科教学。

欧美流行的“儿童本位论”。所谓儿童本位论,就是强调“儿童”既是教育的主体,也是教育的主题;教育的过程,须围绕儿童的发展来作为主要的教学内容。比如当时国际著名的教育哲学大师杜威,就非常明确地肯定了儿童本位主义,他曾非常形象地指出:儿童是太阳,在教学过程中采取的所有手段和措施,都要围绕儿童这个中心来开展。这种欧美儿童本位主义的教育思潮,对当时中国的教育界也带来了很大的影响。包括夏丏尊在内的不少文学大师,也不断用文学来维护“儿童中心”的教育理念。受其影响,丰子恺结合自身对中国上千年来政教合一的封建道统,和以“经史子集”为科考应试内容的教育反思,提出:对于儿童而言,培养“童心”才是教育的重点。他特别强调,依据教育的对象,儿童教育反对以成人的愿望代替儿童,反对把儿童当成缩小的成人;儿童只需要正确引导,而不是放任,更不是压制,从而教育的思想,不管是宗旨、原则,还是方法、途径,都要紧紧围绕着人这一主题。^[2]

可以说,丰子恺的这种“童心”教育思想的基因和取向,是在上述两个方面的客观作用下,最终通过自身的艺术与人文的个性化实践与统一而自主形成的。

二、丰子恺“童心”教育观的基本内涵

丰子恺对美术教育中的一般教育价值的发现,最实质、最突出的一个贡献,就是“童心”教育观。那么他的“童心”教育观的内涵究竟是什么,又包含哪些内容呢?下面从几个方面来谈。

其一,“童心”是纯洁、自由、充满生机的开明心。在丰子恺的视野里,儿童与成年人虽面对着同一个世界,但世界在两者眼中却又是截然不同的。如图1漫画《欣赏》中的孩子们,兴致勃勃地围在水盆旁欣赏着什么,虽看不见孩子们的脸庞,但从画外都能感受到他们的兴奋。假若换成成年人,便不会有这样的生动场景。换句话说,成年人眼里只看到事物的功利性并受其牵绊,而在心无挂碍的儿童眼里,则满是事物本身的纯洁与生机。可以看出,丰子恺眼里的童心,天性中具有和谐自然的开明性,葆有天然的好奇心和求知欲,而不是据成见和城府心,对世界加以分割和提防,从而能够真正超功利地体验和享受观察、认知事物的乐趣。因此他确信,造成儿童与成人眼里世界巨大差别的原因,就在于“心”之间的差别:成人的心,充满了现实的利害关系,无法体会世界的美好;儿童的心,则天马行空,能够发现超乎尘世的纯洁世界。而从现代心理学角度来说,“童心”恰是个性发育、人格发展,乃至科学探索

和文化进步最重要、最宝贵的生命禀赋与动力基质,从而也能根本反映出真正的开明教育之本义。

欣赏



图1

其二,“童心”是想象丰富、与世共舞的自然心。人和艺术,都不是孤立的存在,是与生活世界普遍联系的。在丰子恺看来,儿童亲近自然,细心观察身边的点点滴滴,能在生活的平淡无奇处融合自身的情感、心性和联觉,生发无穷的乐趣和想象力,且陶然享受于其中,从而创造出既纯真又新异的作品。如“流光容易把人抛,红了樱桃,绿了芭蕉”这句诗,是丰子恺非常喜爱的,因了这种喜爱,丰子恺便在自家院子里种了樱桃和芭蕉。从图2漫画《红了樱桃绿了芭蕉》右下角放着一支点燃的香烟看,虽不见人,但好似近旁的人正在忘情欣赏这美景,这不正是作者本人充满联觉意象的童心于不经意间的自然流露和写照吗?可见,童心本然是开放的、灵动的,而非固化和分隔的,从而也最真实最丰富。而这其实也恰切显现了教育文明之要义。



图2

其三,“童心”是强健、朴实、灵感的艺术心。在丰子恺看来,现今许多画家提起笔来就龙飞凤舞,夸弄线墨,以为不这样便不是新艺术,犹如一个服装时髦而体格不健全之人,无论其如何讲究服装搭配,却都少了健美的韵味。究其根本,就是因为这类人不具有完备健全的“艺术心”。反之,无论何种服装,在具有强健体魄即具有“艺术心”的人身上,都会显得有神韵。所谓强健的体格,就是艺术中所追求的主体强大的灵感。换句话说,也就是所有的创造性

活动,则“必先从某自然中获得一种灵感,然后从事表现”^{[3]182-183}。丰子恺曾在“写生画船”上不经意间将船窗当画框,看到岸边“剃头”师傅为人理发的情景而产生的《野外理发处》,这幅画本身(图3),就是他所说的朴实而强健的灵感的一个现身说法。他说,从绘画的角度看,剃头司务是主人,被剃的人暂时变成了一件东西。他“全身用白布包裹……全无自主之权”,剃头司务“拨他的下巴,他只得仰起头来;拉它的耳朵,他只得旋转头去”。“人在被剃头的时候,暂时失却了人生的自由,而做了被人玩弄的傀儡。”^{[4]219}由此可见,培养自由且富于灵感发现的艺术性的童心,对于人的创造性是多么的重要。而这也正是教育应有的原则和方法途径。



图3

其四,“童心”是天真、烂漫、人格完整的正人心。丰子恺显然清楚孟子所谓“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的名言。这句话的意思是,济世悯人、贤德高尚的人不能丢失童真无瑕的人格心灵。因此,丰子恺不仅“向来憧憬于儿童生活”,而且在“看见了所谓‘社会’里的虚伪之状,觉得大人都已失了本性”之后,从哲理高度指认:“只有儿童天真烂漫,人格完整,这才是真正的‘人’。”^{[5]389}为此,他不仅成为“儿童”的崇拜者,而且深刻讽刺那些只为功名、不闻世事、埋入故纸堆“钻研”之乎者也伪命题而浪费生命现象(图4)。在各种艺术教育实践中,他处处赞扬去窠臼、非套化的“童心”,不断呼吁用“艺术心”为表征的赤子心,来引导人的情感体验和认知,从而将知识、技术内化为一颗没有杂质和邪念的童心,以至于他自己也终得保持了一颗鲜活、生动的“老儿童心”。这里所反映的也正是人类人文教育的重要目标和宗旨。

以上四点不难看出,丰子恺的“童心”与“艺术心”具有同一性和建构性。这种思想认识一方面使得“艺术”和“艺术教育”被上升到了教育哲学的高度,从而更具有了普遍意义;另一方面也使得艺术和教育更具有了现实针对性和责任感。这里不妨再举

几个例子:

图5漫画《盆栽联想》,可谓是丰子恺批判某些学校教育扭曲儿童天性的事例。该图引申了唐代柳宗元在其《种树郭橐驼传》中讲述种树要“顺木之天,以致其性”的著名观点。很明显,丰子恺的意思是,一如种树须“顺木之天”那样,教育也应因材施教,要顺应人的自然天性和心理个性,从而使之健康成长。



图4



图5

而在现实中,正如图6漫画《母型》所示,包括家长在内的前辈的许多做法及社会教育机制,却经常与之相背反。他们或按照传统观念与功利目的来设计、要求受教育者,或将自己没有实现的理想和愿望强加于下一代,从而使得孩子既没有童年也没有童心,同时也致使社会整体丧失了朝气和活力。画中母女穿着我们今天所说的“亲子装”,一样的款式,一样的发型,远望去就像克隆出的大小型妇女。丰子恺严厉批评这样的教育要求非但不美,而且似乎让人看见做戏法里的残废、畸形的矮人,不敢逼近。教育上的这种盲目将儿童“大人化”,着实是中国家庭教育中普遍存在的问题。

再如图7漫画《母亲的梦》,更是以反讽的方式,反对一般家长急功近利、望子成龙、揠苗助长且千篇一律的做法;张扬他对人的天性,尤其是对儿童真善美的天性的佑护和呼唤。比如今天,许多家庭早早就把两三岁的孩子送入早教班,使之辗转于英语、钢琴、美术等许多课程中。虽然这样做可能会启

发某些孩子的特长,但更多的代价是,过大的、不适合大多数孩子年龄天性的压力,不仅让孩子们对学习失去了兴趣,而且更让他们失去了“童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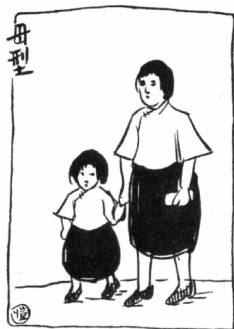


图6



图7

例子很多,不止这些。但在总体上,丰子恺的所有图像化、反“大人化”的教育批评漫画的核心表现,就是要找回童心、保护童心、放飞童心的“童心”教育理念。

三、丰子恺“童心”教育观的启示

丰子恺以其极具特色的童心漫画所表达的意蕴深刻的“童心”教育观,已过去了大半个世纪,有些甚至发表了近一个世纪。20世纪20年代,他就“深感于世间为儿童者的痛苦”。从现实状况看,一定意义上,他对孩子们的生活“设身处地”的想象和悲悯,不仅可称之为是“丰子恺之痛”,也可定义为“世纪之痛”。他曾在《〈儿童的年龄性质与玩具〉译者序——儿童苦》中这样写:那个时代,“椅子都是孩子所坐不着的,桌子都比小孩子的头高”(如图8漫画《我们设身处地,想象孩子们的生活(其一)》)。斗转星移,今天,与“丰子恺之痛”相关的一切,随着社会发展,新课改、教师专业化、启发式教学等都成为我国当代教育改革的重中之重。换句话说,今天的基础教育改革,与丰子恺的“童心”教育观有着许多同质之处。因此,研究丰子恺的“童心”教育,既能帮助我们理解和丰富我国当下的教育改革理念,也能切实推动艺术教育教学的发展。

长期以来,我国一直把知识当作重心传授给学

生,知识掌握的程度再以考试成绩来衡量,这种方式具有局限性和守旧性。在相当长的一个历史时期,以“教师为中心、教材为中心、课堂为中心”的教育体系曾在我国占据主导地位。美术教育也是如此,我国一直以传授美术技能知识为主,继而发展出简笔画和千篇一律的高考美术培训。课堂教学中,依葫芦画瓢、只重结果的教学方式长期存在,使得这种单一和统一化的教学模式悄然扼杀学生的个性和想象力。本来,美术教育工作应是教人以艺术心来生活,也就是教人学习用孩子的心境、眼睛和情感去体验世界、丰富世界。21世纪以来,我国不断改革和完善新的“美术课程标准”,高度“强调基础性和选择性,满足个性需求”的教育理念,积极调动各种资源以促使课程内容多样化、多元化,不断构建既满足个性需要且利于学生全面发展、富有时代特征的美术课程等。某种意义上,丰子恺似乎都是历史的先声,或者说,他早年就批评美术教育“只传授技法而不授予精神修养”。丰子恺始终认为,教育的主要目的是陶冶精神、健全人格,并从美术学科如何修养人文精神的理论层面,提出培养以“童心”为基底的“艺术心”。就此而言,丰子恺的图像化教育思想经常是言简意赅、鲜明直观且鞭辟入里。



图8

如图9漫画《教育(二)》,丰子恺批判了生搬硬套、刻模子式的教育。他从教育的本质出发,倡导以儿童为本的因材施教式教育,强调“重过程体验与轻终极作品”,突出内在心灵的自由,与近年来新课标的相关要求具有高度的吻合度,其先进性,令人惊叹。与丰子恺的时代相比,如今的学生更是背负名目繁多的家庭课业,这不能不让人反思。丰子恺启示我们:人生的全部不是片段的知识技能可涵盖;不能脱离人生谈艺术;应将美术教育融入所有科目之中而成为“大艺术科”;要置身现实生活的框架中进行教育;等等。今天看来,丰子恺的教育理念很具有前瞻性。

再如图10漫画《某种教师》,丰子恺不断批判那种一味照本宣科的教学模式,强调教师课堂教学不是留声机般地机械播放教材内容,而是要将知识

四、结语

丰子恺平生都在从事教育事业,在长期的教育实践中,形成了独到而深刻的“童心”教育思想和教育观。与不少教育名人相比,丰子恺作为教育家的声名,似乎一直显得比较微弱。在笔者看来,在当今日益读图的视觉文化时代,他的思想语言的图像化,和由此构成的“童心”教育观所倡扬的开明心、自然心、艺术心、正人心等方法原则和目标宗旨,使他因独到而孤独,以至于穿越时空,带给我们很多内涵丰富、亟待深入开掘的重要启示和资源。

最后,这里谨向笔者的导师程原先生对本文的悉心指导,表示衷心的感谢。

参考文献:

- [1]刘英.丰子恺图传[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5.
- [2]张昕.论丰子恺“以人为本”的艺术教育思想[J].艺术百家,2009(5).
- [3]丰子恺.万般滋味,都是生活[M].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8.
- [4]丰陈宝,丰一吟.爸爸的画:艺术的劳动[C].丰子恺,绘.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
- [5]丰陈宝,丰一吟,丰元草.丰子恺文集[C].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1990.

(责任编辑 刘海燕)

生动地、创造性地阐发出来,由此真正走向以学生为本的新境界。凡此种种,可以肯定,丰子恺的教育言论,特别是他的大量的图像化、童心化的教育思想和言论,非常值得我们今天的教育工作者、特别是中小学美术教师对之加以深入研究和学习。因为今天的社会现实更要求教师,不仅要具备相应的学科知识,更要具备心灵工程师的素养和担当,从而带给学生思维和心灵上的启迪。



图9



图10

An Analysis of Educational View of the “Childishness” in Feng Zikai’s Cartoons

LI Xin

(College of Art and Design, Jimei University, Xiamen, Fujian 361021, China)

Abstract: The educational view of “childishness” is fully demonstrated in Feng Zikai’s cartoons by a way of retrieving, protecting, and freeing up innocence. Therefore, the connotation of “childishness” are: pure, free, and enlightened heart full of vitality; rich in imagination, a usual heart that dances with the nature; a strong, simple, and inspired artistic heart; an upright heart that is brimming with innocence, brilliant, and integrity. In additional, his unique and profound educational concept of “childishness” that is full of enlightened, natural, artistic, and righteous hearts as the goals and principles, is greatly formed in educational practices and artistic creations. In short, his educational view of childishness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as reference for our contemporary education, especially in art education.

Key words: Feng Zikai; cartoon images; “childishness”; educational view

从民间艺人到艺术工作者:以刘志仁为个案研究

赵法发

(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天津 300350)

摘要:刘志仁是陇东乡村中一个普通的民间艺人。1937年之前,其演出依附于乡村民俗活动,演出内容几乎与“政治话语”毫无关联。但1937年之后,刘志仁在陕甘宁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对乡村社火的演出形式、内容和组织管理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使其完全纳入官方管理和政治话语之中,并成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通过对刘志仁的个案研究,剖析其由民间艺人转变为艺术工作者的个体生命轨迹,分析“政治话语”或“官方话语”能够下乡入户的某些内在关联。

关键词:刘志仁;社火改革;艺术工作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5

中图分类号:K26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22-05

“新秧歌运动”是陕甘宁边区政府(后文简称边区政府)领导下的、利用民间文艺形式进行政治宣传的文化改造运动。该运动在边区的政治宣传、社会教育和民众动员中扮演着重要的媒介角色,为其引领、主导和控制乡村话语发挥着重要作用。因此,“新秧歌运动”备受史学界的关注和重视,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和丰硕成果^[1]。在“新秧歌运动”中,民间艺人作为乡村文艺或者草根文艺的重要力量,备受边区政府的重视、改造、利用和培养。刘志仁可谓民间艺人的典型代表之一。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刘志仁对乡村社火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演出形式上,借鉴革命剧团的表演形式,把传统秧歌与民间舞蹈结合起来,形成新秧歌;在内容上,剔除封建迷信思想,注入“政治话语”;在组织管理上,废除封建剥削制度,引进政治民主,发扬团结互助精神。经过刘氏的大力改革,实现了乡村社火传统功能的巨大转变——由娱神娱人转向政治教化,成为边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作为“新秧歌运动”中一支不容忽视的重要力量——民间艺人,研究者甚少^①。故笔者根据手头所掌握的资料,以“新社会史”为视角^[2],以民间艺人刘志仁为个案,论述其对民间文艺的改革、社会身份的转变,以及政治与民

间文艺的结合,进而分析边区时期“官方话语”或“政治话语”能够下乡入户的某些内在关联。

一、刘志仁与民间社火

刘志仁^②(1910^③—1970),男,汉族,出生于边区新宁县(今宁县)盘克乡南仓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刘氏的家乡是一个经济、文化和教育都十分落后的地方。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废科举制度之后,宁州各义学悉改为小学堂。龙川学院改为高等小学堂。次年,龙川高等小学堂改为龙川小学。宣统元年(1909年),龙川小学有教习1名,学生18名。初等小学堂10所,教员10名,学生百余名。1937年8月,新宁县于齐家村兴建革命根据地第一个小学^[3]。据时人记载:“平均起来,全边区认字的人仅占全区人数的1%,小学只有120处,社会教育则绝无仅有。”^[4]甚至到了1946年,“此地妇女大半缠足,天足在少年女孩里边都是凤毛麟角。小农经济为主,加居住分散(一个村庄只有二三户;一个乡两端相距15公里,且高山深沟纵横),妇女每年除在有限的亲戚中走动有限几次外,几全不与人来往。文盲在妇女中是百分之百。……我走了一个乡,三四十岁的处男,已见到好几个”^[5]。“睁眼瞎”几乎成为陇东乡村社会的普遍现象。

收稿日期:2020-10-30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西部项目“陕甘宁边区日常生活研究”(20XZS024)

作者简介:赵法发(1980—),男,甘肃环县人,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社会文化史。

俗事务,是乡村社会最基本的生活娱乐方式。

二、刘志仁与社火改革

1937年,边区政府成立。南仓村红白不分,是国共两党相互争夺的地盘。但经过刘氏的宣传与动员,群众愿意接受共产党的领导,南仓村被划入边区新宁县。由于刘氏热心革命和在当地的社会声望,被民众选为村主任,成为乡村领袖^⑤。

起初,刘氏从政府拿到新编的秧歌剧目,进行排演。限于民众的文化水平、理解能力和观赏习惯,有些调子民众不喜欢,听不懂,也不爱唱。当然,这也是边区民众中存在的一个普遍现象。有人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新戏”(革命剧团所演出的剧目)的不足和缺点:“边区参议员连《雷雨》也看不懂,更遑论《新木马计》了;有人责备剧作者将戏写得太电影化,又有人说导演是弄电影的,这支戏里缺乏舞台艺术,而大部分人则责怪边区观众水平低,没有欣赏能力。我心里暗忖着,那么演剧工作者可能觉得自己是高出观众——至少是边区观众一等了。……因为曹禺的《雷雨》和奥尔夫的《新木马计》绝不是没有热烈观众的,只不过他们不是边区观众而已。”^[9]“自1940年以来,延安比较少地演中国戏,而几乎不演自己编的戏,偏于演出外国戏和反映外面生活的戏。这事虽然表现着舞台技术的一种大进步,但一般观众也常常感到延安舞台很少从自己的观点来反映抗战中的生活和形象,引以为一种憾事。延安的观众,对于戏剧总是很关心的,他们的这些意思,从事剧运的人必须慎重地来考虑。”^[10]刘氏面对这种“文艺理论”困境和疑惑,肯定不能从高深的理论层面解决问题,而是根据自己实际的演出经验,把新戏的腔调改为民众喜欢的地方腔调,解决民众与新戏之间的矛盾。如1940年某机关所编的《新开荒》,原调子群众不爱听,人们不愿学,刘氏把它改为群众熟悉的“珍珠倒卷帘调”,活泼、轻松、愉快,大家都爱唱。又如他与该区组织科长郭曙同志合编的《新生产》等4个节目,所唱的调子,都是民众熟悉的地方调^[11]。尤其是革命戏词,比较书面化和政治化,刘氏把这些语句进行了一些修改和调整,转变成民众可以理解的口头语。如把《新小放牛》中“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的语句,民众就不理解。因为以前边区政府的口号是“打土豪,分田地”,现在怎么是“共产党分土地停止实行”。他给演员解释说:“现在是国共合作,分土地问题不能再提,咱这边也没有分土地,有些人不明白这道理,听不清楚,会想道:‘为什么现在又分土地?’”^[11]因此,他把这句改为“共产党不打xxx军”。又如《新三恨》中的

年少的刘氏,被其父送到当地私塾读书四年,又上了三个月国语学校。后来,因家庭经济困难,刘氏便结束了求学生涯,回家继承父业,务农稼穡。对于当地的同龄人而言,刘氏是十分幸运的,有机会上学读书,可以识文断字,也算是一个乡村的“文化人”了。“在旧社会没有文化人,人民群众封建思想迷信色彩浓厚,事事求神,听天由命,思想守旧。……绝大多数孩子长到八九岁时,就上山放羊放牛,拉柴压粪,开始承担着较重的家务劳动,这就是孩子们的命运。”^[6]刘氏11岁时,迫于生计,参与乡村社火演出,学习民间小调。青年时期的刘氏不仅熟练地掌握了各种民间小调,而且可以创编一些新歌。尤其是刘氏粗通文墨,日渐成为社火队的重要成员,在当地颇有名气^④。

社火亦称“射虎”,是一种依附于民间祭祀和节庆活动的集各种杂戏、杂耍于一体的传统文艺表演。陇东的民间社火表演,俗称“耍故事”,一般在正月演出。其表演形式主要以传统的踩高跷、跑马、耍狮、舞龙、民间舞蹈及说唱为主;其演出内容,多以历史、神话故事和民间传说为主题,宣扬封建文化和迷信思想,也夹杂乡村生活题材,调情色彩和低俗内容颇多;在组织管理上,主要由社火头主办,提供其演出道具,组织演出活动,所获收入按一定的比例进行分配。社火头(箱主)、核心演员分配较多,普通演员、杂勤分配较少,存在着严重的谋利、剥削和不合理现象。在社会功能上,既承担着乡村社会的民俗事务,又是民众的基本娱乐方式。有一首民谣生动形象地描述了耍社火的动人情景:“吃饭端个黑老碗,粗布衣衫身上穿,锣鼓唢呐哇一声,扭起秧歌拧烂脚。”^[7]

就刘氏个人而言,其角色为歌手兼排练者。但在1937年之前,其演出不仅依附于乡村民俗生活,而且完全属于传统的老一套。在演出形式上,必须按照传统方式进行演出。刘氏的工作是训练演员基本技能和演练队列队形。在表演内容上,表演传统剧目,夹杂一些自编的乡村生活剧,如《王祥卧冰》《秃子尿床》《逛窑子》《钉缸》《十八姐担水》《张九才造反》等。据乡人回忆:“革命前(指1937年之前),社火没有什么变化,就是以前那些老套路,旧东西(旧内容),只是刘志仁记忆好,嗓子好,唱得好,更会编一些新曲。革命后,在边区政府的领导下,其人负责社火演出,闹了很多新秧歌。”^[8]

因此,1937年之前,刘氏既是一个农民,又是一个艺人。平时忙于农活,只有在春节期间才闹一阵社火。其演出与政治毫无瓜葛,完全依附于乡村民

一些词句，“二恨孔祥熙，他的二小姐结婚在美国”，“陪嫁妆够几个师吃饭又穿衣”。农民理解不了“陪嫁妆”，便改为土语“陪嫁洋”^[12]。再如《新开荒》中的“日本是个小地方”“中国是个好地方”，则改为“日本是个地方小”“中国是个地方好”^[11]。

随着边区“新秧歌运动”的深入发展，刘氏对民间社火的改造，不仅仅局限在曲调与词句方面，而是根据边区政府政治诉求和民众的实际需要，对其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如《剑桥中华民国史》所言：“据说一个叫刘志仁的人通过灌输革命内容，并把它与其他形式的通俗剧结合起来，首先革新了这种民间形式。除秧歌舞以外，还发明了一种‘秧歌剧’，它把秧歌的舞步与地方民歌、现代服装，以及借自京剧的手势和表情融合到一起。”^[13]具体言之，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在形式上，刘氏独出心裁，打破传统社火的表演形式，借鉴革命戏剧的表演形式，把单独的跑马与扭秧歌结合起来，实现了歌舞（唱）与故事（舞）的重新组合，形成秧歌剧。表演时又说又唱，载歌载舞，生动活泼，富于表现力。在扭秧歌中，不仅是一个人唱，而是许多人一起舞蹈，一起唱歌。

在内容上，刘氏一方面剔除了乡村社火中的调情色彩和低俗内容。如《顶灯》《相命》《算卦》《钉缸》《逛窑子》等较受民众喜欢，但内容低俗^[14]。刘氏对此进行了剔除和修改，使其既通俗易懂，又不伤大雅。另一方面，刘氏把“政治话语”注入民间文艺，使其主题和内容更加符合边区政治意识形态的构建和需要，如《新三恨》《新小放牛》《新生产》等。尤其是把政治话语与乡村生活结合起来，进行真人真事的演出，如《新小姑贤》《改造二流子》，群众说：这才真正是“高台教化人的戏”。为了把减租演得更像更真，刘氏就发动南仓村地主傅文广扮演地主角色，豁子也是真豁子，演出后，观众说演得全是实情^[15]。

在组织管理上，采取政治民主方式，发扬团结互助精神。在刘氏的领导下，南仓社火队建立了选举制度，对社火演出进行组织和分工。在每次工作中，举行检讨会，工作中犯错误的人，要当众承认错误，以教育大家。还对负责人提出意见，检查明日演出的准备工作。废除一些不合理的制度，如演员有事离队会受到罚油的处罚被废除，制定了请假制度^[11]。

经过刘氏改革的民间社火，其演出形式、内容和组织管理都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乡村娱乐功能日渐弱化，而政治教化日渐彰显，实现了由传统的娱神娱

人向政治教化的转变。过去那种与政治毫无联系或者完全游离于政治力量之外的民间文艺，几乎摆脱了乡村民俗事务活动，成为革命文艺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三、从民间艺人到文艺工作者

1937年之前，刘氏既是一个普通的农民，又是一个从事社火表演的乡村艺人，可谓农民艺人。其演出依附于乡村民俗事务，以历史、神话及传说为主题，其内容大都反映封建迷信思想和传统观念，与“政治话语”毫无关系，完全处于一种自由松散的活动状态。尽管演出受到了民众的喜欢和称赞，但仍然是一个农民，与其他陇东乡村的农民一样，过着平凡而普通的农家生活。不同的是，通过闹社火，多了经济来源，贴补了家庭生活。这种农民兼艺人的现象，在陇东乡村较为常见，是最平常不过的事情。“戏子”还是被乡人所不齿、瞧不起，如“戏子不是人，死了不能进老坟”，农村教育后辈：“一不能学剃，二不可学戏。”^[16]

1937年，刘氏担任南仓村村主任，成为乡村领袖。其演出内容也发生了较大的转变，主要是根据边区政府的要求，把“政治话语”注入民间文艺中，上演了与传统社火所不同的表演内容——“革命与战争”，即群众所言的“新戏”。但刘氏仅是根据自己的演出经验，对“新戏”的曲调和词句进行修改和调整，使其地方化、口语化和民众化。与此同时，刘氏也创编、排演了一些反映现实政治的新戏。但这种情况仅限于南仓社火，其改革仍然停留在初级阶段，群众限于自身文化条件和传统观赏习惯的影响，新戏尚未深入到乡村社会。如某一革命剧团在庆阳演出《逼上梁山》，群众都说“演得好”，剧团感觉演出很成功，达到了预期的宣传效果。他们问观众“哪些地方演得好？”观众说：“你们这女角多，化妆漂亮。”又问“还有哪些地方好？”他说：“看着红火热闹，最后的打仗好，武把子好功夫。”及至问到剧种的事情，却全然不知^[17]。

1942年，刘氏经过革命的洗礼和锻炼，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乡村党员干部，刘氏积极响应边区政府号召，对民间社火进行了深入全面的改革。经过这样的改革，民间社火的形式、内容、组织管理及社会功能都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政治话语”借助民间文艺的形式渗透到乡村生活，并剔除不符合政治意识形态的传统内容，实现了内容的政治化；被改造的“新戏”，摒弃了民众难以理解的书面化和教条化，表演地方化和大众化；政治民主被引进到社火组织管理中，破除了严重剥削和不合理现

象,使其成为一个以村主任为核心的社会团体。这个团体不仅创编、排演新戏,而且参与乡村中的一切政治活动,包括政治宣传、民众教育、社会动员及大生产运动^[18]。由于演出形式与内容的根本改变,其传统的社会功能——娱神娱人也因此逐渐弱化,政治教化日渐彰显,实现了由娱神娱人向政治教化的转变。

尤为重要的是,刘氏扩大了新秧歌的社会影响。刘氏重视新秧歌演员的培养,破除农民艺人不教诀窍的陋习,而是主动地指导大家学习新秧歌。对于那些不愿意学习新秧歌的演员,刘氏总是耐心教育。结果是:“大家都开始愿学新秧歌,内容不好的旧秧歌,渐渐被摒弃。在刘志仁的帮助和影响下,现在已有四五乡的行世村,三区的襄乐村及五区的杜家湾、北仓等处,开始采用新的秧歌了,22个有关抗战生产的秧歌在流行着,刘志仁教会的人当中有十四五人,在22个新秧歌中最少会唱一半。”^[11]新秧歌剧《夫妻开荒》《黑牛耕地》《减租》《王麻子变工》《种棉》《劝二流子务正》《懒黄转变》7个节目。人们看了这些节目后议论:“没有艺术人才的参加,庄稼汉能够搞出这样好的东西来,实在想不到!”^[19]通过闹新秧歌,破除了乡村陋俗,树立了社会新风。南仓社火几年来由40人发展到60多人,全村50余户,成年人和年轻人大半参加了耍社火,娃娃们很多都会敲锣打鼓,妇女们也学会了新秧歌,不分男女老幼,都有他们的正当娱乐,所以几年来消灭了抽烟、酗酒、赌博、打捶等不良现象^[11]。

1944年10月,边区政府召开文教英雄大会。鉴于刘氏的成绩和影响,他被选为文教英雄,授予了“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称号,并颁发了“新秧歌运动的旗帜”的奖状。刘氏从一个民间艺人转变为一个“文艺工作者”,由乡村社会底层的边缘人走向政治中心,成为引领乡村话语的主角。

四、结语

1937年之前,刘氏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民间艺人,几乎与政治毫无关联,完全游离于官方之外,处于乡村社会的边缘。“戏子”,说起来在旧社会是最下层的。“王八戏子吹鼓手”,这些人在社会上,连给自己的老祖宗焚香叩头的份儿都没有,并且他们大都染上了烟、酒、嫖、赌的恶习。借着他们演旧戏的技能(唱、舞、使用乐器),在香烟庙会上,和大的红白喜事上,为旧的统治阶级进行封建、迷信、反动的“高台教化”。^[18]但边区政府成立之后,刘氏成为中共重视、改造、利用和培养的重点对象。因为封建性的旧文艺——在边区主要是旧秧歌,在民间还占

着优势,全区将近1000个秧歌队之中,60%以上的是旧秧歌。这样改造旧秧歌旧艺人、发展新秧歌便成为开展群众文艺的重要任务了^[20]。刘氏由于热心革命工作,被选为村主任;经过革命的锻炼,进而成为中共党员;再经过积极响应边区政府的“新秧歌运动”,获得“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刘氏的个体生命史,肯定有着自身的辛勤努力,但在特殊的历史时空中,刘氏从一个普通民间艺人到乡村精英再到艺术英雄,国家或政治力量肯定是不容忽视甚至是决定性的力量。普通人的确创造着自己的历史,但普通人要成为一个时代的典型或英雄,这不仅暗含着个体行为符合政府主导的要求和需要,更需要国家力量的大力运营。民间艺人刘氏革命化或政治化的生活轨迹,体现了革命政权对乡村文化的渗透、控制、改造、利用和重塑,实现了民间文艺与政治话语的结合。但在实现这种对接、合作与互动的过程中,民间艺人不仅起到了桥梁作用,更是民间文化政治化或官方化的实践主体。从某种程度上讲,边区时期,政府能够实现“政治话语”或“官方话语”从上而下、下乡入户,渗入乡村社会,进而达到政治宣传、社会教育、民众动员的革命目的,与重视、吸纳、改造和培养民间艺人有着莫大的关系。

注释:

- ①主要成果有:李福清,宋绍香.中国民间说书与韩起祥的创新[J].国外社会科学,2008(5);沈文慧.延安“旧艺人”改造运动的历史考察:以“改造说书”运动为例[J].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1(1);赵法发.一个农民、革命文艺与乡村社会:论刘志仁与南仓社火[J].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12(3).
- ②刘志仁是一个传统的民间艺人,因积极从事“新秧歌运动”,受到了边区政府的嘉奖和民众的赞誉。1944年11月,边区政府授予刘氏“模范群众艺术工作者”称号,颁发了“新秧歌运动的旗帜”奖状。同时,刘氏积极响应党的号召,开荒种地,热心公益,曾担任村主任、拥军代表、锄奸委员、评判委员会仲裁员、乡参议员等职,获得了边区“好公民”“好党员”等光荣称号。1949年之后,刘氏曾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县、省人大代表等职务。1966年“四清运动”中,刘氏被定为富农分子,开除党籍。“文化大革命”时期,又被定为“黑线人物”,受到了评判、斗争,后精神失常。1970年不幸坠崖身亡,被发现时已只留残骸。1978年,刘氏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见《宁县志》编委会编.宁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766)。
- ③关于刘氏的出生日期,有两种记载:一为1899年,载庆阳地区戏曲志编辑部.甘肃省庆阳地区戏曲志[M].北京:中国戏剧出版社,2001:555。二为1910年,载刘凤阁.庆阳地区中共党史人物(内部资料),1996:169。这两种说法,

到底孰是孰非,尚无定论,本文采用刘凤阁的说法。因为刘凤阁是陇东地方史研究的专家,较为可信。

- ④2014年7月至9月,笔者曾对陕甘宁边区的民间小戏进行过田野走访。主要目的是为了完成甘肃省社科规划项目“革命话语下的民间文化:陕甘宁边区戏曲研究(1937—1949)”。陇东的走访地点为:环县的曲子、木钵;庆城县的马岭、高楼;华池县的悦乐、南梁;正宁县的宫河、三嘉;宁县的早胜、盘克。环县、庆城的走访工作由笔者完成,其他各县由笔者指导的学生完成。走访资料整理成文,大约8万余字,暂称为《陇东民间小戏田野走访笔记》。如果按照严格的学术规范和要求,此调查的理论与方法肯定有颇多不当、缺点和不足,这主要限于作者的眼界、学力和精力。但在一定程度上,使笔者对陇东民间小戏的历史、形式、内容和功能有了一些初步了解、认识和判断,也获得了大量的民间资料。后文所引均来自此走访资料,不再说明。
- ⑤1936年旧历年前后,国民党军队到白仓收缴粮草,与红军游击队发生了遭遇战,一名红军战士受伤路过南仓村,恰好碰到刘志仁排演社火,并被安全救护。但当时参加排练人员较多,刘氏怕走漏风声,就把演员召集到庙里烧香盟誓,相约不得告密。这个偶然事件,使刘氏结缘革命,为其后成为南仓村的领袖起到了关键作用。可参见刘凤阁主编:《庆阳地区党史人物·刘志仁》(内部资料),1996年版,第170页。

参考文献:

- [1]赵法发.1980年以来国内革命根据地戏剧运动研究综述[J].唐山师范学院学报,2013(3):65-69.
- [2]王笛.新文化史、微观史和大众文化史:西方有关成果及其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J].近代史研究,2009(1):126-140.
- [3]宁县志编委会.宁县志[M].兰州:甘肃人民出版社,1988:623-626.

- [4]社论.为扫除3000文盲而斗争[N].新中华报,1939-04-19.
- [5]王文先.庆阳文史资料选辑:3[M].西峰:庆阳百谊印刷包装有限公司,2007:18.
- [6]刘凤阁.陕甘宁边区陇东的文教卫生事业[M].西峰:甘肃庆阳地区印刷厂,1992:389.
- [7]艾克恩.延安文艺史:下[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9:438.
- [8]赵法发.陇东民间小戏田野走访笔记[Z].2014:16.
- [9]江布.剧运二三问题[N].谷雨,1942-04-15(4).
- [10]张庚.关于《竞选》等三个时事剧的演出[N].新中华报,1941-04-15.
- [11]朱平.“社火头”刘志仁[N].解放日报,1945-06-25.
- [12]文教艺术组.刘志仁与南仓社火[N].解放日报,1944-10-24(4).
- [13]费正清,费维恺.剑桥中华民国史(1912—1949):下[M].刘敬坤,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551.
- [14]舒非.社火的旧形式和新活动:记庆阳社火头会议[N].解放日报,1945-02-18.
- [15]胡仁智.刘志仁秧歌队完全演新秧歌[N].解放日报,1945-02-23(2).
- [16]韩小莉.战争话语下的草根文化:论抗战时期山西革命根据地的民间小戏[J].近代史研究,2006(6):90-106.
- [17]肖秦.关于戏剧工作的几点意见[Z]//山西文学艺术工作者联合会编.山西文艺史料第2辑[M].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61:95.
- [18]石毅.旧剧人的改造[N].解放日报,1941-10-04.
- [19]罗琪辉.庆阳农民的新“社火”[N].解放日报,1944-04-05.
- [20]周而复.边区的群众文艺运动[N].群众,1945-03-08(1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From Folk Artist to Art Workers: Take Liu Zhiren as A Case Study

ZHAO Fafa

(College of Marxism,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350, China)

Abstract: Liu Zhiren was an ordinary folk artist in Longdong village. Before 1937, his performance was attached to rural folk activities, and the content of his performance was almost irrelevant to “political discourse”. But after 1937, under the leadership of the government of Shaanxi Gansu Ningxia border region, Liu Zhiren carried out a radical reform on the performance form, content and organization management of rural community fire, making it fully integrated into the official management and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became an important part of revolutionary literature and art. Through the case study of Liu Zhiren,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ndividual life track of Liu Zhiren from folk artist to art worker, and then reveals some internal relations between “political discourse” and “official discourse” that can go to the countryside.

Key words: Liu Zhiren; rural community fire; art workers

广西入境旅游市场时空结构与竞争态分析

孙华强

(桂林理工大学 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 广西 桂林 541006)

摘要:以广西2000—2018年入境旅游人次为基础,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市场集中指数、年际集中指数、市场收敛性检验对广西入境旅游市场的时空结构进行分析,运用波士顿矩阵分析各客源市场的竞争力。研究发现,空间上,广西入境客源市场较为集中,主要以亚洲市场为主,占比达到61%;时间上,美国、日本与欧洲等经济较为发达地区的客流量随时间变化较小,东南亚地区变化较大。市场竞争力方面,越南占据最高市场份额;韩国与东南亚市场最具竞争力;俄罗斯具有较大发展潜力;英国、德国、法国等欧洲市场与澳洲市场竞争力小。

关键词:入境旅游;时空结构;竞争态;市场收敛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6

中图分类号:F592.68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27-07

一、文献综述

入境旅游是衡量一个国家或地区旅游业发展的重要指标,它在创造旅游外汇收入、增加就业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入境旅游的发展有利于提高国际地位,促使中国由旅游大国向旅游强国转变。广西位于中国南部边境地区,同时也是我国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具有良好的区位优势与资源优势。桂林国际旅游胜地、防城港边境旅游试验区,以及中国与东盟自由贸易区建设、“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促进了广西入境旅游的发展,为其奠定了良好的政策支持。

关于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研究是旅游研究的热点问题,历来受到学界的高度关注。对于入境旅游的研究主要是从客源地与目的地两个角度进行研究的。从目的地角度,黄和平等(2017)采用层次分析法对中国26个省区市进行实证分析,指出气候与资源也是影响入境旅游规模的重要影响因素^[1]。查瑞波等(2018)采用O-D模型对城市型目的地分析,指出对于大型城市目的地应该采取多样型营销策略,对于小型城市目的地应该采取集中型营销策略^[2]。从客源地视角,主要是采用地理集中指数^[3-5]、年际集中指数^[3,6-7]、亲景度^[4,6-8]、动态偏

离份额法(DSSM)^[9-11]分析客源市场的时空结构变化;也有学者单从时间变化结构的角度进行分析,李景初(2014)采用时间变化强度指数模型,对河南省入境旅游市场的时间演变特征进行分析^[12]。罗浩、张瑜璇(2018)采用随机收敛的方法对中国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市场收敛性检验,发现中国入境旅游市场总体不收敛,个别客源市场收敛^[13]。刘倩倩等(2020)采用单位根检验法对中国休闲旅游市场进行市场收敛性检验^[14]。在客源市场影响因素方面,主要采用多元回归模型^[15]以及引力模型^[16-17]分析。在广西入境旅游研究方面,韦福巍、甘永萍(2009)采用市场竞争态分析广西入境旅游市场^[18]。吴黎围等(2009)采用偏离份额法分析,指出广西入境旅游的发展高于同期全国的平均水平,但竞争力较弱^[19]。在影响广西入境旅游发展因素方面,不同的学者采用不同的方法对其进行分析,指出城市经济的发展^[20]、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21]、外贸的发展^[22]是影响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重要因素。但上述的研究都没有从时空结合的角度去分析广西入境旅游的发展,针对市场收敛性的检验也主要是从大尺度的范围进行。因此,本文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时空结构演变的角度出发,结合市场竞争态分析

收稿日期:2020-08-26

作者简介:孙华强(1995—),男,四川宜宾人,桂林理工大学旅游与风景园林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为旅游管理。

广西入境旅游的演变历程,为广西及类似边境地区入境旅游的发展提供些许参考意见。

二、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一)数据来源

搜集 2000 年到 2018 年来广西入境外国人数,受限于官方统计的限制,主要选取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印度尼西亚、泰国、法国、英国、加拿大、德国、日本、澳大利亚、菲律宾、俄罗斯、意大利、新西兰等 17 个国家来广西旅游人数进行分析。相关数据主要来源于历年的《广西统计年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与相关旅游主管部门。特别指出本文主要对旅桂外国人旅游人数进行分析,暂不考虑中国香港、中国澳门与中国台湾的入境旅游人数。

(二)研究方法

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分析主要可以分为空间结构与时间结构。空间结构主要是指客源市场的地理来源分布与空间分布。时间结构主要是指客源市场随时间变化而变化的趋势。对于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空间结构分析采取地理集中度与市场集中度指数进行分析,采用年际集中度与市场收敛性检验分析时间结构,最后运用波士顿 (BCG) 矩阵模型分析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势。

1. 地理集中度

地理集中度主要表明客源市场空间分布的集中程度,其计算公式为:

$$G = 100 \times \sqrt{\sum_{i=1}^n \left(\frac{x_{i,t}}{T}\right)^2} \quad (1)$$

公式中, G 为地理集中度, $x_{i,t}$ 代表第 i 个国家在 t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 T 代表某年入境游客接待总量, n 代表客源市场数量。 G 值最大为 100,说明此时客源市场数量只有一个, G 值越大说明客源市场越集中,多样性越低,风险性越高。 G 值越小说明客源市场较为分散,多样性较好。

2. 市场集中度

市场集中度是衡量客源市场集中程度的指标,可以衡量市场多样性^[23]。其计算公式为:

$$a_i = \frac{x_{i,t}}{T} \times 100\% \quad (2)$$

$$CR_n = \sum_{i=1}^n a_i^* \quad (3)$$

其中, a_i 代表第 i 国在 t 年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 a_i^* 是对于某年 a_i 按照从大到小顺序进行排序。 CR_n 指前 n 个 a_i^* 之和。一般用 CR_1 、 CR_4 、 CR_8 来衡量。文章主要采用前 4 个客源国市场占有率进行衡量,即 CR_4 。 CR_n 指数越大,表明该目的地的客源市

场越集中,多样性较差,旅游经营的风险性较大。

3. 年际集中度

年际集中度可以表明某一客源国对旅游目的地在一定时间内的旅游需求集中或分散程度。计算公式为:

$$H = \sqrt{\frac{\sum_{i=1}^n [((x_{i,t} - \bar{x}_i)/T_i) * 100]^2}{n}} \quad (4)$$

其中, H 代表年际集中度, $x_{i,t}$ 表示第 i 国在 t 时刻的游客数量, \bar{x}_i 表示某客源国在一定时间段内游客的平均数量。 T_i 表示某客源国在某一时段内的总的游客数量, n 表示年度数。若 H 值越小,表明该客源国游客数量比较稳定,对旅游目的地的旅游需求年度变化不大,客流量随时间变化不大。

4. 市场收敛性

收敛性最早起源于数学中数列或极限的收敛性问题,后来引入经济学中,在经济学分析中,经济收敛性是指在一定的经济条件下经济增长率与经济增长水平之间呈现负相关的关系。即经济落后地区会获得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从而减小不同经济单位之间差异的过程。后经发展,由 Narayan 首次把收敛性假说引入旅游市场客源领域,提出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收敛假说^[24]。与经济学上的条件收敛与绝对收敛不同,随机收敛是指多个时间序列之间存在共同的随机趋势,相对差异较小或趋于平稳,分为个体收敛与总体收敛两种情况。

为区分某一客源国市场与总体旅游市场趋势,更加合理地对入境旅游市场进行市场收敛性检验,引入相对旅游变量。其定义为:

$$K_{i,t} = \text{Ln}\left(\frac{x_{i,t}}{\bar{x}_i}\right) \quad (5)$$

其中, $K_{i,t}$ 代表相对旅游, $x_{i,t}$ 代表第 i 个国家在 t 年的入境旅游人数, \bar{x}_i 代表在某年入境旅游人数总数的平均值。本文中国家个数 i 为 17,时间序列数 t 为 19。

在对时间序列平稳性检验的方法中,最常采用 Kwiatkowski 提出的 KPSS 单位根检验法^[25]。在此方法中,可将相对旅游这一检验变量定义为:

$$K_{i,t} = x_{i,t} + u_{i,t} + v_{i,t} \quad (6)$$

$$x_{i,t} = x_{i,t-1} + \varepsilon_{i,t} \quad (7)$$

其中, $v_{i,t}$ 和 $\varepsilon_{i,t}$ 是误差项。则 KPSS 检验的原假设:

H_0 : 某时间序列是水平的或趋于平稳的趋势。用公式可表述为:

$$K_{i,t} = x_{i,0} + u_{i,t} + e_{i,t} \quad (8)$$

式中： u_i 是某客源市场的线性系数； $x_{i,0}$ 是某客源市场的固定补偿数，不随时间变化而变化。 $u_{i,t} =$

$$\sum_{i=1}^T (v_{i,t} + \varepsilon_{i,t})。检验统计量为：D(\hat{\lambda}) = \frac{\sum_{i=1}^n D_i(\hat{\lambda})}{n}，$$

$$D_i(\hat{\lambda}) = T^{-2} \sum_{i=1}^T S_{i,t}^2, S_{i,t}^2 \text{ 是公式(8) 中线性估计的残差和, 即 } S_{i,t}^2 = \sum_{i=1}^l \hat{u}_{i,t}。$$

三、广西入境旅游的时空变化分析

广西位于中国边界地区，与越南接壤，且是少数民族聚居地区。在广西境内大概分布有壮、瑶、苗、毛南、回、彝等 12 个世居的少数民族，极具民族特色，广西在发展入境旅游方面具有地理优势与资源优势。2018 年广西接待外国旅游者入境人次达 270 万人次，相较于 2000 年的 50 万人次，实现增长 440%；旅游外汇收入 27.78 亿美元，相较于 2000 年 3.07 亿美元，增长约 805%。入境旅游发展良好。通过图 1 可以看出，广西入境旅游发展可以分为二个阶段。第一阶段：2000—2008 年，处于平稳上升阶段。在这期间中国与东盟签订战略合作协议，促进广西的对外开放程度。但在 2003 年与 2008 年出现下滑趋势。主要是受到 2003 年中国境内出现“非典”疫情以及 2008 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第二阶段：2009—2018 年，入境旅游人次与旅游外汇收入实现迅猛增长，但接待外国人游客数量增长缓慢，说明在这期间香港、澳门、台湾等地的游客对广西入境旅游市场影响较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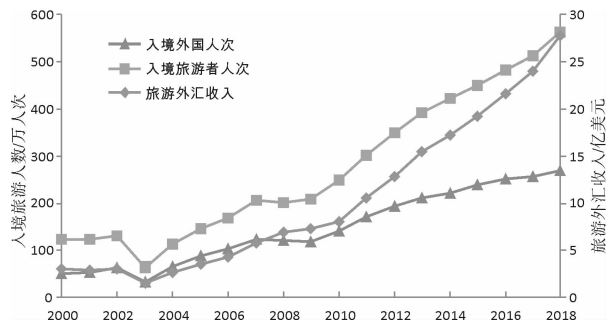


图1 广西2000—2018年入境旅游人数与外汇收入趋势图

(一) 广西入境旅游空间结构

首先，通过公式(1)，以广西 2000—2018 年入境旅游数据为基础，可以计算得出广西入境旅游地理集中指数(图 2)。其次，根据公式(2)可以得出各客源市场占有率变化情况(图 3)。结合公式(3)(4)，可以计算出历年市场集中度变化情况(图 2)。根据图 2 可以看出入境旅游地理集中指数在 2000 年到 2018 年之间总体上呈现上升趋势，由 2000 年

的 60.1 上升到 2018 年的 63.3，期间结构也发生转变。在 2000—2004 年地理集中指数上升较快，从 60.1 上升到 73.4，说明期间游客来源较为集中，市场多样性较差。在 2005—2018 年，地理集中指数呈现下降趋势，从 71.8 下降到 63.3，说明在此期间，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地多样性得到提高，有利于规避旅游经营风险，但纵观 2000 年到 2018 年，地理集中指数始终高于 60，表明广西入境旅游市场较为集中，市场多样性较差。市场集中一方面有利于集中进行旅游宣传，另一方面规避旅游经营风险能力较差。再结合 CR 指数，总体上呈现下降趋势，从 2000 年的 58.8% 下降到 2018 年的 47.8%，表明市场集中程度下降，对主要客源国市场依赖度下降，有利于规避风险。在 2000—2003 年，CR 指数呈现快速上升趋势，2004—2008 年出现明显下降趋势，2009 年以后趋于稳定。总体上，CR 指数集中于 50% 附近，说明主要客源国市场在广西入境旅游市场中占据重要地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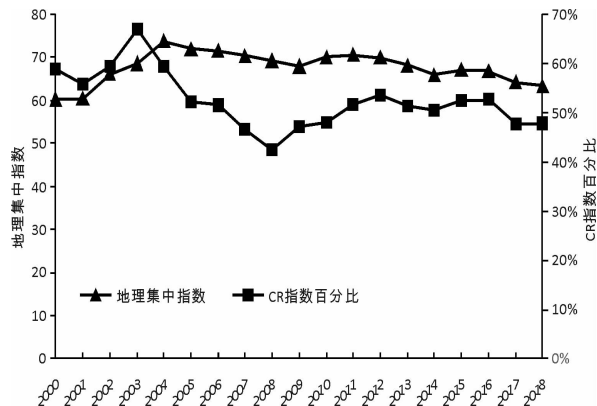


图2 广西2000—2018年入境旅游地理集中指数与CR指数变化图

根据图 3 得出，CR 指数的变化源于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的变化。在 2000 年，入境旅游市场占有率前四位分别是：日本、韩国、越南和美国。在 2003 年后，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幅度变化，日本、韩国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幅度下降；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东南亚国家的市场占有率上升。在 2003 年，中国与东盟国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促进了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与旅游往来。因此，2018 年，前四位分别是：越南、韩国、马来西亚和新加坡。从洲际区域来看，计算 2000—2018 年各大洲市场占有率均值可以得出，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主要是亚洲市场，占据 61%。其次是欧洲市场，占据 12%，之后是美洲和大洋洲旅游市场。在亚洲市场中，东南亚国家占 67% 的市场份额，说明东南亚是广西入境旅游市场的重要客源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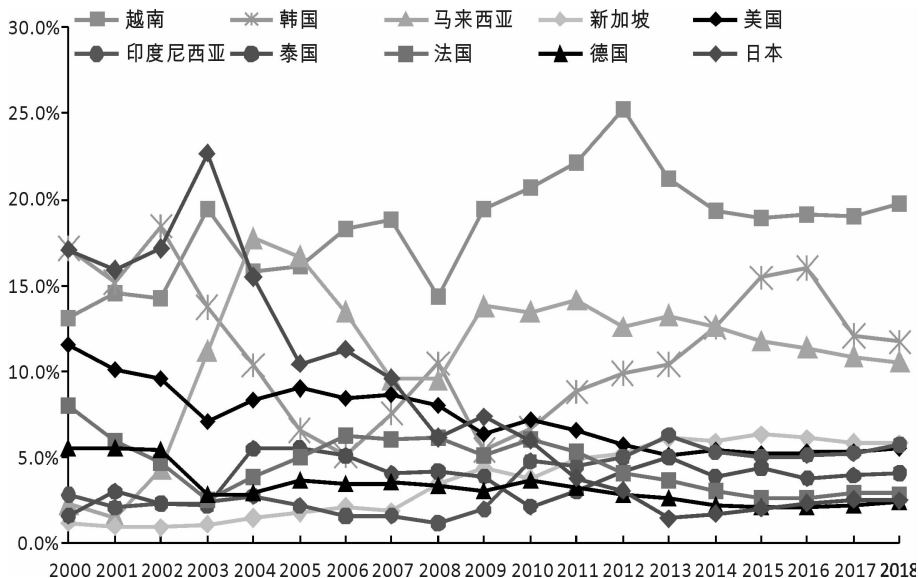


图3 广西2000—2018年入境旅游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变化图

(二) 广西入境旅游时间结构

通过公式(4)计算广西入境旅游年际集中指数(图4)。通过图4可以看出年际集中指数变化较低的是日本(1.6)、德国(1.8)、美国(1.8)和法国(2.0),说明这些国家来广西的游客数量较为稳定,没有随时间的变化出现较大的波动。一方面说明这些国家旅游者对广西旅游需求较为稳定,另一方面也说明这些国家在广西入境旅游方面没有出现较大

的增长。变化较大的是俄罗斯(6.2)、菲律宾(5.9),说明这些客源国市场出现较大的增长或降低,才会形成较大的年际波动,客流量不稳定。通过各客源国市场与年际集中指数均值相比较,发现亚洲客源市场年际集中指数变化幅度大多较高,特别是东南亚市场,如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等国家,也从侧面说明东南亚地区是广西发展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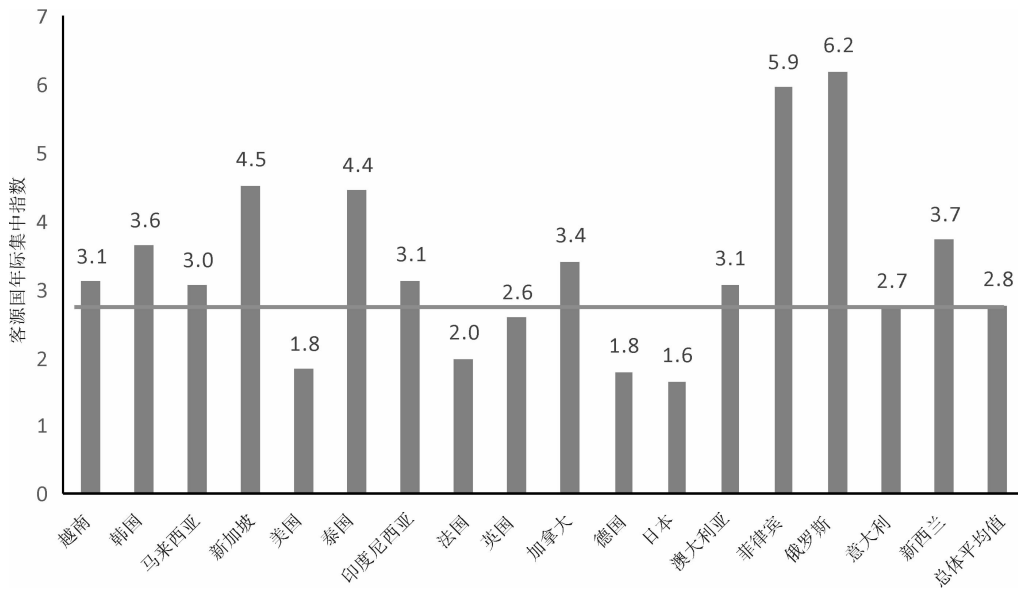


图4 广西2000—2018年主要客源国年际集中指数分布图

(三) 市场收敛性检验

公式(5)构造相对旅游这一变量,通过EViews10.0软件采用KPSS单位根检验法对相对旅游变量进行单位根检验,以及采用Hadri方法对面板数据进行面板单位根检验,区分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国的个体收敛与总体收敛情况(见表1)。

根据表1可以发现,在面板单位根检验下 P 值低于1%,说明拒绝原假设,说明广西入境旅游市场总体上不收敛。再看各个客源市场收敛情况,越南、韩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加拿大、俄罗斯在5%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印度尼西亚、法国、菲律宾在10%的情况下拒绝原假设,说明以上9个国家客源市场

不收敛;美国、泰国、英国、德国、日本、澳大利亚、意大利与新西兰等 8 个国家未找到拒绝原假设的证据,说明以上 8 个国家符合市场收敛假说。

表 1 单位根检验结果

A:单位根检验					
客源国	LM 统计量	客源国	LM 统计量	客源国	LM 统计量
越南	0.1805 **	泰国	0.1087	澳大利亚	0.0904
韩国	0.2032 **	法国	0.1249 *	菲律宾	0.1204 *
马来西亚	0.1700 **	英国	0.1032	俄罗斯	0.1690 **
新加坡	0.1811 **	加拿大	0.1887 **	意大利	0.0537
美国	0.0685	德国	0.0624	新西兰	0.0951
印度尼西亚	0.1375 *	日本	0.1089		

面板单位根检验			
方法	检验值	p 值	
假定同方差	7.0002	0.0000	
克服异方差	5.9994	0.0000	

注:在 10%、5% 与 1% 显著水平下, KPSS 检验临界值分别是 0.119、0.146、0.216。*、** 与 *** 分别代表在 10%、5% 与 1% 下的显著水平。

四、市场竞争态分析

运用波士顿矩阵法来分析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国市场在 2000—2018 年市场状态的变化。波士顿矩阵法主要是通过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来区分各市场所处状态。各客源国市场占有率通过公式(2)计算可得,市场增长率计算公式:

$$b_i = \frac{x_{i,t} - x_{i,t-1}}{x_{i,t-1}} \times 100\% \quad (9)$$

其中, b_i 代表某客源市场的市场增长率, $x_{i,t}$ 代表某客源市场某年的游客人数。把广西 2000—2018 年入境旅游发展分为 2000—2008 年与 2009—2018 年两个阶段,分别计算这两个时间段内各客源国市场增长率与市场占有率的情况,与这两个时间段内总体平均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相比较。可以把市场竞争状态分为四种, $a_i > \bar{a}$ 、 $b_i > \bar{b}$ 属于明星市场; $a_i > \bar{a}$ 、 $b_i < \bar{b}$ 属于金牛市场; $a_i < \bar{a}$ 、 $b_i < \bar{b}$ 属于瘦狗市场; $a_i < \bar{a}$ 、 $b_i > \bar{b}$ 属于幼童市场。经过公式(2)与公式(9)的计算可得出在两个阶段各客源国所处市场竞争状态(见图 5、图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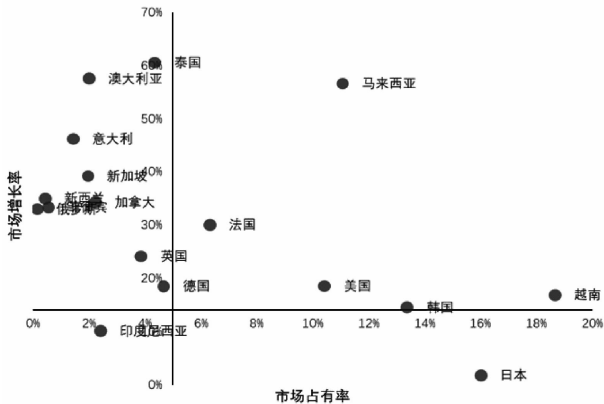


图 5 2000—2018 年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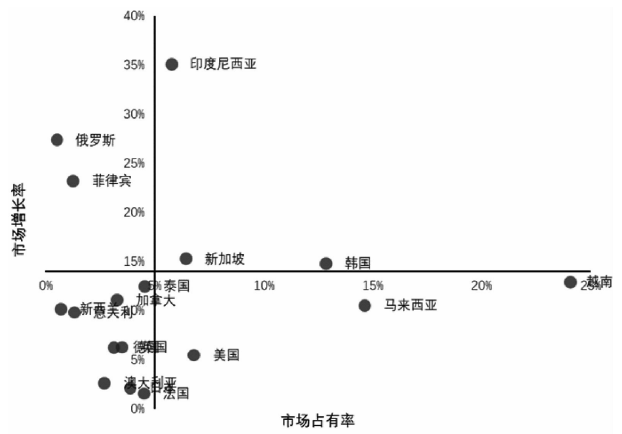


图 6 2009—2018 年各客源国市场竞争态

在 2000—2008 年,马来西亚、法国、美国、韩国、越南 5 个国家市场占有率高于总体市场平均占有率 5%,市场增长率也高于总体市场平均增长率 15%,属于明星市场。日本在这期间市场占有率较高但增长率较低,属于金牛市场。印度尼西亚则属于“双低”的瘦狗市场,其余国家则属于幼童市场。从地域范围来看,此时客源市场情况较好的国家属于欧美等经济发达的地区,即使是在亚洲地区除了具有地理优势的越南外,也主要是经济发展较好的日本与韩国。2009—2018 年,韩国、新加坡与印度尼西亚属于明星市场;美国、越南与马来西亚则属于金牛市场;俄罗斯与菲律宾属于幼童市场;剩余其他国家则属于瘦狗市场。

从市场竞争变动来看,印度尼西亚由于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的上升成为明星市场,美国与越南由于市场增长率的下降由明星市场转变为金牛市场,越南虽然增长率出现下降但市场占有率出现较大幅度的增长。而幼童市场除俄罗斯与菲律宾外,大多由于增长率的下降转变为瘦狗市场,法国下降最为明显,由明星市场转变为瘦狗市场。从总体上看,韩国一直处于“双高”的明星市场,说明韩国最具有市场竞争优势,越南市场占有率最高,虽然增长率较低,但也具有强劲的市场竞争力。从地理位置上来看,位于东南亚地区的国家,如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都具有较高的市场竞争力,位于较远区域的欧洲市场与澳洲市场竞争力较低,大多属于瘦狗市场,有待于进一步开发。东南亚地区比重上升主要是由于在 2003 年以后中国—东盟合作的加强,且广西位于边境地区具有地理区位优势,使得广西与东盟国家的贸易与旅游得到快速发展。

五、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地理集中指数、市场集中指数、年际集中指

数、市场收敛性检验与市场竞争态分析,基于客源地的视角,可以得出关于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以下结论:(1)根据地理集中指数与市场集中指数分析广西入境旅游的空间分布结构发现,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的地理集中指数较高,达到60,说明客源地较为集中,主要来自少数几个主要客源国。结合市场集中指数来看,入境游客市场主要来自亚洲市场,占比达到61%,而东南亚国家又占本区域的67%,说明东南亚市场是广西入境旅游的重要客源地。(2)通过年际集中指数与市场收敛性分析广西入境旅游的时间分布结构发现,地理位置较远与经济较发达的国家,如美国、日本、德国与英国等国家年际集中指数较小,说明这些国家客源相对比较稳定,客流随时间变化趋势不大,但同时也说明这些国家来广西的旅游者数量没有出现较大的增长。而东南亚地区的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与越南等国的年际集中指数较大,说明上述国家的旅游者数量随时间变化出现明显的上升或下降趋势,结合历年数据,上述地区出现较大增长。此外,俄罗斯的年际集中指数明显,说明来自俄罗斯的游客数量出现较大的增长。从市场收敛性来看,韩国、加拿大、俄罗斯与东南亚大部分国家未通过平稳性检验,说明时间序列不平稳,变化趋势比较大。美国、英国、德国、日本等距离较远的客源国市场通过市场收敛性检验,证明序列平稳,变化趋势较小,市场收敛性检验也进一步确定年际集中指数的结果。(3)从市场竞争态分析,韩国一直处于市场占有率与市场增长率“双高”的明星市场,最具市场竞争力,印度尼西亚上升速度最快,从“双低”的瘦狗市场上升为“双高”的明星市场。从总体上来看,亚洲客源市场最具有市场竞争力;欧洲客源市场竞争力较低,大多属于瘦狗市场。

针对以上情况,提出关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的三点建议。(1)打造特色旅游品牌,促进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多元化发展。立足于广西民族旅游资源优势与特殊地理区位条件,以“一带一路”倡议为有利依托,扩大广西对外开放程度,打造广西特色旅游品牌,如以民族特色为代表的“壮族三月三”,柳州市三江侗族自治县的“侗寨风情”与融水苗族自治县的“苗族风情”;以山水景观为代表的桂林山水,以大型实景演出的《印象刘三姐》等一系列具有广西特色的知名旅游品牌,提升旅游知名度,吸引国内外游客来参观旅游。(2)优化旅游营销宣传体系,因地制宜有针对性地开展。市场竞争态的转变一般是从瘦狗市场向幼童市场到明星市场再到金牛市场的

转变过程。广西在旅游营销宣传方面应该注重东南亚客源市场的细分,寻找新的旅游增长点;针对与俄罗斯类似的幼童市场的国家,应该进行重点开发,提高其市场占有率,促进其向明星市场转变;针对欧洲的英国、意大利、德国,大洋洲的澳大利亚、新西兰等瘦狗市场,应该实行“轮作”式推广战略,在适当时机选择增长明显的客源市场进行有重点的营销,而不是全面式的推广。(3)打造多元旅游产品体系,提升旅游竞争力。首先,针对不同区域旅游特色,打造有针对性的旅游产品。在北部湾区域可以发展滨海度假与高端民宿产品;在桂林、柳州等桂北区域可以发展观光旅游以及特色民族旅游产品;在贺州、巴马地区可以凭借良好的自然条件发展康养旅游,因地制宜发展特色旅游产品既可以避免同质化竞争,又可以促进旅游产品多元化发展。其次,注重基础设施建设。通过航空、高铁、公路、水路等立体化交通体系打造区域性旅游产品,促进区域联合发展。

本文对于广西入境旅游发展主要是从时空的角度进行分析,仍然属于描述性分析,没有深入到对入境旅游者影响因素的分析,分析对于入境旅游哪方面因素吸引力较大,哪方面较为薄弱;主要是从客源地的视角进行分析,没有从广西旅游发展内部出发,还有待进一步的研究深化。

参考文献:

- [1] 黄和平,冯学钢,万田户.目的地视角的省际旅游市场季节性开发潜力研究[J].经济经纬,2017,34(5):20-26.
- [2] 查瑞波,伍世代,孙根年.城市型目的地入境旅游市场演化差异研究:基于中国香港和新加坡市内部结构与外部规模分时段辨析[J].地理科学,2018,38(10):1661-1669.
- [3] 贲培雯.入境旅游市场时空演变及发展态势研究:以安徽省为例[J].对外经贸,2019(6):46-48.
- [4] 马玲.基于亲景度和竞争态的宁夏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研究[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19.
- [5] 谢泽氛,李春红,马遵平.西南四省市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研究[J].绵阳师范学院学报,2018,37(7):69-74,107.
- [6] 曹鸿魁,王国梁.山西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特征的动态分析[J].旅游纵览(下半月),2016(7):74-75.
- [7] 万田户,黄和平.江西省入境旅游流时空演变研究[J].世界地理研究,2014,23(3):128-139.
- [8] 刘法建,徐金燕.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入境旅游市场比较研究:基于市场亲景度和竞争态分析[J].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18(1):100-107.
- [9] 石斌,马耀峰.“一带一路”背景下陕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拓展:基于DSSM的客源市场结构演变视角[J].企业

- [10]张新,谢盟月,孙慧娟.东北三省区域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变化研究:基于SSM模型的分析[J].哈尔滨商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2):99-106.
- [11]全华,赵磊,陈田,等.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实证分析:以江苏省为例[J].经济地理,2012,32(1):146-152.
- [12]李景初.河南省入境旅游市场时间序列演变特征的定量分析:基于时间变化强度指数和指数平滑模型[J].企业经济,2014(1):127-131.
- [13]罗浩,张瑜璇.中国的入境旅游客源市场收敛吗[J].旅游学刊,2018,33(7):28-39.
- [14]刘倩倩,姚战琪,周功梅.旅华外国客源市场时空结构再分析:基于入境休闲旅游者的数据[J].热带地理,2020,40(1):128-136.
- [15]穆学青,陈亚攀,郭向阳.云南省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特征与影响因素研究[J].资源开发与市场,2018,34(5):681-685.
- [16]刘少洋,田纪鹏,陆林.上海迪士尼在建景区客源市场空间结构预测:旅游引力模型的修正及应用[J].地理学报,2016,71(2):304-321.
- [17]丁镭,张琼,方雪娟.基于修正旅游引力模型的横店影视城客源市场空间结构划分[J].地理与地理信息科学,2020(3):124-132.
- [18]韦福巍,甘永萍.广西入境旅游市场竞争态势分析[J].河池学院学报,2009,29(2):96-101.
- [19]吴黎围,熊正贤,吴晋峰.广西入境旅游客源市场结构变化分析:基于SSM的视角[J].社会科学家,2009(11):95-96,98.
- [20]窦开龙.入境旅游与城市经济耦合协调发展分析:以桂林为例[J].重庆工商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7(2):112-120.
- [21]程丹,刘利斌,张根根.广西入境旅游、金融发展与经济增长的效应分析[J].广西师范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2020,38(1):79-86.
- [22]苏振.广西旅游经济与进出口贸易重心演变及其对比分析[J].广西社会科学,2016(10):24-28.
- [23]孙根年,周功梅,李红.中美入境旅游,谁的市场更大:基于多样性、重要性、旅游偏好及市场吨位的比较[J].旅游科学,2015,29(3):15-26.
- [24]Sakiru Adebola Solarin, Hooi Hooi Lean. Nonlinearity convergence of tourism markets in Seychelles [J]. Current Issues in Tourism, 2014, 17(6).
- [25] Kwiatkowski Denis, Phillips Peter C B, Schmidt Peter, et al. Testing the null hypothesis of stationarity against the alternative of a unit root: How sure are we that economic time series have a unit root? [J]. North - Holland, 1992, 54(1-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Analysis on the Time and Space Structure and Competition of Guangxi's Inbound Tourism Market

SUN Huaqiang

(College of Tourism & Landscape Architecture, Guili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Guilin, Guangxi 541006,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number of inbound tourists in Guangxi from 2000 to 2018, the temporal and spatial structure of Guangxi's inbound tourism market is analyzed through geographic concentration index, market concentration index, interannual concentration index, and market convergence test. Secondly, the BGM matrix is used to analyze each source of tourists. The competitiveness of the market. The study found that in terms of space, Guangxi's inbound source market is relatively concentrated, mainly Asian markets, accounting for 61%. In terms of time, passenger flow in economically developed regions such as the United States, Japan, and Europe has changed little over time, while Southeast Asia has changed more. In terms of market competitiveness, Vietnam occupies the highest market share; South Korea and Southeast Asia had the most competitive markets; Russia had greater development potential; European markets such as the United Kingdom, Germany, and France together with Australia had relatively low competitiveness.

Key words: inbound tourism; time - space structure; competitiveness; market convergence

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宋红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经贸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中国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的实证检验表明,对外贸易虽然直接缩小了中国城乡收入差距,但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间接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为有效解决对外贸易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要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大力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的支出方向,适度提高出口产业劳动者就业法定最低年龄,为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低成本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条件。

关键词: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城乡收入差距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7

中图分类号:F249.21;F75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34-05

一、引言

当前,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除经济增长速度、发展方式、发展动力等经济发展过程存在的差异之外,高质量发展阶段相较于高速增长阶段更加强调经济发展结果的公平性,进一步协调公平与效率,使全体人民能够共享经济发展成果,大力提升人民群众经济发展的幸福感、获得感。在经济高速增长阶段,我国成功实现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在经济总量增长的同时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基尼系数常年处于0.4的警戒线之上。较高的收入差距与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我们要坚定不移贯彻的新发展理念严重不符,因此,大力改善收入分配状况,缩小收入差距成为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所要解决的重要问题之一,既是保持我国经济社会长期稳定发展的需要,也是落实共享经济发展新理念,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根本目的的关键所在。

相关研究表明,城乡收入差距是导致我国整体收入差距较大的主要原因(韩其恒,李俊青,2011)^[1],因此,有效解决城乡收入差距是缩小我国

整体收入差距的重要突破口,探讨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及应当采取的措施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长期以来,学者们从不同的视角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研究,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时期也是对外贸易逐步发展壮大并对我国经济增长、就业及产业结构等经济社会领域产生广泛、深入影响的时期,对外贸易除了会对一国的整体经济发展和财富总量产生影响,也会在社会成员之间产生收入分配效应,因此,对外贸易发展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关系成为部分学者在研究城乡收入差距时关注的研究对象。魏浩、赵春明(2012)^[2]认为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取决于对外贸易的就业数量扩大效应和就业质量偏向效应的综合作用,他们利用我国31个省区市1978—2007年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的结果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导致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王怀民、王子睿(2018)^[3]的研究表明加工贸易虽然通过农村劳动力流动和收入转移增加了农民收入,但城市部门收入增加得更多,所以,加工贸易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并且,农民工的代际更替将会进一步加剧这种扩

收稿日期:2020-09-28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河南省加快推进贸易强省建设的影响因素及路径研究”(2018BJJ053);河南省软科学研究计划项目“河南省出口供给侧改革的路径及对策研究”(182400410596)

作者简介:宋红军(1980—),男,河南永城人,经济学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经贸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国际贸易理论与政策。

大效应。袁冬梅、魏后凯、杨焕(2011)^[4]研究了对外贸易结构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他们的研究表明制成品贸易比重的提高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沈颖郁、张二震(2011)^[5]利用1993—2008年的省际面板数据进行的研究表明对外贸易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之间并不存在确定的倒U形关系,对外贸易规模的扩张导致了城乡收入差距的扩大。魏浩、杨穗(2011)^[6]利用我国1978—2008年的时间序列数据进行的研究也得出与沈颖郁、张二震(2011)^[5]相一致的结论,无论是对外贸易总额,还是出口、进口变量的二次项系数估计值都是不显著的负值,他们认为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倒U形关系长期内才会存在,短期内,对外贸易的发展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同时,他们的研究认为出口商品结构优化有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而进口商品结构优化则会产生相反的影响。

从上述研究成果来看,学者们不仅研究了对外贸易规模、结构变化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而且分析了对外贸易与城乡收入差距之间的动态关系。但是现有文献主要研究的是对外贸易对城乡收入差距的直接影响,实证分析模型中反映对外贸易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变量仅有对外贸易规模这一个变量。由于对外贸易是一项对经济社会各方面产生广泛影响的经济活动,因此,对外贸易除了通过提供非农就业岗位、劳动力需求的偏向性等途径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直接影响之外,还会通过一系列间接机制对城乡居民收入产生影响,其中之一就是对外贸易会对居民教育投资、人力资本产生重要影响,进而在宏观层面上引起城乡收入差距的变化。在当前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产业结构转型升级的背景下,对劳动力的需求结构将更加高级化,人力资本对居民收入的影响会更加突出,因此,在对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问题进行研究探讨时不能忽视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要研究分析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间接扩大还是缩小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既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对外贸易收入分配效应理论的内容,也能够为完善政策措施进一步缩小城乡收入差距提供决策依据。

二、对外贸易对中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机制

由于对外贸易是通过引起经济社会中某些因素的变化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产生间接影响,影响机制存在多样性、复杂性及方向不同等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明对外贸易是促进还是削弱了农村劳动

力人力资本水平,最终影响效果取决于各种影响机制的强度。

1. 父母陪伴缺失效应。中国对外贸易发展的区域集中性及以劳动密集型产品与生产环节为主的特征,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由农村向城市的大规模流动,使得众多乡村家庭无法延续父母陪伴子女成长的传统生活模式,父母为获取较多收入进城务工,子女留守乡村成为普遍现象,农村留守儿童成为与我国对外贸易发展相伴而生的群体。据《中国儿童福利与保护政策报告2019》,96%的农村留守儿童由其(外)祖父母照顾,这种隔代抚养模式一方面致使留守儿童在学习成长的过程中缺失父母的情感关爱及教育督促,另一方面祖辈父母与留守儿童之间较大的年龄差距、落后的教育观念、自身较低的文化水平及对孙辈的溺爱使其难以对留守儿童的学习成长起到正确引导作用,因此,农村留守儿童普遍学习兴趣不高、逃学旷课现象严重、成绩较差及沉迷于网络游戏。尽管在国家相关政策的约束及支持下,农村少年儿童基本上完成了义务教育,但是其教育质量与城市少年儿童之间存在较大差距,成为导致城乡人力资本差距的重要因素。

2. 教育的机会成本效应。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积极引进外资,大力承接国际产业转移,出口型制造业获得巨大发展,成为向全球各国大量供应质优价廉制成品的“世界工厂”。这种建立在低端加工组装制造产业基础上的对外贸易发展模式为中国提供了大量低技能的劳动密集型就业岗位,使农村大量剩余劳动力摆脱对土地的依赖实现非农就业成为可能。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非农就业机会一方面为农村居民提高收入、改善生活提供了条件,另一方面也提高了农村居民接受教育及进行人力资本投资的机会成本,从而改变了他们的教育决策,当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超过未来预期收益时,他们就会倾向于选择辍学或放弃继续升学而外出务工。由于中国对外贸易扩张对流水线加工组装劳动力的大量需求,农村低技能年轻劳动力很容易找到非农就业岗位获取相对较高的收入,显著提高了其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成为农村青少年过早放弃教育加入“打工大军”的重要因素,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产生严重的不利影响。

3. 收入效应。人力资本作为隐含在劳动者自身从事经济活动的知识、技能,同物质资本一样来源于相应的投资活动,即人力资本投资,其中最主要的方式就是教育投资。教育不仅可以使劳动者获取相应的知识、技能,而且可以提高其认知能力、分析能力

等,为其人力资本的后期待持续提升奠定基础,对人力资本的形成和积累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虽然我国义务教育学杂费免除已有十多年的时间,但是高中教育及高等教育的费用呈现出上升趋势,成为家庭支出的重要构成部分,因此,只有家庭收入达到一定程度才可能保障教育投资的力度和水平。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农村居民收入在横向对比上与城镇居民收入之间的差距扩大了,但是从纵向上看实现了大幅度上升。相关研究表明,农村居民收入的提高主要得益于非农收入的增长(刘安萍,2006)^[7],非农收入成为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主要来源和推动力。虽然农村居民非农收入增长的影响因素是多方面的,但是对外贸易无疑是其中最重要的因素,对外贸易发展不仅直接为农村劳动力提供了大量非农就业岗位,而且通过带动相关服务产业的发展间接促进了农村劳动力的非农就业,有力促进了农村居民非农收入的增长。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居民收入增长的促进作用一方面使农村家庭具备了进行更高水平教育投资获取人力资本的收入基础,另一方面农村家庭由于具备了相应的生活保障,也大幅度降低了迫使子女过早放弃教育为家庭获取收入的现象,从而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提升产生积极的推动作用。

4. 教育期望效应。这里所说的教育期望是指农村家庭父母希望子女在教育方面所达到的程度。父母作为子女教育的投资者及重要的决策者和引导者,教育期望在父母行为与子女学业成绩之间起着极其重要的中介作用,决定着父母对子女教育的重视程度。如果父母对子女具有较高的教育期望,通常对子女教育具有较高的教育投入、为其创设更好的学习环境、注重学习习惯的培养及采取各种激励、督促措施,对子女教育较多的关注和付出能够促使子女提高对自身学业的要求和期望,使其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和具有更强的进取心,从而对子女学业成绩产生积极的促进效用,有利于子女人力资本的积累。与此相反,如果父母对子女的教育期望较低,通常会对于子女教育采取放任的态度,导致子女较高的辍学率、较差的学业成绩及较短的受教育年限。我国对外贸易的发展使大量农村劳动力得以进城务工,进一步打破了我国城乡分离的社会结构,工作生活环境的变化拓宽了他们的视野,众多观念发生了变化,自身工作条件、收入等与拥有较高学历人员之间的差距使其对教育具有更高的认同,认识到教育、文凭在获取更好工作岗位、更高收入及提升社会地位等方面的重要性,促使其对子女产生更高的教育期望,希望子女通过接受更好的教育获得更好的未

来。当然,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农村家庭收入的提高,解决了子女接受教育的资金约束,也是农村父母对子女教育期望提高的一个重要因素。

三、对外贸易、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为得到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以及对外贸易通过人力资本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实际影响,本文利用我国2006—2017年31个省区市的面板数据进行实证分析。

(一) 实证模型的构建及变量说明

依据本文的研究目的、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及数据的可获得性,本文构建如下实证模型:

$$income_{it} = \beta_0 + \beta_1 export_{it} + \beta_2 human_{it} + \beta_3 export_{it} \cdot human_{it} + \beta_4 town_{it} + \beta_5 industry_{it} + \mu_{it}$$

实证模型中各变量的下标*i*、*t*分别表示*i*省份、*t*年,每个变量的含义及数据处理方法如下:

*income_{it}*表示*t*年*i*省份的城乡收入差距,用各省份每年度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与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比值衡量,该比值越大,表明该省份城乡收入差距越大。

*export_{it}*表示*t*年*i*省份对外贸易的发展情况,用各省份每年度的出口额与其当年度的GDP的比值衡量,反映对外贸易对该省经济发展的贡献程度。

*human_{it}*表示*t*年*i*省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状况,由于在九年义务教育制度下,小学、初中教育已基本普及,来自农村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的人员大多数会留在城市成为城市居民,所以本文选择用农村高中学历人数在6岁及以上人口中所占的比重作为衡量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的指标。

*export_{it} · human_{it}*为*t*年*i*省份对外贸易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交叉项,该交叉项指标的系数反映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的间接影响。

*town_{it}*表示*t*年*i*省份城市化发展水平。城市化是我国当前推行的一项重要经济社会发展政策,城市化的推进有利于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加快城乡一体化发展,促进农村劳动力的非农转移,从而对城乡收入差距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本文将其引入实证模型,用各省份年末城镇人口所占的比重衡量。

*industry_{it}*表示*t*年*i*省份建筑业发展情况。我国城市建筑的建设几乎全部由农民工完成,在城市建筑工地上务工所获取的收入是农村居民尤其是高龄农民工的一项重要收入,因此,本文将其作为影响城乡收入差距的因素引入实证模型。由于无法得到农民工从事建筑劳务工的收入数据,但其收入规

模与建筑业发展规模成正比,所以本文用各省份建筑业增加值在 GDP 中的比重作为农民工从事建筑业工作收入的替代变量。

上述变量指标计算所利用的原始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各变量数值的描述性统计如下,见表 1:

表 1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income	372	2.87	0.55	1.85	4.59
export	372	14.99	18.19	0.73	92.93
human	372	11.04	3.43	1.91	23.63
town	372	52.59	14.45	21.13	89.60
industry	372	7.66	4.05	3.12	31.39

(二)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为避免变量序列的非平稳性导致虚假回归的出现,在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之前本文采用 LLC 检验法对面板数据各变量序列进行单位根检验。表 2 所示的检验结果表明可以在 1% 的显著水平上认为所有变量均为平稳序列,无须进行协整检验,可直接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

表 2 各变量单位根检验结果

变量	income	export	human	town	industry
LLC 统计值	-2.7036	-7.0997	-9.7277	-4.0343	-8.2645
P 值	0.0034	0.0000	0.0000	0.0000	0.0000
结论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平稳

为深入考察对外贸易以及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对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情况,本文将实证数据分为全部样本、贸易大省与非贸易大省三组分别对实证模型进行回归。表 3 的回归结果表明所有解释变量回归系数的符号在三组回归结果中是一致的,说明各解释变量对不同省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方向是相同的,但影响程度的大小及显著性则存在差异。

表 3 分组回归结果

解释变量	全部样本	贸易大省	非贸易大省
C	4.8142(0.0000)	4.5341(0.0000)	5.0463(0.0000)
export	-0.0252(0.0000)	-0.0145(0.1011)	-0.0461(0.0001)
human	-0.0398(0.0000)	-0.0764(0.0420)	-0.0490(0.0001)
export · human	0.0021(0.0000)	0.0016(0.0235)	0.0040(0.0002)
town	-0.0267(0.0000)	-0.0182(0.0000)	-0.0289(0.0000)
industry	-0.0136(0.0226)	-0.0273(0.2536)	-0.0148(0.0205)
R ²	0.5167	0.4800	0.4994
观测值数	372	72	300

注:表中括号内的数字为相应统计量的 P 值,贸易大省包括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山东、福建,非贸易大省是指除上述贸易大省之外的其余省区市。

首先,在本文所考察的时期内对外贸易发展直接缩小了各省区市的城乡收入差距,但是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效应不显著。近年来,对外

贸易对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之所以由扩大转为缩小,原因在于:一方面,出口规模持续扩大对农村劳动力需求增加,加上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减少,“民工荒”的出现推动了外贸行业农村劳动力工资的上升;另一方面,随着工作年限的增加,出口部门就业的农村劳动力不仅工作熟练程度和生产率得以提高,而且“干中学”效应也使他们积累了一定的人力资本,部分农村劳动力在企业中的就业岗位得以提升,拉动了收入水平的提高,从而使对外贸易发展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起到了削弱作用。而对外贸易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缩小作用不显著的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大省的农村经济依靠接近对外贸易主要发展基地的地缘优势已经达到较高的水平,对外贸易规模扩大对其农村居民收入提高的直接影响已变得较弱。

其次,对外贸易与农村人力资本交叉项的回归系数在三组回归结果中都是正值并且显著性较高,这说明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居于主导地位,超过了其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积极效应,从而间接扩大了城乡收入差距。从表 3 可以看出,对外贸易通过影响农村人力资本对非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间接扩大效应远高于对全国整体及贸易大省的影响,原因在于非贸易大省主要为对外贸易发展水平较为落后的中西部省份,其农村劳动力大量流向对外贸易发展较发达的东部省份而不是在距离家乡更近的本省就业,这就使得非贸易大省不仅农村留守儿童数量较大,而且父母陪伴缺失对留守儿童教育导致的负面影响也较为严重。另外,非贸易大省通常也是经济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省份,农村居民收入较低,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外出务工收入对其农村居民的吸引力更大,教育机会成本效应对农村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也更为突出。

最后,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城镇化及建筑业发展状况对城乡收入差距的影响在三组回归结果中均为负值,说明三者有助于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符合理论预期,因此,应进一步促进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水平提升和城镇化发展,深化城镇落户制度和义务教育制度改革,推动农村人口向城镇转移规模的持续扩大。建筑业发展虽然有助于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但没有像对全国整体及非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的影响显著,原因可能在于贸易大省农村经济发展水平及农村居民收入较高,农村劳动力外出从事建筑业务工的人数相对较少,得自于建筑业的收入在农村劳动力总收入中的比例较小,致使建筑业发展对贸易大省城乡收入差距没有起到显著的缩小效应。

四、对外贸易发展视角下提升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缩小城乡收入差距的对策建议

本文的实证研究表明对外贸易发展在直接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同时,通过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间接扩大了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在农村居民收入增长主要依靠向非农产业转移,农村居民工资性收入对城乡收入差距程度起关键性影响的背景下,必须充分重视对外贸易发展对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的影响。为有效解决对外贸易对我国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不利影响、充分利用其积极效应,缩小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应采取如下政策措施。

1. 进一步优化外贸产业区域布局,着力解决农村少年儿童接受教育的过程中父母角色缺失问题。得益于中国地域偏向的对外开放政策和地理区位优势,东部省份成为我国外贸出口产业主要的集中分布地,引起劳动力由中西部向东南沿海的大规模流动,致使中西部省份很多农村家庭父母缺失子女教育成长过程,对农村教育质量造成严重不利影响。在东部省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低成本发展优势逐步削弱的背景下,积极推动相关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跨区域转移,既可以为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发展创造新的空间,也可以使更多的中西部省份农村劳动力在离家较近的企业实现就业,从而使其能够对子女教育进行督促、规范和引导,同时父母近距离关爱的情感效应也有助于农村少年儿童学校成绩的提升。为此,在国家积极引导东南沿海产业向中西部转移的基础上,中西部省份要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完善产业发展配套体系,加强与东部省份的交流合作,大力吸引东部省份转移产业落地生根。

2. 大力促进外贸产业转型升级,削弱农村青少年教育存在的“中等陷阱”问题。在推动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向中西部省份转移的同时,东部省份要充分利用多年发展积累的优势,大力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实现外贸产业的转型升级,发展更高技术含量、更大增值程度的先进制造业,努力向产品全球价值链的中高端环节攀升,通过外贸发展产业的高端化释放出更多需要具备较高学历、技能和较多专业知识才能胜任的工作岗位,改变大量低技能外贸就业岗位导致的农村青少年接受教育的机会成本较高,倾向于完成义务教育即选择外出务工,很多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止于初中,接受更高层次教育的动力不强的状况,依靠就业岗位的结构转变引导和促使农村青少年教育水平的提升。

3. 积极引导农村劳动力务工收入的支出方向,使对外贸易影响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积累的“收入

效应”得以充分发挥。对外贸易发展所带来的大量非农就业岗位大幅度提高了农村家庭的收入,虽然为其子女接受教育提供了必要的经济支撑,但要真正起到促使农村劳动力人力资本增长的作用,还取决于农村家庭收入的支出结构,需要其将一定量的收入用于子女教育,出现子女教育支出偏向型增长效应,而不是将收入倾向于投向住房、售价较高的耐用消费品和奢侈品等。这就要求有关部门要对农村居民加大移风易俗宣传力度,消除不良攀比风气及“读书无用论”的思想,引导其树立正确合理的消费支出观念,提高对教育重要性的认可度,实现农村家庭教育投入的逐步提高。

4. 适度提高出口产业劳动者就业法定最低年龄,促使农村青少年学校教育年限的延长。学校教育年限的长短不仅决定着受教育者就业之初知识量的多少、人力资本的高低,而且对其从业期间知识获取、人力资本提升具有重要影响。当前我国劳动密集型出口产业的比较优势虽然在逐步削弱,但在一定期限内仍具有存在的必要性,为降低这些产业低技能就业岗位对农村青少年辍学的不利影响,可以通过制定执行产业部门差异的法定最低就业年龄,适度提高出口产业最低法定就业年龄,削弱农村青少年完成义务教育后倾向于选择外出务工而不是继续升学的动机,以此增加其接受学校教育的年限。

5. 为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劳动力创造更多低成本接受继续教育及职业培训的条件,助其人力资本的提升。由于农村相对落后的教育水平和受教育年限较短,长期简单、重复的加工组装生产活动所包含的知识、技术相对较少,“干中学”所带来的人力资本积累有限,在出口产业部门就业的农村务工人员通常文化和技能水平较低,人力资本不高,难以适应出口产业结构高级化和产品全球价值链提升所提供的新就业岗位的要求,就业岗位具有较强的固化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制约着其收入的进一步提高和城乡收入差距的缩小,因此,进一步提高出口产业部门农村务工人员人力资本成为当务之急。一方面,为农村务工人员提供接受学历教育的机会和优惠条件,根据农村务工人员的条件和特点,在入学测试、培养课程体系、学习形式及教学模式等方面采取有别于普通学生的方式;另一方面,资助企业对农村务工人员开展岗位技能培训及职业技能竞赛,实施“工匠培育”工程,将一部分农村务工人员培育成为技能精湛的高技能人才。

(下转第 46 页)

疫情常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

——以河南为研究视角

王海霞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 研究生院,北京 102488)

摘要:当下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在疫情冲击、减税降费和经济下行压力加大三种形势叠加下,财政收入下滑、支出刚性增加使地方财政形势更加严峻,收支矛盾日益突出。基于疫情常态化的背景,以河南为研究样本,通过对已有财政数据的分析,认为疫情会导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更加突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必须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目标和地方财政可持续性的双向策略。为此,研究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以平衡地方政府财政收支矛盾,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地方经济平稳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疫情常态化;人民财政观;地方财政制度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8

中图分类号:F812.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39-08

2020年是胜利实现全面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和“十三五”规划收官之年,是“三大攻坚战”的最后攻关之年,是“决胜之年”。面对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导致经济和社会遭受重大冲击,更有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实现疫情防控、经济发展、社会稳定、人民幸福的综合目标,财政支持助力协调经济发展任务尤为重要。2020年《政府工作报告》强调,在疫情防控常态化下,积极的财政政策要更加积极有为。以更大的政策力度对冲疫情影响,真正发挥稳定经济的关键作用。这是党中央、国务院为应对复杂多变的国内外形势、抢抓发展机遇作出的科学决策,是立足于2020年目标的实现作出的重大部署,也是当前财政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本文聚焦新冠疫情常态化下地方财政发展,纵观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的现状,讨论地方财政面临的困境与出路,以此提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的政策路径。

一、疫情常态化下地方积极财政政策应对方向

疫情常态化下,地方财政政策一方面要统筹疫情防控,另一方面要协调地区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

展。地方财政形势与常态化防控各项制度的运行状况高度相关,多种复杂因素叠加使财政收入下滑,而财政支出刚性加剧,支出增速高于收入增速,地方财政还会呈现“紧平衡”趋势。

目前,我国政府已出台多项财政政策应对疫情冲击,但面对疫情引发的一系列经济社会问题,财政政策必然会继续加强宏观调控。地方财政政策的重中之重依然是“六保”“六稳”的持续落实,发挥财政的兜底政策。另外,面对疫情控制的基本稳定和疫情防控的常态化,也要积极发挥财政的经济刺激政策作用,促进经济稳定持续发展保增长才是实现地方财政可持续的根本之道。

地方财政兜底政策主要体现在维护经济社会稳定发展,为人民群众提供底线保障,维护公民的基本权利^[1]。其中,地方财政的兜底政策作用体现在疫情防控、经济恢复、社会救助等三个方面。地方财政持续安排疫情防控资金以及疫情得到有效控制后的善后工作。在经济恢复方面,主要是地方财政对困难企业尤其是受影响比较大的中小企业出台相适宜

收稿日期:2020-11-02

基金项目:中国社会科学院财经战略研究院创新工程项目“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与社会公平研究”(2019CJY01-B001)

作者简介:王海霞(1987—),女,河南开封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生院政府政策与公共管理系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财税政策与宏观经济理论。

的税费减免缓缴等政策,以促进企业恢复生产和解决现金流为主的政策作为发力点^[2]。社会救助则充分体现了人民财政观的思想,它用于扶危救困,保障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条件^[3]。

地方财政经济刺激政策主要体现在财政对经济稳定和增长的推动和促进作用,保障市场运行的活力和增长动力。在疫情得到有效控制、经济基本面逐渐复苏的前提下,为实现经济社会的发展目标,在疫情常态化趋势下,地方政府应积极探索刺激消费,带动投资,为经济循环注入新的活力。比如疫情期间多地地方政府采取的给居民发放消费券、刺激汽车消费等扩大社会总需求,与此同时也采取了供给侧刺激计划,如启动新基建、扩大公共卫生领域支出等。每项政策的实施效果并不是单一的局限的,可能同时兼有纾困和经济刺激等双重作用,比如对困难群体的转移支付,就兼具社会救助和拉动该群体消费的作用。不同的经济社会条件下,财政的作用机理和着力点虽有所不同,但地方财政是推动地方政府履职和各项政策实施的基础条件。目前疫情常态化下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对于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二、疫情冲击下河南省财政形势现状分析

(一) 河南省财政收支形势分析

经济下行压力、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和疫情的冲击导致河南省财政收入剧减。与此同时,财政支出的刚性增加,完善“六稳”工作协调机制,三大攻坚战,推动黄河领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有效应对疫情影响促进经济社会平稳运行,保基本民生保工资运转等资金需求较大。2020年1—8月累计,河南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90.7亿元,增长

1.3%,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7095.2亿元,增长0.5%。

河南作为中国的粮仓之一,财政盈余缺口却是国内最大。财政收支矛盾逐年加大,疫情影响之下财政收支双向承压巨大,收支矛盾日益尖锐,财政形势更加严峻(如图1)。2020年1—8月累计,全省财政总收入4298亿元,下降0.7%。一般公共预算收入2790.7亿元,增长1.3%。地方税收收入1849.5亿元,下降4.9%。税收收入较大幅度下降,财政收支平衡压力进一步加大。一旦财政形势持续恶化,地方债务风险和财政风险日益暴露和转化,必将严重阻碍地方财政收支平衡及地方财政长期可持续发展。

(二) 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挑战

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是指在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以及转移支付制度框架下,地方政府财政得以在较长时期内维持合理的财政收支结构和债务规模,发挥财政促进本地区经济发展和国家治理效能,实现地区政治、经济、社会、民生等方面协调可持续发展^[4]。一方面,财政可持续发展是一个长期性的综合发展的过程,根据地方的历史发展水平、现阶段财政收支结构和未来财政收支潜力等因素进行综合考量分析得出。另一方面,财政可持续发展的衡量与财政收入、财政支出、财政赤字率以及政府债务等多重因素相关。因我国地方政府隐性债务数据缺乏翔实具体的统计,为简化分析,本文主要从财政收入与GDP比值计算得到的财政依存度指标,以及财政收入占财政支出的比例所得到的财政自给能力指标两个方面,结合疫情冲击下河南省宏观经济数据和财政收支状况,对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状况进行测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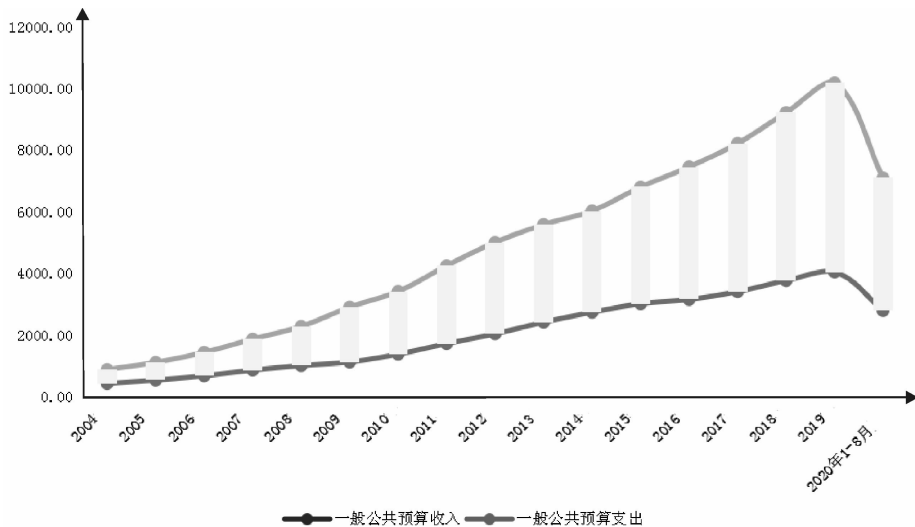


图1 2004年以来历年河南省财政收支情况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河南省财政预决算报告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1. 疫情之前财政可持续发展问题已凸显

河南省财力和政策的腾挪空间极其有限,地方财政严酷的收支形势由来已久,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冲击下河南省财政供需双向承压,财政减收和刚性支出的尖锐矛盾激化,对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形成巨大挑战。在中短期内,在保障疫情防控工作,扶持企业发展促进经济平稳运行,着力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和民生改善等方面河南财政支出压力加大。截至2020年2月13日,河南全省各级财政累计安排疫情防控资金38.41亿元,其中争取中央补助5.64亿元,省财政安排2.73亿元,市县财政安排30.04亿元。这为疫情防控工作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与此同时也增加了财政支出压力。

从收支情况看。从河南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来看,2016年出现严重的下滑后一直保持较低的增长率,而另外一端,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仍然保持较高的增长率(见表1)。2019年,河南省财政收入增速已经降为7.3%,成为分税制改革近30年来增速最低的一年,而2019年河南财政支出增长率为10.4%,支出的增速远高于收入的增速。同时,疫情冲击导致税基减少,以及为支持疫情防控保供、企业纾困和复工复产采取减免税、缓税等措施,拉低收入增幅。2020年1—7月份累计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仅为0.5%,而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为-1.8%。2020年1—8月累计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为0.5%,首次实现由负转正,由于很多待结算事项要到下半年才能出支出,历年财政支出均呈“前低后高”的分布特点,因此下半年的支出会高过上半年。

表1 河南省财政收支情况(2004—2020年)

年份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率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增长率
2004	428.78		879.96	
2005	537.65	25.4%	1116.04	26.8%
2006	679.17	26.3%	1440.09	29.0%
2007	862.08	26.9%	1870.61	29.9%
2008	1008.90	17.0%	2281.61	22.0%
2009	1126.06	11.6%	2905.76	27.4%
2010	1381.32	22.7%	3416.14	17.6%
2011	1721.76	24.6%	4248.82	24.4%
2012	2040.33	18.5%	5006.40	17.8%
2013	2415.45	18.4%	5582.31	11.5%
2014	2739.26	13.4%	6028.69	8.0%
2015	3016.05	10.1%	6799.35	12.8%
2016	3153.48	4.6%	7453.74	9.6%
2017	3407.22	8.0%	8215.52	10.2%
2018	3766.02	10.5%	9217.73	12.2%
2019	4041.60	7.3%	10176.30	10.4%
2020年1—8月累计	2790.70	1.3%	7095.20	0.5%

数据来源:根据历年河南省财政预决算报告及《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得到。

从政府债务形势看。近些年来,河南财政赤字加大,财政资金严重不足,政府举债冲动增强,政府债务规模呈现逐年扩大的趋势,导致地方债务风险增加,制约财政可持续发展(见表2)。由于地方财政缺乏有效约束且地方政府对中央救助存在预期的惯性长期存在,地方债务就成为地方政府调节和发展经济的重要工具。一方面,财政收入增速不足会弱化政府偿债能力,财力增长难以支撑债务偿还,引发流动性风险;另一方面,在政绩考核的现实压力和财政收入增速不足情况下,政府可能会采取机会主义行为,罔顾地方债务压力和金融风险,或明或暗突破地方债务管理红线,从而使债务脱离控制。

表2 河南省地方债务总情况

年度	债务余额	债务限额	GDP	债务余额/GDP(%)
2014	5339.8		35026.99	15.2%
2015	5464.9	5954.5	37084.2	14.7%
2016	5524.9	6499.5	40249.23	13.7%
2017	5549.1	7265.5	44552.83	12.5%
2018	6543.2	8284.5	48055.86	13.6%
2019	7910.1	9728.99	54259.2	14.6%

数据来源:河南省财政厅

注:本文界定债务包括地方政府债券及城投债(不包括其他隐性债务)。

从财政依存度看。依据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数据,计算全国31省份的财政依存度(见表3),而我国2019年总体的财政依存度大约为0.19,2019年河南省的财政依存度为0.07,财政依存度虽正在不断增强(如图2),但在全国范围内依然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因此,从财政依存度来看,河南财政状况虽在可控范围之内,但长期地方利益格局的变化所引起的冲击不容小觑,财政可持续发展面临的问题依然不容忽视。

表3 2019年全国31省份财政依存度

省份	财政依存度	省份	财政依存度	省份	财政依存度
上海	0.19	河北	0.11	陕西	0.09
天津	0.17	辽宁	0.11	江苏	0.09
北京	0.16	贵州	0.11	四川	0.09
海南	0.15	江西	0.10	安徽	0.09
山西	0.14	甘肃	0.10	广西	0.09
西藏	0.13	吉林	0.10	湖南	0.08
内蒙古	0.12	青海	0.10	河南	0.07
广东	0.12	黑龙江	0.09	湖北	0.07
新疆	0.12	山东	0.09	福建	0.07
浙江	0.11	重庆	0.09		
宁夏	0.11	云南	0.09		

数据来源:2020年中国统计年鉴

从财政自给能力看。自2004年以来,地方财政自给能力呈现下滑态势,2018年甚至下降到0.52(见表4),说明地方财政支出中仅一半是由地方本级财政收入支持,其余的则需依靠中央对地方的税

收返还、中央转移支付和政府举债融资。这种情形的出现与我国当前的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有关,财权和事权以及支出责任不匹配的同时,地方税体系构建进程缓慢。河南省财政自给能力自2004年以来常年维持在0.4左右(如图3),而2020年1—8月累计财政自给能力达到了自2004年以来的最低值

0.39。大部分财政资金需要依靠中央转移支付来实现,导致许多政策无法实现各级政府事权和财力的完全匹配,地方事权和支出责任缺乏足够资金支持。由此形成的制度性财政缺口,也激发了政府的举债冲动,债务风险累积叠加赤字规模扩大,影响河南财政可持续发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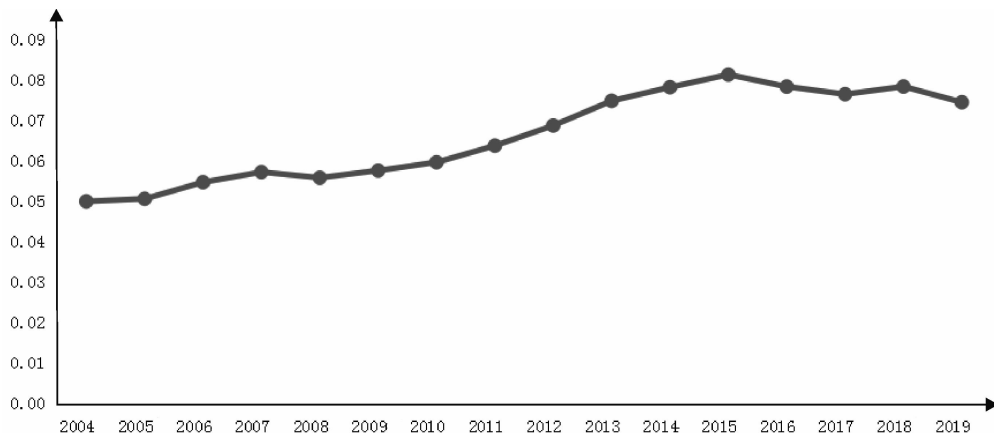


图2 2004—2019年河南省财政依存度

数据来源:河南省统计年鉴

表4 1994—2018年地方财政自给能力

年份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收入(亿元)	地方一般公共 预算支出(亿元)	财政自给 能力
2004	11893.37	20592.81	0.58
2005	15100.76	25154.31	0.60
2006	18303.58	30431.33	0.60
2007	23572.62	38339.29	0.61
2008	28649.79	49248.49	0.58
2009	32602.59	61044.14	0.53
2010	40613.04	73884.43	0.55
2011	52547.11	92733.68	0.57
2012	61078.29	107188.34	0.57
2013	69011.16	119740.34	0.58
2014	75876.58	129215.49	0.59
2015	83002.04	150335.62	0.55
2016	87239.35	160351.36	0.54
2017	91469.41	173228.34	0.53
2018	97903.38	188196.32	0.52

数据来源:2019年中国统计年鉴

形势分析

从财政自身来看,受经济下行压力加大、实施大规模减税降费、疫情常态化等因素影响,财政收入增长将继续放缓。同时,财政支出增长刚性较强,面临前所未有的疫情冲击,经济社会运行正在加速恢复中,做好“六稳”“六保”,三大攻坚战、推动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科技创新,护航经济稳中求进都需要财政资金的支持。

中长期来看,随着疫情的好转,2020年8月份,全省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增长9.1%;1—8月累计,全省财政收入增长1.3%,继续保持恢复性增长态势;财政支出增长0.5%,累计增幅首次实现由负转正。基本民生和重点支出保障较好。财政收支形势略有好转,但疫情继发的影响仍将持续。

2. 受疫情短期冲击及中长期继发影响下的财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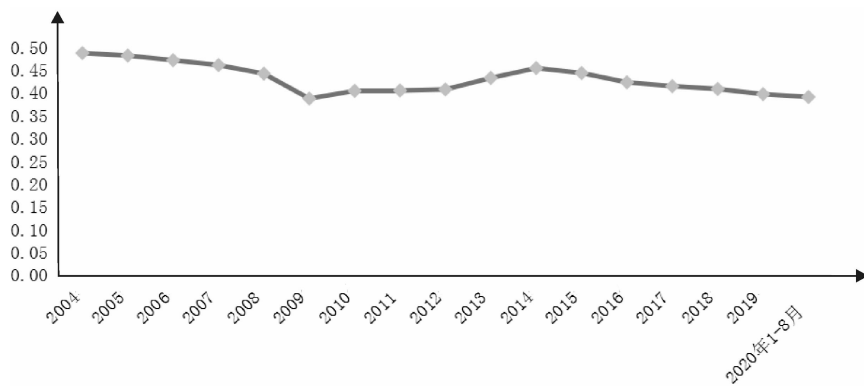


图3 2004—2020年河南省财政自给能力

数据来源:2019年河南统计年鉴,河南省财政厅

综上所述可以看出,河南省财政可持续发展虽尚在可控范围之内,但长期来看,威胁财政可持续发展的主要问题仍较为突出,财政形势不容乐观。

三、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财政制度促进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

现代财政是民主财政,是人民当家作主的财政。现代财政制度建设中,要充分发挥人民代表大会的作用,让人民的意见得到最充分的表达;要充分发挥人民在财政资金筹集和使用中的监督作用;要积极推动财政透明度的提高,政府预算决算信息应尽可能有效公开,为人民监督财政事务提供必要的条件。

习近平总书记多次赞扬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精神,他的“人民观”体现着极其浓郁的人民情怀。学习贯彻习近平的“人民观”,深刻理解“为谁执政、为谁服务”的问题^[5],就能更深刻地认识到财政的本质属性与时代内涵。财政制度应始终把人民放首位,牢记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为人民群众谋福利、作贡献。地方财政建设应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加大民生投入力度,加强民生资金管理,持续做好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

(一)建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变革方向

1. 多渠道稳定和扩大就业

进一步拓宽就业资金保障渠道,积极落实各项就业创业扶持政策,促进企业复工复产和重点群体就业创业。积极应对疫情影响,减轻企业经营压力,稳定企业就业岗位,精准落实困难企业稳岗返还政策。

2. 提高养老保障水平

保障基本养老金按时足额发放。开展调整退休人员基本养老金有关工作。建立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扶贫长效机制。进一步完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政策,地方政府可根据地方实际情况调整,为参加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的贫困人群按照最低缴费档次代缴部分或全部保费。

3. 完善公共卫生服务体系建设

提高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人均财政补贴标准。推进健康中国战略,继续开展重大传染病防控,提高城乡居民医保补助资金标准,支持医疗服务与保障能力提升,加大医疗救助投入力度^[6]。重点资助贫困地区的困难群众参加基本医疗保险,开展疾病应急救助,支持提高贫困地区人口医疗保障水平和能力。

4. 优化财政支出增进社会公平

支持发展公平和高质量的教育,坚持把教育作为财政支出重点领域予以优先保障,进一步优化教

育支出结构,向义务教育、贫困地区、薄弱环节倾斜。支持基础教育事业改革发展,重点提升农村和贫困地区义务教育经费保障机制。

5. 完善住房保障体系

全面推进城镇老旧小区改造,支持公租房保障和城市棚户区改造,大力推进住房租赁市场发展,全力支持做好农村危房改造工作。

6. 保障民生兜底工作

统筹开展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和孤儿基本生活保障工作。加强疫情防控期间困难群众兜底保障。适度扩大低保、临时救助政策范围,及时将符合条件的受疫情影响的困难群众纳入低保、特困人员救助供养、临时救助等保障范围。

(二)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方案

地方政府的收入来源主要是税收、非税收入、政府性基金。其中,非税收入比较杂,如行政事业性收费、资产处置、平台融资等,政府性基金主要是土地出让金收入。短期来看,地方政府可以通过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硬化预算执行约束、推行预算绩效评价等举措来缓解收支压力。长期来看,健全地方财政制度是稳定基层财政财源,缓解地方财政运行中出现的各种矛盾的长效机制。

一是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继续落实落细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巩固和拓展减税降费效果,减税降费更有针对性。支持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

二是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财政支出提质增效,大力压减一般性支出,集中财力围绕省委省政府中心工作,重点工程、项目加大投资力度;加大对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建设投入,保障群众基本生活。

三是加快建立现代财政制度。深化财税体制改革,切实发挥制度的保障作用;加快建立完善全省稳定的各项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财政体制,以及科学规范优化配置财政资源的预算管理制度。

四是加强财政管理。切实贯彻“以收定支”原则,加大优化财政支出结构力度,提高财政资金支出效率,发挥财政支出促进经济增长和社会公平的积极作用;加强预算绩效管理,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加强财政法治建设,提高依法理财水平;加强地方政府债务管理,提高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能力。

四、推动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的对策建议

(一)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框架下构建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

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一直存在,并不完全是减税

降费政策和新冠疫情常态化造成的,而疫情常态化和更大规模的减税降费仅是凸显了这种矛盾。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的不合理性与不稳定性才是引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的根本性原因。在我国现行的财政体制下,地方财政承担着与其财力严重不匹配的支出责任,长期力所不逮累积了地方财政负担。为有效纾解地方财政收支矛盾,保持和推动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加快推动深化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减轻地方财政支出压力;二是持续完善地方税体系改革,稳固地方财政收入;三是加大优化转移支付制度力度,建立健全转移支付机制,增强对地方财力补偿的合理性和规范性,促进区域发展公平;四是加强预算管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1. 深化中央与地方事权与支出责任的划分

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中事权和财权不匹配是相对突出的问题。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建立权责清晰、财力协调、区域均衡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制度”。在我国现有的财政体制下,地方政府承担着大量的事权而没有与之相匹配的财权,中央政府有大量的财权却承担了较少的事权^[7]。财政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条件是从人民的根本利益出发,以更科学的方法建立起充分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让人民群众享有更高效且高质量的服务和获得感。这就要求:一是进一步明确主要领域的责任划分。加快完成主要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善中央和地方财政关系,尤其是积极推进省以下政府间财政关系改革。在已经出台的医疗卫生、科技、教育、交通运输、生态环境等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担方式和具体比例的基础上,结合各级政府的支出分类,按照统一的标准加快出台更多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的改革方案。二是推进共同财政事权的功能有效发挥。在推进中央和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进程中,以事权定财权,合理界定中央财权事权、地方财权事权及中央和地方共同财权事权的边界,规范省以下各级政府事权边界,赋予各级政府承担事权相得益彰的财权,以充分发挥中央和地方的积极性。三是建立健全保障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标准体系。充分明确主要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标准,合理引入增长机制,建立确保共同财权事权的有效落实机制。与此同时,强化中央对地方标准的

管理与控制,在落实执行国家基础标准的条件下,可因地制宜地融入地方治理的地区标准,由地区财政自给自足提供财力支持。四是健全应急管理中的中央与地方财政关系。应急救援领域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是推进应急管理体系和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疫情常态化下,各省应结合地区实际财政收支和体制特征制定符合本省实际的改革方案,明确应急管理中省级以下各级政府间应急救援领域事权和支出责任。真正建立与各级政府财力相适应的制度,突出各自应急管理体系的特色和优势,提高应急救援执行力,强化健全配套措施,落实支出责任。

2. 进一步完善建立地方税体系

根据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示精神,进一步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是做好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的重中之重。充分赋予地方政府相应财权,是缓解地方财政积重已久的问题的长久之道。在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的同时探索政府间收入划分,加快完善建立地方税体系,稳定地方政府收入来源,进一步充实地方财力。新冠疫情给各行各业生产经营活动带来了不小的冲击,地方财政收入在一定时间内难以恢复到常态水平,疫情防控期间,地方基层政府出现了应急管理的能力不足^[8]。地方政府的治理能力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地方税体系的不健全。一是完善共享税模式。根据国家税制改革进程,进一步完善增值税制度等相关制度和政策。二是根据优化政府间事权和财权划分的要求,适当调整地方政府税收征管权限。在人大立法授权和监督之下,给予地方政府在税率调整方面的选择权和税收优惠方面的自主权,结合各省不同的经济发展情况完善地方税体系。三是继续清理与规范非税收入,将一些具有税收性质且收入稳定的收费纳入地方税体系的范围,提高地方财政收入中的税收收入比重。

3. 优化地区转移支付制度

逐步完善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实现区域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进一步优化和完善地区转移支付制度,充分形成稳定的各级政府事权、支出责任和财力相适应的财政体制,支持地方创造性开展工作。一是加大中央转移支付的力度,均衡地区间财力差异。二是健全转移支付体系,以优化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为基础,完善一般性转移支付制度,健全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制度,加快推进转移支付结构优化,形成组合有效、配合高效的转移支付体系。三是逐步完善专项转移支付制度,

因专项转移支付项目多,立项随意性强,造成专项转移支付的资金使用效率不高。调整专项转移支付的使用范围和方向,以支出绩效为导向并通过问责机制提高其使用效率。加强对财政资金各类预算执行监督力度。四是加强制度约束力,避免道德风险。中央在确定对地方转移支付规模时,充分评估当地政府财政纪律,强化监督、问责和惩罚机制,建立规范、科学和透明的转移支付分配制度。

4. 加强预算管理优化地方财政支出结构

科学地改进地方预算编制和控制方式,促进预算管理专业化发展,完善预算管理专业人才培养建设,提高预算管理水平,增强预算约束力。合理分配预算管理权力,建立有效监督和有力促进的预算执行机制,充分发挥纪检、审计等部门的监督职能,使财政资金的使用提质增效。严格加强财政资金管理,坚决执行权责对等理念,健全资金使用的问责机制。强化预算管理对政府债务的监督约束作用,提高地方政府债务管理能力,预防地方债务风险。

(二)地方财政制度要致力于公共产品的可持续提供

现阶段的历史条件下,财政的首要工作就是稳定经济促进发展,体现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聚焦重点,全面支持打好打赢三大攻坚战。增加基本民生保障投入,有效保障和改善民生特别是困难群众的基本生活。

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认真做好重点民生实事资金保障,持续解决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一是加大对市县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力度,重点支持基层财政困难地区和受减税降费影响较大的地区,增强对基层政府和财政困难地区的托底能力。二是制定有效的措施推动重点民生资金保障工作落实,更好地发挥创业投资基金对就业的引导带动作用。三是加大扶贫资金投入和整合力度,加快建立健全稳定脱贫长效机制,集中力量攻克深度贫困,全面打赢脱贫攻坚战。四是提高城乡低保补助、城乡居民最低基础养老金等标准,实现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管理,推动企业养老保险基金省级统收统支,稳步提高社会保障水平,提升人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三)地方财政制度要可持续地促进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

一是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一方面要提升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能力,以适应国家治理现代化进程的客观需要,为缓解新时代社会的主要矛盾提供

基础性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要从发展经济的职能出发,履行稳定地方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在二者之间合理地配置资源,建立持续共存和相互促进的长效机制。二是逐步把地方政府所有的收入都纳入预算管理,让地方提供公共产品和促进经济发展受到合理监督,用有效的体制保障两者之间的合理配置。三是服从中央宏观调控,并用好现有地方财力,加强地方财政平衡管理,用好地方财力促进经济发展。

五、结语

地方财政制度建设与地方经济发展要求相一致,是建立在规范、完善的地方财政制度之上的,而调整央地关系、完善地方税体系建设、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以及构建与财权事权相匹配的财政制度将提升促进地方治理能力,更好地适应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本文基于疫情常态化背景、国家治理现代化目标下对地方财政的新要求,以河南为研究样本,认为下半年地方财政收支矛盾将更加突出,地方财政制度建设必须以人民为中心,以保障民生促进社会公平为根本要求,以增强地方财政可持续性为目标,协同兼顾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要求。本文研究以期对地方财政制度建设提供决策参考,但研究尚有局限,在后续的研究中将进行完善和改进。

参考文献:

- [1] 吕冰洋,李钊. 疫情冲击下财政可持续性研究[J]. 财贸经济,2020,41(6):5-18.
- [2] 赵术高,李珍. 应对重大不确定性风险的财政监管制度逻辑与建议:由新冠疫情防控引发的思考[J]. 财政监督,2020(11):17-21.
- [3] 刘继同. 健康中国与现代健康福利财政制度[J]. 人民论坛,2020(15):35-37.
- [4] 吴波. 疫情冲击下地方财政可持续发展分析与对策[J]. 财政监督,2020(8):18-24.
- [5]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6] 薛钢,明海蓉. 新冠疫情视角下的医疗卫生财政制度优化研究[J]. 财政监督,2020(9):25-30.
- [7] 楼继伟. 坚持现代财政制度主线完善中央地方财政关系[J]. 财政研究,2020(2):3-8.
- [8] 冯俏彬. 新冠疫情折射下的我国应急财政管理制度[J]. 财政科学,2020(4):14-2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People – centered Local Financial System under the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A Research Perspective from Henan

WANG Haixia

(Graduate School,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2488, China)

Abstract: With China's economy entering the phase of a new normal, meanwhile, the impact of the epidemic, tax cuts and fees and downward pressure on the economy, fiscal revenues continue to decline and rigidity expenditure is increasing that makes the local fiscal situation even more severe and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income and expenditur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prominent. This paper is based on the background of COVID – 19 regular epidemic and take Henan province as the research sample. Research suggests that the epidemic will lead to more prominent contradictions in local financi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fiscal system must take into account both the goal of high – quality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the bidirectional strategy of local fiscal sustainability. Therefore, this research intended to the construction of local financial system centering on the people, in order to balance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local government financial revenues and expenditures, enhance the sustainability of local finance and escort the steady development of local economy.

Key words: regular epidemic prevention and control; local fiscal system; local financial system

(上接第 38 页)

参考文献:

- [1] 韩其恒, 李俊青. 二元经济下的中国城乡收入差距的动态演化研究[J]. 金融研究, 2011(8): 15 – 30.
- [2] 魏浩, 赵春明. 对外贸易对我国城乡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J]. 财贸经济, 2012(1): 78 – 86.
- [3] 王怀民, 王子睿. 加工贸易、收入转移与城乡收入差距[J]. 贵州财经大学学报, 2018(1): 77 – 84.
- [4] 袁冬梅, 魏后凯, 杨焕. 对外开放、贸易商品结构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基于省际面板数据的实证分析[J]. 中国

软科学, 2011(6): 47 – 56.

- [5] 沈颖郁, 张二震. 对外贸易、FDI 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J].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 2011(11): 136 – 147.
- [6] 魏浩, 杨穗. 对外贸易、进出口商品结构与我国城乡收入差距[J]. 经济经纬, 2011(5): 56 – 60.
- [7] 刘安萍. 农民增收与农村劳动力非农就业[J]. 统计与决策, 2006(22): 126 – 12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Foreign Trade, Human Capital and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in China

SONG Hongjun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Trad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ccording to the empirical test of 31 provinces panel data in China, foreign trade narrowed directly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but expanded indirectly it by affecting the human capital of rural labor force. In order to solve effectively the adverse effects that foreign trade has on the accumulation of human capital of rural labor force and narrow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we should further optimize the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foreign trade industry, vigorously promote th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of foreign trade industry, actively guide the expenditure direction of rural labor workers' income, moderately raise the legal minimum age for employment of workers in export industries, and create more low – cost continuing education and vocational training conditions for rural labor in the export sector.

Key words: foreign trade; human capital; urban – rural income gap

智慧城市兴起背景下河南省智慧农业发展研究

邓 岩

(河南财经政法大学 公共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6)

摘 要:智慧农业是依托大数据驱动以实现农业全产业链智能化、精准化的高级农业形式,对变革农业生产方式意义重大。智慧农业是智慧城市的基本支撑,在我国起点较晚且仍处在起步阶段,在实践层面还面临诸多挑战:建设研发资金匮乏、农业复合型人才不足、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等诸多问题,制约着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因此,必须统一规划整合建设资金、加快培育高素质复合型人才、加快信息化建设与应用等举措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关键词:智慧城市;信息化;智慧农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09

中图分类号:F323.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47-06

农业是立国之本,农业发展不仅关系到人民的温饱问题,而且还影响到国家的安全问题。特别是现在粮食安全成为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问题,如何发展好农业,提高农业产率,保证农业的发展质量是关键。李克强总理在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加快建设现代农业产业园和特色农产品优势区,发展“互联网+农业”,稳定和优化粮食生产。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摆脱贫困》一书中提到走一条发展大农业的路子,并对2020年全国春季农业生产工作作出指示,强调各级党委要把“三农”工作摆到重中之重的位置,农业基础打得更牢,把“三农”领域短板补得更实。2020年6月,农业农村部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国家农业科技创新联盟建设的指导意见》指出,深化农业科技体制改革与机制创新、深度推进产学研一体化的重要举措,是科学配置农业科技创新资源、培育农业农村发展新动能、支撑引领乡村振兴的重要平台和载体。

智慧城市建设是提升我国城市治理水平、完善城市服务功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经济文化需要的重要战略支撑^[1]。在智慧城市兴起的背景下,农业生产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与互联网技术,为

农业的发展提供全方位的信息服务且更加准确的管理,使得农业系统运行得更加具有效率、更加智能化,成为现代化农业发展的新引擎,故而集新兴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云计算和物联网技术为一体的智慧农业发展是形势所趋。

一、智慧农业的内涵

何为智慧农业?广而周知,农业是指利用动物植物等生物的生长发育规律,通过人工培育来获得产品的各部门。智慧农业则是在支撑国民经济建设与发展基础产品的农业基础上围绕“大数据”、依托大数据驱动从而实现农业的全产业链智能化、精准化的高级农业形式^[2]。

智慧农业将农业作为一个中心系统,从获取信息、传输信息、比较分析、做出决策、实践应用五个层次了解农作物、牲畜、水产品的生长状态。获取信息层是智慧农业利用多种摄像头及传感设备得到各类农业信息及生长数据;传输信息层是将采集到的信息和数据传输并储存到智慧农业动态数据库中;比较分析层处于智慧农业五个层次中的核心位置,利用先进的数据挖掘技术对半结构化及非结构化的农业数据进行分析 and 处理,从而提取出关键信息作为

收稿日期:2020-10-29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一带一路背景下郑州智慧一体化研究”(2018BZZ001);河南省政府决策研究课题“面向一带一路的中原城市群智慧一体化研究”(2018B228)

作者简介:邓岩(1982—),女,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财经政法大学公共管理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智慧城市研究。

支撑农业预警、控制、决策和管理的基石;做出决策层是依据比较分析层的结论对实施远程自动控制的农业装备和设施提供决策支持;实践应用层即智慧农业最终目的是投入到农业的智能管理及应用实践。

二、河南省农业建设概况

河南省地处中原,绝大部分地区位于北亚热带和暖温带,由于具备天然的地理位置和气候优势,充足的光、热、水资源和肥沃的土地为其农业的发展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因此,河南省作为中国农业大省,粮棉油等主要农产品产量均居全国前列,是全国重要的优质农产品生产基地。

1. 耕地面积

耕地作为粮食生产的重要前提与保障,能够为农村人口提供主要生活保障,也是城市居民生活资料的主要来源。河南省作为国家粮食生产核心区,当前在推进坚守耕地数量质量、永久农田规划工作“双红线”等方面,做出了不少探索。

在坚守耕地数量质量方面,河南省自然资源厅为严守耕地红线,要求各级国土部门强化“管控、约束、补救、建设、倒逼、惩治”六重保护措施,同时建立以县级平衡为主、省辖市调剂为辅、省级适度统筹为补充的耕地统筹机制,以确保耕地数量不减少。在“十二五”期间,河南省共整治土地近 3069.53 千公顷,新增耕地 120.73 千公顷。据 2019 年河南省统计年鉴显示,截至 2018 年底,河南省耕地总面积达 8162.37 千公顷,与 2009 年第二次全国土地调查结果相比,实现耕地净增加 30.05 千公顷。近五年河南省耕地面积具体变化情况如下图 1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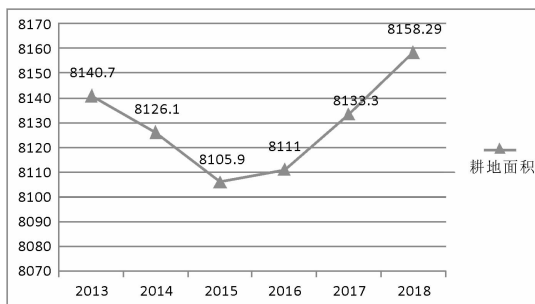


图 1 河南省耕地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公顷)

永久基本农田作为耕地组成部分,是指为确保土地资源可持续利用和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根据土地管理法律法规,在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中确定不得占用的具有较高或潜在生产能力的农用地。2017 年底随着河南省第三批县级永久基本农田划定数据库上报自然资源部,全省永久基本农田划定工作全部完成,基本农田保护率由划定前的 83.75% 提高

到 84.04%。2018 年河南省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耕地保护的实施意见》,提出到 2020 年,全省耕地保有量不少于 8027.35 千公顷,永久基本农田保护面积不少于 6807.40 千公顷,确保建成 4248.12 千公顷、力争建成 4949.14 千公顷高标准农田。

2. 粮食种植

粮食作物是农作物种植中的主导作物,目前河南省主要种植的粮食作物有水稻、小麦、玉米等,主要分为夏收与秋收粮食。2020 年河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坚持三链同构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的意见》中指出,要深入贯彻李克强总理关于加快建设粮食产业强国的批示要求,抓住我省粮食这个核心竞争力,加快延伸粮食产业链,优化服务着力提升价值链,积极打造供应链,完善原粮供应、仓储物流、市场供应、食品安全保障四大体系,加快推进粮食产业高质量发展,发挥粮食龙头企业和产业园区示范带动作用。

在粮食播种面积方面,近年来河南省粮食种植总面积呈现稳中有增的变化态势,如图 2 所示。截至 2018 年底,河南省粮食种植面积 10906.80 千公顷,比上年减少 9.05 千公顷。但河南省为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保障粮食安全,从 2015 年开始实施高标准粮田建设计划,并出台了相关保护条例,如《河南省高标准粮田保护条例》,以规范河南省高标准粮田的规划、建设、管理和保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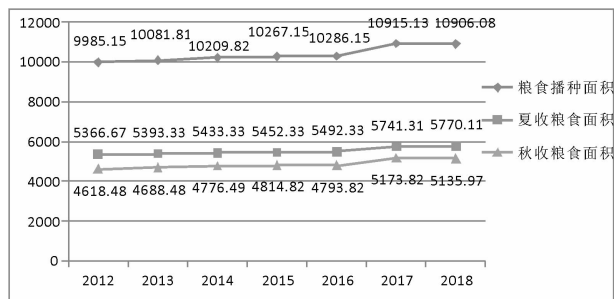


图 2 河南省粮食播种面积年度变化情况(千公顷)

在粮食产量方面,2020 年河南省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对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强化举措、狠抓落实,集中力量完成打赢脱贫攻坚战,持续抓好农业稳产保供和农民增收,推进农业高质量发展。河南省 2013—2018 年粮食总产量变化情况如图 3 所示,截至 2018 年底,全省全年粮食总产量 6648.91 万吨,比上年增加 124.66 万吨,是历史第一高产年。其中夏粮产量 3613.7 万吨,同比减少 102.28 万吨,是历史第二高位;秋粮总产量为 3035.21 万吨,比上年增加 226.54 万吨。此外,其他农作物如棉花、油料作物、蔬菜及食用菌,以及

猪牛羊禽肉、禽蛋等总产量也都实现了不同程度的增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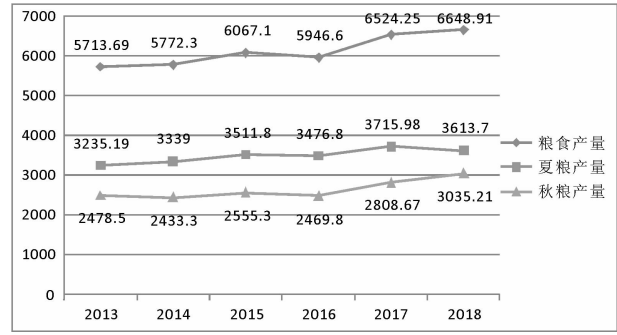


图3 河南省粮食产量年度变化情况(万吨)

3. 生产条件

粮食产量不仅会受到粮食播种面积、作物品种的影响,同时也会受到机械化水平、化肥施用量等多种外部条件的影响。因此,在作物生长期进行科学管理,通过改进外部生产条件,能更好地促进农业生产方式转变、加快农业现代化。

农业机械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当前河南省农业机械化正处于速度加快、质量优先发展阶段,机械化水平和机械总动力都呈现逐步上升趋势。一方面,机械化程度逐步提高。据河南省统计年鉴数据显示,截至2019年上半年,全省主要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水平达82.6%,达到历史新高,其中小麦生产基本实现全程机械化,机收水平均稳定在98%以上,玉米机播率达92%。另一方面,农机装备更加优良。2019年初河南省农业机械总动力达1.0204亿千瓦,同比增加166万千瓦,大中型拖拉机保有量和总动力分别达34.715万台、大中型拖拉机配套农具63.18万部,较上一年度增速减缓。为进一步改善农机装备结构,提升农机化综合水平,河南省自2010年开始推行实施农机购置补贴政策。2018年底河南省共安排农机购置补贴资金超18亿元,重点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倾斜。

河南省主要的农业生产模式是化学农业,这种模式会依赖于化肥和农药等人工合成化学品,对此河南省相继出台《河南省2018—2020年化肥使用量零增长行动方案》《河南省清洁土壤行动计划》等文件对农药、化肥的使用进行管控,旨在到2020年,实现全省主要农作物化肥、农药使用量零增长,利用率提高到40%;测土配方施肥技术推广覆盖率达到90%以上;有机肥养分还田率达到60%。2018年河南省化肥使用量增幅降至6.2%以下,增幅明显降低,农药使用量下降,如表1所示,2014年以来河南

全省化肥农药使用量呈不同程度的下降趋势,零增长行动效果显著。

表1 河南省农药施用实物量年度变化情况

年份(年)	农药施用实物量(万吨)
2012	12.83
2013	13.01
2014	12.99
2015	12.97
2016	12.71
2017	12.07
2018	11.36

三、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的现状分析

1. 大田农业智慧化

农业生产承载着农业资产与农业流通两大领域的发展^[3]。大田农业作为河南省的农业支柱,将大田农业生产与互联网技术相结合使粮食种植的运行更有效率和活力。

在作物种植信息化建设方面,河南省主要利用3S技术(遥感技术(RS)、地理信息系统(GIS)和全球定位系统(GPS))对作物种植面积、作物长势、作物产量、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进行监控。对于作物种植面积监测,河南省主要应用多源遥感影像数据的方法,在全球定位技术和地理信息系统的辅助下,提高作物面积的估算精度。对于作物长势监测,河南省“主要农作物生长动态监测与定量评价技术研究”项目通过验收,并在关键技术方面取得了较大突破。如作物生长参数与作物地表环境参数遥感反演优化技术、遥感作物生长模型和复杂下垫面作物面积提取的混合像元分解技术等,最终为河南省构建了基于多遥感反演参数的主要作物长势综合监测指标与定量评价技术体系。对于作物产量监测,目前河南省主要采用具有多波段和较高分辨率并且覆盖范围大、免费的MODIS数据展开作物大面积产量估测作业。对于病虫害监测,河南省启动全省1000多个病虫害监测网点以及数字化监测预警平台,借助卫星遥感技术利用光谱反射率、不同类型的植被指数等方法对病虫害进行研判。

在农业用水灌溉应用方面,河南省大力推广应用以低压管灌、喷灌、微灌为代表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节水增粮,节水增效,生态环保效益显著,为粮食生产核心区建设打下坚实基础。近年来河南省农田水利基本建设得到大发展,通过分析河南省统计年鉴可知2000—2018年全省农业有效灌溉面积不断增加,节水灌溉面积也在不断攀升,具体发展状况如表2所示。按照河南省的规划,到2020年,农业灌溉水有效利用系数将提高到0.616,高效节水灌溉

面积占有效灌溉面积的比重达 30% 以上。

表 2 河南省农业灌溉面积年度状况分析表

年份(年)	有效灌溉面积(10 ⁶ hm ²)	节水灌溉面积(10 ⁶ hm ²)
2000	4.73	0.95
2005	4.86	1.31
2010	5.08	1.54
2015	5.24	1.6
2016	5.36	1.8
2017	5.38	1.89
2018	5.40	2.0

2. 温室农业智慧化

日光温室作为反季节作物种植的重要基础设施,能够突破农作物对于地域、光照、水源等生长条件的限制,缓解季节性作物市场供应紧张的局面。目前河南省利用现代农业技术推进温室农业的整体情况较好,内黄县、滑县等地积极开展高效农业日光温室建设,成果显著,已建设的高标准日光温室已逾 200 多座。通过采用大棚温控技术,利用温度、湿度、气敏、光照等多种传感器对作物生长过程进行全程数据化管控,保证作物生长过程绿色环保、有机生产,促进了高效农业的发展。

课题组以焦作市新源鑫高效农业日光温室基地为主开展实际调研,该基地占地 56 亩,完全采用荷兰进口设备。对于温度把控,该温室内部安装有温度传感器,可以收集到各区域微小的温度变化,根据作物需要可以自动控制双层湿帘风机、高压喷雾、降温、升温系统,并启动通风系统,为温室智能创造适宜气候环境;对于施肥灌溉,该温室采用自动化滴灌施肥,引进原装进口的滴灌系统,自动对作物进行营养液补充。此外,该温室还采用无土栽培技术、自动化阳光控制系统、自动化补给 CO₂ 系统等,从而实现了电脑遥感控制温室农作物生产的全过程。

3. 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

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是利用物联网、云计算等先进信息技术对涵盖农业市场、农业科技、农业金融等方面的信息数据进行采集、加工与传播的过程,能够帮助农民准确高效的定位市场、及时把握农产品市场价格,进而直接影响农作物的种植结构^[3]。

河南省农业农村厅目前已开设河南省农产品价格信息监测系统、河南省农业产业化重点龙头企业监测系统、小麦价格周报系统、高产创建信息平台四大模块,同时设置网上批发市场,及时更新各类农产品最新价格,为农户种植、销售提供相关资讯。此外,为有序推进“互联网+农业”,河南省开展信息进村入户工程,截至 2019 年 10 月,河南省已建成运营益农信息社 40285 个,覆盖全省 85.8% 的行政

村,构建省信息进村入户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并努力推动全省益农信息社运营,初步在全省乡村建起了一条“信息高速公路”。预计到 2020 年底,河南将形成比较完善的信息进村入户服务网络和运行机制,实现服务延伸到村、信息精准到户。

四、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存在的问题分析

1. 建设研发资金匮乏

智慧农业需要充分依托大数据收集传输系统、终端远程控制系统等多种现代化技术装备^[3],而该类技术装备大多价格高昂,需要政府及社会资金的投入帮扶,单靠企业或个人无法完全承担。目前,资金已成为制约河南省农业智慧化生产规模扩大的一大瓶颈。

据河南省统计公报数据显示,在固定资产投资中,第一产业投资金额连续多年远低于二、三产业,基础建设资金相对较为缺乏。以焦作新源鑫公司为例,该公司从产品种类到育种、施肥、生产等设备都是依靠荷兰进口,成本较高,由于租借土地承包经营权,无土地所有权,无法从银行获得贷款,故而前期资金投入均需依靠负债,从母公司进行贷款,资产负债率高达 90% 以上。此外,国家虽出台相关政策支持农业技术创新,省里补助部分资金,但要求该项目所在县必须配套同等资金,由于县政府资金不足,使得此项目缺乏外部资金投入。

2. 农业复合型人才不足

智慧农业是物联网、大数据等现代信息技术在农业领域的全新应用,属于知识技术密集型产业,不仅需要掌握农业生产技能和操作现代化机械设备的高素质农民,更需要掌握电子信息化的农业技术人员^[3]。但就目前而言,河南省仍存在农民劳动力素质有待提高、复合型人才缺乏等问题。

一方面,由于城乡劳动力转移,青壮年劳动力离开农村,大多数农业从业人员整体文化水平较低,传统观念根深蒂固,农业生产决策往往依赖传统经验,接受和使用现代信息化技术能力较弱。另一方面,我国现有农业技术的院校教育主要集中在种植业和畜牧业等传统产业,缺乏农业生产经营管理和电子信息化的复合型人才,河南省农业技术人才存在较大缺口,尤其是高职称、高层次的农业人才。因此,高素质农民和高层次专业技术人员的匮乏限制了智慧农业的发展。

3. 信息化应用水平有待提高

现代信息化技术是农业发展智慧化的技术前提,信息化的应用和发展水平也影响着智慧农业发展的水平^[4]。但就目前河南省信息化建设和应用

程度来看,仍存在以下两个问题。

一是规模化农业生产力度不足限制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智慧农业的发展方向将是在大规模集约化生产的基础上实现网络统一监测和购销等。而河南省人多地少,当前小规模细碎化经营模式占比较大,大多数农垦区的农业经营仍以单农户家庭为单位,不能形成集中管理、科学种植、按需生产,如焦作市国营博爱农场仍以集体土地承包给农户的方式进行独立生产。二是信息化基础建设阻碍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农业智慧化发展需要依赖一定信息技术手段,如物联网、大数据等。2018年河南省信息社会指数不足0.3972,且显著低于全国平均水平,仍处于信息社会转型期,全国排位第28名,较上一年度退后两个名次,信息化建设程度较为落后,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智慧农业相关技术的应用和推广。

五、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的结论与建议

1. 研究结论

智慧农业就是将物联网、大数据、云平台等信息技术运用到传统农业中去,通过互联网平台或移动终端实现对农业生产过程的控制,使传统农业更具有“智慧”。开展智慧农业建设能够提升农业生产效率、改善农业生产环境、整合农业生产资源、转变传统农业生产者身份,从而推进农业现代化建设。课题组通过对河南省农垦区、农产品加工企业、现代智慧农业企业进行实地调研和访谈,对河南省农业建设概况、农业智慧化应用现状及存在的问题进行整理分析,得出以下结论:

(1)河南省农业工作成果显著,在耕地面积、粮食产量以及生产条件等方面均处于全国前列。首先,河南省耕地面积稳步增长。通过推进坚守耕地数量质量、永久农田规划等工作,提高了农用耕地的生产能力以及耕地总体面积。其次,河南省农作物产量逐年增加。目前河南全省各级粮食部门主动适应改革新形势、积极应对发展新任务,其中高标准粮田面积及产能增速较快、粮食生产能力持续保持稳定。最后,河南省农业种植条件逐渐改善。当前河南省农业机械化正处于速度加快、质量优先发展阶段,机械化水平和机械总动力都呈现逐步上升趋势。同时,河南省化肥农药零增长行动效果显著,肥料和农药的利用率都有不同程度的增幅。

(2)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取得一定成效,但也存在不足。一方面,河南省积极推进大田农业、温室农业以及信息服务系统智慧化建设。对于大田农业,河南省主要利用3S技术对农作物种植面积、长

势、产量、病虫害监测等方面进行监控,同时大力推广应用以低压管灌、喷灌、微灌为代表的高效节水灌溉技术,实现节水增粮、节水增效。对于温室农业,河南省主要采用大棚温控技术,利用温度、湿度、气敏、光照等多种传感器对农作物生长进行全程电脑管控,实现绿色环保生长。对于信息服务系统,河南省农业农村厅主要开设网络信息发布系统、网上批发市场、信息进村入户工程等,及时为农户种植、销售提供相关资讯,实现服务延伸到村、信息精准到户。另一方面,河南省智慧农业建设仍面临一些制约因素,如智慧农业所需专业技术装备大多价格高昂,亟须政府及社会资金投入;由于城乡劳动力转移、高校教育集中于传统模式,使得农业复合型人才供不应求;规模化农业生产力度不足,以及信息化基础建设有限等阻碍了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应用等。

2. 政策建议

随着互联网、物联网等新兴技术的大幅崛起,人工智能、大数据、深度学习等新兴概念已逐步渗透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农业作为三农问题的根本,在与新兴技术的融合中出现了不太和谐的因素,为推动智慧农业建设顺利开展,应妥善解决这些不和谐的因素,因而本文就现存问题提出以下三点建议。

(1)统一规划整合建设资金,加大研发资金投入。一方面,智慧农业具有一次性投入大、受益面广和公益性强等特点,需要政府的支持和引导。各地方政府应统筹规划,立足于智慧农业发展现状,加强对推进智慧农业的宏观指导,加大政策扶持力度,积极鼓励探索适宜本土发展的智慧农业建设模式。另一方面,智慧农业发展需要依托的关键技术(如智能传感、作物生长模型、溯源标准体、云计算、大数据等)还存在可靠性差、成本居高不下、适应性不强等难题,需要加强研发技术与投入资金,攻关克难。政府应尽快制定一套完善的财政补贴体系,鼓励商业银行及金融机构提供支持智慧农业发展的融资贷款服务,号召具有实力的企业家及农村集体加入智慧农业建设的体系中,多渠道地募集资金以支持智慧农业的研发投入。

(2)培养高素质复合型人才,提高农民综合素质。智慧农业的发展有赖于大数据、互联网高新技术的创新与支持,农业技术的创新和器械设备的操作应用都有赖于人才的支持,复合型人才对智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无可比拟的作用。首先,要加强智慧农业人才高校培养计划,加强高校、农业企业及科研机构三者之间的协作关系,形成产学研一体化的培养方式。其次,要进一步完善公共服务体系,

适当提高科研人才待遇能够“留住人”，同时大力引进人才落户为本地智慧农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最后，结合河南省农业从业人员综合素质偏低的现状，鼓励农民学习农业信息知识，主动融入现代农业潮流，培养农民的互联网思维、经营理念，有序有效地对其教育及培训高新技术设备的操作，使农民能够适应智慧农业发展的步伐逐渐成长为新型职业农民。

(3)加强信息化建设与应用，推动智慧农业发展。一是搭建智慧农业发展的综合信息服务平台，发挥顶层设计的宏观指导作用，为农业生产者、经营者提供生产情况、市场供求关系及物流等多方面的最新信息，统筹省内的农业发展。如2018年，河南省自然资源厅基于云架构遥感监测“一张图”建设成果，搭建了“智慧耕地”一体化监测监管平台，完成了基于云架构的河南省国土资源遥感监测“一张图”工程整体建设，形成了“一池、一库、两体系、三应用、四平台”，构建了集业务全面管理、审批高效便捷、数据深度挖掘、资源综合监管、智能辅助决策、

社会便民服务于一体的信息化平台。二是利用新兴技术，如互联网、大数据等技术深入开发农业生产数据的潜在价值，并将其成果转化为商业模式，提升智慧农业的利润空间。如在农产品的销售阶段，可以利用大数据技术搜集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并将其数据化，进而通过云计算技术分析消费者的消费习惯与特征，为其推荐适合的产品，由此来提升农产品的销量，推动智慧农业的发展。

参考文献：

- [1] 韦颜秋,李瑛.新型智慧城市建设的逻辑与重构[J].城市发展研究,2019,26(6):108-113.
- [2] 宋伟,吴限.大数据助推智慧农业发展[J].人民论坛,2019(12):100-101.
- [3] 胡亚兰,张荣.我国智慧农业的运营模式、问题与战略对策[J].经济体制改革,2017(4):70-76.
- [4] 阮青,邓文钱.发展智慧农业问题研究:以广西为例[J].桂海论丛,2013,29(2):49-5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n Henan Province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Rise of Smart City

DENG Yan

(College of Public Management, Henan University of Economics and Law,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Abstract: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relies on big data to realize the intelligent and precise high-level agricultural form of the whole industrial chain of agriculture,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transformation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mode.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is the basic support of the smart city. It starts relatively late and is still in its infancy in China.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still faces many challenges in the practical level, the lack of construction funding, the insufficiency of agricultural talents for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 the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pplication level needs to improve, and many other issues, which restrict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Therefore, we must strengthen planning and integration of construction funds, speed up the cultivation of high-quality versatile talents, and accelerate the construc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nformatization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Key words: smart city; informatization; intelligent agriculture

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的构建

刘明江

(河南牧业经济学院 文法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与美国专利法和欧洲专利公约以及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中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相比,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审查标准显得较高。相比较而言,我国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存在两个突出的问题: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以及完全无视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内在联系。构建一个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势在必行,可行的措施包括: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澄清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用性证明标准。

关键词:宽严相济;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0

中图分类号:D923.4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53-10

在人类历史上,专利制度备受质疑,甚至在个别国家曾一度遭到废弃,发展到当今时代也没有完全摆脱社会公众的质疑。然而,专利制度依然存在人类社会,其持续存在的强大根基就在于专利制度对于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作出的巨大贡献,就在于社会公众在发出质疑的同时也从实用性中发现了专利制度存在的合理性。^[1]在专利法上,实用性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获得授权应当具备的不可或缺的条件之一,其发挥的作用并不比其他条件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然而,与其重要性不相匹配的是,实用性较少受到研究人员的关注,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如何改进,以及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如何处理,更是少人问津。笔者注意到了这一研究现状,也注意到,在中外专利法以及区域性或者国际性专利文件中,概括专利“实用性”的用语有所不同,这些用语的含义也有所差异。

本文立足于这些“不同”和“差异”,剖析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存在的问题,提出构建一个宽严相济的实用性审查标准的设想,该标准既能与国际协议要求保持一致,也能适合我国的现实需要,既不宽松,也不严苛,以宽严相济为目标。

一、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现状

在我国专利法上,实用性是指,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一方面要具备“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的特性,另一方面还要具备“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特性。我国专利法虽经多次修改,但对于实用性含义的规定从没有改变过。实用性不仅可以在专利权的授予中起决定性作用,而且也可以在专利权的无效中同样具有决定性的作用。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用性,专利申请会被驳回,授权专利也会被宣告无效。准确把握实用性这一要件的含义,具有重要的意义。

《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义》一书对2000年第二次修改后的专利法进行了细致入微的解释。根据该书对实用性的解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有实用性,取决于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能够在产业上制造出来(仅就产品专利而言),或者在产业上投入使用(仅就方法专利而言),以及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能够在产业上产生与“现有技术”相比的积极效果。^[2]尤为惹人注意的是,该解释引入“现有技术”,将其作为“积极效果”有没有产生的参照对象。后文对此还有批评性分析。

收稿日期:2020-09-1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代背景下《对外贸易法》知识产权条款研究”(2018BFX010)

作者简介:刘明江(1965—),男,河南南阳人,博士,河南牧业经济学院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上述解释也是我国学术界对实用性的惯常两要素(重复再现和积极效果)解释,见诸各类文献。以教科书为例,王迁教授在其所著的《知识产权法教程》中指出:“一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有实用性,应当看其能否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解决技术问题,以及能否达到积极和有益的效果。”^[3]

可以看到,在我国的专利法上,实用性的内涵体现在两个方面,一个是重复再现,另一个是积极效果。值得注意的是,对实用性的惯常解释均突出了“产业”的要求,尽管可以在最宽泛的意义上解释“产业”的内涵,对实用性的解释也仅产生少许的限定作用,但这个“产业”的限定用语在我国的专利法中从来没有存在过。这一点在下文的评价部分还会提及。

国家知识产权局依据我国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制定了一部具有部门规章属性的专利审查指南,并根据实际需要及时进行修改完善。该指南细化了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的各项规定,是各类专利申请的审查依据和标准,毫无疑问具有权威性 & 规范性。《专利审查指南 2010(2019 年修订)》(以下简称专利审查指南)规定有实用性审查适用的指引。^[4]从中可以发现,专利审查指南对实用性的规定与专利法上的规定和上述解释均是一致的,都强调了“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和“能够产生积极效果”两项实质内容,同时列举了不具备实用性的 6 种情形。

在叙述了有关实用性的规定及解释之后,本文在此还要提及我国专利法针对充分公开的规定。我国专利法第 26 条规定,说明书应当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清楚、完整的说明”,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现为准。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是否能够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就成为判断说明书是否满足充分公开要求的基本依据。这就是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若这一要求得不到满足,专利申请会被驳回,授权专利也会被宣告无效。在此提出充分公开的问题,是因为本文认为充分公开与实用性存在有内在联系,需要一并进行分析。

我国专利法在不同的条款中分别规定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应当具备的实用性要件和应当满足的充分公开要求,但没有处理好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致使专利申请同时涉及实用性和充分公开问题时审查员不能正确适用这些条款。我国专利审查指南指出:“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关。”换言之,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

备实用性若系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造成的,就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根本不需考虑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的问题。本文质疑的是,实用性与充分公开真的没有牵连吗?

二、美国和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美国专利商标局和欧洲专利局位于获得普遍认可的五大专利局之列,这两个专利局适用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对我国来说具有较高的借鉴价值,因此成为本文的分析对象。本文主要参照美国专利商标局适用的专利法(35 U. S. Code Title 35 - PATENTS, 简称美国专利法)和欧洲专利局适用的欧洲专利公约(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简称 EPC 公约),以及这两个专利局各自发布的专利审查指南。

(一)美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美国法上的实用性(utility)规定植根于三个渊源:其一,美国宪法第 1 条第 8 款第 8 项的规定,将一定期限的专有权利授给有用技术(useful arts)的发明人;其二,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的规定,将专利授给有用的(useful)发明;其三,以普通法形式发展而成的实用性标准,系美国最高法院(US Supreme Court)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US Court of Appeals for the Federal Circuit)在判决中确立的实用性标准。

一般认为,美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要求体现在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的规定:“凡是发明或者发现任何新颖且有用的(useful)方法、机器、制造物、物质组合或者上述任何新颖且有用的(useful)改进者,……均可以获得专利。”其中,“有用的”一语就成为美国实用性要件的法律依据。学说和判例一般将 useful 视为实用性(utility)的渊源,意在强调发明的有用性(usefulness)。

在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及在美国最高法院和美国联邦巡回上诉法院的审判实践中,实用性先后延伸出以下含义:(1)可操作的实用性(operable utility),即发明是否能够实施;(2)有益的实用性(beneficial utility),即发明是否能够提供可识别的益处;(3)特定/实在的实用性(specific/substantial utility),即发明是否具有特定和实在的用途。^[5]有益的实用性在早期的判例中还包括“道德的实用性”的含义,但在后来的判例中“道德的实用性”的适用遭到了否定,美国专利商标局的专利审查程序手册(Manual of Patent Examining Procedure, 简称 MPEP)也不赞成发明因格调低下、具有欺骗性或者有悖公共政策而不具有实用性的判定。特定和实在的实用性释义的出现是为了应对化学及生物领域一些未知用途的发明专利申请,要求发明具有可

信的(credible)特定且实在的用途,若欠缺这种用途,就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特定实用性是指一项发明的用途必须是非常具体的,而不能是抽象的;实在实用性是指一项发明的用途必须是现实性的,而不能是潜在性的。^[6]

在充分公开方面,美国专利法第 112 条规定,说明书应当使用完整、清晰、简洁、准确的术语,对发明、制造、使用该发明的方式和方法进行书面描述,以使所属领域或者最接近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制造和使用该发明,还应当披露发明人深思熟虑的实施该发明的最佳方案。根据美国专利法第 282 条在 2011 年修改前的规定,未充分公开发明或者未披露最佳实施方案,均可导致专利权利要求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执行;但第 282 条经过 2011 年修改之后,情况就不同了,未充分公开发明可导致专利权利要求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执行,未披露最佳实施方案则不会产生如此后果。第 282 条的修改对第 112 条要求的最佳实施方案的披露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得最佳方案的披露徒具形式意义,“不再具有实质性意义”。^[7]

MPEP 澄清了美国专利法第 101 条(实用性)与第 112 条(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一项发明欠缺第 101 条所要求的实用性,同时也会造成该发明欠缺第 112 条所要求的充分公开。在发明不具备实用性的情况下,本领域普通技术人员不可能将发明付诸实施,进而也不可能在说明书中教导技术人员如何使用该发明。根据 MPEP 提供的指引,对于这类发明专利申请,基于第 101 条规定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同时基于第 112 条规定以未充分公开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实际上很清楚,专利申请因缺乏实用性而被驳回,无论是依据第 101 条规定,还是依据第 112 条规定,都建立在同一个基础上,即申请人声称的实用性不能令人信服。为了避免混淆起见,凡是依据第 101 条规定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作出的驳回决定,都伴随有依据第 112 条规定以未充分公开为由作出的驳回决定。

在实用性要件得以满足的情况下,如何判定说明书的充分公开情况? MPEP 明确回答了这个问题。申请人披露了发明的一项特定用途,并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支持了这种特定用途,毫无疑问满足了第 101 条的实用性要求,但并不意味着第 112 条的充分公开要求也得到了满足。以一项某种化合物治疗某种疾病的发明为例,专利申请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证据证实了该化合物的治疗作用。若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必须进行过量(undue amount)的实验,获得足够的实验数据,才能实现该化合物声

称的治疗作用,那么,可以说,该发明申请欠缺第 112 条要求的充分公开,但不能说该发明欠缺第 101 条要求的实用性。在专利审查中,为了避免混淆起见,凡是基于“欠缺实用性”之外的原因依据第 112 条规定提出的驳回决定应当单独作出,以与基于“欠缺实用性”依据第 101 条规定和第 112 条规定提出的驳回决定相区分。

(二) 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欧洲专利公约,顾名思义,是一个关于欧洲专利局据以授予欧洲专利的公约,也是一个区域性的专利公约。欧盟成员国全都是 EPC 公约成员国,因此受 EPC 公约拘束。分析 EPC 公约针对实用性的规定,也就相当于分析各个欧盟成员国的专利法中有关实用性的规定。本文只援引 EPC 公约及相应审查指南的有关规定,不触及欧盟成员国的专利法。

EPC 公约在第 52 条第 1 款中规定,在任何技术领域内,凡是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并适于产业应用(suscepti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的发明,均应当授予欧洲专利;并在第 57 条中规定,如果发明能够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中制造或者使用,包括能够在农业中制造或者使用,即可认为发明适于产业应用。

关于发明的充分公开,EPC 公约作出了明确规定。EPC 公约第 83 条规定,欧洲专利申请应当以足够清晰且完整的方式公开发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与美国专利法不同的是,EPC 公约没有对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披露提出什么要求。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Guidelines for Examination)澄清了 EPC 公约第 57 条(产业应用性)和第 83 条(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对于违背公认的物理定律(well-established physical laws)的发明(如永动机),区分不同情况,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单独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单独以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或是同时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且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根据欧洲专利审查指南 G 部分第三章就“产业应用性”审查提供的指引,对于明显违背公认的物理定律的产品发明或者方法发明(如永动机),这类发明将被排除在适于产业应用的发明之外。若权利要求保护的对象仅仅是该发明的功能或者目的,就援引 EPC 公约第 57 条规定,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为由提出反对意见;若权利要求保护的对象仅仅是该发明物件的特定构造,就援引 EPC 公约第 83 条规定,以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在“充分公开”审查指引部

分也提到了上述永动机式的发明,这类发明存在固有缺陷,没有实施可能性,原因就在于违背了公认的物理定律。根据欧洲专利审查指南 F 部分第三章就“未充分公开”审查提供的指引,如果永动机发明权利要求的保护对象指向了永动机的功能,而不是仅仅指向了永动机的结构,那么,不仅援引 EPC 公约第 57 条规定以不具备产业应用性为由提出反对意见,而且援引 EPC 公约第 83 条规定以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提出反对意见。

(三) 美国和欧洲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对比分析

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也就是“在产业中制造或者使用”标准,实质上是要求发明申请描述的技术方案能够在产业中实现,强调发明的重复再现性。美国的“实用性”或称“有用性”标准要求发明具有使用价值,能够解决技术问题,强调发明的价值性。尽管这两个标准具有各自的侧重点,但经过解释性适用之后,两者的含义有趋同的倾向,均要求授予专利权的发明不仅要具有再现性,而且也要具有价值性。那么,这两个标准,孰优孰劣? 本文认为,只能视技术领域而定。在传统的技术领域(如机械、电子)，“产业应用性”标准较优一些,意在强调发明的可制造或者可使用,而在新兴的技术领域(如生物、化学)，“实用性”标准较优一些,意在强调发明的可利用价值。

对于违反物理定律的发明专利申请,欧洲专利审查指南区分专利权利要求保护的对象,保护对象不同,就以不同的理由提出反对意见,产业应用性条款及充分公开条款或是单独援引为反对理由,或是同时援引为反对理由。MPEP 则不做这种区分,一律以不具备实用性且不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驳回专利申请。这表明,对于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内在关系,欧洲专利局与美国专利商标局存在着不同的认识。本文认为, MPEP 对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的处理,较具合理性,值得我国借鉴。

三、TRIPS 协议和 SPLT 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TRIPS 协议(Agreement on Trade - 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议)和 SPLT 条约草案是(Draft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实体专利法条约草案)与专利有关的比较重要的国际协议和国际条约,其中的实用性规定在统一协调各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方面具有重要的作用。TRIPS 协议是一个已生效的国际协议。SPLT 条约草案在磋商阶段即遭搁置,但在磋商过程中呈现的各方观点,一方面表明在国际层面上

统一实用性条件的重重困难,另一方面提示各方为达成实用性条件的统一而应努力的方向,其中孕育着实用性审查标准的国际发展趋势。

(一) TRIPS 协议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TRIPS 协议首次在国际层面上统一规定了授予专利权的实质条件。TRIPS 协议第 27 条规定,在所有技术领域内,任何发明,不论是产品发明,还是方法发明,只要具备新颖性、创造性并可付诸产业应用(capable of industrial application),均应当授予专利;在为第 27 条提供的注释中,TRIPS 协议指出:“可付诸产业应用的”可以被成员国视为“有用的(useful)”的同义语。TRIPS 协议的这一注释清楚地表明,“可付诸产业应用的”与“有用的”在本质上还是有所区别的,只是在 TRIPS 协议中被作为同义语看待而已。“可付诸产业应用的”与“有用的”之间的关系类似于我国著作权法上“著作权”与“版权”之间的关系,尽管“著作权”和“版权”实质上具有不同的内涵,但在我国的著作权法上“著作权”和“版权”就能成为同义语。

TRIPS 协议也有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规定。TRIPS 协议第 29 条规定,成员国应当要求专利申请人采用足够清晰且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并可以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发明人在专利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知晓的实施发明的最佳模式。从语言表述上看,TRIPS 协议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要求与美国专利法第 112 条的要求是一样的。

(二) SPLT 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

虽然 SPLT 条约草案远不如 TRIPS 协议知名,但却是在国际专利一体化进程中取得的阶段性重要成果,体现了国际专利法从协调各国专利法到统一各国专利法转变的动向。本文参考的 SPLT 条约草案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WIPO)专利法常设委员会(Standing Committee on the Law of Patents, 简称 SCP)于 2001 年 5 月 14—19 日在瑞士日内瓦召开的第 5 次会议上讨论的 SPLT 条约草案(Draft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SCP/5/2),同时参考的还有 SPLT 条约草案实施细则和实践指南草案(Draft Regulations and Practice Guidelines under the Draft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SCP/5/3)。

SPLT 条约草案在三个条款(第 16—18 条)中分别对发明应具备的实用性、新颖性和创造性做出了明确规定。依据第 16 条的备选条款 A,一项发明,就其性质而言,如果可以“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拥有一项特定的、实在的和可信的用

途”，就应当被视为适于产业应用的(有用的)^①；第16条的备选条款B则是“删除产业应用性/实用性要求”，也就是说，对实用性不做任何规定。与TRIPS协议采用脚注的方式不同，SPLT条约草案直接将“适于产业应用的”和“有用的”两个术语并列置于第16条备选条款A之中，第16条就是以“产业应用性/实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ility/Utility)作为条目标题的，将“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等同看待的意图非常明显。

SPLT条约草案第11条系对发明充分公开的规定，它的备选条款A规定，申请人应当采用足够清晰且完整的方式披露其发明，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实施该发明。比较而言，该草案第11条备选条款A的文字表述与TRIPS协议第29条没有什么不一样。然而，第11条备选条款A对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公开没有提出要求，这是与TRIPS协议第29条不一样的地方。SPLT条约草案第11条的备选条款B采用不同的措辞对发明的充分披露提出要求：对申请专利的发明的披露应当是充分的，申请专利时提交的说明书、权利要求书和附图足以使本领域的技术人员不需进行过量试验即可将该发明付诸制造和使用。SPLT条约草案第11条备选条款B也没有对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公开提出要求。

(三)TRIPS协议和SPLT条约草案中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对比分析

产业应用性强调发明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在意的是发明的再现性，而实用性强调发明能够具备实际的用途，在意的是发明的价值性。在传统的技术领域(如机械、电子)，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的发明一般都具有不证自明的用途，而在新兴的技术领域(如化学、生物)，发明的再现性常常是不证自明的，但发明的用途却不那么清晰可见，有待实验数据证明。正如前文已述，“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在内涵上本不相同，但被人们视为同义语了。

尽管TRIPS协议和SPLT条约草案均将“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视为同义语，但两个用语背后的观念已经根深蒂固，双方(主要是美欧各自代表的双方)固执己见，不肯妥协，因此要把这两个用语的内涵真正统一起来并非易事。TRIPS协议没有在国际层面上实现实用性要件的真正统一。在SPLT条约草案讨论中，缔约磋商各方未能就调和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两个术语内涵的统一条款达成一致意见，直到2005年5月第11次专利法常设委员会会议上，仍没有就产业应用性和实用性的协调统一达成共识，致使SPLT条约草案的协商工作自2006年

起暂停至今。

若SPLT条约能够达成，存在一种可能性，那就是需要调和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与美国的实用性标准，方法就是，在SPLT条约中将产业应用性(实用性)规定为发明能够在任何类别的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的特性，在SPLT条约实施细则或者实践指南中将产业应用性(实用性)解释为发明具有特定的、实在的和可信的用途。可以预料的是，按照这样一个解释思路走下去，SPLT条约在形式上采纳了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但在各国的专利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实际适用的是美国的实用性标准。不过，这是不是可以反映出产业应用性标准渐渐向实用性标准靠拢的发展态势呢？

对于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不管是TRIPS协议，还是SPLT条约草案，均没有提及，SPLT条约草案实施细则和实践指南草案也没有提及。因此，对于违背自然规律的发明专利申请，以什么样的理由做出驳回决定，悉数交由各国自行规定，TRIPS协议和SPLT条约草案不持任何立场。本文认为，原因可能在于，TRIPS协议不是各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即便SPLT条约将来能够达成，也不可能成为各国专利局授予专利权的直接法律依据，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关系可以交由各国自行处理。

四、对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评价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的含义与欧洲的产业应用性较为接近一点，与美国的实用性相对来说较远一些。从整体上看，与美国和欧洲，以及TRIPS协议和SPLT条约草案的实用性审查标准相比，我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存在三大明显的不同。

(一)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产生积极效果”

不管是“产业应用性”标准，还是“实用性”标准，根本就没有发明“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规定，只要求发明在产业上能够实现(“产业应用性”标准)或者在产业上有用(“实用性”标准)。以比较的眼光观察，会惊奇地发现，仅有我国的专利法针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提出了“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双重要求。很明显，我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高于“产业应用性”标准和“实用性”标准，换言之，我国的实用性门槛高于美国和欧洲，也高于TRIPS协议和SPLT条约草案设定的标准。这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

本文认为，对“积极效果”的要求系对实用性内涵的误读。实用性审查的重点是，判断发明或者实

用新型是否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产业应用性”标准)或者在产业上解决实际问题(“实用性”标准)。至于解决问题的效果怎么样,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也就是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上能够产生什么样的技术效果,是积极的技术效果,还是消极的技术效果,则不属于实用性审查的范围。强行植入“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内容,系对实用性的错误理解造成的,为实用性赋予了不应有的内涵。

(二)在“制造或者使用”前面没有使用“产业”限定语

EPC 公约、TRIPS 协议和 SPLT 条约草案在规定实用性时,均使用了“产业”这一限定语,意在强调,不管是在制造过程中,还是在使用过程中,发明的制造或者使用均能够在产业上重复再现,既不是一次性制造,也不是一次性使用。其中的“产业”从来都是从最宽泛的意义上解释的。SPLT 条约草案明确指出,按照《巴黎公约》第 1 条第 3 款解释工业产权的方式,从最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产业”。依据《巴黎公约》第 1 条第 3 款对工业产权的解释,最广泛意义上的“产业”不仅仅是指严格意义上的工业和商业,而且也是指农业和采掘业及所有的制造产品或者自然产品,例如葡萄酒、谷物、烟叶、水果、牛、矿物质、矿泉水、啤酒、花卉和面粉。

本文注意到,与 EPC 公约、TRIPS 协议和 SPLT 条约草案迥然不同的是,我国专利法在界定实用性时,没有使用“产业”一词,仅强调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那么,在“制造或者使用”前面没有“产业”限定语,是不是我国专利法上实用性的“产业”特性就没有了呢?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对于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学术界和实务部门均是在“产业”的层次上解释“制造或者使用”的,也是在最广泛的意义上解释“产业”。比如,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将实用性解释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在产业上制造或者使用”,并认为“产业……包括工业、农业、林业、水产业、畜牧业、交通运输业,以及文化体育、生活用品和医疗器械等行业。”

基于上述分析,对“产业”的最广泛解释在国际国内都是一致的,没有“产业”限定语并没有对我国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审查产生什么实质性的影响,甚至连形式上的影响都没有。然而,不得不指出的是,我国的实用性标准实质上是倾向于欧洲的产业应用性标准的,着重评价的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特性。生物、化学领域发明的出现凸显了将实用性内涵局限于“能够制造或者使用”特性的缺陷,消除该缺陷需要学习美国

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标准,在我国的实用性审查标准中引入“实际用途”特性的评价,用以替代“积极效果”特性的评价。本文主张,重新诠释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概念,将其解释为“实用性,是指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并且具有实际用途”。前半部分着重考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上的再现性,后半部分将我国现行专利法上的“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文字表述替换下来,着重考察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产业上的有用性,即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可信的特定且实在的用途。此一主张与后文“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的建议是遥相呼应的。

(三)忽略了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的内在联系

美国专利审查程序手册和欧洲专利审查指南均明示了各自的专利法及专利公约中发明实用性条款与说明书充分公开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对于我国专利法第 22 条第 4 款(实用性)和第 26 条第 3 款(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我国的专利审查指南仅仅指出:“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关。”很显然,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置说明书公开的程度于不顾,根本不考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用性必然导致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的情况,完全忽略了第 22 条第 4 款和第 26 条第 3 款之间的内在联系。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审查员常常感到迷茫,遇到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的专利申请时,难以准确适用实用性条款和充分公开条款,更难以把握实用性条款和充分公开条款之间的关系。^[8]

比较充分公开条款中的“能够实现”和实用性条款中的“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可以发现,两者的落脚点存在共同之处,那就是,都着眼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施,只是两者的出发点存在不同而已,充分公开从信息披露出发,实用性从技术方案再现出发。然而,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完全无视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存在的联系,将两者武断地割裂开来。当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因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而不具备实用性时,一律将不具备实用性作为驳回专利申请的理,根本不考虑同时还存在着未充分公开的问题。

五、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的重构

本文提出构建一个宽严相济的实用性审查标准的设想,这样一个标准既不能失之于过宽,也不能失之于过严,要能够适应我国的国情及现实需要,有利于推动科技创新。为达此目的,需要对我国现行的实用性审查标准进行重构。

(一)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

“能够产生积极效果”本来就不应当是实用性要件应该包含的内容。本文主张,不再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提出“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将“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文字表述替换为“具有实际用途”,让实用性要件恢复其应有的面貌,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可再现性,也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有用性。凭借实用性审查应当达到的目标是,奖励发明人为社会公众作出的贡献,将专利权真正授给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同时在产业上具有实际用途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杜绝将专利权授给虽然在产业上能够制造或者使用但在产业上缺乏实际用途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

美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utility)源于“有用的”(useful)一语,要求发明具有某种或者某些可信的特定且实在的用途,并没有积极效果的要求。欧洲的“产业应用性”(industrial applicability)要求发明能够在产业上予以制造或者投入使用,也没有积极效果的要求。相比较而言,仅有我国的实用性要件关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

“积极效果”是相对于“消极效果”而言的,这提示我们,实用性应当像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一样,是一个有参照对象可供做比较分析的对比性概念。在我国专利法上,专利新颖性和创造性均有一个参照对象可供进行对比分析,这个参照对象就是“现有技术”。然而,我国专利法并没有为实用性设立一个参照对象,没有参照对象的话,“积极效果”的判断就无从说起。

我国专利法从来没有为实用性设立过什么参照对象,只有1993年版本的专利审查指南曾经将“现有技术”确定为实用性的参照对象:“积极效果,是指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产生的经济、技术和社会的效果……同现有技术相比,这些效果应当是积极的和有益的。”不过,在2001年版本的专利审查指南中,再也见不到“同现有技术相比”这样的文字表述了。原因在于,我国专利行政机关对于实用性要件的认识发生了明显的改变,真正认识到实用性本来就不是一个对比性概念。

实用性不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那么,哪个指标可用来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答案无他,这个指标就是同属专利“三性”之一的创造性。创造性定义中的“显著的进步”(发明)和“进步”(实用新型)分别有对于发明所产生的技术效果和实用新型所产生的技术效果的评价。以发明为例,我国专利审查指南指出:“发明

有显著的进步,是指发明与现有技术相比能够产生有益的技术效果”;“在评价发明是否具有显著的进步时,主要应当考虑发明是否具有有益的技术效果”。由此看来,创造性本来就有评价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技术效果的内容,完全没有必要再在实用性中进行重复评价。

将“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从实用性要件中剔除出去以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技术效果的评价,就从实用性要件转移到了创造性要件那里去了。实用性要件和创造性要件各司其职,不仅能够避免法律规定的相互重叠,而且也能够体现立法资源节约的原则。

(二)澄清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的适用关系

我国的专利审查指南割裂了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的联系,没有就如何处理两者之间的适用关系做出恰当的规定。然而,本文认为,充分公开与实用性之间存在着难以割裂的内在联系。

一方面,专利说明书公开充分与否,对包括实用性在内的专利“三性”的判断会产生重要的影响。仅就实用性而言,如果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不能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诸实施,必须进行过量的实验才能实现,那就表明说明书公开不充分,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就会认为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没有制造或者使用的可能性,做出不具备实用性的判断就成为一种必然,这显然是专利说明书公开不充分造成的。说明书公开不充分,继而怀疑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是有“足够的理由”的^[9],因为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凭借未充分公开的说明书,不知道而且也不可能知道如何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诸实施。对于这类专利申请,应当以不具备实用性且未满足充分公开要求为由做出驳回决定。

另一方面,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因其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而当然不具备实用性,必然导致专利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不管是发明,还是实用新型,只要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就没有制造或者使用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不具备实用性。在这种情况下,任凭专利申请人对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作出怎样的说明,也不可能使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将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予以实现,这意味着说明书没有,实际上也不可能满足“清楚、完整”的要求。因此,因技术方案固有的缺陷引起的实用性的缺失总是与充分公开的缺位相伴而生的。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条款与充分公开条款之间的关系长期令人困惑。正确处理实用性条款与充

分公开条款之间的适用关系,实质上是要明确,当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因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而欠缺实用性时,以什么样的理由做出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是不具备实用性?还是公开不充分?抑或两者并用?本文认为,学习美国的做法,摒弃欧洲的做法,我国的选择应当是“两者并用”,同时以不具备实用性和公开不充分两个理由做出驳回专利申请的决定,因为在这类专利申请中不具备实用性和公开不充分是同时存在的。

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1.3 能够实现”(涉及公开不充分的情形)一节中,增加一项内容:“(6)说明书给出的技术方案明显违背自然规律,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按照说明书记载的内容不能够实现。以第(6)项理由驳回专利申请时,也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同时,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五章“3.2 审查基准”(涉及不具备实用性情形)一节中,将“因不能制造或者使用而不具备实用性是由技术方案本身固有的缺陷引起的,与说明书公开的程度无关”替换为“申请专利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违背自然规律时,应当以不具备实用性为由驳回专利申请,也以未充分公开为由驳回专利申请”。

需要说明的是,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经过实用性审查,获得了具备实用性的认定结果,是不是意味着充分公开的要求也得到了满足?答案是不一定。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必须进行过量的试验,才能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付诸实施,这样的专利申请难以满足充分公开的要求,但不能说实用性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应当单独以说明书公开不充分为由驳回专利申请,以与实用性和充分公开均不具备的专利申请有所区别。

有必要在此提及的是,TRIPS 协议及美国专利法在发明充分公开条款中,要求发明人披露在专利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所知的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那么,我国专利法要不要在第 26 条第 4 款充分公开要求中增加类似规定呢?从积极的一面来看,要求发明人披露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一来可以预防发明人将最佳的实施方案隐藏起来,二来方便同行业的竞争对手将创新建立在最佳方案的基础上。尽管如此,本文还是不主张增加要求发明人披露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的规定。不主张增加的第一个原因是,最佳方案系一个主观上的判断,披露的方案只要是发明人主观认为已属最佳即符合披露要求,但是否属最佳方案难以判断。不主张增加的第二个原因是,实施发明的最佳方案是动态变化着的,在申请日

或者优先权日披露的最佳方案不会一直最佳下去,或许一过申请日或者优先权日就不再是最佳方案了。美国专利法对最佳方案披露的规定,由极具实质意义转向仅具形式意义,富有启发意义。不主张增加的第三个原因是,TRIPS 协议第 29 条规定,成员国“可以”(may)而不是“应当”(shall)要求专利申请人指明最佳实施方案。成员国有权自主决定是否在其国内法中做出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最佳实施方案的规定,要求或者不要求专利申请人披露最佳实施方案都符合 TRIPS 协议的要求。

本文注意到,依据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的规定,在专利说明书应当包括的内容中,“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具体实施方式”赫然在列,该实施方式应当是申请人认为的“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方式”,必要时,举例说明。另外,我国专利审查指南仔细解释了“实现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优选的具体实施方式”及“实施例”,并专门规定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实施例要求。本文认为,包括“实施例”在内的“具体实施方式”尽管有“优选”的要求,但没有“最佳”的限定,因而不会出现像“最佳方案”那样难以判断的问题。更重要的是,尽管“具体实施方式”是专利说明书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充分公开与否的判断具有决定性的作用,但其作用并没有被提升至不应有的可导致专利权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程度。在我国专利法上,没有提供“具体实施方式”,或者提供的具体实施方式不是优选的实施方式,仅会影响说明书公开是否充分,以及实用性是否具备的判断,但不会产生专利权被撤销、无效或者不可执行的后果。因此,本文主张,有关“具体实施方式”的规定可继续保留下去。

(三)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

我国专利法上的实用性强调发明或者实用新型能够制造或者使用,这只回应了社会公众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可实施性的关切。但是,社会公众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有何用途的关切,现行的实用性规定没有给予回应。本文认为,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机制,以此回应社会公众的后一个关切。

以往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集中在机械、电子等领域,其实际用途可以较为直观地呈现出来,即使专利申请人不在专利说明书中披露,社会公众特别是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也能够从专利申请文件中识别出来。然而,随着生物、化学等领域新兴技术的问世,这些新兴领域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在生物、化学领域,主要是发明,罕有实用新型)在申请专利的时候,如果申请人不披露实际用途,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

员就难以从专利申请文件中明了这些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究竟有何用途,更别说社会公众了。因此,在我国专利法上,要求专利申请人在专利说明书中披露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是非常必要的。

专利申请人应当在说明书中披露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专利法可不限限制披露的实际用途的数量,但可要求至少披露一种实际用途。在专利审查实践中,审查员要审查申请人披露的实际用途是否符合实用性判断要求,即该实际用途是不是可信的特定且实在的用途。^②若审查结果是肯定的,就作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的认定,若审查结果是否定的,就不应作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备实用性的认定。当申请人披露了多种实际用途时,只要一种用途或者部分用途满足了实用性要求即可。

欧洲专利审查指南规定,根据说明书记载的内容或者基于发明的特性,发明适于产业应用的方式(用途)不易被发现,即不是显而易见的,就应当在说明书中清楚地披露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如机械、电子领域的发明),发明适于产业应用的方式具有自显性,无须再在说明书中描述;仅在少数情况下(如生物、化学领域的发明),发明适于产业应用的方式不具有显而易见性,如某些涉及基因序列的生物技术发明,就必须作出清晰的披露。这说明,不是发明的所有用途都应当在说明书中披露,要求披露的仅限于不具有自显性的用途。我国专利法或者专利审查指南也应如此规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不具有自显性的,专利申请人应当在说明书中明确披露。

基于前面的分析,即使专利申请人没有在说明书中披露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任何实际用途,审查员也不能径直判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用性,因为没有披露并不意味着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真的没有实际用途。在这种情况下,审查员依然应当审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是否具有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并做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有无实用性的判断。同样,即使专利申请人在说明书中披露了多种实际用途且这些实际用途全都不符合实用性要求,审查员也应审查在已披露的实际用途之外是否存在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只有在披露的实际用途之外,没有发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审查员才可以推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备实用性。当然,不披露用途或者用途披露不当引起的法律后果应当由专利申请人承担,这其中的法律后果就是,审查员没有发现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

能够识别的实际用途,可以据此做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有实用性的判定。

关于发明用途的披露,我国专利审查指南针对涉及化学产品和遗传工程产品的发明明确提出了披露的要求,这两类发明的用途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披露。“关于化学领域发明专利申请审查的若干规定”指出,要求保护的发明为化学产品本身的,说明书中应当记载化学产品的用途……至少记载一种用途。另外,根据“有关生物技术领域发明专利申请的审查指引”,对于涉及基因……的发明,应在说明书中描述其用途……

与欧洲专利审查指南相比,我国专利审查指南关于发明用途披露的规定仅限于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的发明,应当将此规定适用于全部技术领域。同时,应当考虑到这样一种情况,即大多数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具有自显性,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能够识别出来,只有不具有自显性的用途,难以被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识别,才有披露的必要。因此,建议在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第二部分第二章“2.1 说明书应当满足的要求”一节中,在“充分公开”条款之后,紧接着增加一款内容,作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的“一般规定”。该“一般规定”的具体表述建议为: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对于所属技术领域的技术人员来说,是难以识别的,应当在说明书中予以描述。“一般规定”增加之后,专利审查指南关于化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发明用途披露的规定就有了正当性基础,同时也体现了法律规定的一体适用特性。

我国专利法实施细则也有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的相关规定。专利法实施细则第23条(涉及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的内容)规定,“说明书摘要应当……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但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7条(涉及说明书应当包括的内容)却没有把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列为说明书应当包括的内容。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写在说明书摘要中,而不是写在说明书中,有本末倒置之嫌。按理说,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应当在说明书中披露,且根据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内容及特性,应当要求披露非自显性的用途。因此,建议在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7条中增加一项内容:“(六)主要用途:写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主要用途,但具有自显性的用途除外。”

(四)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用性证明标准

在实用性审查过程中,至关重要的一个问题是,对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用性存在与否的证明,应

当采取什么样的标准?是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还是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或称盖然性占优势的证明标准)?

若要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对专利申请人来说,最有效的举证方法是,将专利产品制造出来,或者将专利方法投入实际使用,让社会公众能够感受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际用途,以此方式证明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方能达到排除一切合理怀疑的程度。若真要求申请人这样证明其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实用性,那么,这与专利制度发展初期威尼斯政府和美国政府要求发明人提供发明“模型”或者“样品”有什么两样?专利制度发展到现在,提供发明“模型”或者“样品”的要求早已成为历史。中外专利法上的实用性仅要求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可付诸制造或者使用的可能性,而不要求实际制造出来或者实际投入使用。何况,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一般适用于刑事案件,而在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实用性审查中则没有适用的余地。

若要采取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就要均衡考虑专利申请人作为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实用性的证据与另一方当事人提出的发明或者实用新型不具有实用性的证据。在双方当事人都没有足够的依据否定对方证据时,需要判断一方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因此,基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均衡考虑双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实用性的可能性高于不具有实用性的可能性,也就是说,具备实用性的证据的证明力大于不具有实用性的证据的证明力,就应认定发明或者实用新型具有实用性,否则,就应做出不具有实用性的认定。

我国专利审查指南确立了专利权无效宣告程序中证据运用的若干规则,但没有指明应当采用何种证明标准。专利审查指南第四部分第八章规定,对于同一个事实,双方当事人提出了相反的证据,但都不足以否定对方的证据,“专利复审委员会应当结合案件情况,判断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是否明显大于另一方提供证据的证明力,并对证明力较大的证据予以确认”。这清楚表明,专利审查指南对于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是予以认可的,这一标准不但能够适用于专利复审及无效宣告程序中,也应当能够适用于其他类型的专利案件中,如专利侵权纠纷案件。

基于上述分析,高度盖然性的证明标准应当成为我国实用性审查中有关证据审核认定的证明标准,并应当予以坚持。

六、结语

为了重构我国实用性审查标准而建议的上述四项措施,就其所能产生的效应而言,有的产生松绑的效应,有的产生紧缩的效应,有的产生复原的效应。毫无疑问,取消“能够产生积极效果”的要求,将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的“积极效果”交由“创造性”去评价,必定能对实用性审查标准产生松绑的作用。澄清实用性与充分公开之间的适用关系,以合适的理由驳回技术方案存在固有缺陷的专利申请,可令实用性审查标准回归其原有的本位。引入发明或者实用新型用途披露一般规定,拒绝用途不明的专利申请,在一定程度上收紧了实用性审查标准,尤其是抬升了生物、化学领域发明的实用性门槛。坚持高度盖然性的实用性证明标准,实际上就是将实用性审查标准建立在审查员“对证据有无证明力和证明力大小独立进行判断”的基础上,并在实用性审查标准上打上了审查员自由心证的烙印,相较于采取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明标准,使实用性审查标准呈现出一定的灵活性。

本文认为,综合运用上述四项措施,可以构建出一个既不过于宽松又不过于严苛并具有一定灵活性的实用性审查标准,这样的标准即属于本文主张的宽严相济类型,可以因应经济社会发展的实际需要,促进创新驱动和科技强国战略的实施。

注释:

- ①industrially applicable (useful)。
- ②特定用途是相对而言的,要“特定”到什么程度才能满足特定用途的要求,取决于说明书中披露的用途能否在产业上或者生活中直接应用,而无须进一步的实验。例如,将一种化学物质的用途描述为可以用来治疗感冒,是不符合特定用途要求的,因为感冒有很多种,若描述为可以用来治疗病毒性感冒,则符合特定用途的要求。

参考文献:

- [1]杨德桥.论实用性在专利合理性危机克服中的价值[J].北京化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1):1-8.
- [2]徐玉麟.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释义[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112-114.
- [3]王迁.知识产权法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9:328.
- [4]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审查指南2010(2019年修订)[M].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20.
- [5]李新芝.美国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研究[J].知识产权,2017(8):106-112.
- [6]杨德桥.美国专利法上的专利实用性判断标准研究[J].知识产权,2015(5):92-98.

(下转第67页)

地方立法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研究

张隽旂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管理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立法权向下延伸为地方治理提供了更多的立法层面的机制手段,对地方立法权的行使既要鼓励推进,又要审慎把控。地方立法活动的依法有序开展需要立法监督工作保障。面对立法主体的扩容,地方立法监督制度也需调整配合,建议从监督主体、监督程序、监督方式等方面探索,制定更加合理细致的规范,确保监督实效,提高立法质量,以良法护航地方治理现代化。

关键词:地方立法;监督机制;地方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1

中图分类号:D920.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63-05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是国家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明确指出,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不仅需要加快形成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还必须建立严密的法治监督体系。完备的法律规范体系的形成需要依靠完善的立法体制机制,而立法监督工作是立法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当前,在《宪法》《立法法》的安排下,我国已基本形成了权责清晰、层级分明、有序可循的立法体制,但是对于立法监督工作还有待加强和规范。在地方立法权扩容后,地方立法活动逐渐活跃,对新晋的相对缺乏立法经验的地方立法主体实施的立法活动,应当更加重视立法监督工作的开展,通过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使监督工作进一步系统化、规范化,从而确保地方立法的质量与效率。

一、监督机制是开展地方立法工作的重要制度保障

(一)立法监督的目的

立法监督最核心的目的是为了确保护立法权合法行使及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保障宪法法律的权威。同时,对地方立法活动实施监督是实现地方科学立法、民主立法、依法立法的重要保障。人民通过行使立法权来达到分配权力、保护权利、实现权益

等目标,立法权是实现民主政治的重要手段。我国实施的是代议制民主,立法权归属于各级权力机关,地方相较于中央更加接近基层群众,因此对地方立法进行监督,使其在《宪法》《立法法》安排的秩序下依法开展,发挥地方优势充分听取民意,从而实现民主立法目标。对立法权的运行、立法过程实施全方位监督,确保立法活动中的论证、听证、审议及审查备案等工作环节依法有序开展,有利于实现科学立法的目标,进而提高立法实效。

(二)地方立法监督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我国的立法权高度集中,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推进,为适应发展需求立法权也在一步一步审慎地逐步向下延伸,地方立法者也在不断地摸爬滚打中探索着开展地方立法活动。从《立法法》为设区的市划定“城乡建设与管理、环境保护、历史文化保护等方面的事项”的立法范围可以窥见中央对地方立法的担忧。然而,赋予地方立法权的主要目的就是使地方能够通过立法来解决本地区发展过程中难以突破的实际问题,既赋予了设区的市地方立法权,又束缚其手脚,长此以往恐难实现其最初目的。相比之下,通过监督的形式规范地方立法权,使其依法科学行使,更宜为长久之计。与此同时,地方

收稿日期:2020-09-30

基金项目:2020年度郑州市社会科学调研课题“地方立法与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研究——以郑州市为例”(0194)

作者简介:张隽旂(1988—),女,河南开封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管理学院助教,郑州大学法学院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宪法学。

立法“新手”们普遍缺乏立法活动组织经验,立法技术较薄弱,专业人力资源相对匮乏,大多数地方人大代表及人民群众尚未形成立法活动参与意识,在此条件下若盲目开荒进取,难免会埋下隐患。然而地方立法活动的开展又势在必行,因此必须有一套适当的、操作性较强的立法监督制度辅以实施。

二、地方立法监督现状及问题分析

(一)立法监督主体方面

1. 有权监督主体与社会监督主体发展不均衡

根据我国的立法制度,立法监督机关的设置以权力机关即人大及其常委会为核心,行政机关也使某些立法监督职能。在地方立法监督主体层面,省人大有权改变或者撤销其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和批准的不适当的地方性法规;省人大常委会可以通过批准或备案的方式对设区的市人大及其常委会、人民政府制定的规范性文件进行监督;省人民政府可以通过备案的方式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进行监督;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可以对同级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通过备案实施监督。除此之外,其他有关单位、社会团体、群众可以通过参与听证的方式,对立法或修改案提出意见和建议的方式对地方立法工作进行监督。由于立法听证环节并非立法必经环节,社会各界对立法案提出建议和意见的可能性及质量依赖于其主观意愿、参与监督的经济能力及其具备的相关领域经验、知识背景等,因此这类来源于社会的立法监督主体在客观上存在较大不稳定性,在立法监督工作中能够发挥的作用是有限的。但是,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代表可以忽视地方立法的社会监督主体,因为他们是立法事项的利益相关者,立法内容直接影响着地方群众的切身利益,民主立法的要求正是为了巩固所立之法的合法性基础。

2. 有权监督主体之间监督工作任务交叉繁复

从实践情况看来,目前地方立法监督主体依然以权力机关和行政机关为主,包括省人大、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等。这些监督主体分处不同层级、不同系统,且存在监督工作上的交叉重复。比如,对于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政府规章,在地方上就需要在同级人大常委会、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三个机关进行备案,以备审查。多元复杂监督主体,在制度设计上本是打算起到多重把关的作用,然而“一个和尚挑水喝,三个和尚没水喝”,相同的审查工作三个机关都要做,难免会产生相互依赖心理,加之各监督机关负责备案审查的人力资源紧缺,又没有审查不到位的责任追究机制,审查质量难以保证,恐难实现制度设计的初衷。同时,在立法监督工作中实际承担监督工作的

部门较为散乱。以河南省为例,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虽然设有专门的备案审查处,但由于立法权扩容后立法监督工作激增,各个工作委员会都要承担与其领域相关的法案审查与立法计划落实的监督工作;在河南省人民政府,负责审查地方性法规和规章工作的有行政法规处、经济法规处、省政府法制办三个部门。另外,由于批准前的审查工作是立法程序的一个环节,也需要被监督,但是在地方负责这项工作的大多是省人大法制委员会,该委员会在闭会期间受省人大常委会领导,然而后者本身就是立法监督主体之一,因此对于这一环节的立法工作事实上是缺乏有效监督主体的。

(二)立法监督程序方面

1. 立法监督工作制度有待优化

2015年《立法法》修改之后,省级立法机关承接中央立法精神,担负着指导并监督本地区设区的市开展立法活动的职责,各省纷纷研究、出台本地区的立法条例。这些地方立法条例虽然对有关批准、备案、审查程序进行了一定程度上的具体化,但基本上还是属于《立法法》《监督法》的地方化而已。由于尚未大量积累地方立法监督经验,因此地方立法监督工作制度安排并不细致,也造成了部门间工作衔接障碍。比如《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第六十四条规定,“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应当对其合法性进行审查,同宪法、法律、行政法规和省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制定的地方性法规不抵触的,应当在四个月内予以批准”。这条规定是参照《立法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而来的,然而,在河南省人大常委会对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进行审核的程序中共设置了四个步骤,即报请批准的地方性法规需要历经省人大常委会法工委、省人大法制委员会、主任会议、常委会会议四步把关,那么上述规定的“四个月”时间从哪一步开始起算,以及以上几个审查步骤之间的时间如何分配?每一重把关之间的作用关系没有明确,理论上讲,哪怕所有审查环节都放在四个月中的最后一天来完成,在程序上也是不违法的,无法追究哪个部门机构的责任,但若是如此显然监督工作的质量就会大打折扣了。

2. 立法监督制度缺乏反馈机制

虽然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各地方人大机关制定的立法条例均引入了立法听证、征求意见的社会监督方式,在实际立法过程中立法主体也大多会发布一些立法草案、立法规划建议或意见征集的通知,但鲜见征集意见结果的反馈。一方面是因为现实中绝大多数接受社会监督的工作依然流于形式;另一

方面也是因为现有的立法监督规范中缺乏对反馈机制程序上的具体规定,对于信息公开、反馈的监督制度规定更是缺乏的,使得这些监督方式难以得到有效落实。

3. 审查程序与监督措施有待衔接

完善审查机制程序并不是最终目的,无论何种监督方式,都只是整个立法监督过程中的一个环节,最重要的是如何把审查程序与最后的具有实质意义的监督措施——“改变或撤销”行动有机对接起来,使在立法监督工作中发现的问题最终得以解决,而当前的监督程序缺少关于监督工作与对被审查的规范性文件进行改变、撤销的制度衔接安排。

(三) 立法监督方式方面

目前我国地方立法监督的方式主要分为两类:一是有权机关监督方式,包括备案、批准、审查等;二是社会监督方式,包括立法听证、建言献策、建议审查等。根据我国目前的立法监督体制,立法监督工作以有权机关监督方式为主,社会监督方式为辅。立法监督工作本身也需要有程序保障,要依法监督,否则监督就难以达到实效。目前无论是中央还是地方,对于有权机关立法监督的工作已经作出较为明确的安排,但对于社会监督工作的规定却较为模糊,致使现实中诸多社会监督方式难以落于实处。况且,有权机关的监督机制并非完备,有些制度性的缺陷可能恰恰需要社会监督机制来弥补。比如,在省人大闭会期间,省人大常委会既是开展立法工作的主导者又是监督者,身份重合之下容易视角单一,淡化监督者应持的态度,此时就需要适时引入社会监督方式来补强监督效果。

三、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的对策

(一) 立法监督主体方面

1. 明确各监督主体的监督职责

鉴于当前并存的有权监督主体较多,为避免资源的浪费及实际工作中各主体相互依赖心理的产生,建议明确划分不同层级、不同系统机关的具体监督内容、目标。立法监督工作的核心目的是保障法律制度内部的协调统一,即检验审查下位法是否与上位法“相抵触”问题。由于我国法律制度体系较为庞大,致使这项工作实际实施起来相当繁杂,因此可以对该项工作在不同监督主体之间进行适当合理拆分。比如,在对设区的市人民政府制定的规章内容进行审查时,明确要求由省人大常委会、省人民政府、该设区的市人大常委会三个审查主体分别负责审查该规章是否与其自身所制定的现行有效的地方性法规或规章存在抵触的情况。因为审查主体对自己所制定的规范性文件是最熟悉的,可以根据这一

特点对审查工作进行分工,提高审查效率。在这种监督分工模式下,对于各监督主体而言,审查内容相对明确集中,而且充分结合了各监督主体的优势资源,同时明确划分了各监督主体的任务与职责,便于日后发现问题时对相关监督主体进行责任追究。

2. 监督主体应体现民意代表性

根据上文梳理,立法监督机关内部具体负责监督的职能部门纷繁复杂,一方面是由于地方立法权的扩容激增了立法监督工作量,立法监督工作难以单独由某一个部门承担,另一方面是考虑到被监督的规范性文件中涉及的专业知识问题,交给领域相关的部门去审核似乎显得更加合理,但事实上并非监督机关内部的各个部门都适宜作为审查工作的承担者,对于被审查文件涉及的专业知识应当在法规起草阶段就予以严格把控。我国的立法监督制度之所以安排人大及其常委会作为最主要的监督主体,是因为这里是最能代表民意和表达民意的地方,立法监督者是为人民而监督,因此具体承担这项工作者必须具备一定的民意代表性,这是立法监督主体身上所应具备的核心的要素。根据目前的立法监督制度,绝大部分的备案审查工作被分配给了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该部门是人大常委会的内部工作部门,里面的工作人员一般不具有人大代表的身份,他们只是人民的办事员,所具备的民意代表性较弱。较为合理的安排是由人大法律委员会作为人大内部立法监督工作的主要承担者,其余相关部门可以作为辅助。

3. 重视社会监督主体的作用

在立法监督主体方面还应重视社会监督主体,逐渐加强群众、社会团体、媒体等对立法的监督作用。同时,社会监督要从立法的立项阶段就开始,以确保地方立法的实用性。毕竟之所以需要立法,是因为有需要法律进行规范的事项,按需而立,绝非为了赶潮流在立法问题上走形式主义,而“需”则往往来源于民。立法事项、内容是否符合当地需求,要看社会监督主体的评断意见。立法时充分汲取民意,可以增强所立之法的实用性、实效性。比如在城市管理、历史文化保护领域的立法,就会因不同地区经济、文化、人口结构等因素的不同而体现出不同特色,而地方立法机关如何避免生搬硬套的形式造法,最直接的途径就是将民意吸收到立法内容之中。以河南省为例,省内有三个极具特色的城市民族区,分别是郑州市管城回族区、开封市顺河回族区、洛阳市瀍河回族区,它们建立所依据的文件是20世纪50年代国务院发布的《关于更改相当于区和相当于乡的民族自治区补充指示》等文件。这些文件并未就

城市民族区的性质与法律地位问题予以明确说明,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们不属于民族自治地方,无权制定单行条例。正因如此,长期以来虽然这三个市辖区有着少数民族群众聚集群居的特点,但是却缺乏针对这部分少数民族群体生活、教育、文化、民族特色建筑等方面的特别立法保护。如今在立法权下放后,郑州等地市的立法机关可以充分利用已享有的立法权,通过积极听取城市民族区内不同民族居民所反映的问题和实际需求确立单独的立法项目,或者在本地区的一般立法项目中充分考虑民族区的问题并制定有针对性的条款,以立法的形式从生活环境管理、民族文化、历史建筑等方面对这些生活在民族区的少数民族群众的民族权益予以保护,促进本地区内多民族群体和谐共处,使地方立法真正成为有用之法。

(二) 立法监督程序方面

1. 具体监督程序有待细化

当下地方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不足,地方立法监督制度设计较为笼统,且各监督主体在其内部工作程序上通常有既定的流程规定可循,缺乏系统的监督工作安排。这不仅导致各监督主体之间在工作衔接方面产生了诸多问题,也容易使不同地区对同类立法监督工作产生理解上和做法上的偏差,更不利于社会群体对立法监督工作的追踪与监督,因此建议在地方立法监督工作积累了一定工作经验后,在省级地区范围内根据实际情况对立法监督程序做统一细化设计。

2. 重点填补社会监督程序规定

虽然无论是《立法法》,还是各地方制定的立法条例中均提及了立法听证、专家论证、立法评估、征纳意见等接纳社会群体参与、监督的方式,但大多没有做完备、具体的程序安排,有的甚至连负责组织、统计的部门都没有列明。社会监督程序能对有权机关的立法监督工作起到强有力的补充作用,也是民主立法的必然要求,因此必须打破社会监督工作开展无程序可循的状态。

3. 重视立法监督工作本身的透明性

立法监督工作本身也需要依法开展,立法监督主体是否能尽其责也需要被评定,否则立法监督工作就有可能虚设。目前,无论是立法监督规范还是在实际立法工作中都缺乏明确的立法工作反馈机制,常常见到有关机关发布法案的征询意见稿,却不见征询意见及被采纳与否的结果反馈公示,这样的有去无回往往会打击公众对立法工作的参与度,更会弱化人民群众的信任。因此,建议在程序上增加定期公开立法工作进展的规定,并由专门的机构负

责,使有关机关和社会群体能够定期跟踪了解立法动态,这样可以确保立法工作及立法监督工作的透明度,让关心立法的群体不仅能够及时了解立法进展,更能清楚地知悉立法工作出现问题后的走向。

(三) 立法监督方式方面

1. 着重发展完善社会监督方式

当前,我国立法监督工作的实施主体主要在权力机关,社会监督方式是立法监督的薄弱环节,然而事实上最关心法律制度的应该是社会大众,因为公民、社会组织才是法律所设定权利义务的利害关系者。地方立法要树立立法为民的意识,立法项目是群众所需,立法内容符合民意,立法过程接受社会监督。社会监督主要通过立法听证、征纳意见、立法评估、建议审查等形式实现,而这些工作若想真正落实并取得实效,除了在程序上做好设计安排,更重要的还有两方面工作要做:一是要培养地方人民群众的民主政治思想、法治思维、参与立法监督的意识,通过普法宣传工作使人民群众了解立法工作,明白这项工作关系到每一个人的切身利益,是为自己争取权利的一种途径;二是要利用信息化技术打造更加便民的立法监督平台,比如,通过人大和政府的微博、微信公众号等交流平台征集立法建议、公布立法动态、反馈信息,尽可能地降低群众参与监督的时间与经济成本,如此才能引起更广泛的群众关注立法、关心立法,逐渐营造出地方立法文化氛围。

2. 加强各监督方式间协调配合

当前我国立法监督方式以事后监督为主,对立法活动事前、事中的监督缺乏制度化设计安排。事后监督以合法性审查、合宪性审查制度为依托由权力机关来主导展开,而事前、事中监督则应充分调动社会力量来开展监督工作。多元的立法监督方式是为了确保立法监督工作取得尽可能理想的效果,但当下多种立法监督方式间缺乏制度关联,这可能导致不仅达不到预期效果,同时还造成资源浪费。因此,应加强各种立法监督方式间的协调配合。比如,可以将立法听证、立法评估工作与审查批准程序进行有机结合。具体而言,就是把立法听证、立法评估的结果作为审查批准工作中的一项考量评判指标,并将这种结合规范化,明确于立法监督工作制度之中。通过加强有权机关监督与社会监督方式之间的协调配合,使有权机关的监督能够引领带动社会监督,社会监督的结果能够成为有权监督机关工作的有力佐证。

四、结语

地方立法能为地方治理提供更加周到的法治保

障,是地方治理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立法水平是衡量地方治理能力的重要指标,地方立法工程的推进不仅需要地方立法机关严格依法组织开展,也需要地方群众积极参与、监督立法。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我们应当在地方立法实践活动中不断发现问题、总结经验,探索应对措施,从而不断完善地方立法监督机制,提高地方立法工作质量,为地方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提供法治保障。

参考文献:

- [1] 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N]. 人民日报,2019-11-06(1).
- [2] 河南省地方立法条例[N]. 河南日报,2016-02-17(9).
- [3] 苗连营. 立法法重心的位移:从权限划分到立法监督[J]. 学术交流,2015(4):77-82.
- [4] 秦前红,李少文. 地方立法权扩张的因应之策[J]. 法学,2015(7):11-18.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search on Local Legislation Supervision

ZHANG Junyi

(School of Management,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downward extension of legislative authority provides more legislative institutional means for local governance. The practice of local legislative authority should be both encouraged and controlled prudently. The legal and orderly operation of local legislative activities needs the guarantee of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The local legislative supervision system needs to be adjusted according to the expansion of legislators. It is suggested to explore and formulate more reasonable and detailed regulations from the aspects of supervisors, supervision procedures and methods, so as to ensure the effectiveness of supervision, improv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and then escort the modernization of local governance with good law.

Key words: local legislation; supervision system; local governance

(上接第 62 页)

[7] 李明德. 美国知识产权法[M]. 北京:法律出版社,2014:68.

[8] 徐趁肖,邓学欣,熊茜,等. 关于实用性和公开不充分的法条适用探讨[J]. 中国发明与专利,2012(11):98-100.

[9] 魏想,胡晓红. 专利实用性要求宽松与严苛之博弈与启示[J]. 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5):153-160.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stablishment of a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Moderation Standard for Patent Utility Examination

LIU Mingji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 Law, Henan University of Animal Husbandry and Econom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patent utility examination standard in China's Patent Law appears to be higher than any of those in the US Patent Law and the European Patent Convention as well as the Agreement on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the Draft Substantive Patent Law Treaty. Comparatively speaking, China's patent utility examination standard is defective in two outstanding issues, i. e., demanding inventions or utility models "can produce positive results" and totally ignoring the inherent link between utility and sufficient disclosure, respectively. It is imperative to establish a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moderation standard for patent utility examination. The measures deemed to be feasible include: Eliminating the requirement of "can produce positive results", clarifying the relationships of application of utility and sufficient disclosure, leading in a general provision of utility disclosure of inventions or utility models, and insisting on the high degree of probability rule as the standard of proof of patent utility.

Key words: leniency and strictness moderation; patent utility; examination standard

万物皆媒视域下高校器物文化的传播价值研究

吕村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党委宣传部,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高校是优秀文化的聚集区,也是文化传播策源地、风向标,以向社会传播先进文化、引领社会文化建设、推动形成良好的社会文化风尚为目标。在高校的文化传播体系内部,十分重视文化具象化,秉承“纳礼于器、器以载道”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形成了特色鲜明的高校器物文化。器物文化作为校园文化体系中的物质形态文化,具有直观可视性强、历史价值与文化价值兼具、艺术价值与教育价值并重的优点,成为高校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和载体。同时,器物的文化属性使其也成为一种传播媒介,不仅可以在高校校内传播,同时还可以实现校际传播和社会传播。在传播过程中可以起到凝聚人心、促进交流、引领社会文化事业发展、增强爱国主义情感等方面的作用。

关键词:器物文化;校园文化;传播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2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68-05

高校文化是一个复杂的体系,由精神文化、器物文化、行为文化和制度文化四个方面的亚文化构成。其中器物文化以其直观可视、造型精美的特点使其成为校园文化体系中最受欢迎、令人印象最为深刻的文化形态。器物文化有广义和狭义两种概念,狭义的器物文化主要指在高校教育教学中满足教育教学活动所需要的各种物质层面的设施,包括校园景观设置、教育教学设备、实习实训场地、生活学习辅助设施等。广义的器物文化除了包括狭义的器物文化外,还包含校园内为实施教育教学活动而建造的建筑物。这些物质形态的器物是学校开展教育教学活动所必须依赖的、不可或缺的载体。同时,中国传统文化中“道亦器、器亦道、道器合一”的精神使得这些器物蕴含着特定的文化意义,彰显出学校的文化魅力。传播性是文化的本质属性,也是推动文化融合、发展的动力源。从传播学的角度看,万物皆媒介,这些凝聚于器物的校园文化在校际、校内与社会传播过程中可以很好地起到展形象、聚人心、引发展的作用。

一、校际传播,展示学校文化形象

为了更好地开展教育教学与科研交流,提高学生的专业技能、综合素养以及展示学校文化形象,学校都建有规模不等的建筑或校园雕塑,购买或制作大量的教育教学设备。这些建筑和设备蕴含着丰富的人文精神,体现出学校的办学理念,“既器见道”,在不同高校的文化交流中,器物文化承担着传播学校文化形象、彰显文化品位的重任。

(一)展示学校的办学理念

“壹引其纲,万目皆张。”学校的办学理念是学校办学之纲,是办学方向、教育目标的具体体现,是教育教学活动的指导,也是大学的精神和灵魂。大学办学理念和治校风格往往集中体现在高度凝练的校训之中。如果说校训是一校之魂,那么校训石这个器物就是这个灵魂的寄托与直接外显。校训石给予校训以载体,校训赋予校训石以灵魂,二者相得益彰,共同承载着学校的精神文化。如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校训石,就承载着这所全国顶尖学府刚柔并济的文化特质。“自强不息”传递出清华人奋发图强、勇往直前、勇于创新的奋斗精神;

收稿日期:2020-08-28

基金项目:2019年度河南省教育科学重点课题“新时代中国高等教育文化创新发展路径研究”(2019-JKGHZD-07)

作者简介:吕村(1971—),女,河南泌阳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党委宣传部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而“厚德载物”传递出清华人具有像大地那样厚重而广阔的胸怀,体现出其团结协作、严以律己、无私奉献的精神。再比如南开大学、武汉大学的“允公允能,日新月异”“自强、弘毅、求是、拓新”等校训石都诠释了各自办学理念,成为学校文化的符号与表征,最直观地传递出学校的办学理念。

(二) 传递学校的人文精神

学校的人文精神是在学校长期的办学活动中形成的,凝聚在学校的规章制度和各种建筑器物上,透过这些器物可以传递出学校的人文精神。一些历史悠久的大学大多善于通过器物文化来展示学校的人文精神。如武汉大学内古朴典雅、中西合璧的宫殿式建筑群,在满足学校教育教学活动的同时,也传递出学校特有的贯通中西、互联互通的创新意识,彰显学校既扎根传统、善于从传统文化中汲取营养,又敢于开拓创新、吸收国外先进文化理念的人文精神。

此外,高校中的各类雕塑、景观布局、教学设备等器物同样是学校特色与精神的高度凝聚,在校际的文化交流中传播学校精神文化,展示出学校特有的人文精神。

(三) 传递学校的文化定位

文化是一个国家民族精神的体现,是民族生生不息的纽带。大学同样如此,文化是大学的精神支柱,是大学的核心要素。英国前首相丘吉尔曾说“不伴随力量的文化,到明天将成为灭绝的文化”,大学校园文化“伴随的力量”就是指凝聚着文化因素的器物,正是因为这些器物,才使得文化有所依托。

“质而无文,其行不远。”器物文化是高校校园文化凝聚与传承的重要一环,通过显现或隐含文化因素的器物这一物质载体,将学校的文化定位、文化属性良好地传递出来,塑造校园文化特性,并以此感染学校师生群体,凝聚起学校师生及社会对学校文化的认同,对学校的热爱。这些器物文化成为展示学校发展定位最直观的传播媒介,使学校文化可以更好地为受众所接受认可。

(四) 展示学校的发展历史

学校的发展像一条蜿蜒曲折的河流,或波澜壮阔或宁静清婉,但在时光的大浪淘沙中,都或多或少留下一些重要痕迹,在学校历史文化中熠熠生辉,启迪后学。“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历史的发展中总是留下不少经验或教训,这些经验或教训是后来者进行相类似活动时可供借鉴的不可多得的财富。特别是一些已经符号化、精神化的器物,更是因其凝聚了大量发展的历史痕迹和精神符号,成为凝聚共识、

强化认同的标志性符号,激励着、鼓舞着一代又一代的师生对学校文化的认可与接受。

许多高校由于办学历史较长,留下了不少学校前期发展的器物。比如实验设备,带有历史痕迹的雕塑、建筑,反映建校初期学校艰苦奋斗的影像资料等,这些都是学校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凝聚了学校历史文化的因素。器物文化特有的直观性与艺术性在校园文化传播中的影响更为直接,更容易被人接受,成为校园文化传播的重要力量。通过对这些器物所蕴含的文化意义解读,可以有效激发参观者对学校来之不易的成就的感动之情,促使参观者对学校发展道路、发展成就产生认同感。

二、校内传播,塑造校园文化精神

器物不仅仅是一个具有使用价值的、客观实在的物质形态,同时还是某种特殊文化符号。器物传递出来的不仅是满足教育教学工作器物或者某种历史的再现,同时,还发挥着媒介的作用,传播学校的主流文化,凝聚师生价值观念与校园群体人文道德追求的价值,激励广大师生以校为荣、为校奋斗,积极推动学校的教育教学工作。

(一) 引领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

包括信守承诺、厚德包容等在内的传统价值观念是社会核心价值体系中的重要内容,是学生必备的素养,也是教育事业可持续发展的必要支撑力量。然而由于对技能的过度追求,应用型高校在教育实践中往往重技能轻德行。这些倾向也会对“三观”正在养成的青年学生造成不良影响,培养出一批价值观念不够健全的利己主义者。

校园器物往往都是经过精心挑选、科学论证而创制出的,不仅具有优美的外在形态,还凝聚着积极向上的文化内涵。传播活动中可以物化人,营造出充满正能量的“精神场域”,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三观,让学生在接受器物外形直观美的熏陶与侵染,领悟到深刻的文化内涵,实现器物文化对学生的行为、情感和认识能力更深刻持久地引领。

首先是树立刻苦学习精神。学习是学生的天职,也是顺利走向工作岗位,实现个人理想抱负的基础。当前,社会上存在着一些浮躁氛围,往往以挣钱多少来衡量个人价值。这些功利性的不良倾向也严重影响到学校,使得学生们的价值观念受到一定的影响,出现肤浅的学习认知心理,一心想着短平快赚钱,缺乏学生阶段应有的立足实际、刻苦学习、全面发展的精神和全面提升自己能力与素养的正确学习观,缺乏坚韧不拔、持之以恒的学习精神与可持续学习能力,也影响了学校人才培养质量的提升。各个

学校在中发展留存下不少器物,这些磨得发亮的实验设备、写得密密麻麻的教案、一张张有些泛黄的荣誉证书,都是反映学校师生刻苦学习,孜孜不倦钻研知识的证明,可以激励学生树立正确的学习态度,养成良好的学习习惯。

其次是引导学生树立集体主义精神。“万人操弓,共射一招,招无不中。”社会发展不能依靠某个英雄人物个人的力量来推动,而要将全体公民凝聚起来,同心同德,共同推动。集体主义也是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是中华民族生生不息、数千年来一直屹立于世界强国之林的重要因素。但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侵入,对我国社会意识形态也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个人主义泛滥,集体主义思想弱化;顾小家弃大家,只看重个人利益、个人发展,而对于集体的利益则弃置一端,不仅影响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也影响削弱了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作为经历数十年、上百年的发展积淀的学校,每一点成就都是全体师生凝心聚力、协作共创而成的。通过反映这些活动的器物,可以使学生受到教育,领悟到团结力量大的道理,自觉融入集体中去,将个人目标融入集体目标中去,实现个人价值与集体价值协调发展。

最后是引导学生树立正确道德情操。“人而无德,行之不远”,事业的长远发展必须要有远大的理想、高尚的情操作为支撑。长期以来,学校特别是应用型高校在重视学生技能型知识学习时,道德教育存在着偏软、偏松现象,使得学生虽然专业学习能力比较强,但也存在理想信念滑坡、道德责任意识落后、社会认知标准模糊的问题。而学校的古朴建筑、校园文化园、文化景观等器物蕴含的丰富道德教化功能、深厚的文化精神和道德追求正好可以弥补这一缺环,可以引导学生汲取其中的养分,继承学校发展中形成的优秀文化基因,激励他们刻苦学习,树立正确的道德情操与理想信念。

(二)引领教师队伍树立正确教育宗旨

教书育人、培育栋梁是教师职业伟大之所在,也是教师受人尊重的重要原因之一。器物文化是在学校长期的办学活动中形成的精神力量,反过来这种器物传播出来的人文精神也可以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职业道德和育人理念。作为高校教师,在掌握扎实专业知识的同时,还应当具有自觉服务党和国家教育事业的职业意识,培养献身教育的高尚情操。高校器物及其传播出来的文化就是教育引导教师传承高校精神的关键性要素之一。

首先是引导教师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为谁培养人,如何培养人,是新时代高校育人工作的重要前

提,也是高校教师开展教育教学工作的基础。只有明确了为谁而教、因何而教、如何去教,才能树立正确的育人理念,倾心于教育教学活动。在这个过程中,前辈教育工作者在革命年代或建设时期遗留下来的雕塑、照片、视频或者教学仪器等器物凝聚着历代教师奋不顾身,不计个人得失,积极投身教育,为国家培养优秀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崇高精神品质,成为激励教师积极投身教育活动的精神动力源泉。

其次是引导教师树立团结协作的精神。“人心齐,泰山移”,教育事业的发展靠的是全体教育工作者共同努力、携手共进。各自为战、相互排斥、相互拆台,只会陷入内耗,影响学校育人工作的实施,影响高校为社会培养大批高素质人才的成效。反映学校教师队伍建设的器物,是历代教师团结协作、攻坚克难的见证。老一辈的团结共进的精神,可以引导广大教育工作者坚守教育初心,牢记使命,相互团结协作,共同推动教育事业不断向前发展。

(三)凝聚学校发展目标

学校的发展离不开全体师生员工对学校发展目标的认同。“二人同心,其利断金”,只有学校对学校发展有一个明确的共识,并戮力同心,形成合力,持之以恒为之奋斗;“上下同欲者胜”,学校只有同心协力,顺势而为才能顺利实现发展目标。校园文化体系中的器物由于伴随着学校的发展历程,凝聚着学校师生的智慧和力量,也凝聚了最先进的思想和最前沿的技术,因此,这些大多都被赋予特定的文化内涵,或者是校园历史文化的积淀。这些不同历史时期的器物分别凝聚着该时期学校发展的目标,这些器物结合起来就成了学校发展目标演变过程中的一个个节点与标志,成为展现学校发展历程的见证者、无声的讲解员。通过对这些器物蕴含内容的解读,可以加深对校园文化历史与现实的认识理解,进一步凝聚对学校发展目标的自觉认同,共同致力于学校未来的发展。

(四)引领学校持续健康发展

学校文化的首要价值在于思想引领,学校首要的任务就是持续发展。持续的发展不仅需要专业建设逐步强化,更需要强有力的文化来支撑引领。器物文化的强大精神力量可以推动学校事业的持续发展。

首先是引领学校办学定位逐步完善。应用型高校的办学应当围绕服务于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为地方经济社会发展提供足够的人才保障。高校教育教学工作离不开大量的教育教学、实习实训设备,这些物质载体一方面具有服务学校发展的使用功效,另一方面也是不同办学阶段学校精神的物化,体现

出不同时期、不同办学定位下学校的精神文化。这些器物与学校的办学定位相互印证,结合学校的发展历程、教育成果,反映出应用型高校只有根据经济社会发展需要,不断调整完善办学定位,促使学校发展和社会需求紧密结合,才能培养出更具有时代需求的人才,完成高等教育肩负的历史使命。

其次是引领学校顺应时代发展方向。科技引领发展,新时代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影响到社会的方方面面,也影响了人们的心理认知。器物不仅是时代发展的产物,同时也是时代的见证。适应时代发展潮流而产生的器物,不仅成为人民生活学习的助手,同时指引着时代发展的方向。不少蕴含着时代先进科技因子的器物,如迭代更新的实验设备、日新月异的教学仪器、具有时代感的建筑设计,不断涌现于校园的角角落落,成为校园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提醒着每一个人,如果不能把握住时代脉搏,紧跟时代潮流奋力拼搏,只会被时代抛弃。只有顺应时代潮流,抓住机遇,迎难而上,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为社会培养出符合时代要求的优秀人才。

(五)营造鲜明的人文氛围

高校作为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合格的建设者和接班人的场所,必须要具有浓厚的人文氛围与开放的人文气息。而这些特色的直观体现,莫过于校园的各种器物。它们作为展示校园文化的物质载体,无论是宣传条幅上的标语口号、还是脚下的石刻,或者造型独具的场馆,每一个组成部分都是学校智慧的结晶,文化的体现,包含着深厚的人文因子。众多的器物结合起来可以共同营造起学校积极向上的人文氛围。不同的高校由于定位不同,办学方向差异,形成了不同的校园文化特色,这些特色同样反映在器物文化中,比如体育类高校往往大量塑造竞技体育类的雕塑、特色鲜明的体育场馆。师范类高校则以教育名家、名人名言为器物文化的主体,而应用技术类高校的器物文化则充满了工科特色。在不同学校的文化交往中,这些器物鲜明地传递出学校的文化精神,成为学校文化的标志性符号。

三、社会传播,引领社会文化发展

文化交流是一个双向互动的过程。作为国家文化体系中的高校校园文化,一方面深受社会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也对社会文化产生能动的影响。器物文化是高校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同时也是凝聚着高校先进知识分子对社会发展的深刻认识与艺术再现,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是社会先进文化的代

表。在文化传播中,高校器物文化不仅以高超的艺术性引发社会受众的赞叹,为学校赢得较高的声誉,同时也以其深刻的文化内涵激发受众的情感,引领社会主流文化发展。

(一)提升学校的社会美誉度

今天的高校不再是高不可攀、封闭独立的象牙塔,而是顺应时代需求主动走入社会,采用相对开放的办学格局,社会人士与团体可以在不影响学校教学工作时进入校园,参观校园风光,领会校园的文化魅力。高校作为人才培养与文化传播的场所,历来十分重视环境育人的功能,通过丰富的物质形态的器物来塑造学校的精神与灵魂。当社会各界人士进入校园中后,校园文化中与学校发展定位、学科特色、地域特色、学校文化相符合的器物文化,比如最能体现学校发展历程的校史馆、满足对知识渴望的图书馆、反映学校在各个历史发展时期的物质形态成果,以及散布全校的各种雕塑等,就能体现出学校的文化品格与精神追求,以独特的文化传播形式给受众以审美享受和文化领悟,进而为学校带来相应的认同感与美誉度。

(二)激发受众爱国主义情感

由于历史等方面的原因,不少知名高校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这些资源承载着先辈们为国牺牲、鞠躬尽瘁的奋斗精神,具有丰富的历史文化底蕴。也有些器物是我国在积贫积弱时遭受到外国侵略时遗留下来的,成为我们铭记历史、勿忘国耻的动力。这些优秀的校园文化不仅能够满足学校师生学习生活的需要,更成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如南开大学八里台校区,依托周恩来总理塑像、西南联大纪念碑、陈省身故居等19处校园物质形态文化资源,打造成面向学校及社会各界人士进行理想信念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重要阵地。通过参观学习,参观者体味出南开大学“允公允能,日新月异”的精神,了解老一辈革命家为国奋斗的爱国主义情怀,激发受众不忘初心、砥砺前行的奋斗热情,积极投身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去。

四、结论

文化与国家、民族的发展有着密切联系,是国家、民族的灵魂所系。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民族振兴也需要文化先行。一方面器物作为文化的载体和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人民生活需要,另一方面器物本身或者使用过程也蕴含着相应的生存智慧及审美理想,表达民族的价值观与人生哲学,是精神层面文化外现的重要载体,在中华民族文化发展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纳礼

于器、器以载道”，通过物质层面的器物来呈现精神层面的文化，这是以中国为代表的东方文化的优秀传统与精髓。

在网络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万物互联已成为现实，万物皆媒也正逐步实现。借助网络科技的东风，器物及其构筑的文化体系也得以在更广范围内传播。在这个传播语境中，谁的传播内容能获得受众的认可，谁的传播就能占据传播活动的主导地位，就能占有更多的传播话语权。因此，我们应当以创新精神、时代眼光赋予器物更优秀的文化内涵，进而能够更好地传承、传播器物的文化价值。作为校园文化最具直观性和艺术性的文化形态，我们应当使器物在立足满足时代要求、帮助完成教育教学任务的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其蕴含的浓厚人文气息和文化内涵，以其艺术性、教育性、传播性承担起传播优秀校园文化，激发爱国主义情感的重要使命，实现高校器物文化凝聚学校发展目标，引领社会发展、引导树立正确道德情操、营造人文环境等价值，激励高校师生

及相关社会人士树立崇高的爱国爱校情感，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奉献自己力量的理想观念。

参考文献：

- [1] 林玉琴. 校园文化建设中思政教育的融入与深化[J]. 江西电力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9(2): 118 - 120.
- [2] 肖苑. 基于校园文化建设的高校隐性思想政治教育探析[J]. 佳木斯职业学院学报, 2018(7): 145 - 146.
- [3] 李维维. 道器之辨: 儒道精神在传统器物美学中的体现[J]. 广西社会科学, 2017(3): 60 - 63.
- [4] 丁文清, 徐政, 张云彬. 大学校园文化的层次结构与老子的“有”与“无”[J]. 铜陵学院学报, 2015(6): 84 - 87.
- [5] 温倩慧, 柳红燕. 校园建筑的文化内涵及其教育功能[J]. 山西建筑, 2013(6): 31 - 32.
- [6] 李松杰. 充分认知器物文化蕴含的力量[N]. 中国文化报, 2018 - 01 - 12(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the Dissemination Value of College Utensil Cultur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All Things are Media

LYU Cun

(Publicity Office of the CPC Committe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are the gathering area of excellent culture, as well as the source and weather vane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They aim to spread advanced culture to the society, lead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culture, and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good social and cultural trends. In the cultural communication system of colleges, great importance has been attached to the concretization of culture, adhering to the spirit of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of "receiving etiquette in utensils and carrying the principle with utensils", forming a distinctive college utensil culture. As the material form culture in the campus culture system, utensil culture has the advantages of strong intuitive visibility, historical value and cultural value, and both artistic value and educational value. It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part and carrier of campus culture communication in colleges. At the same time, the cultural attributes of utensils make them become a kind of media, which can not only spread in colleges, but also realize inter school diffusion and social diffusion. In the process of diffusion, it can play a role in rallying people's hearts, promoting communication, leading the development of social and cultural undertakings and enhancing patriotism emotion.

Key words: utensil culture; campus culture; dissemination

出版企业影视增值:逻辑、价值与现实路径

于春生,郭婉君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媒介融合弱化产业边界,出版企业跨界影视谋求增值渐成常态。跨界的内在逻辑,其一在于影像化时代来临的机遇,其二在于出版与影视媒介之间存在明显的互文性与互利性,其三在于出版业的内容资源、读者基础、人才、渠道等方面的优势。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其价值不仅表现为突破营收困境增加盈利机会,更在于整合资源、拓展产业链条,实现转型升级;其现实路径是多元化的,既可以借助影视营销图书,运营图书的影视版权,也可以直接投资生产影视产品,或实现影视相关多元化增值。

关键词:出版;影视;增值;版权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3

中图分类号:G239.2-F;J9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73-05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和媒介产业发展,加之传媒制度变迁与政策推动,媒介融合日益深入。影视媒介以其先天的传播优势而拥有庞大的受众群体和影响力,而出版有着显著的内容、人才等资源优势,出版与影视的互文性决定双方更容易彼此进入、融合互利。从出版的角度看来,融合影视谋求增值既是对媒介产业形态演变趋势的适应,也因应了国家文化产业政策的要求,更是摆脱现实困境实现跨越式发展的必要举措。当前一些出版企业已经融合影视取得了一定的市场业绩和运作经验,但整体上仍处于初级阶段和浅表层面。本文试图厘清出版企业影视增值的内在逻辑并探析其现实路径,以期为出版业全面、深度融合影视进而获得常态、稳定增值收益提供借鉴。

一、出版融合影视增值的内在逻辑

所谓“增值”,这里是指价值量的增加,概指以图书为主要产品的出版企业突破传统经营领域,通过与电影、电视以及新媒体视频等媒介融合发展以获得增量资产价值。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谋求增值,既是媒介形态演化的时代需求,也是基于出版业自身资源而进行的合理拓展,是有其必然性和可行

性的。

(一)影像时代来临的机遇

被誉为“美国20世纪最后一位大思想家”的丹尼尔·贝尔,在论及视觉文化时说:“目前居‘统治’地位的是视觉概念。声音和影像尤其是后者,组织了美学,统率了观众。在大众社会中,这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当代文化正在变成一种视觉文化,而不是一种印刷文化,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1]影视媒介日益成为主导型的文化传播手段,声像挑战文字,已经成为当下大众审美文化的既成事实。

影像时代来临,缘起于社会发展带来的大众文化勃兴。“大众文化的产生源于西方资本主义进入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后,‘大众’因生存竞争的激烈、紧张、压抑,需要社会提供轻松愉快、带有刺激性、消遣性的文化消费享受”^[2]。当前我国社会文化发展业已进入这一阶段。大众文化是一种消费文化,具有科技含量高、可复制性强、娱乐功能强、时尚前沿等特征,注重对大众低层次欲望和感官的满足,而思想深度不足。这就契合了影视媒介的内在特征,使得影视超越纸媒风靡于世成为必然。

影像媒介后发于纸质媒介,汲取了人类更多的

收稿日期:2020-09-10

作者简介:于春生(1974—),男,河南南阳人,编辑出版学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院长、副教授,河南省教育新媒体暨舆情研究中心副主任,主要从事数字出版、新媒体传播研究。

技术成果,技术赋能的优越性显而易见。影视媒介集视听手段于一体,通过画面、声音、字幕以及特技等多种符码传递信息,生动直观,逼真传神,能给予受众以强烈的现场感和视觉冲击力,带动受众轻松进入剧情,理解影片或剧集的主旨内容。随着3D、VR等新型技术的普遍应用,影视作品制作更为精良,画面愈发精致,视觉效果几可乱真,更能引发观众共鸣。相对于以文字、图画为主的纸质媒介,影视解码过程相对简单,比阅读白纸黑字要省心省力省时,从而具有最为广泛的受众基础。

影视媒介日益繁荣,体现为产业经济收益和社会影响力的快速提升。其中国内电影票房从2012年的170.7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642.7亿元,年均复合增长率达到20.85%。^[3]电视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已经发展成为第一媒体,截至2018年底,电视综合人口覆盖率99.25%。近年来广播电视行业虽然进入结构调整期,但营收规模仍然庞大。据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显示,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实际创收收入5639.61亿元,比2017年增加797.85亿元,同比增长16.48%^[4]。继之而起的网络视听节目发展尤为迅猛,从2013年中国网络视听节目服务协会开始发布行业数据以来,市场规模6年间由132.2亿元激增至2016.8亿元,增幅高达1525%。^[5]基于网络短视频、网络直播的应用普及,影视媒介正展现出更为广阔的发展前景。

(二) 出版、影视的互文与互利

出版与影视都以可再生的信息为主要资源,具有共享性,可以重复使用。它们的符号表达形式不同,但同为内容创意产业,共同倾向于表达和传播富有创意、价值密集、优质的内容。同一内容的多形态传播具有成本节约优势和规模化效应。在技术发展导致不同媒介类型之间的壁垒弱化之后,出版与影视围绕内容转换进行融合互动更为便利。它们虽然功能各有侧重,但都有向受众进行劝服、告知、教育、娱乐的社会功能,都用于满足受众的精神需求,这是其融合的重要基础。

在内容层面上,出版业的主要产品——图书与影视作品之间存在着明显的互文性(intertextuality)。所谓互文性,也称“文本间性”,是指一个文本与某一既有文本之间的相互关系,具有独特的修辞作用和文化学意义。首倡这一概念的法国符号学家朱丽娅·克里斯蒂娃指出:“任何作品的本文都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的,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6]其基本内涵是指,每一个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镜子,每一文本都是对其他文本的吸

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文本过去、现在、将来的巨大开放体系和文学符号学的演变过程。根据互文性理论,图书的文本可以经由影视进行转化和衍生,转化而成的影视作品是对图书文本从某一角度的关照和解读,也能够扩大原有文本的影响力。许多文学名著改编成为影视剧,而影视剧反过来带动相关图书的阅读和销售,即为图书与影视互文性的典型例证。

就媒介功能而言,图书与影视各有所长,相互融合利于取长补短、优势互补。图书更长于表达抽象的、深刻的语义内容,信息容量更大,逻辑性更强,而影视则长于表现形象可感的事物,能使人身临其境,更为形象生动,真实感人。它们之间并非排他或截然分割的关系,而是具有融合共生的巨大空间。在实际运营中,图书与影视在内容层面的相互借鉴、恰当融合,使得前者受众群体扩大,影响力提升,后者则获得受众基础和内容资源。它们相互阐发、彼此造势,能够释放出更大的价值。出版学者刘拥军指出:“21世纪出版运作的核心是媒体互动。同一内容的知识以不同的媒体形式出现,大大降低了知识创作的成本,又无偿地利用了媒体的广告效应。图书、影视、网络这三大媒体之间的互动将是主流。”^[7]如果跨越日渐消失的媒体边界,出版企业就能超越图书出版单一形态,而与影视、网络关联、互动、整合,从而获得更多市场机遇。

(三) 出版介入影视的资源优势

出版企业介入影视领域谋求增值,其一具有内容资源优势。出版业经长期发展而大量积累的优质内容,蕴含着极为丰富的价值,可以作为产业链上游,供应影视等媒介形式开发利用。多年以来,影视界已经惯于从大型文学期刊、文学著作中撷取优秀作品进行影视剧改编。经由书刊发表的内容通常把关严格、质量较高,能够为影视剧再创作打下良好基础。张艺谋曾表示:“中国电影永远没离开文学这根拐杖,看中国电影繁荣与否,首先要看中国文学繁荣与否。”^[8]中国古典四大名著都多次被改编成为不同版本的影视剧,当代大型文学刊物中的不少作品也被成功地被改编成为影视剧作。即如《收获》一种刊物而言,其中的《妻妾成群》被改编为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动物凶猛》和《你不是一个俗人》分别被改编成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和《甲方乙方》,《白鹿原》被改编为同名电影、电视剧,都堪称佳作。这些都是出版资源的文化价值得以衍生增值的著名案例。

其二是读者资源优势。传播心理学认为,受众倾向于接受与自身头脑中已经储存的信息具有一定重合度和一致性的信息。这能够解释为何经典图书改编影视作品更容易获得成功。经典或畅销书图书已经接受过读者的检验,在读者心目中留有深刻印象,再改编成为影视剧,原有的读者群就成为影视传播得天独厚的优势。出于对原著的喜爱,读者通常会继续关注其衍生产品,如电影、电视剧、动漫形象、衍生服饰等。古典文学如四大名著都历经多次影视改编,虽然褒贬不一,但每一次改编都会受到万众热议,这在注意力经济时代就是非常难得的资源。郭敬明的《小时代》、韩寒的《长安乱》虽然都饱受争议,但由于粉丝量庞大,前期图书读者甚众,影片票房都成绩不俗。《小时代》制作人安晓芬说:“郭敬明近 2000 万的微博粉丝,三千万的书籍粉丝,我们把他当作一个最大的媒体资源来营销,会为我们做一个最接地气的免费宣传。”^[9] 影视改编以图书的读者基础为测量标准之一,以读者群为重点进行营销,能在一定程度上化解市场风险,这也是出版业庞大读者群体的价值体现。

其三是人才资源优势。出版企业汇聚了大量高水准的编辑人员,在长期约稿、审稿、改稿流程中练就了识珠慧眼,能够披沙拣金甚或妙手回春,为影视创作提供优秀剧本。更重要的是,出版编辑在日常工作中广泛联系作者,已经形成了彼此信任的关系或者良好的合作基础,能够及时获得优质内容,为影视剧创作奠定基础。随着出版企业版权意识增强,培养出一批具有版权运营能力的专业经纪人员,更能够及时签约优秀作者、储存优质版权、推动影视改编,为影视业注入新的活力。这些编辑、作者和经纪

人,是传统出版与影视融合过程中最为宝贵的资源和财富。

另外,出版企业具有相对精准的专业化的渠道资源,能够在某一领域为相关题材影视作品营销开辟通路。比如,教育出版与教育系统关系密切,这就便于开展爱国教育题材影视的学生团体观影活动。而且,出版企业在经历了多年发展之后,整体上具有较为雄厚的经济实力,尤其是一些实力雄厚的出版集团已经上市融资,能够募集到更为充裕的社会资金,具有调动更多资金参与影视生产的资本优势。上述优势如能善加利用,出版融合影视谋求增值大有可为。

二、出版介入影视增值的现实价值

出版融合影视,既是对影像时代和媒介融合趋势的适应,也是国家政策推动出版跨媒体、跨地区、跨产业“三跨”整合发展的要求,更是出版企业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而积极拓展盈利渠道的必然举措。出版肩负着传播主流价值观、繁荣社会主义文化的时代重任,却又面临新媒体对读者的严重分流、产业增长乏力、做大做强任务艰巨的困境。尽管统计数据显示,我国新闻出版产业规模持续增长,2018 年全国出版、印刷和发行服务实现营业收入18687.5 亿元,但年增长率仅为 3.1%,远低于电影、网络视听产业增幅。^[10] 就出版企业主营业务的图书出版类目而言,市场状况更加不容乐观。自 2013 年到 2018 年间,我国图书出版从总种数、总印数、新版图书种数、营业收入、总利润等各项指标看来,增长迟滞缓慢,一些年份甚至出现负增长(如图 1)。其中虽有出版供给侧改革主动调整的因素,但仍反映出发展动能不足的问题,亟须寻找新的增值路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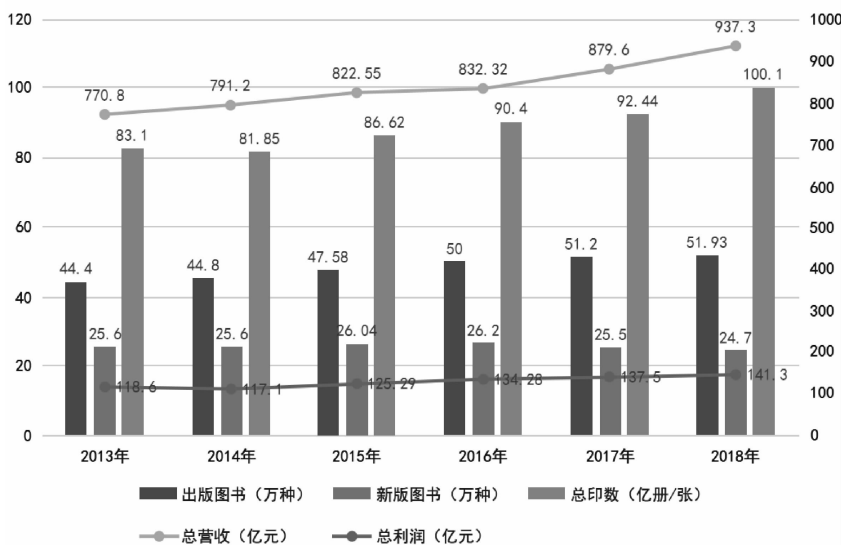


图 1 我国 2013—2018 年图书出版基本情况^[11]

与传统出版所处的困境不同,影视行业则呈现出相对良好的发展势头,前文已有述及。尤其是近年来部分热映影片,如《羞羞的铁拳》《战狼2》《西虹市首富》《我不是药神》《流浪地球》《哪吒之魔童降世》等,动辄数亿票房,获得数倍于投资的高盈利率,同时赢得高知名度。基于行业对比的现实情况、媒介融合的明朗趋势,加之出版与影视之间长期互动积累的经验,出版业适当地介入影视领域可能存在巨大增值空间,值得出版业界试行探索。

出版业介入影视领域,除了能够增加直接经济收益之外,也有利于其整合资源、拓宽延展产业链条,实现整体转型升级。出版业作为文化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正处于深化改革、加快发展和产业格局调整与升级的关键时期,发挥内容、作者、渠道、品牌等方面的资源优势,适时、适度涉足影视类强势媒介领域实现产业融合,是两个产业链条优化重组的过程。融合发展,能够促进出版产业价值链延展和完善,增加利润增值点,促进版权制度和风险防范机制完善,有助于形成基于优质内容进行多媒体、多渠道开掘价值的集约化发展模式。对于出版上市企业而言,介入影视领域,也是树立形象、打造品牌,增强其在资本市场影响力的重要手段。

在出版融合影视增值的实践中,由于体制束缚、观念滞后、经验不足等多方面原因,近年来虽然不乏“吃螃蟹者”,但大多浅尝辄止,自发而为,跟风玩票,方式和方法尚不够科学系统,所得增值收益依然有限,甚或时有失败案例。对出版企业而言,从策略乃至战略的层面上介入影视业,将影视融合与产业链拓展、多元化运营方略密切结合,尚需结合自身资源优势,探索切实可行的多种现实路径,方能规避风险,实现系统化、常态性的增值收益。

三、出版企业介入影视实现增值的现实路径

(一)借助影视营销图书

影视媒介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出版企业在传统营销方式之外,可以通过电视图书广告、电视读书栏目、热播影视剧以及微电影、短视频等影视新媒体对图书进行推广营销。实际应用中,电视图书广告方式所需费用较高,出版企业应注意提高电视图书广告的性价比,根据合理的广告预算,针对恰当的图书品类、内容和目标受众,慎重选择广告表现方式和电视频道。电视读书栏目整体收视率较低而观众质量较高,应重视图书潜在读者与节目观众的一致性而进行相对精准的营销。出版企业普遍借势热播影视营销图书,导致严重的影视同期书同质化问题,应从主题立意、内容创作、发布时机等方面实施差异化运

作,避免恶性竞争带来的资源浪费和市场风险。微电影、短视频等影视新媒体具有制作成本低、内容包容性强、形式灵活自由、受众群体广泛等优势,出版企业应予更多重视和应用,以扩大增值空间。

(二)运营图书影视版权

这里所谓影视版权,系指图书的影视改编权、拍摄权等附属版权。出版企业可以进行自有影视版权交易、代理影视版权业务、影视版权资本化运作等。要以此盈利,出版企业应重视依法取得作者的规范化授权,重视编创适合影视改编的优质内容,重视签约并培养优秀作者。与此同时,出版企业应重视完善内部的版权运营机制,包括建设专门的版权运营部门、培养版权运营复合型人才、搭建网上版权交易平台等。在此基础上,出版企业应规范管理影视版权资源,以便于及时、深入、有序地开发利用;同时也应重视影视版权保护,尤其是保护未授权的部分附属版权不受非法侵占,并打击抄袭剽窃侵权行为,维护自身利益和版权市场秩序。

(三)投资生产影视产品

出版企业投资影视以求增值的具体路径主要包括:以版权开发为手段,参股优质影视项目生产;斥资并购、控股专业影视制作公司或在企业内部整合、组建影视专业部门,开展影视制作业务;发挥内容优势,介入动漫、教育、纪录片等多类别电视节目制作;对原有的电子音像出版业务进行升级改造,生产IPTV微视频、微电影和移动短视频等作品类型。当前的影视投资环境中,投资主体多元而投资模式单一,利润分配不均衡且投资配套体系不够完善,具有一定的投资风险。因此出版企业应以量化评定和经验分析相结合精选优质项目,培育兼具影视、出版、投资三方素养的复合型团队和人才,重视依法质押担保,注意规范投资合同,并进行科学的投资组合,以分散风险保障收益。

(四)实现影视相关多元化增值

一方面,出版企业可以实施影视传播渠道多元化策略,将自己拥有版权的影视作品通过院线、电视频道、视听新媒体平台等多种渠道进行传播,甚或投资建设上述影视传播渠道,以获得最大化的经济收益。另一方面,出版企业可进行影视衍生产品的多元化开发,包括开发动漫、网游、手游等多种内容类影视衍生产品,依托影视角色形象设计制作玩具、文具、服饰、表情包等多种形象类衍生产品,以及开发运营汇聚多种影视元素于一体的综合性衍生产品,如主题公园、影视基地等。在此过程中,出版企业应重视多元化整合营销,不仅应用多种媒体优势互补

进行营销,而且统筹规划图书与影视、传播主渠道与副渠道、主产品与衍生产品的开发、播映、应用,使之彼此联动借势,互为宣传营销,从而实现较长时段的持续增值。

出版企业通过上述路径实施增值策略的过程中,应把握三个关键点。其一,正确处理多元化运营中主业与副业的主从关系,夯实出版主业,强化核心竞争力。其二,注重打造企业、图书及影视产品品牌,进而发挥品牌辐射效应,进行品牌授权和衍生产品开发,获得更多附加效益。其三,建构并延展出版—影视产业价值链,增加盈利点并强化战略环节,以产业链整体协作争取最大效益。如此,在媒介融合趋势提供的良好机遇中,出版企业有望获得多元化的增值盈利,甚或以之为契机,实现转型升级和跨越式发展,在更高层面上获得“双效”增长。

四、结论

综上所述,媒介融合为出版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更带来了百年未有之机遇。出版企业应深入挖掘自身的内容版权、人才储备、受众和渠道等方面资源优势,因应影像时代音视频内容日益主流化的发展趋势,不断创新运营模式、服务手段和产品形态,拓展媒介可供性带来的增值空间。这要求出版人进一步革新理念,淡化出版业的边界意识,从普惠大众的知识生产与传播的角度出发,以信息内容产品供应者的身份思考出版业的未来发展进路。随着5G时代的到来,移动短视频成为基本的内容文本,网络直播、全息投影、VR和AR等影视化媒介形态

嵌入公众日常生活之中,出版业的内容产品形态必将日渐丰富,借助“短内容”生产和“微版权”运营进行“轻知识”服务,也将日益成为必要和必然的增值路径。

参考文献:

- [1]周向荣,单鹏.影视图书:传统出版在泛媒体传播与大众阅读时代的突围[J].中国图书评论,2013(1).
- [2]丁荣源.论大众图书出版研究[J].出版研究,1996(2).
- [3]刘汉文,陆佳佳.2019年中国电影产业发展分析报告[J].当代电影,2020(2).
- [4]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发布《2018年全国广播电视行业统计公报》[EB/OL].http://www.nrta.gov.cn/art/2019/4/23/art_2555_43207.html.
- [5]崔保国.传媒蓝皮书:中国传媒产业发展报告(2019)[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
- [6]茱莉亚·克莉斯蒂娃.符号学:符号分析探索集[M].史忠义,等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5.
- [7]刘拥军.21世纪出版产业形态:再论大出版概念[J].出版广角,2002(1).
- [8]李春利,李蕾.影视创作与文学联姻:相互尊重才能共入佳境[N].中国青年报,2007-01-22.
- [9]郭毅,安晓芬.《小时代》是粉丝电影[J].电影,2013(7).
- [10]尹琨.国家新闻出版署发布《2018年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N].中国新闻出版广电报,2019-08-28.
- [11]根据国家新闻出版署2013至2018年发布的《新闻出版产业分析报告》整理数据.

(责任编辑 吕志远)

Added – Value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n Publishing Enterprises: Logic, Value and Realistic Path

YU Chunsheng, GUO Wanjun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Media integration weakens media industrial boundary, and publishing enterprises seek value – added across borders. Its internal logic lies in the opportunity of the era of imaging, the obvious intertextuality and mutual benefit between publishing and film media, and the advantages of content resources, reader base, talents and channels in publishing industry. Publishing enterprises intervene in the field of film and television, its value is not only to break through the revenue dilemma to increase profit opportunities, but also to integrate resources, expand the industrial chain, and achieve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 publishing; film and television; value added; copyright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筹建问题再考察

史新恒

(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河南商丘 476000)

摘要:奉天各级审判厅的筹建是在提法使的亲自参与和直接领导下完成的,这一过程提法使既有与督抚的沟通协调,也有与高等审判厅和高等检察厅的共同调查集议,成为协调各方关系的枢纽。提法使在听命清廷和法部的同时,在人事、财政、场地等方面又不得不仰赖督抚,形成极为复杂的多维图景,反映了改革过程的复杂面相,但由此建立的各级审判厅也对其他各省起到了积极的示范效应。

关键词:清末;奉天;提法使;审判厅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4

中图分类号:K25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78-05

作为效法西方司法独立的主要标志,各级审判厅的筹建是清末司法改革的重要内容与关键环节,而其在各省的渐次推行与在全国范围的全面铺开,则是由另一新设的省级司法行政机构——提法使着力推动实施的。清廷官制改革中权限边界的模糊划分,在这一过程中更是纷繁复杂,使二者在众多关系中纠缠不清。由此展开的各方呼喊与争夺,更加混淆了利益的角逐和法治理想之间的界限。

然而,提法使在各级审判厅的创建过程中的权力主体和责任主体地位,和其在实际筹建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作用,终究是无法抹杀和回避不了的。清廷把各级审判厅的筹设置于官制改革的框架下进行,加剧了司法改革的行政化色彩。尤其值得注意的是,提法使个人在此过程中的所思所想对事件的进程起着十分关键的作用。本文试图以此为视角,通过梳理相关史料,力图对此过程进行史实重建,并通过对此过程的审视重新深化认识清末司法改革的复杂与艰难,为当下中国的司法改革提供可资借鉴的思想资源。^①

一、提法使奉旨筹建审判厅——一个文献视角的考察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五月二十七日,清廷颁布《各直省官制先由东三省开办俟有成效逐渐推广谕》,基于这个谕旨,各省按察使改为提法使,分设审判厅,先由东三省开办,“俟卓有成效,逐渐推广”。^{[1]510}由此观之,为了降低改革的风险,清廷试图走一条渐进改革的路子。同时,值得注意的是,从清廷颁布各省设立审判厅的那一天起,审判厅就与提法使紧密相连在一起,并最终发挥了对各级审判厅的筹设和监督的职能。但清廷的谕旨仍停留在框架性和表态性的层面,对于如何实施等细节性和程序性的问题却没有任何体现。继清廷谕旨之后,法部颁布了《提法使官制》以书面文本的形式规定了提法使在审判厅筹设过程中的职能,并赋予其主体地位,从而既肯定了其在筹设审判厅过程中的权力,也以法律的形式规定了是其应尽的义务,如《清法部奏定提法使办事划一章程》规定:“第五十条、各厅之设置,除遵照筹各年限酌量设立外,如因情势改易或其他未便事宜,应须废止或添设,及其管辖区域之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清末省级司法改革研究(2015-QN-238)”;商丘师范学院校级青年骨干教师项目“清末省级司法改革研究(2014GGJS08)”

作者简介:史新恒(1978—),男,河南商丘人,历史学博士,商丘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政治史、中华民国史。

宜变更者,即详细体察,妥为改定;第五十一条、各厅工程营缮,应先绘具图式,呈提法使审定,并送付总务科备查;第五十二条、各厅开厅时刻及开厅日期,由该科拟呈提法使酌定,一律遵行。”^{[2]350}实质上赋予了提法使对审判厅筹建的自由裁量权,包括审判厅的设置,及其废止或添设,审判厅的审判管辖问题、工程营缮、开厅时刻、开厅日期等都由提法使核定。从而筹建审判厅成为各省提法使的重要使命与职能。宣统元年(1909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清廷发布的《颁行法院编制法谕》再次申明:“自此次颁布法院编制法后……其应钦遵逐年筹备事宜清单筹办各级审判厅,并责成法部会同各省督抚率提法司,切实筹设。”^{[3]376}

二、设立审判厅自奉天始——清廷和东三省官员的共识

在清廷的上谕颁布之后,奉天率先开始筹建各级审判厅。由于吉林和黑龙江两省相对开发较晚,在清廷心目中奉天在东三省中居于最重要的位置,这是东三省设立审判厅自奉天始的重要原因之一。东三省的官员们在这一点上和清廷认识一致,认为奉天的地位较为重要,东三省总督徐世昌和奉天巡抚唐绍仪在向清廷联衔具奏的《钦差大臣东三省总督徐奉天巡抚唐奏奉天各级审判厅开办情形折》中说“奉省为陪都重地,尤当从速创办,树厥风声……况奉省交通便利,行一新政不独外人观听所系,亦即国权消长之机,将来法律改良外可以范围列邦,内可以巩固宪政,新设各厅当为嚆矢”^{[4]246},奉天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在正式的公文和非正式的演说中也多次强调这一观点,如其在《高等审判检察厅请建筑厅署咨呈提法使转详文》和《高等审判检察厅及承德地方两厅新署落成时许厅丞演说》中说“东省肇造宏规,尤中外观瞻所系,改良法律、扩张国权此其缘起”。“我国预备立宪先从司法独立入手,司法独立又以改良审判为先,着而又以东三省先行试办,又以奉天开办审判厅最早,是朝廷之所期望者殷,国民之所指视者严,外人之所观听者众”^{[4]351}。由此观之,奉天主政者把各级审判厅的创建看作司法改革的起点,既要以此改变外国人对中国的看法,重塑中国司法形象,又有以此来扩张国权的期待。反映了处于国家内忧外患中的改革者内心的忧虑与沉重。同时,也由此使得在移植西方司法制度的过程中伴随着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这种司法改革的目标追求与西方法治观念追求的客观、中立、超然的法治精神上的矛盾与冲突,必然反过来影响到改革的实际进程。

三、清廷政策在奉天的执行——以提法使吴钊筹建各级审判厅为中心的考察

(一)总体方案的拟定

上谕颁布之后,东三省总督徐世昌督饬时任奉天提法使的吴钊切实考察和论证。吴氏首先拟定了提法使衙门及各级审判厅官制职掌,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八月二十六日分缮清单具奏,给审判厅的筹建奠定了领导基础和可操作性的依据。但是,作为破冰之旅的奉天走在改革的前沿也是异常艰难的,吴钊感叹:“惟奉省地方辽阔,举行伊始,普及维艰。”^{[4]281}他经过实际的调查研究提出了一套筹设的方案,“先于奉天省城设立高等审判厅一庭,于奉天府设立地方审判厅一庭,于承德、兴仁两县地方按巡警区域分设初级审判厅六庭,各厅均附设检察厅,俟亦有成效再行逐渐推广”^{[4]282}。但由于经费困难和天气原因,这种设计未能得到立即施行,而是采用了借房改设的办法作为过渡。关于职能,吴钊提出“高等掌审理全省上诉案件,惟各属尚未遍设审判厅人民上控者,向无已结、未结之限制,若不划分界限,则阶级错乱,临时必至分歧,今拟已设审判厅之处自应照章定级,未设审判厅之处,则凡上控各案已经该地方官讯结及应提审者概归高等审理,未经讯结及不应提审者,由提法使分别批令该地方官秉公讯断。奉天府所属共十二州县,距离过远,管辖难周,今拟地方审判厅只审理承德、兴仁两县地面刑事诉讼之不属初级者,一以为将来府不辖县之规划,一以为人民赴诉之便利,初级六厅各按本区域内受理该厅应管之事。自各厅成立之日起,凡属承兴两县管辖之处,除行营发审系属特别裁判暂仍其旧,其余民事刑事案件悉归审判厅管理,现奉天府承德兴仁两县即不收其诉讼,其未结旧案在两县呈诉者归地方分期接收,在奉天府上控系两县界内者亦归地方接收,不属两县者,概归高等接收,遇有招解勘转等件系审判厅之案即有各该厅径行解司解院,不必由上级审判厅转解。系各州县之案,仍照旧例办理”^{[4]286}。

可见,奉天各级审判厅筹设是在提法使的亲自参与和直接领导下完成的,同时也是其与高等审判厅、高等检察厅共同努力、并肩作战的结果。

(二)具体实施过程的推进

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初八日,奉天提法使照会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主要内容是回复在此之前高等审判检察厅请提法使转呈督抚的各厅开办的情况,以及呈送章程规则及公牍程式。奉天督抚批示道,“所拟各节大致尚属周妥,仰即转飭各厅

先行试办,如有未尽事宜及窒碍难行之处,仍由该司随时体察情形督同各厅员斟酌损益、改良办理,务期实行无阻,使民称便,方于司法前途有所裨益”^{[4]310}。这在实际上是提法使又一次被督抚授予办理筹设审判厅之权。同时也可以看出提法使在本省各级审判厅筹设过程中的作用。

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三月初六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接到了奉天提法使的照会,该照会转发了奉天督抚关于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由提法使转详督抚的批文,批准了奉天高等审判厅建筑高等地方审判检察厅署之请,令其先行择地堪估、绘图呈候核夺^{[4]321}。

吴钫在奉天督抚的一再催促下,详细统筹督同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署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守珍调查集议,并首先制定了在抚顺设立地方审判检察厅的方案,综合考量了自然地理环境、人口、商业、交通等方面后,最终把千金寨选为抚顺地方审判和检察厅的理想之地。由于时值严冬,不具备施工条件,吴钫提出暂时租赁民房开办抚顺地方审判厅,检察厅附属其内,包括对原有审判检察厅的重新分划组合等工作亦皆是在奉天提法使的亲自领导下完成的。“原设有奉天府第二初级审判检察厅,现即划归抚顺,界内即作为抚顺第一初级审判检察厅,暂设一厅,如将来实系事繁,再行酌量加增,所有各厅员缺拟由高等及奉天府地方两厅内拨员派署,以资熟手而节经费,原补之奉天府第二初级审判厅推事方瑛应改补抚顺第一初级审判厅推事,俾副名实。”^[5]这个方案获得了奉天督抚的批准,并在奉天督抚与奉天提法使分别对有关人员任用之后,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二月初一日开办。

奉天各级审判厅的设置大体上是按照行政区划进行的,即在省城设立高等审判厅管辖全省上诉案件,府、直隶厅、直隶州设立地方审判厅,各县设立初级审判厅。这种设置的方法是否合理姑且不论,值得注意的是当时奉天的行政区划也处于不断的变更之中,这种变更就使得原来审判厅的审判管辖不断被打破,如何恢复到行政区划变更之前的有序与平衡,成为一个新的问题不断地被提出来,或要求对审判管辖做出重新解释,或在审判厅的设置上做出新的调整。提法使在其中发挥了参与方案、协调各方的作用。

(三)虚心接受不同意见

上文已经论述了在提法使与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的努力下,制定了抚顺地区设置审判厅的方案,并获得了奉天督抚的批准,定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

年)十二月初一日开办。然而,方案提出之后,抚顺县知县朱孝威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兴仁旧属塔儿峪、四方台两处,前曾各设初级审判,惟权限过狭,若非添设地方审判厅,司法独立机关仍难组织完备”^{[4]11}。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六月二十二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接到了提法使的照会,转发了督抚的批飭:“值兹筹款维艰似应稍示变通,拟请将该两处初级审判厅酌移一处,于抚顺一面改省城地方审判为承抚两县地方审判,庶几名实相符,权限分明,而民间亦有所遵循。”^{[4]13}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并咨呈提法使,认为审判厅的设置作为一个司法问题是严肃的,应该严格按照它的内在要求来办理,根据当时审判厅的司法管辖区域与行政管辖区域一致的惯例,应该随着行政区划的变动而设立相应的审判厅,不应该因为经费紧张而随意变更^{[4]15}。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二十六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再次收到提法使的照会,转发了督抚的批示,同意了该方案,“查该司所议兴仁县改移抚顺,应增设抚顺地方审判厅,将奉天府地方审判厅原设刑民各二庭分出一庭,移于抚顺,其不能划分之典簿、主簿、录事及应设检察厅之检察官均分别添设,并另设推事长、检察长以为该厅监督各情形,名义即属允洽,而司法范围亦可借以逐渐推广,应准如所议办理,划分区域、配置厅位、建立衙署及规划一切庶务,事体颇繁,自不能不遴派妥员先行筹办,即据该司查有法部主事程继元才力强干、众望久孚、堪以委派,应准札委一专责成,所有该员筹办一切事宜,应即随时禀由该司核明,呈候察夺,委札随批发给,仰即遵照缴”^{[4]11-15}。

原法部主事程继元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二十六日接到提法使照会转发的督抚札委其筹办抚顺地方审判厅事宜之后,于八月初六日赴抚顺、千金寨、塔儿峪等地方查看,观察到千金寨的繁盛程度已超过抚顺数倍,并提出了自己对于行政、司法机构设置的想法,“窃惟政治上之地理宜分司法、行政两途,行政取其冲要,司法重在繁难”,所以,“抚顺地当孔道,为省城东北之冲,行政官驻此则指挥便利,千金寨户口极繁,又为中日民人杂居之地,往往刁徒勾结、欺压善良,司法官驻此则法律之保护较为周切,故就现在情形而论,抚顺县宜驻抚顺,审判厅宜驻千金寨”^{[4]20}。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九月初三日,提法使照会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转奉督抚批示,一切按程继元的方案办理。

抚顺地方审判厅厅署的位置确定之后,因为天气变化并没有立即动工兴建,而是在塔儿峪租赁了

一所民房先行开办,作为权宜之计。天气变暖之后,抚顺地方审判检察厅继续为此展开交涉,咨呈高等审判检察厅要求速建厅署,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继续与提法使交涉,提法使转详督抚请示。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二十日,奉天高等审判检察厅接到了奉天提法使的照会,转达了督抚的批示,飭民政部迅速派员前往堪估,并札度支司拨款兴筑^{[4]20-22}。

(四)具体事务的亲力亲为

继抚顺之后,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署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守珍向奉天提法使提出建设高等审判检察厅和承德地方审判检察厅厅署的请求,“高等据全省审判最上之阶地方,受理重要及不服初级之诉讼,省会之区,厅署实未便终于迁就,开办借租之房屋既已狭小,地势又均非适中,原系一时权宜,于事实上殊形窒碍。矧近来民刑案件日有增益,必须添设法庭,扩充房舍,尤应先时预备,请予建筑奉天高等并现时承德地方审判厅检察厅署”^{[4]33}。奉天提法使吴钫转详东三省总督兼奉天巡抚徐世昌,徐氏当即批令相择地址,并飭民政部会同派员堪估工程、拟绘图样。

奉天提法使经过调查之后,设计了一套非常详尽的方案,“择定省城小南门内旧通济仓地址,及西首官有隙地一区,约一百六十方丈,足敷建筑厅署之用”^[6]。而且,奉天提法使对厅署的总体布置、房间分配和楼下与墙外的群房也作了详细的规划,最后还对工程做了预算。此方案得到了徐世昌的支持,徐氏飭交民政部转由工程局核实复估,“用公家旧存之大木料及铁道所存枕木约可折价银三千五百余两,由省城罪犯习艺所承办,以犯人充作小工,按平民工价酌减二成发给,约可省银两千四百余两,用劝业道造砖厂所造之砖,只给运费,又可省银七千四百余两,统核全部工程实共需库平银三万八千余两,除折抵价款外公家应拨给现银两万七千余两”,^[6]由度支司如数开拨,于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十月开工。

奉天提法使在高等审判检察厅和承德地方新署落成典礼的训词中介绍了自身参与、组织筹备审判厅的状况,“当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本司筹备审判,迫于事势,急求成立,遂赁借宗人府为高等审判厅,购买发审局所租民房为承德地方审判厅,地面狭隘,房舍卑陋,赖各厅僚贰同心进行,规模粗备,然因厅廨之草率,对于诉讼人民有种种之不便,对于外来参观宾客,生无穷之欠缺,迭次禀奉督抚宪发款建筑新厅,经两年之久始观厥成”^{[4]343-345},并对新建的审判厅寄予了诸多期望。高等审判厅厅丞许

世英也表达了其与提法使及督抚共同谋建审判厅之事,“鄙人所以于开办之初即禀商督抚与法司谋建审判厅也,溯自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十二月朔日”^{[4]246-351}。

(五)各厅的陆续开办

紧接着设立营口、新民各级审判检察厅的工作开始着手,其过程基本是抚顺的如法炮制,提法使吴钫在奉天督抚的飭令下督同高等审判厅厅丞许世英、署高等检察厅检察长汪守珍办理。经过一番调查研究之后,提法使制定了设置方案,“拟于营口设地方审判一厅、初级审判一厅,新民设地方审判一厅,初级审判一厅,均附设检察厅,按照奏定章程分级管理,该厅府所辖境内民刑诉讼、其分给法官、支給薪公,均照省垣酌量减少,暂行租赁民房略加修葺,法庭则务求整齐,群室则仅取敷用,业已组织就绪,请派员定期开庭,所有以前积案,查照奉天府审判厅成立时办法暂由该厅府自行清理,分期由审判厅提收,以免拥滞,仍以三个月收尽为限”^[7]。督抚和提法使分别对审判检察厅作了相应的人事任用之后,定于宣统元年(1909年)三月十五、二十日相继开庭,新任署理各员仍由提法使随时考核,对于确实能够胜任的奏请法部补授实缺^[7]。

宣统元年(1909年)七月,东三省总督和奉天巡抚联合批飭提法使与民政部开会讨论辑安县令李廷玉条陈的沿鸭绿江设立审判分庭办法,其理由和办法大致为:“辑安地处边疆、濒临鸭江、人民稀少、风俗顽梗,沿江一带所属地界绵长千里,中韩民人杂居一处,时起争端,地方官厅距离甚远,鞭长莫及,愚民无知,动辄酿成交涉,唯有沿江赶紧分设审判厅,专以办理中韩民人刑民诉讼交涉事宜,以辅地方官耳目之不及,且沿江一带伏莽甚多,抢劫之案时有所闻,小民每以控诉无门隐忍不报,为此陈报沿江分设审判厅办法并谓提前开办实于地方裨益匪浅。”^[8]

四、结语

奉天提法使在奉天省内筹建各级审判厅的工作整体来看较为积极和努力,且颇有成效。从提法使吴钫关于奉天设立各级审判厅的奏折,为选址在奉天全省范围内对各地的经济、社会、交通、商业等方面做系统调研与考察论证,到审判厅设置方案富有逻辑和充分说理的论证,以及不遗余力与各方沟通的事实,包括饱含深情、以训词名之的演说,均充分展示了提法使个人对审判厅筹设的重要作用。同时,提法使即听从清廷谕旨,又受命于法部,还听命于督抚,尤其是在审判厅筹建过程中,无论土地、房屋等基础设施,还是人事、财政等方面,均须仰赖督

抚,暴露出提法使仍受制于督抚的尴尬境地,自身尚且难以独立,事实上造成了各省审判厅独立运行的艰难。也折射出历史惯性的力量之大,在行政权长期独步天下的中国试图推行以审判中心主义为特征的司法独立尝试何其艰难!

提法使吴钊率先垂范、事无巨细亲力亲为的事实说明,吴氏本人具有良好的个人品质并具有一定的法治理想,同时也透视了改革初期各种秩序尚不完善,各种新情况、新问题不断出现,具有一事一议和在不断总结经验中逐步推行的双重特征,也使奉天在审判厅筹建过程中打下了吴钊个人的深刻烙印。不过,值得肯定的是,提法使吴钊的举措与努力,最终在一定程度上还是推动了奉天省法制改革的进程,而且对其他省份产生了一定的示范效应。

注释:

①以往研究清末提法使和各级审判厅问题,多分别论述,或从其他视角,及更广泛的清末司法改革的整体进程展开讨论。进入21世纪以后,开始有学者对晚清审判厅展开研究。比较重要的成果有李启成《晚清各级审判厅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俞江《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考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刘焕峰、郭丽娟《清末审判厅设置考略》(《历史档案》,2009年第2期)等。上述成果在对基本史实作梳理的基础上,提出了若干颇有启发性的见解。但同时亦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或对其筹建过程的描述较为粗略,“虽多方搜集资料,并对天津、京师、东三省创办各级审判厅用力颇多,但仍以未能查到清末创办地方审判厅的具体史料为憾。”

(俞江《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考论》《华东政法学院学报》,2006年第1期),或对奉天审判厅成立之后的运行情况展开讨论。关于提法使的研究,参见拙文《效法西方话语下的自我书写:提法使与清末审判改革》(《历史教学》,2010年第5期)、《清末官制改革与各省提法使的设立》(《求索》,2010年第8期,此文被人大复印资料《中国近代史》,2010年第10期全文转载)、《分科改制:提法使官制向近代科层制的演进》(《求索》,2011年第6期)、《清末提法使衙门的人事变革:以直隶为中心的考察》(《历史教学》,2011年第12期)、《清末司法官制改革中的臬司甄别》(《历史档案》,2012年第3期)等。

参考文献:

- [1] 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 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M]. 北京:中华书局,1979.
- [2] 汪庆祺. 各省审判厅判牍:王朝末日的新型审判[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 [3] 怀效锋. 清末法制变革史料(上卷)[M]. 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9.
- [4] 王家俭,姜可钦,童益临,等编. 朱延龄,汪仁宾,锡箴,校勘. 汪守珍,许世英,汪世杰,鉴定. 奉天司法纪实(第二册)[M]. 沈阳:陪京印书馆,1909.
- [5] 抚顺开办地方审判检察厅[N]. 申报,1909-02-09.
- [6] 政治官报[N]. 1909-03-05.
- [7] 政治官报[N]. 1909-03-20.
- [8] 东三省近事[N]. 申报,1909-09-05.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analysis o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urts at All Levels in Fengtian in Late Qing Dynasty

SHI Xinhe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Shangqiu Normal University, Shangqiu, Henan 476000, China)

Abstract: The preparations for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trial halls at all levels in Fengtian were completed under the personal participation and leadership of the referee. This process referred to not only the communication and coordination with the superintendent, but also the joint investigation and assembly with the high court and the high procuratorate. Become a hub for coordin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ll parties. While obeying the orders of the governor and the Ministry of personnel, finances, and venues, forming an extremely complex and multidimensional picture that reflected the complex aspects of the reform process. However, courtrooms at all levels were established. It has also played a positive demonstration effect in other provinces.

Key words: late qing dynasty; fengtian; ti-fa-shi; trial hall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与创意开发模式探究

杨洪飞¹, 李庆雷^{1,2}, 夏梦蕾¹

(云南师范大学 1. 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 2. 云南旅游产业研究院, 云南 昆明 650500)

摘要:基于创意经济理论、体验经济理论,充分挖掘利用束河古镇的“魂”,寻找突破点,提出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运用实地调查法、文献分析法对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进行梳理,识别资源的多元价值。结果表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在文化价值、社会价值、旅游价值和艺术价值方面具有较高品位,在建筑文化和民俗工艺资源方面具有较强竞争力,据此提出“空间创意”集聚、“异业混血”合作、“束河文创”特色模式,对于推动民俗文化的活化利用以及地区产业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创意开发;旅游发展;束河古镇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5

中图分类号:F59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83-06

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进程加快,古城镇以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厚重的历史气息和原生态的生活方式逐渐成为人们的向往之地。束河古镇作为丽江世界文化遗产的重要组成部分、茶马古道重镇、皮匠之乡,避免“千城一面”发展局面,有效传承和挖掘利用古镇文化内涵,实施创意开发模式对于提升古镇吸引力,切实守住古镇的“魂”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这也在实践中得到了证实。日本三岛町乡村振兴计划,三岛町以本地民俗工艺为切入点,提出“生活工艺运动”、打造“自然博物馆”举措,成为古村镇民俗文化传承与发展的典范;乌镇以曲艺民俗戏剧作为自身文化特色,创造性地建造木心美术馆、举办乌镇戏剧节,成为我国古镇发展的佼佼者;袁家村以关中民俗美食作为核心发展主题,将特有小吃、民俗技艺与现代创意相结合,实现了从无到有的关中民俗第一村的华丽转变。还有更多实践表明,民俗文化资源是古镇发展的关键资本,进行创意开发对古镇提升吸引力具有重要作用。鉴于此,在对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进行价值识别的基础上,坚持保护与开发相统一、特色明显和差异化突出的思路,提出束河

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创意开发模式。

一、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概况

束河古镇位于丽江古城西北4公里处,坐落在聚宝山、莲花山和龙泉山脚下,九鼎河、疏河、青龙河穿过古镇村落街巷,是纳西先民在丽江坝子的最早聚居地之一^[1]。早在20世纪40年代,束河古镇因独特的地理优势和资源优势成为茶马古道集镇和纳西文化交汇中心,皮革、炼铜、打铁等手工艺在此云集,并因此孕育和繁荣了束河的民俗工艺资源。近代以来,丽江的经济、文化中心逐渐向大研古城转移,束河减缓了商业化进程,因此保留了较为丰富的纳西文化、茶马文化、生态文化等文化资源^[2-3]。束河古镇作为丽江世界文化遗产的外延,以丽江境内最大的石板桥青龙桥、古镇上溪流水源地九鼎龙潭等名胜,以及“皮革之乡”“千年清泉之乡”“茶马古道重镇”等誉称闻名于世。从地理区位来看,束河古镇位于大研古城和白沙古镇的过渡地带;就开发程度而言,相对于开发过度造成商业化严重的大研古城、开发不足导致资源利用率低的白沙古镇,束河古镇介于二者之间。因此,束河古镇在大研古城

收稿日期:2020-10-15

作者简介:杨洪飞(1995—),女,云南禄劝人,云南师范大学旅游与地理科学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规划与战略管理。

“明星”光环效应下,如何挖掘利用其独特的民俗文化资源,准确把握保护与开发的平衡,运用创意进行高质量开发以区别于大研古城发展路径,并为白沙古镇提供可行的成功经验成为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与大研古城、白沙古镇相比,束河古镇在民俗工艺资源方面占据相对优势。结合陶立璠《民俗学概论》^[4]的分类方法,将民俗文化资源分为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基于此,通过查阅相关文献、书籍资料,系统梳理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如表1。

表1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一览表

类别	款项	具体内容
物质民俗	建筑民俗	“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马锅头豪宅;木楞房;土掌房;两拐房;四合头;一进两院;多进多套院;深出檐、坡屋面、灰瓦白墙、雕花木门窗;“十二生肖”以及“四蝠闹寿”铺地;大觉宫壁画;“城依水存,水随城至”建筑特色;青龙河、九鼎河、疏河三河水系等
	饮食民俗	鸡豆凉粉;米灌肠;火烤粑粑;红鲟金鲟;扁担酒;纳西杂锅菜;纳西米糕;纳西烤鱼;牛肉饵呷饼;黑糖豆花;牦牛冰棍;吹猪肝凉拌;黄豆清水面等
精神民俗	服饰民俗	“披星戴月”(七星羊皮);花腰带;百褶围腰;披毡;麻布长裙;毡帽;青蓝色棉布短裤;长袍马褂;花纹头饰发辮等
	口头语言 ^①	东巴象形文字;纳西语、傣傣语、藏语等民族语言;《署的来历》;《迎净水》;《舞谱》;“阿默达”;“阿丽哩”;打跳;口弦调;树叶调;火把舞;芦笙舞;锅庄舞;“木瓜白”“白是白”调子等
	行为传承 ^②	皮毛皮革;东巴纸;珙琅银器;石器;铜器;刺绣;铁器;漆绘;木雕木刻;篆刻;蜡染;扎染;书法;绘画;民间纺织等(相关民俗工艺已有一定规模物质载体:云天工、彭萍大师刺绣艺术馆、白沙锦绣艺术院、禾口月生皮匠铺、云南大学旅游文化学院文创基地、石寨子千年银器等)
	精神信仰 ^③	东巴教;毕摩仪式;“祭署”仪式;藏传佛教噶玛巴圣迹“噶玛巴脚印”;自然崇拜;祖先崇拜;多神崇拜;祭天大典;祈福仪式等
社会民俗	岁时节日	三朵节;纳西族和彝族的火把节;“棒棒会”“七月骡马会”等
	民间礼仪	“三叠水”(待客的最高礼仪);知诗书好礼仪;宽容仁义、敦厚真诚;忌踏木、坐木;忌破坏水源;纳西人不食狗肉、马肉、猫肉等习俗

注:①包括方言、神话传说、歌谣曲艺、民间文学等;②指民俗工艺等;③包括宗教信仰、伦理道德等。

由上表可知,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丰富,物质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多种类型并存,是束河古镇社会、经济发展进步的精神动力和源泉,实施创意开发模式具有坚实的资源条件。

二、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

民风民俗及悠久的历史彰显出一个古镇厚重的文化底蕴,其展现的价值与内涵是其他资源无法比拟的。

(一)文化价值:彰显历史底蕴与内涵

束河古镇历史悠久,在不同历史阶段形成了不同特征的民俗文化资源,集中反映了束河古镇古朴传统的生产生活方式和特有的价值观念。“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马锅头豪宅等传统建筑是纳西族人民在历代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的物质遗产,描绘了古镇的“形”,白墙青瓦、朱红门窗、照壁飞檐等细节装饰生动地刻画了古镇的“魂”,“居民博物馆”的荣誉是束河悠久建筑文化的最佳表达。束河古镇的传统民俗工艺尤其皮革工艺,是历史发展的重要见证,也是世界文化多样性的重要体现。从皮革原料的获取、制革过程、缝制工序到外观设计都印上了束河古镇具有民族性和地域性的符号,彰显了厚重的历史底蕴,具有重要的文化价值。束河古镇保留较好的纳西传统建筑和以皮革工艺为核心的民俗工艺具有相对竞争优势,文化价值高,应进行重点利用。

(二)社会价值: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

民俗是民族独特精神和个性特征的重要表征,反映了一个地区对自身文化特性的认同和自豪感,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和谐、教育等价值^[5]。束河古镇民俗资源发源、存在和传承于当地居民的日常生活之中,对于传承和弘扬民族精神具有重要意义。东巴象形文字被称为“世界上唯一活着的文字”,在漫长的历史发展中,纳西族人民使用自然符号象形文字记叙了其从奴隶制过渡到封建制这一时期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东巴文、东巴经等东巴文化成为传承和弘扬纳西民族精神最重要的活的载体。三朵节作为束河古镇重要节日之一,体现了纳西族热爱和平、倡导和谐、自强不息的民族精神。“知诗书好礼仪”等民间礼仪对于维护社会秩序、宣扬现代精神文化具有良好的促进作用。在束河古镇实施创意开发中,应注重体现其独特的民族精神和个性特征,增强当地居民的民族认同感和社会归属感,并积极主动服务于旅游建设、经济发展。

(三)旅游价值:打造旅游核心吸引物

以各种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打造旅游核心吸引物是旅游者通过感受异域民族风情和地方文化以获得愉悦的一种高层次旅游形式^[6]。以束河古镇的建筑、饮食、服饰、语言文学、民俗工艺、节庆、礼仪等民俗文化资源为依托,能够打造具有吸引力的核心吸引物。束河古镇“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

等建筑民俗、“披星戴月”等服饰民俗具有审美和实用价值;皮革工艺、银器、木雕等民俗手工艺能够发挥娱乐体验价值;东巴文、《署的来历》等口承语言、“知诗书好礼仪”,以及其他禁忌等民间礼仪能够满足游客求知需求;毕摩仪式、“祭署”仪式等岁时节日能够满足游客的猎奇需求。求异是旅游开发的重要价值取向,体验异域风情、感受异文化震撼是游客的首要追求^[7]。对比大研古城、白沙古镇以及周边大理古城、迪庆、怒江等民俗文化资源,束河古镇的民俗工艺资源较为突出,以此为重点进行创意开发能够较好发挥旅游价值。因此,根据寻找差异、创造差异的思路,挖掘利用特色突出的民俗工艺资源作为开发重点,是丰富旅游核心吸引物、提升旅游价值的关键方式。

(四) 艺术价值:挖掘特色和审美功能

特定地区的民俗文化资源展示着地方特殊的设计、风格和高水准的技艺,凝聚着当地居民传统的艺术审美情趣。“披星戴月”、花腰带、百褶围腰、披毡等服饰,一方面是纳西族人民为适应生活环境而创造的,另一方面也凝聚了纳西族古老传统的审美观念,体现了纳西族对传统民族文化的传承和对服饰穿搭的审美观念。“建筑是人们进行物质生产和精神生活的空间场所,其本身就是一种艺术、一种文化”^[8]。从装饰来看,块石、瓦砖、卵石等装饰材料、具有浓郁民族风格的象征图案“四蝠闹寿”“十二生肖”,体现了地域特色和手工艺术。从颜色搭配来看,古城整体色彩为灰、白、红基调,突显出古城的朴素淡雅;街道多以红色角砾岩铺设,与古镇自然、人文环境相协调,又不失艺术美感。皮革、纺织、木雕等工艺在颜色搭配、造型设计等方面独具民族文化特色,在精细的手工艺中凝聚着巧妙的审美情趣,也是现代工艺最原始的呈现,对现代工艺具有一定参考价值 and 美学价值。注重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特色和审美功能,塑造其鲜明个性,有利于打造“束河精品”。

三、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

民俗文化资源是束河古镇特色文化的体现,在创意思维指导下,挖掘利用民俗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促进资源价值实现、价值提升、价值转化,完善价值链,提升产业附加值。

(一) 基本思路

实施束河古镇创意开发模式,首先应坚持开发与保护相结合原则,合理利用资源,不破坏资源的真实性和原生性。其次,按照特色明显、差异化突出思路提出创意开发策略,重点挖掘利用保留相对较好、

具有束河古镇典型风格的建筑文化以及拥有厚重历史底蕴的皮革等民俗工艺资源,以此为突破点建构束河古镇旅游发展的价值链。最后,根据体验经济原理,体验分为娱乐、教育、逃避和审美体验,独特、深刻和丰富的体验能够增强地区吸引力^[9]^[208-211]。注意活化利用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促进资源价值提升。值得注意的是,位于束河古镇四方街旁的“工匠街”是汇聚工匠艺人、集中展示民俗文化、弘扬工匠精神的特色街区,也是实现资源多元价值的聚集区,对于打造束河乃至丽江民俗文化旅游新地标、促进旅游转型升级具有重要意义,在束河古镇实施创意开发模式中应重点利用。

(二) 创意开发模式

从空间、产业、产品方面提出“空间创意”“异业混血”“束河文创”三种创意开发模式,促进综合价值高、特色突出的民俗文化资源实现价值增值,并带动相关资源提升价值。

1.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

(1)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的目标和亮点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主要是创造一个独特的文化消费空间,强化社区生活艺术再造,主要目标是挖掘文化底蕴提升资源价值、化腐朽为神奇,促进价值转化,搭建旅游者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之间的对话交流平台,增强旅游者消费地方文化的真实性和参与性。独具特色的景观展示、充分的互动交流、真实性的人文感知、创意元素的集聚是“空间创意”模式的亮点,也是与传统开发模式的重要区别。与大研古城已有的空间利用方式相比,束河古镇不同之处体现为“小而精”“讲创意”“重秩序”,将高端小众产品作为主体产品。

(2)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的具体设计

“空间创意”集聚模式是基于束河古镇已有的“形”,主要指建筑文化资源,结合其他相关民俗文化资源的利用,融入创意元素打造具有地方历史文化意义的体验性空间。一方面,营造真实性民俗文化大空间,培育文化体验、休闲度假(慢生活)产品体系。民俗文化大空间的开发主体是旅游企业,构建“企业+社区”共同开发方式,避免大研古城脱离原住民开发旅游的形式。地域范围包括整个束河古镇空间,龙泉村、仁里村等村庄以及四方街、工匠街等空间重点打造为民俗文化载体。与大研古城片区的四方街、五一街等空间载体相比,束河古镇民俗文化空间的传统建筑更完好、民俗文化更古朴、地方品质更真实。基于地方感理论,场所、活动、意义与特色是人们对于某一空间产生情感体验的关键要素,是

促使人们产生地方认同、地方依恋的有力支撑。重点构建人、文、景要素,以突出真实性和个性化为开发理念打造民俗文化大空间。第一,人是古镇发展最有活力的要素,必须留住东河古镇原住民,打造主客共享的体验空间。保留原住民“披星戴月”、花腰带、毡帽等传统服饰,以及纳西语等具有纳西象征性的语言符号,呈现东河古镇原生态的生活场所,提高美好生活品质。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将东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物化,以原住民的住宅为基地、家庭为生产经营单位发展庭院经济,丰富游客体验,实现文化资源的综合价值提升。引导当地居民保留知诗书好礼义、宽容仁义、敦厚真诚的习俗礼节,营造知书达理、人文气息浓郁的文化氛围。第二,景观是最具视觉冲击力的要素,在吸收传统纳西建筑元素,如三坊一照壁、四合五天井、两拐房、四合头等传统建筑形式的前提下,丰富建筑轮廓线条、突显建筑特色,增设楼顶天台、透明玻璃窗,营造视觉美。在墙体悬挂标有东巴文、汉语和英语的指示性木标牌或具有特色的文字话语,巧妙融合传统特色与时尚潮流,为游客营造具有归属感而又不失真实性的民俗文化空间,包容性和多样性的氛围。另外,民俗文化大空间的打造应与自然生态相呼应,避免过度商业化,打造“慢生活”氛围,让游客在“慢走”“慢游”“慢品”“慢食”的舒适空间里尽情地感受东河古镇丰富的民俗文化,打造区别于大研片区热闹喧嚣、快节奏的“宁静空间”。

另一方面,建设小众艺术空间,促进民俗文化资源的价值提升和价值转化。吸收借鉴巴黎 104 创意艺术中心、韩国 Heryi 艺术村,以及北京 798 艺术园区等艺术空间打造经验^{[10]98-102},打造东河古镇新的文化艺术地标。综合区位条件、建筑特色、文化氛围等因素考虑,可选取东河古镇仁里老村南片区作为艺术空间载体。在基础保障方面,完善仁里村的通信网络、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为艺术创作提供舒适便利的创作交流条件。在开发主体方面,成立艺术委员会进行管理,艺术空间的发展和运作采取民间化形式保持其独特性和独立性。在空间创意拓展方面,采取相关激励机制,吸引各类创意人才如画家、雕塑家、建筑师、作家、摄影师、音乐家、电影创作者、艺术教育家以及博物馆、画廊、音乐厅、剧院、艺术品商店等机构和管理人才入驻,拓宽艺术空间的创意源泉和领域。在要素业态方面,发展高端美学体验、艺术创作、创意设计等业态。依托仁里村传统的纳西建筑,结合建筑师的创造性,坚持变废为宝、化腐朽为神奇的开发理念,实现低价值的纳西废弃传统

建筑向高价值的艺术空间载体转化。利用新型数字保护技术,修复改造居民建筑为“建筑学博物馆”。利用废旧建筑打造“行动咖啡屋”、多功能展演厅、电影厅等。打造高端民俗工艺精品工作室,发挥设计师、雕塑家、画家、摄影师等创意人才的创造性,利用皮革、东巴造纸、银器、木雕等工艺,打造特色鲜明的纪念品。最后,将艺术空间与东河古镇发展紧密结合,强化社区生活再造,促进艺术家与当地社区居民的充分互动学习,发挥文化教育与艺术涵化的社会性功能。

2. “异业混血”合作模式

(1) “异业混血”合作模式目标和亮点

“异业混血”合作模式主要是通过不同企业或不同行业的“跨界”合作寻找新的经济增长点,以利用各自成熟的技术和现有的知识信息进行创新而形成联盟关系,创造性地推动文化繁荣和经济进步^{[10]344}。创意经济原理表明,将不同形态的既有元素进行重新搭配,能够刺激创意的产生并提高产品综合价值^{[9]235-236}。结合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和不同业态的有利元素,“异业混血”模式能够实现优势互补、提升价值,在自主研发、创意设计、品牌塑造等价值链环节提高附加值。与传统开发模式相比,“异业混血”模式更注重科技创新和品牌力量,注重将资源价值转化为品牌价值、经济价值。利用民俗文化资源实施“异业混血”,完善工艺价值链,结合已有皮革工艺的“一把锥子走天下”的品牌基础,东河古镇与大研古城相比能够更好地推动价值实现、价值提升。

(2) “异业混血”合作模式的具体设计

“异业混血”模式主要是以东河古镇的行为传承文化即皮革工艺为核心,从上游的技术研发、中游的创意设计和产品生产到下游的产品营销,在各价值链环节中提升附加值,推动民俗文化资源价值实现。坚持以科技促进文化保护、创新产品开发的理念,打造数字化旅游新时代,提供个性化、高端化、品质化的服务。在开发主体方面,以东河古镇文旅企业为载体,寻求与不同行业、不同企业共同合作开发,带动社区居民参与,使原住民共享民俗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及相关衍生价值。在要素业态方面,重点推动科技与民俗工艺的跨界融合,打造包含科技体验、现代的先进科技工程、自动化生产线的科技旅游。以科技为基础,提供东河古镇民俗文化与美学创意的技术支撑,改进和完善传统民俗工艺的生产质量和效益,促进民俗工艺资源的艺术美学价值、经济价值和社会价值提升。在产品生产方面,突出地

方特色和差异化发展,束河古镇的皮革、扎染工艺应自主研发新型技术,突破现今工艺生产品质与产能限制瓶颈,进一步突出束河工艺的精细与品质。融入创意元素,以原创设计促进民俗工艺的艺术价值、文化价值以及经济价值等相关衍生价值的实现。针对银器、木雕、石器、铜器等工艺品的生产,在图案设计、用途构思等方面,可使用现代科技进行改良更新、创新设计,打造与时俱进的“束河精品”。在产品展示方面,采用三维影像、虚拟技术等数字技术展示刺绣、绘画、雕塑等产品,提升产品吸引力。在产品营销方面,与大研古城进行联合营销,采用短视频、网络直播等新型营销手段。

创造品牌、发挥品牌力量是增强文化附加值、完善价值链的重要途径。束河古镇的创意开发模式,应制定品牌发展战略,树立品牌制胜理念,提高与大研古城、白沙古镇等周边地区的旅游竞争力。茶马古道的衰落,束河古镇皮革工艺积累的声誉和品牌也随之没落。深入挖掘束河古镇的皮革皮具以及制铜打铁、漆绘雕刻等传统工艺技法,结合现代工艺、市场需求,将传统民俗工艺的技法转化为品牌发展的奠基。在短期发展中,寻求品牌合作是重要的解决路径,束河古镇应深化与红谷品牌的合作,以红谷较高的品牌知名度传承束河古镇 600 多年的皮革文化,依托红谷品牌的平台展现茶马古道上的皮匠传奇。从长远发展来看,束河古镇皮革工艺应逐步走向世界,依托精湛的皮革工艺与当地特有的皮革原料,开创世界皮具工艺中的束河流派,与路易摩登、登喜路、普拉达、圣大保罗等世界著名皮具品牌寻求合作是一种有益尝试,并逐步打造高知名度专属品牌。另外,依托束河古镇独具纳西风格的服饰民俗,打造融合民族、时尚元素的小众服装品牌,丰富束河古镇的品牌体系。

3. “束河文创”特色模式

(1) “束河文创”特色模式的目标和亮点

“束河文创”特色模式主要是通过提炼束河古镇优秀的民俗文化资源,打造具有特色的新型文化内容产品。依托创意手段和市场化运作方式,将束河古镇民俗文化与现代消费生活进行有效结合,通过具有艺术特色和实用价值的文创产品,使束河古镇情感和精神层面的文化资源走向大众生活。传统文化与大众生活的巧妙结合、形式多样和层次丰富的文创产品是此模式的亮点,打造地方文化 IP 是束河古镇与大研古城等周边地区竞争的利器。

(2) “束河文创”特色模式的具体设计

“束河文创”是综合利用束河古镇的各项物质

民俗、精神民俗和社会民俗,积累创意素材,拓展创意空间,提升综合价值。借鉴北京故宫、台北故宫文创经验,实施“束河文创”模式,打造文旅 IP 引导发展。针对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类型和特色,可重点打造实用性、观赏性、纪念性、体验性四类文创产品来丰富“束河文创”。

第一,将束河古镇独特的文化元素与大众现代生活相结合,开发实用类文创产品,促进民俗文化价值转化。依托皮革工艺开发暖手宝、酒囊袋等;利用珐琅银器开发主题系列“茶马古道”茶具、“清泉之乡”主题餐具;将书法、绘画与东巴纸结合运用,开发东巴纸灯、书签等;扩大刺绣、扎染等工艺的使用范围和实用价值,开发床上四件套、窗帘等家居用品;融合扎染、刺绣等元素创新性开发“披星戴月”系列服饰等。

第二,利用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审美价值、艺术价值开发观赏性文创产品,提升资源价值。根据《署的来历》《迎净水》《舞谱》等民间文学,融入现代艺术元素,开发主题演艺产品,通过舞台演艺展示和传承束河古镇民俗文化。

第三,利用“原型”推动束河民俗文化资源综合价值实现。将铜器、皮革工艺与束河古镇作为茶马古道重镇地位相结合,开发铜铃铛、马鞍摆件、马帮靴挂件;以束河古镇传统纳西建筑为原型,设计纳西古建筑模型摆件;以束河古镇重要历史场景、生活景象为素材,利用刺绣工艺创作挂画、折扇、香囊等。

第四,根据体验经济原理,以参与体验的形式开发束河古镇体验性文创产品,通过价值链提高附加值。在工匠街开设民俗工艺体验工坊,提供消费者参与体验制作的机会,开发“在束河创作”“自由 style”等主题游戏产品;以传统民居建筑、当地居民以及其生产生活方式为核心要素,开发“当一天纳西人”“茶马古道上的一天”“在束河晒太阳”等体验性文创产品。

第五,发展夜间经济,挖掘夜间消费潜力,提升民俗文化资源的多元价值。如打造露天舞台秀、文化水秀、民俗表演和少数民族文艺演出,举办篝火晚会、火把节等节庆;创新开发可食可娱的纳西烤鱼、火烤粑粑等夜宴产品;以青龙河、九鼎河、疏河三河水系为空间载体,结合花腰带、褶围腰、披毡等服饰民俗和铜器、刺绣、铁器、漆绘等民俗工艺,打造民俗一条街等。

四、结语

开发和保护一直是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经典论题,创意开发是近年来迅速发展的民俗文化资源利

用新方向。在创意经济时代和文化强国大背景下,探讨古镇民俗文化资源创意开发模式对于民俗文化传承、资源潜在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具有积极作用,对于束河古镇走出丽江古城的“明星效应”、践行差异化发展路径具有重要意义。基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模式分析,各地可根据自身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结果和相对优势,参考“空间创意”“异业混搭”“束河文创”三种模式,探索符合自身实际且独具特色的创意开发模式。在实践中,应采取相应措施留住原住民,注意激发文化传承人、社区精英的活力,吸引各类创意人才入驻,集聚人才力量和智慧。完善相关服务设施,提供便利舒适的生活空间,塑造包容、开放的氛围,吸引企业投资获得创意开发的资金支持,不断积累创意资本。同时,应处理好文化保护和利用的关系,坚持“保护第一”的理念。关于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和创意开发模式的研究,在创意知识产权保护、创意产品开发与风险防控、创意功能衍生等方面还值得进一步探究,这需要旅游学、创意学、市场学、经济学多学科学者共同关注,为民俗文化资源的创意开发提供智力支持。

参考文献:

- [1] 杨国清. 丽江文化旅游崛起解读[M]. 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1:296.
- [2] 黄越,赵振斌. 旅游社区居民感知景观变化及空间结构:以丽江市束河古镇为例[J]. 自然资源学报,2018,33(6):1029-1042.
- [3] 任珮瑶,赵振斌,赵青阳,等. 基于游客留言内容分析的古镇旅游体验研究:以丽江束河古镇为例[J]. 浙江大学学报(理学版),2017,44(3):355-261.
- [4] 陶立璠. 民俗学概论[M]. 北京: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7.
- [5] 韩晓时. 民俗资源与创意产业[M]. 辽宁省社会科学普及及系列丛书8:辽海讲坛·第六辑,2010:62.
- [6] 金丽. 辽宁省满族民俗资源的特征及价值研究[J]. 沈阳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36(5):10-11.
- [7] 黄旭涛. 民俗资源的旅游开发与区域文化产业的发展:以山西为个案[J]. 生产力研究,2008,(17):114-116.
- [8] 杨正权. 传承发展彝族建筑文化:彝族建筑文化[M]. 昆明:云南民族出版社,2008:1.
- [9] 李庆雷,廖春花. 旅游资源开发理论研究[M]. 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208-211,235-236.
- [10] 方彦富,陈蕪. 两岸文化创意产业的发展与融合[M]. 福州:海风出版社,2014:98-102,344.

(责任编辑 谢春红)

Exploration of Folk Culture Resources Identification and Creative Development Model in Shuhe Ancient Town

YANG Hongfei, LI Qinglei, XIA Menglei

(a. College of Tourism and Geography Science;

b. Yunnan Tourism Industry Research Institute; Yunnan Normal University, Kunming, Yunan 650500,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the theory of creative economy and experience economy, the “soul” of Shuhe Ancient Town is fully tapped, and a unique breakthrough point is put forward to propose the creative development model of Shuhe Ancient Town folk resour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folk resources of Shuhe Ancient Town have high taste in terms of cultural value, social value, tourism value and artistic value, and have strong competitiveness in architectural culture and folklore craftsmanship. “Cooperation” and “Shuhe Cultural and Creative” characteristic model can effectively play the value of the folklore resources of Shuhe Ancient Town, enhance social and economic benefits, and have great significance for promoting the activation and utilization of folk culture and the regional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and upgrading.

Key words: folk culture resources; value identification; creative develop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Shuhe Ancient Town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蕾

(中共洛阳市委党校 法学与科技文化教研部,河南 洛阳 471003)

摘要:随着老龄化社会到来,养老问题成了突出的民生问题。通过机构层面、社区层面、居家层面的有机结合,医疗资源与养老资源效能得以充分发挥,但传统养老观念落后、机构转型审批受限、违规套用医保政策、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滞后、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较低、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等问题成为阻碍医养结合的突出症结。针对上述难题,提出了可行性的建议对策,为进一步深化医养结合提供了借鉴参考。

关键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医疗卫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6

中图分类号:D66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89-05

养老服务制度是我国重要的社会服务制度,它与每一位公民及其家庭的切身利益息息相关。随着生活质量和医疗水平不断提升,人口老龄化是我国在加快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促进人的全面发展过程中一个必须直面的关键问题。

一、医养结合的实现方式

改革开放40多年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卫生与健康事业发展取得了长足进步,城乡居民的健康水平持续提高。2018年我国居民人均寿命创下77岁的新高。据国家统计局2019年1月21日公布的数据显示,截至2018年年底,60周岁及以上人口达24949万人,占总人口的17.9%;其中,65周岁及以上人口16658万人,占总人口的11.9%。按国际进入老龄化社会的标准:65周岁及以上人口比率达到7%,社会即步入“老龄化”,超过14%,即步入“老龄社会”。因此,我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养老问题已经成为近年来全社会普遍关心的问题。根据中央和国家部署,“医养结合”的新型养老模式正悄然走进我们的生活。

何谓“医养结合”?医,是指医疗诊治、健康咨询、健康检查、临终关怀等医疗服务;养,是指生活照料、精神心理、文化活动等养老服务。医养结合是指集医疗、康复、养生、养老为一体,将医疗资源与养老

资源合二为一,以实现双向资源利用最大化,使老年人在养老的同时也能得到充分的医疗保障。其特点可归纳为“有病治病、无病疗养”,兼具医疗卫生资质和养老服务能力的医疗机构或养老机构因此被并称为“医养结合机构”。从目前实践来看,医养结合的实现方式可以概括为以下几种:

第一,机构层面的医养结合,即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双向结合,形成医养结合联合体。它主要有四种实现途径:一是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某些医疗机构在市场竞争中生存困难亟待转型,往往将原先的单纯的医疗机构转型为融医疗与养老为一体的医养结合机构。二是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不少养老机构在提供养老服务时因为医疗资源缺乏,无法及时为老年病人提供医疗救助,导致养老服务质量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因此需要增加护理型机构和床位比重、并入部分医疗资源以提升养老服务质量。三是医疗机构和养老结合机构通过签订协议建立医养联合体,优先为入住老人提供医疗服务。例如,2017年7月3日,洛阳某三甲医院与涧西区、洛龙区、伊川县养老服务机构签订了医养结合模式的“远程诊疗”服务试点,为基层养老机构免费提供医疗保健、咨询、健康指导、就诊等服务,让洛阳老百姓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大医院专家的优质医疗

收稿日期:2020-09-12

作者简介:王蕾(1980—),女,河南孟津人,法学硕士,中共洛阳市委党校法学与科技文化教研部讲师,研究方向为法学。

服务。四是建立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是集医疗、预防、保健、康复、健康为一体,能够为老年人提供治疗期住院、康复期护理、稳定期照料以及安宁疗护一体化的健康和养老服务。洛阳市积极推进各县(市)老年病医院组建工作,鼓励二级以上医疗机构开设专业特色的老年病科,率先成立了河南省首个安宁疗护专家委员会,组建了全国省辖市第一个市级安宁疗护中心,并积极对全市县(市)拟成立安宁疗护病区的医疗机构进行评审授牌。

第二,社区层面的医养结合,即通过社区养老服务中心与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卫生服务站)、农村老年幸福院与乡镇卫生服务站(村部卫生室)签订医养结合协议等方式,实现医疗资源在城乡基层养老的广覆盖、深融合。在今年抗击疫情防控阻击战中,洛阳市从规划到落实再到正式上线,仅用8个小时,迅速建立起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专用“空中医院”远程诊疗系统。截至2020年5月,洛阳市已初步建立起“互联网+远程医疗”的医疗服务模式,共有2家市级医院、132家县(市、区)医院和乡镇卫生院、121个村卫生室等基层医疗机构用视频问诊,为广大老人提供就近的就医便利服务。

第三,居家层面的医养结合,即通过“互联网+”信息服务平台、家庭医生签约服务等方式,使居家养老享受高效便捷的医疗服务。就目前实践来看,主要通过两种方式予以实现:一是智慧养老服务建设。通过建设运营12349居家养老信息平台,实现“一个网站、五个子平台”的架构,为老年人相继开通名医问诊、生活帮助、紧急救助等服务。二是家庭医生签约服务。充分利用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的签约服务经费,实施城乡居民“1+1+1”组合式签约服务模式,即居民和辖区乡镇卫生院或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签约,同时可自愿就近选择一家二级医院和一家三级医院签约,为65岁以上老年人建立相对稳定的契约服务关系。

二、“医养结合”存在的突出难题

为了推进医养结合,2015年11月,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推进医疗卫生与养老服务相结合指导意见的通知》。随着十九大关于医养结合的部署推动,各地也掀起了探索“医养结合”的高潮,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仍存在着诸多亟待解决的突出矛盾和问题。

(一)受传统养老观念的影响

长期以来,传统型家庭养老模式一直占据主要位置,其主要原因在于:第一,中国传统文化自古提

倡孝道。传统文化认为“百善孝为先”,因此值得被人们称颂的孝道一定是子女们亲力亲为地赡养,“二十四孝故事”也因此家喻户晓;同时,子女们也认为自己能亲自照顾老人才是“知恩图报”“反哺报恩”尽孝道。第二,长期的家庭生活和老年人的心理状态决定了老年人更习惯于居家养老。不少老年人已经习惯了在年轻时与子女们共同生活的相处模式,而且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会越发感觉内心孤独,更需要子女们的陪伴。他们会认为:子孙满堂膝下坐,才是乐享天伦年。只要家中有子,就不应该去养老院,在家养老既可照料孙辈又安心自在。第三,现有的养老机构良莠不齐,难以全面满足老年人的养老需求。不可否认,随着养老市场的需求增多,近年来养老产业作为朝阳产业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但不少养老机构存在养老服务设施不健全、护工人员素质不太高、医疗配套服务不周到等问题,再加之有些媒体对养老机构状态进行恶意炒作,导致很多老年人和子女“谈养老院色变”。第四,养老机构费用较高,不少老人不具备经济负担能力。有些生活设施、护理服务、周边环境等较好的养老机构的价位比老年人的平均退休工资要高得多,子女们的经济负担能力也有限,面对昂贵的养老开支,大多数老人还是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

(二)受医养机构转型审批制约

医疗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在现实操作中存在一定的审批障碍,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消防审批障碍。要求转型的医疗机构一般是患者人数较少、医疗资源相对富余的医院。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是为了盘活医疗资源、补充养老资源,因此是在依托于既有的基础设施条件下尽量符合转型要求。按照现行消防技术要求,开办多年的医疗机构在转型时需要提高消防标准,以符合养老机构标准。但因基础设施建设改造受限,消防整改难度很大,不少医疗机构往往因为消防设施不达标而放弃转型。二是土地性质转变障碍。医院开展医养结合工作占用的是医疗用地,而国家明确规定养老服务用地实行划拨政策。由于非营利性质的确认、养老服务设施强制性规划等原因,致使划拨供地难以实施,因此部分医疗机构在转型过程中不仅面临原有空间狭小、拓展业务受限的困境,还面临占用原医疗用地进行养老服务时土地性质难以明确的尴尬。

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也存在一定难度。养老机构在转型过程中同样需要进行消防整改,有时虽然消防整改达标,但规划、土地、建设、环评等手续不全,也无法办理消防验收和机构设立许

可登记,从一定程度上阻碍了转型。

(三) 违规套用医保政策行为时有发生

医养结合工作的服务对象大部分为失能老人,现有的医保政策不足以支撑其养老需求,同时监管部门在医保资金使用检查中,有时还会出现一些违法违规使用医保资金的行为。例如把“养老床位”变相改为“医疗床位”,套用医保资金支付养老床位费;将入住老人一般的康复护理服务变相改为“医疗诊治”服务,用医保基金报销费用;用医保名义给老人开“营养液”“中医调理”等保健处方,变相套取医保资金等问题。这些行为不仅严重影响了医疗保险资金的正常使用,还侵蚀了医疗保险基金制度,更加损害了其他参保人员的权益,且人为地增加了养老机构和医疗机构的合作难度。现有的涉及医养结合方面的保险政策除了医疗保险外尚未有其他保险政策予以支撑,一旦遇到突发情况,医养结合将面临严峻考验。

(四) 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滞后

目前我国在建立完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方面虽取得了一些成绩,但只是迈出了第一步,在政府投入、政策支持、医养界定、协调配合等方面仍有诸多不足。例如,国内三线以下城市大部分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都是私立性质的,与一线城市多设立公立性质的社区服务中心相比差距甚远,导致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建设未能跟上现代化城市发展步伐。广大农村地区的医养结合工作仍然是一个“短板”,特别是为失能老年人提供集中或者居家的健康养老服务数量还不够多、质量还不够好,相应的老年医疗康复机构建设迟缓、医养联合体签约服务滞后、家庭医生签约服务欠账等问题依然普遍存在,致使农村居民养老医疗服务不能满足实际需要,养老欠账较多。

(五) 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较低

推进医养结合的难点之一就是如何促进基层医养资源充分结合。在医疗资源方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服务站)和乡镇卫生服务站(村部卫生室)医疗条件欠佳、医疗水平不高,导致老年人对基层医护水平不信任,有条件的患病老人宁可奔波于大医院,也不愿选择当地小诊所,这无疑增加了基层医养结合的推进难度。在养老资源方面,医养结合机构的护理人员工作环境差、劳动强度大、工资待遇低、社会认可度不高,导致养老服务机构招聘人员困难、留住人员更难。虽然2017年国家取消了养老护理员职业资格证书,但并未出台规范养老从业人员的相关规定。如果放宽养老护理员职业标准,只求数量

不重质量,势必导致养老护理人员素质参差不齐、养老机构管理混乱等问题出现。

(六) 相关部门信息共享机制不健全

医养结合工作涉及人社、卫生、民政等多个部门,各个部门在履职过程中虽各司其职,但缺少硬性的互相通报制度,时常会出现交流不及时、信息不对称等问题,导致部分统计体系、统计口径、统计数据不一,相关工作推动不力。特别是国家自2017年取消了对养老机构内设医疗机构的行政审批手续后,相关部门的信息互通工作更显得滞后。人社部门在支出医保费用、进行医保报销管理过程中不能如实掌握卫生部门、民政部门关于医疗、养老机构设置及运行情况,导致医养结合机构账目管理混乱、医养人员混淆等问题时有发生,影响了医养结合的发展和政府的公信力。

三、推进“医养结合”的对策建议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要求,不断完善老年人家庭赡养和扶养、社会救助、社会福利、社会优待、宜居环境、社会参与等政策,增强政策制度的针对性、协调性、系统性。要完善老年人权益保障法和配套政策法规,统筹好生育、就业、退休、养老等政策。要完善养老和医疗保险制度,落实支持养老服务业发展、促进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融合发展的政策措施。

要进一步落实党中央、国务院关于推进“医养结合”的重大部署,促进我国养老事业、养老产业持续健康发展,我们需要针对“医养结合”中存在的部分突出问题对症下药,通过多方努力提升社会治理水平,切实增强老年人的幸福感和获得感。

(一) 更新传统家庭养老观念,倡导理性养老观

随着社会不断发展,传统型家庭养老模式已显得力不从心:一是4:2:1的家庭结构增加了年轻人的工作生活压力。现在年轻人工作压力大、生活节奏快,一方面要努力工作赚钱,另一方面还要照顾老人和孩子,有限的精力致使他们无法承担传统型家庭养老的重任。二是不少老年人也因缺少子女陪伴而更乐于抱团养老。现在老年人已经习惯于自发地组群、组团,将兴趣相投的老年朋友聚集起来,定期或不定期地从事一些集体活动,并且在其中的老年人需要照顾时,轮流照料。目前,我国有些地方已经通过在社区开设“时间银行”的方式在老年人之间形成互相照顾的互助机制。三是养老机构的设施条件在不断完善。随着老龄化社会的到来,国家也愈发重视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发展,相继出台了一系列鼓励、扶持养老事业、养老产业的优惠政策,这对于进一步完善养老机构具有积极的推动作用。

四是人民收入日益增长,社会保障水平日益提升。进入新时代,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显著提升,党和国家对民生的关注力度逐渐增强,居民收入水平和社会保障能力使老年人更有经济能力选择机构养老。因此,传统养老观念需要与时俱进,在不违背孝道的前提下要提倡以新的方式养老,以符合新时代要求。

因此,各级民政部门、基层群众自治组织(居委会、村委会)等相关部门要充分发挥作用,采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倡导新时代家风家训建设,在“尊重老人意愿”的前提下树立理性养老观,加大“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宣传力度,消除“非传统养老即为不孝”的理念,既能切实保证老人安享晚年,又不无限度地增加子女负担。同时,要特别注意正确处理提倡“子女尽孝”与发展“医养结合”的关系,不能以机构养老完全取代子女尽孝。

(二)加大政策支持,破解转型审批难题

建立养老机构和建立医疗机构的审批条件及程序不同。要破解两者转化壁垒,至少需要从以下方面着手,解决转型中的突出难题:一是要简化消防审批手续。对消防验收已经合格的医疗机构,在转型过程中可考虑同时认定为消防合格,以破除转型的消防审批障碍。研究出台《养老机构消防安全管理办法》,细化消防安全手续办理程序,探索建筑物许可与消防设施许可脱钩的审验收办法,对不符合规定的养老机构依法进行取缔,确保养老机构安全、合法运营。二是要破除土地性质转变障碍。各地可结合本地实际出台适合“医养结合”特点的土地使用政策,鼓励有转型需求的医院拓展其发展空间、提升基础设施条件发展养老事业,以消除土地使用性质不一的尴尬。此外,可探索建立“政府无偿提供用房+专业社会组织(医院、养老机构)提供服务”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建设运维模式,解决“医养结合”用地难题。三是在破解养老机构转型为医养结合机构难题的过程中,可在尚未达到成立医疗机构等级资质的情况下,采用“养老机构内设医疗门诊”的方式实现医养结合。具体做法:内设的医疗门诊仅针对老年人的常见小病给予及时治疗,为住养老人提供急性医疗、康复护理、健康管理等服务。一旦老人出现重大疾病,需及时转入附近医疗水平更高的医院就诊。这种“小病不出院,大病需转院”的医养结合模式,既解决了养老机构转型难题,又确保了“养中有医”。

(三)探索建立护理保险制度,化解医保管理风险

各地可加大探索在“五险”之外探索建立老年人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力度。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

办公厅发布的〔2016〕80号文《关于开展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指导意见》已经确定了15个试点城市,并开始了先期探索。根据2019年国务院政府工作报告部署要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对此其他城市也需要在借鉴试点城市经验的基础上探索创新,开拓新的渠道筹集护理保险资金。除了要求一定年龄以上的公民按照一定比例强制缴纳保险费、所在单位配套的常规渠道以外,还可考虑其他筹集渠道:一是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设定比例划转。二是通过财政拨款、福彩公益金资助、提取残疾人保障金方式划转。三是出台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单位、慈善机构等社会团体和个人进行捐助。

同时,还需要建立与之配套的照护需求评估制度,助推护理保险落地。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是实施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配套制度,是搞好养老基本公共服务的“守门人”。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是将原民政、卫生、医保等三套针对老年人照护需求的评估标准进行整合,形成一套统一的评估标准和照护等级,通过第三方评估机构对老年人身体状况进行评估后,根据评估结果为其提供相应的照护服务。老年照护统一需求评估制度包括需求评估标准、需求评估流程、评估信息管理系统、第三方评估机构准入标准等内容。

(四)加大财政投入,完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

各级政府部门要加大对养老事业的资金扶持力度、优化医养设施建设、强化医养资源培训、完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在打赢“脱贫攻坚战”的决胜期,对扶贫资金的使用要根据实际情况,对医疗资源相对匮乏的贫困地区要有针对性地倾斜于农村医疗康复机构建设,提升农村医疗人员待遇,以促进医养联合体和家庭医生广泛签约,这有利于确保防止“因病致贫”的贫困地区再次“返贫”。为了打通“最后一公里”医疗保障服务,从根本上缓解农村地区老年医疗资源紧张状况,各地区要统筹加强城乡医养结合服务体系建设,统筹乡镇卫生院和敬老院、村卫生室和农村幸福院的资源,统一规划、毗邻建设,融合医养结合服务,有条件的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可设置康复、护理病床和养老床位,逐步形成以市老年病医院及老年疾病防治中心为龙头,以县(市、区)老年病医院、康复医院、乡(镇、社区)卫生计生服务机构老年医疗康复科室为架构,以医疗机构建立有专业特色老年病科为脉络,以大型健康养老社区为补充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通过搭建深入基层的老年医疗卫生看护服务网络,解决基层

尤其是农村地区的老年医疗资源匮乏问题。

(五) 开展护理培训,提升基层医养护理人员水平

2020年1月,国家卫健委、民政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联合印发了《医养结合机构服务指南(试行)》,明确了医养结合机构的基本要求、服务内容、服务流程等内容,为进一步提升基层医养护理水平指明了方向。但“医养结合”能否推得开、做得好,离不开基层医养护理人员的服务质量和服务水平。因此,各地要出台各项相关政策,强化基层医养护理人员的护理能力:一是加强基层医养护理人员的交流互动。可采取定期坐诊、交流指导、远程网络服务等方式,鼓励优质医疗资源对基层帮扶。二是人社、卫生、民政等部门可依托高职院校资源,建立医养结合护理培训平台,针对医养结合工作中出现的问题,开展医养护理相关人员的初任、继续教育培训。三是积极推动地方医养服务标准化建设,制定地方医养服务岗位专业标准和操作规范,对老年人护理服务、护理人员配置、护理管理体系等内容进行明确分类,对每项具体要求内容提出详细的定性和定量操作指标。用服务质量提升促进医养结合发展,以医养结合发展倒逼服务质量提升。

(六) 强化信息共享,建立相关部门联席会议制度

推进“医养结合”涉及多部门联动。在信息时代,强化信息共享机制尤为重要。要建立信息共享系统,确保“医”“养”信息准确切换并及时更新。但在信息共享机制不完善的地区,可建立医养结合联席会议制度,强化部门间配合协作,合力推进健康养老工作扎实开展。医养结合联席会议的主要职责是在地方政府领导下,及时研究解决医养结合推

进过程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扎实推进地方医养结合工作有序开展,满足群众多层次、多样化的健康养老服务需求。医养结合联席会议可由政府牵头,主要分管领导担任召集人,分管副秘书长和卫健委主要负责人为副召集人,人社、民政、卫生健康、规划、财政、土地、工信等相关部门主要负责人为联席会议成员,通过定期召开联席会议的形式互通有无,以传统方式实现信息共享。建立联席会议制度时,必须要明确科学编制医养结合机构设置规划和空间布局专项规划,合理布局医疗卫生和养老服务资源,统筹协调解决“医养结合”发展中出现的问题,以“干事创业敢担当”的态度推动“医养结合”事业发展,提高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实现社会发展成果人人共享。

参考文献:

- [1] 李长远,张建国.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的典型模式及优化策略[J].求实,2017(7):68.
- [2] 北京师范大学中国公益研究院.中国医养结合政策发展历程[J].社会福利,2016(1):9.
- [3] 张旭,石丹妮.“医养结合”开拓养老新模式[J].人民论坛,2016(11):80.
- [4] 马俊.“互联网+”背景下养老产业发展的机遇与挑战[J].产业经济,2017(3):50.
- [5] 付诚,韩佳均.我国养老服务产业化发展的现实困境与改进策略[J].经济纵横,2015(12):26.
- [6] 本书编写组.《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辅导读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296-303.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oughts on “Promoting the Inter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

WANG Lei

(Department of Teaching & Research on Law, Party School of Luoyang Committee of CPC, Luoyang, Henan 471003,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arrival of aging society, the pension problem has become a prominent livelihood issues. However, problems such as backward traditional pension concept, limited approval of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illegal application of medical insurance policy, lagging construction of elderly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service network, low level of grass-roots medical and nursing staff, and imperfect information sharing mechanism of relevant departments have become the prominent sticking points hindering the integration of medical and health care. In view of the above problem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feasible suggestions, which provides reference for further deepening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and nursing.

Key words: intergr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 pension model; medical and health work

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王 俊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土木工程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基于对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理解和分享课程建设成功案例,围绕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以课程思政为引领,从课程建设规划、专项经费筹措、软硬件条件建设、课程团队打造、课程带头人选拔、老教师作用发挥、应用型本科教材开发、课程建设工作宣传等九方面施策,探讨如何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

关键词: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建设;课程思政;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7

中图分类号:642.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094-06

2019年11月7日,教育部党组发布《关于教育系统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从坚持和完善党对教育工作全面领导的制度体系、完善立德树人体制机制、构建服务全民终身学习的教育体系、提高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抓治理的能力、提升教育管理效能、完善教育保障制度等六个方面^[1],提出推进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具体要求。谋划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行动路径和工作举措,是教育主管部门和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的重要创新探索方向。

一、应用型本科院校贯彻落实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提升教育管理效能的主要内涵

(一)提升教育质量管理是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发展的关键

2014年3月,教育部提出全国1200多所普通本科高等院校中的600多所逐步向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转变,并强调新升本院校全部举办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2],这其实代表的是高等职业教育内涵创新发展的全新趋势所在。由于普通本科高等教育向

应用技术型本科教育转变一个较长的探索实践过程,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对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重视程度也远不及本科教育的“双一流计划”和高职教育“双高计划”,针对应用型本科教育启动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少之又少。一方面,除高等教育相对发达省份在“教育质量工程”建设项目下达时,单列了应用型本科教育类型,大多数省份还是针对所有本科院校,采用“一纸文件”“一套标准”的“一锅烩”的方式部署“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在分配项目名额时,自然是向办学历史长和办学能力强的本科院校倾斜,应用型本科院校和刚升本的院校只能拿到“少得可怜”的项目名额和建设经费;另一方面,许多应用型本科院校还没有认识到国家要求举办应用型本科教育的针对性和重要性,“不切实际”地幻想将自身建设成为“高大上”的传统本科院校,缺乏对应用型本科教育转型与教学改革的深入研究,有意或无意之中也模糊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如果这种状况持续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第一,学校将因缺乏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教育教学改革成果支撑,缺乏应用本科特色,在教学评估难以获得较好的成绩,导致家长和行业的都不认可,难以获得高质量发展;第二,获批立项的省级以上纵向课题

收稿日期:2020-10-17

作者简介:王俊(1967—),男,湖北孝感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土木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应用型人才培养与研究。

及资助经费将“少得可怜”，许多教师会失去主持或参与省级教学项目研究的历练机会以及获得奖励并晋升高级职称的机会，长此以往，教师参与教研的积极性逐步丧失，师资团队的教育教学能力得不到提升，更严重是教师的从业信心丧失，提升办学能力的活力难以激发；第三，对学生而言，接受的仍是传统教育理念下的本科教育，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没有按照应用型本科要求的标准落实，参加工作后可能面临“专业理论不够扎实，实践能力难以满足一线岗位需求”的尴尬局面。

(二)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实践之思

《通知》中提及“提升教育管理效能、完善教育保障制度”，具体到应用型本科教育可以表述为“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如何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其抓手落实在哪里呢？应用型本科教育人才培养的主要特点就是重视学生专业实践能力的培养，实现学生的专业实践能力培养与学生上岗时生产一线所必需的生产能力和技术转化、推广、创新能力保持一致，以此来区别于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目标所要求的研发能力。

以笔者2019年主持智能建造本科专业申报材料编撰工作为例。针对此项工作的要求，笔者所带领的团队在对标教育部颁发的《本科专业类教学质量国家标准》制定人才培养方案的同时，参阅了同济大学、北方工业大学等国内同类型优秀高校的智能建造专业人才培养方案，对比分析其课程设置可知，由于各校人才培养目标的不同，构建专业课程体系和教学环节时，专业课程名称和教学环节的名称虽保持一致，但定义课程的内涵时和教学环节的培养目标差别很大。如果盲目对标同济大学等研究型大学人才培养标准去培养本校的应用型本科学生，结果可想而知：第一，教材内容广度和深度不适合应用型本科院校学情，学生学习非常吃力，造成学生厌学，不能扎实完成学业；第二，缺乏对学生满足行业企业一线所需职业精神和职业道德及生产技术实践能力的培养和训练，学生就业后“高不成，低不就”，行业企业不欢迎这样的学生。若不能设计满足人才培养目标的课程体系，就难以实现应用型本科院校高质量的就业，也圆不了“办人民满意教育”的初心。

由上可知，落实应用型本科教育的人才培养目标的有效路径就是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课程建设措施和制度建设，全面实施包括课程建设整体规划、建设经费的筹措、师资的内培外引，校政

校企及校校合作的教材或课程资源建设、课程建设所需硬件条件建设、课程建设的管理与服务能力的建设等等，达到从“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等方面真正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目标。

二、应用型本科教育加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地方高校的应用转型是对原有发展路径的一种突破和变迁，然而，受既有教育体系中“课程建设惯性思维的影响，在课程理念、课程体系、实施路径和评价机制等方面，依然存在不同程度的路径依赖，制约着应用型本科高校的转型发展”^[2]。为此，必须从广义课程的理解出发，对应用型本科的课程建设实施行之有效的改革创新。广义课程是实现人才培养目标时，教师依据教学目的、选择教学内容、组织教学进程的总和，它包括学校老师所教授的各门学科和有目的、有计划的教育活动。狭义的课程是指某一门学科。在广义课程的概念之下，大学里的所有人员均在课程之中^[3]，从这个意义上说，课程建设是学校“牵一发而动全身”，需要多位教师和多部门协同的工作，也势必关联至学校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建设。

(一)加强课程建设的重要性分析

第一，课程建设是实现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重要抓手。2019年3月18日，习近平在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上指出，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4]。

第二，课程建设是落实人才培养目标的根本，是体现人才培养标准时所拟定最小的专业知识和专业能力体系的建设单元。

第三，课程建设是构建教学团队的依据，也是教学团队的工作任务。许多院校依据承担课程的不同，划分组建基层教学组织(团队)的依据(如土力学教研室、商务英语教学团队等等)。

第四，课程建设实施和课程内涵构建是考核和评价学科建设质量和人才培养特色的最基本观测点。

第五，课程建设是引进新教师评价其未来承担教学工作的评价指标。

第六，课程建设必须满足新时代“强化现代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的要求。这是《教育部关于一流本科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教高〔2019〕8号)对新一轮“本科课程建设”的具体要求。

(二)课程建设代表性案例分析及其经验呈现

以笔者曾所在团队的课程建设为例。1991年前后，该团队及所在教研室主要承担学校职业核心

课程《水力学》的教学任务。从师资结构讲,该教研室有8位教师,分别毕业于清华大学、天津大学、武汉水利水电学院(后合并入武汉大学)等校,具有一定的科研和教学能力,但8位教师中有7位教师年龄均较大,虽具有丰富的教学经验,但在教学精力和时间等方面均存在一定不足。根据教研室的实际情况,教学团队克服办公电脑等设备没有普及或严重不足的缺陷,着重发挥既有的教学资源优势,包括科学有效利用教研室团队长期研发能满足不同专业需要的纸质试题库卡片和实验设备完全对应课程实验指导手册、实验报告,合理利用能满足课程教学和课程综合训练及能承接生产研发项目的大型试验场馆和设备完善的实验室。几十年来,教研室注重高质量开展课程建设的优良传统一直保持持续到今天,因此取得了骄人的成绩,在课程建设方面逐渐处于全国同类学校的领先水平,先后主编多部全国同类学校选用的课程教材、习题集、实验指导书和学生实验报告。2003年以来,该教研室有8位教师晋升教授,主持完成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3项,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1项,完成几十项国内国际纵向横向科技服务项目,团队中有1人次担任过校级领导,7人次担任过学校中层领导,2名教师被其他院校作为高层次人才引进,1名教师获“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中原名师”“河南省模范教师”、2名教师获“河南省高层次人才”等学术或荣誉称号。

2003年至2015年的12年间,教育部围绕课程建设3次启动“教学质量工程”建设项目,该团队主持的课程建设项目均获批立项,成果如下:

第一,2003年,教育部在《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中提出实施“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和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将国家精品课程建设作为先期启动的高等学校教学质量工程项目之一。该团队《水力学》课程获评为河南省第一门国家级精品课程,也是当年河南省唯一获批的国家级精品课程^[5]。正是这门课程的示范作用,该校相继有13门课程建设成果获批国家级精品课程,为该校后期申报多项国家级专项建设资金支持项目奠定坚实基础。

第二,2011年,依据《教育部财政部关于“十二五”期间实施“高等学校本科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的意见》《教育部关于国家精品开放课程建设的实施意见》等文件要求,教育部启动教师教育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计划。2013年初,笔者主持建设的《水力学》课程入选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建设计划,2013年10月,课程完成建设任务。通过近三年建设应用推广,2016年6月,该课程被认

定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6]。建成后的该课程资源知识体系比较完整,依托“爱课程”网站平台,作为应用型人才培养的学习和参考资料,长期开放供教师备课和学生使用,取得了较好的教学示范引领作用。

第三,2015年,按照《教育部关于加强高等学校在线开放课程建设应用与管理的意见》等文件的统一部署,教育主管部门在高等院校启动了本世纪第三轮围绕“课程建设”为核心的“教学质量工程项目”,2016年10月,该团队主持建设的《水力分析与计算》在线开放课程,经专家评议及综合评定,2017年成功入围当年490门国家精品在线开放课程之一。课程负责人王勤香教授先后获得“河南省教学名师”“河南省中原名师”“河南省模范教师”“河南省高层次人才”“全国水利职教名师”等学术荣誉称号,是从人才培养工作基层和课程建设一线成长起来的劳动模范和专家名师,成长为值得广大基层教师学习的典范。

三、加强课程建设推进应用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及能力建设的创新思路

每一个应用型本科专业的课程体系中有十几门专业课程,每一门课都需要实施规范必要的课程建设。面对如此繁重的课程建设任务,要重点实施以下九项举措:

第一,定好“调子”。就是坚持习近平总书记“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7]的指导思想,在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的同时,坚定地落实总书记2018年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要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在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上下功夫,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8]的重要讲话精神,统领课程思政建设。在课程团队组建时,将团队负责人的政治素质放在首位,鼓励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强的教师积极投身课程建设;在架构课程知识体系时,突出立德树人,除专业技术技能学习必需的知识体系外,要将推动产业发展的优秀文化纳入课程,通过产教融合将产业行业企业专家及能工巧匠的优秀事迹进教材;在教学组织时,及时将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和最新凝练的优秀产业行业文化引进课堂。以“黄河文化”为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足迹遍及黄河流域的6个省区,实地考察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发展的同时,对黄河文化予以高度评价,郑州大学和河北水利水电大学等省内多所高校积极响应,纷纷成立研究机构、组织论坛、部署一批研究课题,这就为古老的优秀的黄河文化和新时代

“黄河治理文化”进教材、进课堂提供了良机,让黄河岁岁安澜、人民治黄 70 年的丰功伟绩入师生脑、入师生心、入师生行,引导师生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厚植师生爱国主义情怀,把爱国情、强国志、报国行自觉融入课程建设和具体实施的全过程,以“治教”和“治学”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第二,开好“方子”。即做好校级的课程建设规划。以某外省高校为例:该校 2002 年升本,2003 年该校以教育部评审国家级精品课程为契机,进行本科专业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2005 年正式启动。当时学校有 20 个本科专业,每个专业按 15 门专业课统计,共 300 门专业课。考虑相近学科专业的所开设某些专业课相同或相近,全校按 180 门需建设专业课统计,但当时该师资力量数量不够。如何解决课程建设能力不足的关键问题?针对此,该校进行了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2005 年该校首批实施 30 门专业课的课程建设,五年完成 180 门课程建设任务。在实践中总结而知,顶层设计的三个原则分别是:①专业全覆盖;②共享专业多的课程优先;③师资力量强的课程优先。制订原则的理由:①专业全覆盖:除了彰显公平外,也是要求所有的院系都必须做,要求把最能体现专业特色的课程作为必建课程,以课程建设为抓手开展应用型本科专业建设,全员全方位全过程探索应用型本科人才培养的要求与特色,首批建设共 20 门;②共享专业多专业课程优先:体现受益面广和资源共享,首批建设共建设 5 门;③师资力量强的专业课程优先:可以要求快出成果、出好成果,首批建设共建设 5 门。首批建设的 30 门课程分为校级建设、校级培育和院级建设三个等级。建设的标准参照当时省级教学质量工程的课程建设标准实施,但将校企共建课程标准、共建师资队伍,生产一线案例进课程等内容作为评价课程建设的一级评价指标,这样的一级评价指标的设定,就是敦促团队在课程建设中积极探索和落实应用型人才的培养要求和特色。

在升本后十余年的建设中,该校成功获得多项省级和国家级教学质量工程项目的立项,2019 年底,该校土木工程学院就加快推进博士学位授权点培育学科建设等工作,邀请同济大学、华中科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等 13 所 985、211 大学的教授学者到校指导学科规划和建设。

第三,备好“银子”。学校根据课程建设的顶层设计方案将每年所需建设经费优先列入专项预算,并要求按课程建设进度列支,既保障又敦促课程建设的实施。如果“银子”备足了,就能用资金的使用

进度对在课程建设中“不作为”的课程负责人及院系领导问责。2013 年,笔者所负责的精品资源共享课《水力学》建设任务,财政部下拨 10 万元,团队所在学校按要求配套 10 万元。在 20 万建设经费精确到位的情况下,团队成员苦干三年,全面保障了课程建设的质量,于 2016 年 5 月通过认定为“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

高标准高质量的课程建设是多人和“多工种”协同工作,自然不是某位课程任课教师个人独立承担的,是完全独立于课程授课的另外一项更加复杂的工作任务。考虑物价和人工费上涨,参照其他高校课程建设投入的标准,对于校级课程建设项目,筹措经费 10 万元方能开工建设,并且,建设经费几乎全部都用于支付协同方制作课程视频这一项工作了。其实,对于应用型本科特色的课程建设还需要到行业企业的调研,生产案例转化课程资料等都是需要课程团队付出艰辛的劳动才能实现。所以,备“银子”时,应考虑这些方面支出,这是对付出劳动的尊重,更是对敢于承担课程建设这项繁重工作教师的认可与褒奖。

第四,扎好“场子”。就是要建设好课程建设软硬件支撑条件,能够充分体现对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真正落实,就是提升应用型本科教育管理效能、完善应用型本科教育保障制度。目前,对于高水平的应用型本科教育的课程建设,还没有成功经验可资借鉴,这就意味着需要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持续开展一些具有探索性和开创性的工作,其工作难度和工作强度可想而知。因此,学校如何“提升课程建设管理效能、完善课程建设保障制度”呢?除前面论述的定好“调子”和备好“银子”外,还有几项建议如下:①变“管理监督”为“指导服务”。在行使教学质量相关建设项目管理时,我们面对的许多问题都可能是新问题,我们会常常问自己“我为什么不知道?”“我为什么没有见过?”因为教学质量相关建设项目极少,若实施“应用本科课程建设计划”,几十门课程同时建设,相关管理或教辅部门或许需要安排专门的科室或专人承担课程建设的“管理、指导和服务”工作,为赢得广大教职工的“信任、认可和肯定”,每位参与人员都会自主学习,每个部门都会优化管理制度,寻求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提高课程建设管理效能,努力为课程建设提供保障,这就体现出教职员通过本职工作落实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要求。②加强相关制度建设。实施深度校企合作和产教融合是办好应用型大学的重要举措,建设高水平应用型大学的必由之路。落实高水平、高

质量的应用型本科人才课程建设计划,离不开校企合作,也需要产教融合,学校应抓紧推进相关制度的建设,如:学校实施校企合作与产教融合的相关制度。③加强相关硬件条件的建设。教学任务重,师资力量不足或师资能力不强是学校某些学院所面临的真实状况,为搞好课程建设,建议学校运用校企合作、产教融合或大学生双创项目等方式,将“课程视频录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工厂”引进校园,一方面,“工作室或加工厂”可以作为相关专业师生产教融合的真实环境,更重要的是:承担课程建设的教师从授课讲台或办公室到课程视频录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工厂只需要几分钟的时间,降低了教师的时间成本,当几十门课程同时建设时,校园内建设“课程视频录制和制作工作室或加工厂”将成为必需,减少课程建设团队成员的劳顿,以提高工作效率。

第五,拉好“圈子”。就是要按课程的建设要求组建好课程团队,除了合理的年龄结构、职称结构、学缘结构、学历结构外,建议重点考虑以下因素:①对于相近学科共享的专业课,课程团队的成员的学习或研究方向应对各自的学科进行全覆盖,要熟知不同学科对课程(主要是专业基础课)建设的不同要求;②邀请生产企业的专家和技术加入课程团队,保证生产一线最新且通用的技术等内若及时纳入课程建设;③加大课程团队对行业专家或教学名师的引进力度,提高课程建设质量;④加大课程团队教师校企交流,做到真实岗位锻炼,保障课程内容零距离对接一线规范和新工艺新技术,要通过校际交流,取人之长,提升质量。

第六,选好“柱子”。要营造和鼓励青年教师勇于担当的氛围。“少年强,则中国强”,对于新晋本科院校应该这样表达:“青年强,则学校强”,除内培外引外,要大胆启用青年教师担任课程建设负责人,建议将“双带头人”制度沿用到课程建设负责人的选拔,对政治素质高、专业能力和教学能力可以迅速提高的优秀青年教师委以重任。当然,要让这些青年教师专注在为学校快速和稳步发展的工作中去,对课程建设业绩突出的青年教师,学校应考虑在职称晋升,职位提拔方面予以优先。有许多青年教师成家后,生育两个孩子,还需敬养爹娘,家庭负担比较重。但他们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善于学习、善于积累、工作能力强、业务水平也很高,超额完成学校核定工作量之外的各项工作,学校或部门理应在年终奖分配时应拉开差距褒奖,既遵从“按劳分配”的原则,也彰显对勤恳工作态度的褒扬。从“顶层设计”努力打造“只要在学校勤勤恳恳干出了成绩,也能

让家人过上幸福生活”的忘我奋斗的工作氛围,为更多有能力、实干的青年教师解决后顾之忧,全身心投入工作,踏踏实实为学校工作几十年,“青年强,则校强”就成了历史必然。

第七,当好“梯子”。就是要充分发挥好老教师的传帮带作用。一方面,由于年龄的原因,老教师精力有限,抗疲劳的能力已赶不上青年教师,但在教育方法的运用、教材内容的处理、课堂节奏的把握、师生就专业问题的沟通技巧及对师风师德的坚守等方面仍然是青年教师的榜样。另一方面,当所建设的课程参与省级或国家级评审时,对职称结构和课程之外的成果也有要求,这也是老教师的优势。从坚守职业操守的角度要求,老教师也应该要求自己做好“传帮带”,为课程团队的建设当好“人梯”。

第八,写好“本子”。就是要编写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材或讲义,课程建设的成果之一就是能够编写好的教材或讲义。这些年,为土木工程应用型本科教学选择教材很作难,简单地概括为三种:①就高法,即选择像清华大学、同济大学、东南大学等一流高校组织编写和使用的本科教材,优点是内容更新及时、在高等院校有一定权威性。②试选法,就是不知道那本教材合适,必须通过每学期试选不同的教材用,最后看那本教材合适。③其他法,不是利用上面两种方法选用教材,这里均统称“其他法”。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中有这样论述:“凡是现实的东西都是合乎理性的”^[8],意思是凡是合乎理性的东西都是现实的,这是客观唯心主义的理论,我们通常表达:存在即合理。之所以存在这样选择应用型本科教材的方法,客观原因就是现实中还没有适合该专业应用型本科的教材,或者说没有被应用本科院校公认的好教材。编写满足应用型人才培养的课程教材已成为当务之急,也是建设高水平高质量的应用型本科课程所依据的蓝本。

第九,做好“集子”。就是要加强对课程建设等教学质量工作的宣传,既体现了学校党委和学校行政对该项工作的有力领导,也是向社会各界展示学校积极探索和努力推进应用型人才培养工作的开展和深入。仍以笔者所在教学团队为例,自2011年10月至2018年4月,历时6年半,该团队所承担的1项教育教学项目的研究,与该成果紧密联系的内容在网站主页被宣传了近40次,年均5次以上;有关内容被推送至该省教育厅官方网站10余次;在中国教育报、光明日报、河南日报等国家级和省级报刊均有宣传报道;在全国同类院校的校长联席会、中国-东盟教育周等国内国际会议上多次作为优秀案例展示。

2018 年上半年,团队在整理成果奖申报材料时,将新闻媒体的宣传网页抓图、报刊扫描等资料整理成精美的“写真图集”。“集子”从“政府推动”“学校重视”“社会认可”“推广应用”等视角翔实地反映成果的形成、应用推广的全过程,充分展现出较强的真实性和权威度,成果最终获得国家级教学成果二等奖。

随着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课程建设越来越起到关键性作用。特别是面对 2020 年较为严重的新冠疫情下的教学工作困境,试想一下,如果各级教育主管部门和教育部署 600 多所高校向应用型本科转型时,就大力推进满足应用型本科教学的课程体系及课程信息化建设,那么当前在全国各种教育教学资源库的平台上,各学科类的主流应用型本科专业每学期都可以找到 3—5 门共建共享课程。疫情期间,只要有网络,师生就可以利用计算机和手机等互联网终端开展教学活动,能够大大降低应用型本科院校师生应对类似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下课程教学的难度。经过这次疫情下课程教学工作的考验,有理由相信国家将进一步加强各层次各类教育的网络课程和课程平台的建设,这也将迎来应用型本科院校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建设的明媚春天。

参考文献:

[1] 中共教育部党组. 中共教育部党组关于教育系统学习贯彻

彻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精神的通知:教党[2019]49 号 [A/OL]. (2019 - 11 - 07) [2020 - 02 - 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12/s7060/201911/t20191129_410201.html.

- [2] 高雪春,侯长林. 应用型本科高校课程建设的“破”与“立”[J]. 中国职业技术教育,2019(29):33-38.
- [3] 彭道林,贺婷. 课程与一流大学的本科教育[J]. 湖南师范大学教育科学学报,2019(02):31-35+111.
- [4]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9.
- [5] 教育部. 教育部关于公布 2003 年度国家精品课程名单的通知:教高函[2004]1 号 [EB/OL]. (2004 - 02 - 10) [2020 - 02 - 10]. <http://old.moe.gov.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3843/201010/109656.html>.
- [6] 教育部办公厅. 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公布第一批“国家级精品资源共享课”名单的通知:教高厅函[2016]54 号 [EB/OL]. (2016 - 07 - 01) [2020 - 02 - 10].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5664/s7209/s6872/201607/t20160715_271959.html.
- [7] 习近平.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三卷)[M]. 北京:外文出版社,2020:328.
- [8] 习近平. 习近平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 [EB/OL]. (2016 - 12 - 08) [2008 - 08 - 20] http://www.china.com.cn/newphoto/news/2016 - 12/08/content_39878764.htm.

(责任编辑 许峻)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Governance System and Governance Capacity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with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WANG Jun

(School of Civil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sharing successful case of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understanding the practice of spirit of the Fourth Plenary Session of 19th Central Committee of CPC in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graduate school, and educating students with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n New Era, this paper discussed how to promote the modernization of educational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from the following aspects: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and planning, special fundraising, software and hard ware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team construction, curriculum leader selection, role of experienced teachers, development of teaching materials of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 graduate education, curriculum publicity, etc.

Key words: application - oriented undergraduate education; curriculum constructi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urriculum; governance system and capacity

基于疫情期间互联网+《管理学》理论思想与课程思政教学探讨

杨道富¹, 蔡琰², 杨鹏³

(1. 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 河南 郑州 451150; 2. 河南师范大学新联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46;
3. 黄河水利委员会 河南黄河河务局, 河南 郑州 450003)

摘要:分析互联网+课程教学改革的必要性,调查网络课程教学的现状,寻找网络课程教学的资源分布和进入路径,判别建筑工程专业对《管理学》知识体系的需求,探讨《管理学》网络教学的最佳实施途径,制订互联网+《管理学》的教学改革方案,替换原《管理学》中不适合建筑工程专业的案例,更新并列了国家工程建设最新的、最优秀的、世界领先的案例,创新管理学事件处理的思维方式。在疫情期间,融入《管理学》危机管理策略,及时把中国与世界疫情危机管理进行比较,找到体制机制的差异,增强了学生的“四个自信”,达到了课程思政的目的,突击解决网络教学与传统教学发展不协调的燃眉之急。

关键词:互联网+; 管理学; 理论思维; 案例重置; 课程思政; 教学探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8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00-06

在疫情蔓延期间,为了落实教育部延期开学的通知,以及“停课不停教、停课不停学”的教学工作安排^[1],国家和许多教育公司免费开放了网络教学平台,要求各级各类学校编制网络教学计划。全国共有51.88万所学校、2.76亿在校生、1672.85万专任教师参加^[2]。全球最大的、人数最多的网络教学在中国实施,创造了世界网络教育规模奇迹!现就疫情期间互联网+《管理学》教学理论思想与课程思政进行探讨。

一、互联网+教学的历史必然性

(一) 互联网+教学模式优势凸显

互联网+教学,让受教育者在信息终端封闭的环境里实现思想开放。打破了权威对知识的垄断,让人人都能够创造、共享、获取和使用知识。在开放的大背景下,中国乃至全球性的知识库正在加速形成,优质教学资源正得到最大程度的丰富和充实,这

些资源通过互联网连接在一起。使得人们在各自的信息终端随时、随地、随事都可以获取他们想要的学习资源。知识获取的效能、效率大幅提高,获取学习资源的成本大幅度降低,也为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建设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二) 互联网+教学备胎及时救援

2015年3月5日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首次提出“互联网+”行动计划^[3]。在2020年疫情期间,互联网+教学这个教育模式的备胎及时得到高效利用,对大中小学的师生教学和学习方式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并成为大中小学必备的教学和学习手段。

互联网+教学的理想场景,是要构建不分国界区域限制、不设老幼阶层门槛,随时随地接触全球最好的教育资源以便满足学习者需求。在疫情危机时刻,有危必有机,迫使互联网+教学飞速发展,对网络教学

收稿日期:2020-09-27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一带一路国际工程项目风险分析与防控体系构建”(7207011323);河南省2017年度科技发展计划项目“国家一带一路与国际FIDIC条件创新应用研究”(172400410429);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2018年度教改项目:建筑新工科教育模式国际化趋势研究(JG-180201)

作者简介:杨道富(1956—),男,河南济源人,硕士,郑州工业应用技术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工程项目管理。

普及改革带来推动、带来变革、也带来更多新的希望。

二、互联网+《管理学》教学理论思想

(一)工程管理专业起源与学科交叉特征

工程管理专业出现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末期。当时,对工程教育进行评估的结论是:传统的工程教育,只注重技术层次的教育和数理方法的应用,其毕业生和工程师们普遍缺乏必要的管理知识和沟通技巧。

据世界工程教育专业学会随机调查发现,有约 70% 的工程师,在 40 岁之后都由技术操作工作转变为承担工程管理工作。因此,产生了工程管理这个新的学科专业。

工程管理专业,在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里属于管理学,且目录上明确说可授予工学学位或者管理学学位二者其一。在 2020 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题指南中,管理科学部一处受理的是“管理科学与

工程”项目申报,只设定研究范围,题目自选^[4]。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课题指南中,“管理学”有 97 个选题^[5]。工程项目管理专业根据课程知识结构的特点,可以授予工学学位或管理学学位,工程管理是较少同时跨越文科和理工科 2 个学科特征的交叉学科。

(二)工程管理专业学科结构与知识体系

建筑工程行业设置工程管理专业,根据培养目标确定的学科结构是:具备管理学、经济学和土木工程等的基本知识,掌握现代管理科学的理论、技能、方法、策略、流程、手段和措施,能在工程建设领域从事项目决策和工程管理的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重点面向基层的应用型专业人才。

《管理学》^[6]理论教学安排 32 学时,教学理论知识体系和技能实践要求如表 1。

表 1 《管理学》教学理论知识体系和技能实践体系

课程	周学时	学分	考核方式	采用教材情况	教材名称	《管理学》
学期					主编(著)	陈传明
总学时					出版社名称	高等教育出版社
32	2	2	考试		出版时间	2019 年 9 月
周次	日期	每周学时分配		教学内容		
		讲授	实验(实践)	备注		
1-2	02.17-21; 02.24-28	4		第一章 管理导论	习题:P15(1,2); P43(2,5)	
3-4	03.02-06; 03.09-13	4		第二章 管理理论的历史演变 第三章 决策与决策过程	习题: P68(6,7)	
5-6	03.16-20; 03.23-27	4		第四章 环境分析与理性决策 第五章 决策的实施与调整	习题:P83(2,4)	
7-8	03.30-4.3; 04.06-10	2	2	第六章 组织设计 第七章 人员配备	P103(1,4) 习题:P123(2),	
9-10	04.13-17; 04.20-24	2	2	第八章 组织文化 第九章 领导的一般理论	P124(5)P158(1,2) 习题:P177(1,3)	
11-12	04.27-5.1; 05.04-08	2	2	第十章 激励 第十一章 沟通	P191(3,4) 习题:P218(2,3)	
13-14	05.11-15; 05.18-22	2	2	第十二章 控制的类型与过程 第十三章 控制方法与技术	P238(1,3) 习题:P257(1,3)	
15-16	04.25-29; 06.01-05	2	2	第十四章 风险控制与危机管理 第十五章 创新原理 第十六章 组织创新	P277(2,4) 习题:P300(1,3)	
				结语:互联网时代的管理展望	P322(1,2)	
				考试		

32

(三)《管理学》网络课程优化和选择

教育部通知,全国各类学校、出版社和文化教育网络公司免费开放在线教学资源,包含 22 个在线平台、12 个学科门类、2.4 万余门课程、1291 门精品课程、401 门虚拟仿真实验室等^[7]。为互联网+教学奠定了基础,服务 3 亿师生用互联网+教学场景和状态教学。

在《管理学》网络教学初期,通过检索网络教学资源、阅读管理学相关教学内容,寻找所有接近 32 学时的网络课程,最后选择了中国大学 MOOC+智慧树+qq 群+电子课件线上线下综合教学方式,丰

富的网络免费教学资源,扩大了学生的知识面,提高了学生的学习兴趣 and 自学能力。

本课程设置了备选方案。如果遇到停电、网络不畅、接收终端故障的特殊情况,可以采用教师提供的电子课件学习。每一章课件分理论教学和优秀工程课程思政案例两部分,并且跟踪最新优秀工程建设案例和疫情发展现状讲解管理学知识。

三、互联网+《管理学》教学实践思想

(一)《管理学》课程教学目标设置

1. 知识系统,奠定学生的管理学科基础。《管

理学》网络课程的教学以5大职能为基本框架,要求内容简洁、逻辑关系清晰、重点难点突出,便于学生全面系统地领会和掌握管理学的知识结构体系。掌握管理学的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技能,从而为今后学习工程管理专业其他课程和开展管理科学研究打下坚实的基础。

2. 知行合一,提升学生的管理实践能力。在《管理学》网络课程讲授中,收集了新闻和网络中大量的、通俗易懂的、大国工程的优秀建设项目和先进建筑施工企业的案例进行解析,注重对于疫情期间管理实践的应用分析,在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学管理、用管理、爱管理”。培养和训练学生灵活运用管理学的知识,及时解决身边实际管理问题的能力,培养学生的计划能力、协调能力、组织能力、沟通能力等,提高学生工程管理的综合能力。

3. 重在拓展,提升学生的管理整体思维。通过《管理学》网络课程的学习,帮助学生建立管理思维方式,用管理的思维方式去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培养学生善于发现科学问题,并积极寻找解决方法的基本管理素质,以及善于独立思考和开拓创新的开放性思维,树立“只为成功想办法,不为失败找借口”的管理思想理念。

(二)《管理学》网络课程教学策略实施

教师先通过对名校相关专业管理学网络课程的调研、学习、比较,找到接近32课时的管理学课程安排,选择适合本校建筑工程管理专业教学的课程,进行专业需求排序,采取优选法,最后推荐前3名管理学网络课程供学生学习。

对学生管理学网络视频学习提出要求:根据个人能力,学习多少管理学网络视频不限,但底线(最少)是学习一个管理学视频+管理学课件,完成作业。课件上标红的地方是重点、难点和考试点。告诉学生网络课程以前多数是要收费的,在疫情期间,当网络课程免费时,尽量多获取学习资源。提高学生疫情期间的自我学习和管理意识、务必保护自己不被感染,关心祖国的未来,要青年强为国强奠基。

在学习过程中,要求每次课、每个学生保留自己学习过程的4个截图,交给学习委员,证明自己在规定时间上课了,最后再由学习委员集中后交给教师,以便确定平时成绩。否则是旷课。

在每一章最后习题中,标注红色的题目是要完成的作业。本周作业到下一次上课前交,每周交一次作业,个别网络不畅、接收终端有故障的同学,可以提出申请,作业到最后返校时一起交。提交作业用图片和文档的形式都可以,原则上全班使用的形式一致。

全程监控学生课堂理论学习和实践答疑过程。作业和截图提交方法均按照:班级+新编学生序号+学籍学号+姓名+作业(或截图)进行文件命名。

(三)《管理学》网络课程思维方式探析

管理学涉及人类社会发展各个方面。小到家庭生活,大到国家治理;小到一次旅行,大到超级工程。在疫情期间,利用在家封闭的大量时间,对所有名校的管理学网络课程检索查阅,通过认真的分析研究,虽然找到了管理学理论教学接近32课时的课程,但是随着教学的深入,发现了管理学课程案例有较多导向文科的倾向。例如:名医扁鹊三兄弟治病的故事,大哥治未病是事前控制,二哥治已病是事中控制,扁鹊治生死是事后控制。案例虽然很优秀,但与工程管理无关。

在管理学众多网络课程中,许多文科和理科专业都开管理学,教材多数是文科教师编写的,课程知识结构体系相同,讲课的思维方式和案例需求差异较大,归纳分析有以下特性:校本需求性、学科相关性、专业必需性、教师风格性、知识结构和阅历烙印性。

网络调查结果表明:管理学网络课程多数是设置在管理学院,属于文科教师讲管理,案例基本属于社会科学领域的历史传统案例,管理思想以线性思维为主。而工科的管理思想属于发散性思维为主。

线性思维,是一种直线的、单向的、单维的、缺乏变化的思维方式,线性思维经常用在传统的写作和阅读领域,受稿纸和书本的空间限制,必须以时空和逻辑顺序展开,线性思维在一定意义上来说属于静态思维。非线性思维则是相互连接的、非平面化的、立体化的、无中心化的、无边缘化的网状结构,类似人的大脑神经和血管组织。非线性思维包含发散思维、系统思维、模糊思维等。

发散思维,就像一棵树。发散思维又称辐射思维、放射思维、扩散思维或求异思维,是指大脑在思维时呈现的一种扩散状态的思维模式,它表现为思维视野广阔,思维呈现出多维发散状。如“一题多解”“一事多写”“一物多用”等方式,发散思维在一定意义上说来属于动态思维。对于复杂多变的工程管理,项目经理要面对千头万绪的事件、多项工作需要齐头推进、多部门多专业需要有序协同配合,共同实现工程项目管理目标,管理者非常需要发散式思维,发散思维具有3个特点。

(1)流畅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理问题时,在规定的时间内,会产生不同的管理策略、多个解决问题的方案。该特征代表心智灵活、思路通达。对同一工程管理问题,想到可能解决的方案越多,表示

思维的流畅性越高。

(2)变通性。即灵活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理问题时,遵守法规但不墨守成规,不钻牛角尖,大局为重,能随机应变,触类旁通。对同一工程管理问题,想出不同类型的解决方案越多,施工运行流程的关键线路途径越多,变通性越高。

(3)独创性。当管理者面对工程管理问题时,能独具慧眼,想出不同寻常的、超越自己也超越同辈的解决方案。对同一工程管理问题,想出的解决方案越新奇、越独特、价值功能越高、性价比越高、效能效率越高,其独创性越高。

四、互联网+《管理学》教学课程思政

(一)《管理学》工程管理案例课程思政

为了弥补网络教学单一线性思维的缺陷,引入了课程思政和发散思维内容。要求学习网络《管理学》相关课程之余,强调学习现实工程建设管理案例,这些案例多数是以发散思维为主,兼顾线性思维。安排学习了《世界还是那个世界,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中国》^[8]《国家工程探秘》^[9]《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10]《大国重器》^[11]《大国工匠》^[12]……内容(在网上搜索即可),并要求这些是属于必考的管理学案例分析内容。

兼顾讲解发散思维方式,在《管理学》课程中引入了我国世界前沿的、目前绝无仅有的工程管理优秀案例。

1. 武汉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仅用10天^[13]。2020年1月23日,武汉决定参照北京小汤山医院模式建设火神山医院。1月23日当天13点06分,国机集团中国中元收到武汉市城乡建设局关于“应急医院设计”的求助函。中国中元立即组建以全国勘察设计大师、中国中元顾问总建筑师黄锡璆为组长的技术专家组,78分钟后,修订完善的小汤山医院图纸送达武汉。1月24日春节除夕夜晚开工,火神山医院施工现场灯火通明,各种机械开足马力,仅用一天时间,大部分土地平整工作完成,为后续工作奠定了基础。2020年2月2日上午,武汉火神山医院正式交付使用,仅用10天时间,万众瞩目的火神山医院从一片荒地上拔地而起。这就是中国的工程管理科学的高水平见证,也是世界唯一的案例。

2. 在郑州港区建成的河南版“小汤山”医院,由原郑州市第一人民医院传染病医院以最快的速度改造完成,2020年2月13日郑州市政府颁发文件更名为“郑州岐伯山医院”^[14]。岐伯山位于郑州新密市苟堂镇南部,据传是黄帝召集天下名医,开展医药研究的基地、研创《黄帝内经》的圣地。岐伯,是中

国上古时期著名的医学家,精于医术脉理,后世人们尊称为“华夏中医始祖”。我国医学宝库中现存成书最早的一部医学典籍《黄帝内经》,便是以黄帝和岐伯问答为主要形式,以黄帝和岐伯之名所著,又称“岐黄家言”,中医学又称为岐黄之术,岐伯山与郑州有着很深的历史渊源,以“岐伯山”命名体现中原厚重的历史文化底蕴,展示岐伯山医院命名与历史事件的课程思政。

(3)用9小时改造福建龙岩火车站^[15]。利用晚上铁路通车密度低的时间,2018年1月19日晚6时,福建龙岩火车站的大改造开始,1500多名工人和技术人员展开了一场特殊“战役”,到次日凌晨3时完工。现场7支不同专业施工队的分工合作、23台挖掘机施工有条不紊、千人在狭小环境中施工操作的默契配合,展现了不可思议的施工效率和效能,用了9个小时完成道路拆铺、信号换装、新老站房之间的转场施工。通过9小时改造一座车站的案例,终于让同学们明白中国工程建设管理为啥被外媒叫“基建狂魔”。

(4)用43小时重建北京三元立交桥^[16]。三元桥位于北京市三环路东北角转弯处,是东三环与北三环的交界点。三环主路在桥上通过,桥北侧是京顺路,桥南侧是机场高速路。2015年11月13日晚11时起,北京三元桥正式启动“换梁疗伤”工程,换梁施工仅用24小时,实现“一日之内旧桥变新桥”。全部“换梁疗伤”施工用了43个小时。采用千吨级驮、运、架桥一体机,实现了1350吨桥梁整体更换,创造了大吨位整体换梁新技术的范例,在国内属首次,在国际上技术领先,创造了中国建桥速度和工程施工管理的新纪录。

(5)济南用5个小时给铁路搬家^[17]。济南货运大北环施工项目之一,是邯济、胶济铁路联络线拨接,就是指铁路线路位置发生变化的改造工程,在原位置与新位置间进行转换的施工项目。从2019年7月16日凌晨4时40分开始至16日9时10分施工结束,在16日9时42分时,一列由白城驶向青岛的K955次客运列车安全通过,一切好像没有发生过。在270分钟(4个半小时)的“天窗点”内,由500余名中国铁建的建设者,将两段分别长为460米和177米长的线路整体向北平移,最大拨距3.1米,使铁路快速搬家,体现工程项目管理的高效能、高水平。(注释:列车在一段时间内暂停通过,以供对线路、接触网等设备进行检修等工作。这段时间叫天窗,也叫天窗点。)

(6)江苏江阴两个半小时拆一座大桥^[18]。看一场电影的时间,就拆掉了一座大桥。江苏省江阴市

也在“中国速度”上书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该桥服役22年,是芙蓉大道京沪高速跨线桥,是贯通江阴东西的重要枢纽。2019年5月26日凌晨3点多拆桥施工开始,在50多台镐头机、挖掘机同时连续作业和有序施工下,历经2.5个小时后,旧桥成功拆除并清理完废渣,5月26日6点京沪高速江阴段上海方向恢复正常通车。

(7)解放军26分钟在长江上架了座千米钢铁浮桥^[19]。2016年8月29日上午,“长江-2016”渡江工程保障实兵演习,东部战区陆军某舟桥旅官兵们,在1100多米宽的长江江面上,用26分钟的时间架起一座钢铁浮桥,体现军事工程后勤保障管理实施速度的实力。在长江桥梁工程史上,架桥速度之最快的工程管理案例从此诞生。

(8)港珠澳大桥,世界上最长的跨海大桥^[20]。港珠澳大桥是中国境内一座连接香港、珠海和澳门的桥隧工程。于2009年12月15日开工建设,2018年10月23日正式通车。工程路线起自香港国际机场附近的香港口岸人工岛,向西接珠海与澳门口岸人工岛、珠海连接线,止于珠海洪湾,桥隧全长55公里,是目前全世界最长的跨海大桥。

我国工程建设最新的、最优秀的、世界领先的、全球第一的、令人激动的案例举不胜举。“中国速度”和“中国奇迹”让世界惊叹。体现中国工程项目建设和管理水平的世界领先地位。互联网+《管理学》网络教学,极大地弥补了传统教学资源的发散思维缺陷,将中国优秀工程管理案例、世界最前沿技术及时补充到教学实践中,达到了《管理学》课程思政的教学目的。

(二)《管理学》期末考试课程思政

期末考试结合新冠疫情危机管理命题,以考促学、知行合一、课程思政、增强自信,达到了提高学生管理能力和管理水平的目的。

期末考试题中有一道案例分析题为:2020新冠疫情危机特征与本地区疫情的管理?(10分)。(在空白处编辑案例答案,有统一管理理论指导,各地区疫情不同,没有固定答案。答题要点:按照给定的论述纲要,根据自己疫情期间所在省、地区或社区的疫情危机管理控制的情况撰写。)

答:(1)危机定义。危机是指突发的、严重影响组织的生存与发展的一种状态。

(2)疫情危机特征:第一,突发性。_____。第二,危害性。_____。第三,紧迫性。_____。第四,信息不充分性。_____。

(3)疫情危机控制。第一,建立疫情领导小组。

_____。第二,启动应急预案及调整方案。_____。第三,隔离疫情危机。_____。第四,获取更多疫情信息。_____。

(4)疫情危机恢复管理。第一,建立疫情恢复领导小组。_____。第二,获取疫情危机处理信息。_____。第三,制订疫情危机恢复计划。_____。第四,疫情危机损失评估。_____。

(三)《管理学》疫情管控课程思政

疫情无情党有情,国家正义救民生。在战疫期间,广泛收集来自各方的消息,每次课都将当天疫情发展动态和扣动灵魂深处的案例教育学生。集中体现并强化了中国的制度、道路、理论、文化自信。自信产生了14亿人的凝聚力,彰显了共产党的号召力,目睹了政府的动员力,展现了国人对疫情的阻击力,公民宅家守家的执行力……

中国有共产党和各级政府的靠山,火神山、雷神山、岐伯山等各地设立的方舱医院救护的诺亚方舟,钟南山等专家院士和医护人员的舍命抢救。上有习近平党中央及各级政府的领导指挥,下有农民工快递小哥的拼搏增援,成功防控疫情扩散。中国抗击疫情、控制危机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令世界看到中国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五、结束语

由于互联网+教学发展的历史必然性,所以提倡和鼓励教师以“主动作为”代替“疲于应付”;由于网络在线教育资源的缺陷和不足,所以需要进一步丰富完善、查漏补缺;由于教学平台、课程创新、虚拟仿真等要加快更新,所以需要加大资金、人才、设备投入;由于互联网+教学是教育改革创新的主流,所以要加强普及互联网+教学技术、技能、管理水平;由于要提高互联网+教学的吸引力和影响力,所以从教学组织、教学内容、教学方法、学习效果4个方面构建互联网+教学全面质量管理的体制机制。

参考文献:

- [1]教育部.关于在疫情防控期间做好普通高等学校在线教学组织与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EB/OL].[2020-05-30].<http://www.waizi.org.cn/doc/76621.html>.
- [2]教育部.2018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EB/OL].[2020-05-30].http://www.moe.gov.cn/jyb_sjzl/sjzl_fztjgb/201907/t20190724_392041.html.
- [3]李克强.政府工作报告:2015年3月5日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三次会议上[EB/OL].[2020-06-03].<http://nx.people.com.cn/n/2015/0317/c192469-24177819.html>.
- [4]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2020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课

- 题指南[EB/OL]. [2020-06-03]. <http://www.nsf.gov.cn/>.
- [5] 全国哲学社会科学办公室.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 2020 年度课题指南[EB/OL]. [2020-06-03]. <http://www.nopss.gov.cn/>.
- [6] 陈传明. 管理学[M]. 北京: 高等教育出版社, 2019.
- [7] 教育部. 2.4 万余门在线课程向全国高校免费开放[EB/OL]. [2020-06-02]. http://www.moe.gov.cn/jyb_xwfb/s5147/202002/t20200206_418468.html.
- [8] 新浪新闻. 世界还是那个世界, 但中国已经不是那个中国[EB/OL]. [2020-05-28]. <https://www.cehome.com/news/20190821/246301.shtml>.
- [9] 央视网. 国家工程探秘共 26 集[EB/OL]. [2020-05-28]. <http://jishi.cntv.cn/2012/12/15/VIDA1355567382449724.shtml>.
- [10] 央视网. 超级工程·港珠澳大桥[EB/OL]. [2020-05-28]. <http://tv.cctv.com/2012/12/10/VIDE1355150043991163.shtml>.
- [11] 央视网. 大国重器[EB/OL]. [2020-05-30]. <http://jishi.cntv.cn/special/djsb/daguozhongqi/>.
- [12] 央视网. 大国工匠[EB/OL]. [2020-05-30]. <http://tv.cntv.cn/videoset/VSET100308830573>.
- [13] 搜狐网. 火神山、雷神山医院建设的“中国速度”![EB/OL]. [2020-05-30]. https://www.sohu.com/a/370939296_120094713.
- [14] 河南省人民政府. 河南版“小汤山”医院正式命名郑州岐伯山医院有何渊源?[EB/OL]. [2020-05-30]. <http://www.henan.gov.cn/2020/02-13/1291872.html>.
- [15] 人民网. 9 小时改造火车站, “中国速度”让世界惊叹[EB/OL]. [2020-05-30]. <http://opinion.people.com.cn/n1/2018/0124/c1036-29784860.html>.
- [16] 人民网. 北京三元桥 43 小时完成改造 震惊全球网友[EB/OL]. [2020-05-30]. <https://lt.cjdy.net/thread-2113349-1-1.html>.
- [17] 搜狐网. 惊呆了!“基建狂魔”5 小时让铁路搬家![EB/OL]. [2020-06-02]. https://www.sohu.com/a/329778897_690589.
- [18] 西瓜视频. 中国两个半小时拆一座大桥! 外国人都看呆了[EB/OL]. [2020-06-02]. <https://www.ixigua.com/i6708331576037474830/>.
- [19] 爱奇艺资讯. 26 分钟! 解放军在长江上架起千米浮桥[EB/OL]. [2020-06-02]. https://www.iqiyi.com/v_19rrm5ef2g.html.
- [20] 优酷纪录片. 港珠澳大桥, 世界上第一座跨海最长大桥, 桥隧全长 55 公里[EB/OL]. [2020-05-30]. https://v.youku.com/v_show/id_XNDExMTg0MzI00A%3D%3D.html.

(责任编辑 许峻)

Discussion on the Internet Plus Management Theory and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eaching during COVID - 19

YANG Daofu¹, CAI Yan², YANG Peng³

(1.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Industry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1150, China; 2. Xin Lian Colleg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46, China; 3. Yellow River Conservancy Commission (YRCC), Henan Yellow River Bureau, Zhengzhou, Henan 450003, China)

Abstract: Reform the traditional teaching mode, which is not adapted to the epidemic environment, and promote the reform plan of Internet plus teaching, so as to solve the teaching problem that teachers and students cannot come to school face to face with teachers. By analyzing Internet plus the necessity of teaching reform, investigating the present situation of the network course teaching, looking for network teaching resources distribution and enter the path, discriminant demand for knowledge management system in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best management network teaching means, make Internet plus teaching reform of management, to replace the original case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construction engineering major in management, update and lists the latest national engineering construction of the best of the world's leading cases, innovation management event handling way of thinking. During the epidemic period, I integrated crisis management strategies into management, compared China's crisis management with that of the world in a timely manner, fou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systems and mechanisms, strengthened students' four self-confidence, and achieved the purpose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which solved the urgent need of inharmonious development between online teaching and traditional teaching.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management; teoretical thinking; reset case; course education; teaching discussion

新形势下外语学科教师学术能力建构研究

袁金平

(南阳师范学院 公共外语部,河南 南阳市 470000)

摘要:从“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选取国内 11 种主要外语类专业核心期刊,采集 2017 年 1 月 1 日—2019 年 12 月 31 日三年内,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 11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据和文献的引文量,分析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主要关注的外语学科领域的焦点,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学术能力,揭示制约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的因素,并给出如何基于现状构建外语教师学术能力,促进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创新发展的策略。

关键词:学术能力;外语学科;构建;创新发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19

中图分类号:G642.4 H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06-05

2016 年启动的第四轮一级学科评估和 2017 年由教育部、财政部与国家发展改革委员会共同印发《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的通知,标志着中国正在经历着由教育大国向高等教育强国的历史性跨越^[1]。学科是以知识为中心,专业是以问题为导向,课程随着专业结构的调整必须进行重组,这种重组是专业外部条件和内部条件变化的要求。作为课程和专业的实施者,教师专业能力和学术能力赋予了新的内涵和新的使命内涵,教师亦面临着重组^[2]。

一、研究现状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国内外的教师研究历经外语教师地位的变换、教师角色的转变、教师知识结构的发展、教师专业的理论发展到教师研究型、教师行动研究和教师共同体的建构等^[3]。外语教师专业的发展应该与教学紧密结合,在注重理论学习和研究的同时,关注和加强行动研究^[4]。

国内外针对外语学科重要性的争论亦十分激烈,研究的课题主要包括学科知识、学科身份认同、跨学科教学、学科相关理论等。胡开宝,王琴(2019)认为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要素主要表现为

三大要素,即学术要素、人才要素和机制要素。其中,人才要素是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的关键,涉及具体研究领域、研究方向和人才培养目标的学术要素是基础,机制要素是保障^[5]。而学科建设的重要载体是科学研究,科研水平主要反映在“科研成果”“科研获奖”和“科研项目”三个方面。第四轮学科评估在一级指标“科学研究水平”板块注重学术论文发表质量,强调在国内外的影响力,强调期刊论文的他引次数^[1]。对高校外语教师论文发表的要求由“量”升华到了“质”,只有教师学术水平高、科研强,学科方能强。

二、研究路线

本文基于文献分析法,辅以 Excel 统计,拟从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近三年发表情况中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展趋势,以期打造名语特色学科(characteristic disciplinary)提供前瞻性和建设性的参与和借鉴。

(一) 研究手段

1. 研究问题

本文旨在研究下面几个主要问题:(1)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如何?(2)河南高校外语教师

收稿日期:2020-10-12

基金项目:2017 年度河南省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时期河南普通高校外语学科创新发展研究”(2017BYY013);南阳师范学院一流课程建设项目“大学英语读写 I”(2019-YLKC-053)

作者简介:袁金平(1972—),女,河南邓州人,南阳师范学院公共外语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外语教学与研究。

科学研究焦点及实践效果如何? (3)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发展趋势及对外语学科建设的影响、制约因素是什么?

2.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中国知网(世界上全文信息量规模最大的数字图书馆)作为样本数据库,研究检索的论文作者为河南省普通本科院校的外语教师,具体指高校里从事语言学、应用语言学、外国文学、翻译等学科的教学和科研的教师,这里涵盖了高校从事外语教学的所有教师(包含读博教师),也涵盖了单位为高校专业研究机构和在河南高校外语学科读博的学生。

3. 研究方法

本研究利用文献分析法及 Excel 软件进行统计分析,考察文献量、作者数和词汇数(分类)三个指标,分析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一定时期内科研的发展趋势、作者聚焦、主要研究领域和研究分类。以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为基础,聚焦科学文献的外部特征,采用数学与统计方法来描述、评价和预测科学技术的现状和发展趋势^[6]。计量对象主要是:文献量、作者数(个人集体或团数)、词汇数(各种文献标识)。

(二)数据采集

1. 数据采集方法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为国内重要的 11 种外语专业期刊,主要包括《外语教学与研究》《现代外语》《外语与外语教学》《外语界》《外语教学》《外语学刊》《中国翻译》《外国语》《当代语言学》《外国文学研究》和《国外文学》。本研究采集的时间是 2020 年 6 月 10 日,研究主要从“CNKI 中国学术期刊网络出版总库”采集 2017. 1. 1—2019. 12. 31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以上 11 种期刊上发表论文的数据和文献的引文量并进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主要关注的外语学科领域的焦点。三年期间这些期刊发表学术论文共计 4246 篇,这些文章反映了国内外语界的主流研究。梳理出含有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文献,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发表的论文进行分类,并对数据进一步筛查和分析,探讨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科学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对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发展的影响。

2. 数据筛查原则

根据上述方法,在 4246 篇文献中,根据作者单位判断为河南高校外语教师、高校专业研究机构或相关人员在读博的,视为有效数据。统计文献有独著和合著。合著作者单位中含河南高校或研究机构的,亦视为有效数据。共采集到 65 篇文献。根据外

语学科的属性和分类,把采集到的文献数据分为下面 7 类:(1)文学研究及评论;(2)语言学研究;(3)二语研究及应用;(4)翻译研究;(5)外语教育;(6)语料库应用及研究;(7)书刊评介。

三、数据结果分析与讨论

(一)论文发表趋势

2017. 1. 1—2019. 12. 31 期间,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发表论文比重大约分别为 1.4%、1% 和 1.4%;在《现代外语》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4%、2.4% 和 0;在《外语与外语教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4%、0.4% 和 0.4%;在《外语界》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4%、0.4% 和 0;在《外语教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1.6%、1.1% 和 0.3%;在《外语学刊》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1.0%、1.1% 和 0.3%;在《中国翻译》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2%、0.2% 和 1.3%;在《外国语》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4%、0.9% 和 0.4%;在《当代语言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7%、0.7% 和 0;在《外国文学研究》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6%、0.6% 和 0.6% 和《国外文学》发表论文比重分别为 0.5%、0.5% 和 0.9%。

(二)指标统计

论文研究内容统计方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这 11 种期刊上发表内容主要集中在语言学研究(58%)上。文学研究及评论(15%)、翻译研究(14%)、外语教育(3%)、二语研究及应用(3%)、语料库应用及研究(3%)及书刊评介(3%)。论文引用统计方面,65 篇论文中论文引文量最高为 15 次,下载最高次数为 2781 次,反映出高质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论文作者排行统计方面,2017—2019 年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国内 11 种主要外语类核心期刊,发表论文较多的前 6 位作者(均来自河南大学,含合著):徐盛桓(6 篇)、刘泽权(5 篇)、牛保义(3 篇)、刘辰诞(2 篇)、刘存伟(2 篇)和张克定(2 篇)。三年中河南大学教师在这 11 种外语类核心期刊中发表数量约占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的 43%,郑州大学约占 18%。

(三)方法应用分析

研究方法以非材料性研究方法为主,实证性研究为辅。实证性研究仅为 0 篇,远远少于非材料性研究。常见的外语研究方法有两大类:实证性研究和非材料性研究。实证性研究包含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实证性研究方法主要通过对研究对象大量的观察、实验和调查,系统地、有计划地、客观地搜集材料信息和分析,归纳出事物的本质属性和发展规律

的一种研究方法。而科学规范的研究方法是追求真理探索学问的行为,是从事科学研究应该遵循的有效的科学工具,是进一步推动理论和学术发展的动力。

四、外语教师学术能力发展制约因素分析

通过对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期刊上论文发表情况进行统计并进行定量分析,我们可以看到河南普通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情况如下。

(一) 研究结论

1. 发表趋势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这 11 种外语类专业期刊发表量同比增长幅度不大,与全国同行相比,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类核心期刊论文发表数量比重偏低,说明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水平比较滞后。

2. 研究内容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学研究焦点侧重于语言学、翻译研究和文学研究及评论,缺乏一定的原创性和特色性研究,原创性成果较少。与本省社会经济发展相关的有影响的论文较少,与人才培养相关的研究较少,体现出学科建设与社会经济发展、贡献及服务值较低。与大多数教师教学密切相关的应用语言学研究相对较少,部分高水平的研究与目前融于信息化技术的外语教学和评估等实践结合不够密切,实用性不强,权威性的学术论文针对外语教师的思政研究相对关注不够。

3. 采纳的研究方法

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的科研现状与国际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研究方法的局限性反映出教师没有掌握基本的文献检索方法和科学的研究方法,与国际国内以实证研究为主的发展趋势存在较大差异,教师缺乏基本的科学研究方法。教师缺乏相关资源,无法及时了解相关研究领域最新的发展动态,导致所选的题目或所做的研究毫无价值、重复研究或意义甚微;或者选准了研究题目但却不具备研究条件和研究方法等,导致难以产出高水平的研究成果,无法与国际国内研究主流保持一致,无法与国际接轨,缺乏创新性研究。

4. 其他

从我省论文引用次数反映出学术论文质量相对较低,论文他引次数反映出论文影响力较低;从论文作者排行侧面反映出河南省高校外语教师普遍缺乏一定的科研能力和科研意识。

(二) 制约因素分析

科研成果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高校师资水平,我省的科研现状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河南高校外

语学科大多处于“边缘学科”,学科建设无法体现当地特色建设。综合以上分析和讨论,本文认为可能制约或阻滞高校外语教师专业发展的因素可简要归纳如下。

1. 学科专业定位不准

大多数高校外语学科专业定位目标模糊,整体学科专业布局不合理,分布不均衡。学校重点发展的学科不突出,专业建设缺乏特色,缺乏具有鲜明特色的教学团队和科研团队,缺乏一定的创新精神和特色研究。一流的学科建设离不开一流的教师队伍的建设,没有好的团队,没有团队合作精神,学科内部人财物分散,缺乏沟通和交流,严重阻碍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学科缺乏专业的带头人,没有学科梯队核心和灵魂,在学术上起不到带头和指导作用。

2. 科研时间难以保障

外语涵盖面非常广,要求掌握丰富的语言文化,以及语言国家的历史、地理、宗教和风俗人情,并不断地提高自己的语言听、说、读、写水平,才能成为一个优秀教师,才能在教学上得心应手。但大多数学校日常教学工作繁重的,占用了教师较大的时间和精力,在这种超负荷工作状态下,外语教师能投入到科研上的时间和精力非常有限,不能够在科研上进行深度的研究,专业发展和学术提升之间的矛盾阻碍了教师学术水平的发展。

3. 教学与科研方向不一致

扩招带来了外语教师的需求增加,但大学对外语教师学历要求都在硕士以上,教育类学院培养的教师是有限的,这样造成大多数外语教师出自非教育学院,多以学语言应用为主,从事的教学工作与自己的学习专业不一致。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学方面的理论,对语言研究的方法和工具不熟悉,再加上教学与科研的方向问题,限制了专业研究的发展。

4. 科研环境欠佳

外语教师作为特殊的群体,女教师的比例大约 80%,加上社会分工的不同,由于家务多而分散了精力,在整个学校都属于重教学轻科研的大环境下,缺少学科带头人,整体科研意识淡薄。科研是教师由教书匠成为思想者,由“知识的消费者”成为“知识的生产者”的最佳途径,但学校给外语的科研条件也有限,外语学术期刊有限,发表文章难度大,搞科研困难重重。好多教师只是为了评职称才做科研,否则就不做科研,科研经验和方法的欠缺及科研成果少影响了教师群体的专业发展和科研水平。

五、外语教师学术能力构建策略

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

要》里明确提出“要紧紧抓住教师队伍‘主力军’、课程建设‘主战场’、课堂教学‘主渠道’……,形成协同效应,构建全员全程全方位育人大格局”和“要加强教师课程思政能力建设,建立健全优质资源共享机制”。基于以上种种制约因素,河南高校外语教师在外语学科创新发展方面应该构建自己的学术能力。

(一) 立德树人

高校立身之本在于立德树人,只有培养出一流人才的高校,才能够成为世界一流大学。作为高校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仅仅承担“传道、授业、解惑”的角色,仅仅完成语言教学目标这是远远不够的。习近平提出传道者自己首先要明道、信道,高校教师要更好担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因此,我们还要关注学生学习策略的培养,关注学生正确价值观、人生观的引领工作。作为高校外语教师,要采纳丰富多样的教学方法,把思想政治教育目标融于教学目标,并且贯彻于整个教学过程,尤其是在教学目标的制定和中西文化教学和活动实施过程中,充分利用新媒体和信息技术,吸收大量的案例,丰富“课程思政”的教学资源和教学活动,寓教于乐,增强时代感、吸引力、思想性和学生的参与性,注重在潜移默化中坚定学生理想信念、厚植爱国主义情怀、加强品德修养、增长知识见识、培养奋斗精神,提升学生综合素质。

(二) 加强教师科研创新观念的培养

在大数据和新信息技术的大背景下,在混合式教学风靡全球的大背景下,高校科研创新不仅体现在管理机制、机构或组织,更加体现在创新的主体——教师方面。作为高校教师,外语教师个人首先应该界定自己的身份认同,明确自己的教学身份和科研身份,明确自己的研究方向,具有创新的科研意识和科研精神。教师要发挥自主能动性,具备一定的创新意识,掌握创新的思维和方法,善于运用科学的方法,善于运用大数据和新技术,善于结合语料库和各种云平台,结合地方经济和特色研究,结合目前“以评促学”“混合教学”“素养”“大数据”等研究热点为契机,明确个人科研研究的方向。陈麦池和戴俊霞(2012)提出教师培养科研创新能力需要掌握创新的思想和方法,切实重视实践性环节,从而持续提升自身科研创新能力^[7]。因此教师在课堂教学中培养学生的思政和思辨能力的同时,还要具备一定的“实践”和“行动”能力,及时地发现问题和提出问题,及时有效的收集和分析数据,并且结合发现的问题,做出与教学研究相关的“选择”,采取相应的“行动”,构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职业发展道

路,有效提升自己的学术能力。

(三) 加强平台建设,推进教师学术能力发展

学科创新能力的发展离不开环境和氛围的支持,学校要通过创造学习氛围及建立平台推动教师学习。首先高等院校应加强外语学科资源库建设,推进智库建设;其次外语院系应该科学制订外语学科发展规划、建立学科梯队培育体系、加快外语类线上线下教师培训平台建设等。亓明俊,王雪梅(2017)建议从学习共同体的视角构建专业认同的模式^[8],教师个体可通过参加国际国内学术会议、培训、学习共同体、学习社区和 Mooc 学习,参加中国高校外语学科发展联盟^[9]等形式或者参加在国家与国家之间、高校与高校之间、高校与基础教育之间、高校与企业或者科学研究机构之间展开行动研究等方式,促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与此同时,高等院校应该进一步加强教师管理,健全激励机制。教育部印发的《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把课程思政建设成效作为“双一流”建设监测与成效评价、学科评估、本科教学评估、一流专业和一流课程建设、专业认证、“双高计划”评价、高校或院系教学绩效考核等的重要内容。从资源库平台建设、培训平台建设和激励机制平台的完善等方面综合推进教师学术能力的发展。

(五) 加强团队建设

团队是为了共同目标组成的一个群体,团队中的个体具有各自的技能并相互协作。孟亚茹等(2019)等研究跨校外语学术共同体中发现所形成的集合型专家提高了团队的整体科研能力^[10]。教师团队的建设不能仅局限于本校教师,应当引进相关领域的专家,并与企业或者其他研究机构和学校联手,形成伙伴关系,通过共同研究以及示范教学的形式,相互学习并改进自己的教学策略,提升教学质量。教育部曾发文要求加强教学团队建设,建立有效的团队合作机制,推动教学内容、方法的改革和研究,促进教学研讨和教学经验的交流。我们要找准研究点,积极组建一支结构合理、富有团队精神的学科梯队,并充分发挥学科带头人的引领作用,加强队员的学术能力培养,以培养专业基础扎实、实践能力较强,具有创新精神和国际视野,德、智、体、美全面发展的应用型、外向型专门人才为目标,构建“实基础、强能力、多方向”的教学模式。

(六) 做好外语教育学科属性定位

学科属性是指学科的本质性质和特点,阐述本学科所解决的根本问题。就外语教育而言,我国外语教育理论研究起步较晚,关于外语学科的定位众

说纷纭,学界对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仍不明晰,对其独立学科地位仍然存疑,我们要进一步提高研究水平对相关问题深入探讨,准确定位定位外语教育的学科属性。作为高校外语教师应具备一定的学术能力,对外语教育进行深入的研究,学会运用科学、规范的方法和技术,针对外语科研的研究领域(从外国语言与语言学研究、文学与比较文学研究、外语教育与教师教育发展研究到语言和经济相结合的研究、翻译相关研究、跨学科研究和特色研究等)中发现并提出的问题进行系统的研究,或者结合地方经济发展和学科发展进行特色研究。只有合理地、科学地定位了学科归属,才能把语言教育研究纳入正常的学术研究范畴,外语教师才可能更加理直气壮地加大教学投入,积极从事与外语教育相关的研究,才能够加强结构调整而实现自我革新,在语言教育的宏大舞台上找到自己的研究领域,使外语教育为我国的国家发展战略服务。

六、结束语

总结河南高校外语教师近三年在外语类专业期刊上论文发表情况,及时掌握探索河南高校外语教师科研现状、实践效果及发展趋势,不但可以为外语领域研究提供参考,也可为外语学科的特色建设提供参考。外语学科的创新发展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关系密切,在争创“一流学科”“重点学科”“特色学科”的同时,如何正确地引领高校外语教师在本领域做出高水平的研究,提升河南高校外语学科内涵发展的有效

途径——学术能力素养的提高已迫在眉睫。

参考文献:

- [1] 彭青龙. 论学科评估新趋势和外语学科内涵建设新路径[J]. 外语界, 2016(3): 34-41.
- [2] 蔡基刚. 一流本科课程与专业建设的重组新概念: 以外语学科为例[J]. 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20(3): 7-12.
- [3] 王天晓. 校长专业化建设: 教师共同体管理视角[J]. 中国教育学刊, 2012(1): 42-44.
- [4] 束定芳. 社会需求与外语学科建设[J]. 中国外语, 2017, 14(1): 22-25.
- [5] 胡开宝, 王琴. 外语学科核心竞争力要素及其构建研究: 以上海交通大学外语学科建设为例[J]. 中国外语, 2019, 16(4): 4-11.
- [6] 金胜昔, 林正军. 国内翻译认知研究的文献计量分析[J]. 外语教学, 2016, 37(5): 96-101.
- [7] 陈麦池, 戴俊霞. 高校外语教师科研创新机制研究[J]. 江苏外语教学研究, 2012(1): 27-31.
- [8] 元明俊, 王雪梅. 学习共同体视域下的大学英语新手教师专业认同: 内涵、模型与路径[J]. 外语界, 2017(6): 70-78.
- [9] 李维屏, 王雪梅. 构建学科联盟平台, 促进一流学科发展[J]. 外语界, 2019(2).
- [10] 孟亚茹, 张宪, 张妍华, 马晓梅. 基于中介调节的外语教师科研能力发展机制[J]. 现代外语, 2019(6).

(责任编辑 许峻)

Research on Developing Academic Competence of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under New Situation

YUAN Jin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 Nanyang Normal University, Nanyang, Henan 470000,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ims to mainly collect the data of the papers published by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from Henan higher education on the main 11 kinds of foreign language acquisition from the “CNKI China academic journal network publishing pool” and the literature citation amount during January 1, 2017 and December 31, 2019, analyze the focus on the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field of Henan foreign language teachers Henan higher education and their academic competence, and reveal the restriction factors of Henan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and explore how to construct the teachers’ academic competence based on the present situation, so a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Henan universities and colleges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innovation.

Key words: academic competence; construction; foreign language disciplin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论新时代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斗争精神

巩善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纪委,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斗争精神是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是党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胜利和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巨大发展成就的重要法宝。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时代,在“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即将实现的历史关键期,要教育培养、激励激发纪检监察干部保持斗争精神,坚守初心使命,忠诚干净担当,以反腐败斗争的实际成效为经济社会健康发展保驾护航。

关键词:新时代;纪检监察;斗争精神;教育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20

中图分类号:D262.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11-04

提升斗争本领,坚守斗争精神,是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正确履职尽责的重要保障。要教育培养、激励激发纪检监察干部在新的历史时期,始终保持斗争定力,坚定斗争意志、讲求斗争方法,增强斗争本领,切实扛起纪检监察工作的初心和使命,以更加坚决的态度履行“两个维护”重大政治责任,以更加坚定的意志同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作斗争,以更加有力的措施一体推进“三不”机制,一体推进“三项改革”,持续深化“三转”,以更加坚韧的魄力坚持标本兼治,全面夺取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

一、深刻理解新时代纪检监察工作斗争精神的精神实质

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伟大斗争的表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历史任务,必须准备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1]实践充分证明了保持和发扬斗争精神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十九大报告再一次指出:“实现伟大梦想,必须进行伟大斗争。我们党要团结带领人民有效应对重大挑战、抵御重大风险、克服重大阻力、解决重大矛盾,必须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2]

习近平总书记对斗争精神有过多强调和论述。2019年1月21日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坚持

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专题研讨班:各级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要加强斗争历练,增强斗争本领,永葆斗争精神,以“踏平坎坷成大道,斗罢艰险又出发”的顽强意志,应对好每一场重大风险挑战,切实把改革发展稳定各项工作做实做好。2019年9月3日在秋季学期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开班式:党员干部要发扬斗争精神,增强斗争本领。赵乐际同志在十九届中央纪委历次全会报告中对发扬斗争精神均提出明确要求: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守党性原则,敢于为党和人民的利益唱“黑脸”、当“包公”,坚决同违纪违法作斗争,决不能消极懈怠、回避矛盾、做“老好人”;坚定信仰信念信心,弘扬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秉持献身党和人民事业的崇高情怀,敢于斗争、善于斗争,在重大斗争一线学真本领、练真功夫;建设高素质专业化干部队伍,做忠诚干净担当、敢于善于斗争的战士。

二、在新时代如何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发扬斗争精神

(一)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坚守初心,做到忠诚坚定

纪检监察干部是党的忠诚卫士,作为党纪执行者、维护者和监督者,必须要把“两个维护”自觉转化为“政治基因”,做到对党绝对忠诚、对纪检监察

收稿日期:2020-09-13

作者简介:巩善鑫(1978—),男,河南尉氏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纪委副研究馆员,研究方向:廉政建设与文化传播。

事业绝对忠诚，在大是大非面前旗帜鲜明，保持坚定的政治自觉，坚决维护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把敢于斗争转化为彰显初心、对党忠诚的政治本色。纪检监察干部要在学懂弄通做实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上作表率，在坚决贯彻落实党中央路线方针政策上作先锋，在政治思想行动路线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上作模范，在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上做带头，在廉洁自律和尽职履责上做表率。还要不断提升政治鉴别力，把政治监督作为根本职责，对错误言行勇于斗争，敢于发声亮剑，面对风险敢于直面挑战。

(二)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强化使命，提升过硬本领

一要坚定斗争立场。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学懂弄通做实党的创新理论，掌握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夯实敢于斗争、善于斗争的思想根基，理论上清醒，政治上才能坚定，斗争起来才有底气、才有力量。”纪检监察干部要牢固树立政治意识、大局意识、核心意识、看齐意识，在思想行动上自觉向党中央看齐，向党的理论和路线方针政策看齐，向党中央决策部署看齐，坚决响应党中央所提倡、坚决执行党中央所决定、坚决杜绝党中央所禁止。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决维护习近平总书记党中央核心和全党核心地位，坚决维护党中央的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同一切违背、歪曲、否定党的政治路线的言行作斗争，坚决抵制破坏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行为以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等不良作风，从思想深处就把自己铸造成勇于斗争的“钢铁战士”。

二要增强斗争实力。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纪检监察干部只有不断在实践中增强自身综合实力，才能真正成为严惩腐败的钢铁拳头。要自觉提升政治敏感意识，时刻在政治思想行动上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主动学习把握理解党中央关于当前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政策方针精神，积极到脱贫攻坚、精准扶贫、环境治理、抗击疫情等急难险重的特殊岗位和“六稳”“六保”领域，加强政治能力训练，强化政治实践历练，增长政治才干，增强政治能力，涵养政治定力，驾驭政治局面，履行政治责任，提升防范政治风险的本领。要自觉提升纪检监察政策理论水平，积极贯彻党中央在新时代健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大战略举措，积极适应一体推进“三项改革”、一体推进“三不”体制机制建设的新形势新要求，更新知识板块、优化知识结构、拓展知识边界，深刻理解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党的自我监督是主

体；深刻理解在党的自我监督中，纪检监察处于主干位置；深刻理解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是“三项改革”的龙头、灵魂和基础；深刻理解“三项改革”一体推进的核心，是在党的领导下，以党的纪律检查体制改革统领国家监察体制改革和纪检监察机构改革，做到优化协同，提质增效。要自觉提升监督执纪业务能力，积极争取到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巡视巡察斗争一线经受锻炼和磨砺，在等重点任务中挑大梁，把完成急难险重任务作为提升实力的教学课堂，在亲身经历的斗争实践中经风雨、见世面，壮筋骨、长才干，学真本领、练真功夫，把自己修炼成为既有敢于斗争精神又有善于斗争本领的能够真正适应进行伟大斗争要求的忠诚卫士。

三要掌握斗争艺术。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在坚持原则、坚守信仰、坚定立场的基础上，因时因势采取最为有效的积极行动，才能达成反腐败标本兼治的目标使命。要掌握斗争精神和斗争艺术，实现监督执纪问责和监督调查处置工作的政治、纪法、社会三个效果的有机统一，政治效果要做到在监督执纪纪法全过程中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纪法效果要做到纪法双施双守，既要施行纪律，又要施行法律，既要遵守纪律，又要遵守法律；社会效果要做到以人民为中心，审查调查工作要有利于增强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厚植党执政的政治基础、群众基础。要具备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的真实功夫，还要掌握借力发力、借势谋势的巧妙方法，更要在斗争中赢得主动、取得胜利。要深化运用监督执纪“四种形态”，把纪律挺在前面，尤其是在实施第一种形态上敢于担当作为，经常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约谈函询，让“红红脸、出出汗”成为常态。要精准把握“三个区分开来”，把干部在推进改革中因缺乏经验、先行先试出现的失误和错误，同明知故犯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上级尚无明确限制的探索性实验中的失误和错误，同上级明令禁止后依然我行我素的违纪违法行为区分开来；把为推动改革的无意过失与为谋取私利的故意行为区分开来。要坚持严管和厚爱结合、激励和约束并重的方针，既严肃执行纪律，对查实的依纪依规处理，认真执行受处分党员干部教育回访制度，做好以案促改后半篇文章；又注重维护党员干部的合法权益，建立和完善干部澄清保护机制，为担当者担当、为负责者负责，激励广大干部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勇于担当尽责、大胆干事创业。要始终坚持党中央反腐倡廉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一贯方针，切实做到将教育人、挽救人、惩处人相结合，推动“不敢腐、不

能腐、不想腐”体制机制行稳致远。

(三)要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尽职履责,监督执纪执法

在强化政治监督上勇挑重担。纪检监察干部把“两个维护”作为政治监督的首要任务,就是要在思想上确立政治工作的“根”和“魂”,在督促各级党组织认真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上勇挑重担。要把政治监督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着力监督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推进“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建设情况,着力监督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全力开展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情况,着力监督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情况,着力监督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履行全面从严治党“两个责任”,营造良好政治生态情况,着力监督贯彻落实十九届中央历次全会精神、推进制度建设完善治理体系情况,着力监督执行党章党规党纪情况,着力监督履行职责和遵纪守法情况,着力监督党委重要决策部署落实情况。纪检监察干部要坚决与自行其是、各自为政,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攫取政治权力、改变党的性质,山头主义、宗派主义,码头文化、帮圈文化等违反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的错误言行作斗争,严肃党内政治生活,持续净化政治生态,确保党中央政令畅通。

在做实做细日常监督上求真务实。监督是纪检监察机关的第一职责和基本职责。要把日常监督摆在更加突出位置,着力抓好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深入学习贯彻《党委(党组)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规定》,协助党组织落实全面从严治党主体责任,打通贯通党委主体责任、书记第一责任人责任、领导班子成员“一岗双责”和纪检监察机关监督责任一体落实。着力加强对权力运行的监督约束,协助党委修订完善规章制度,健全党内监督体系,织密权力的笼子。着力做好信访举报受理工作,贯彻落实《纪检监察机关处理检举控告工作规则》,规范信访举报受理、办理、处置办法,保障党员、群众的监督权利,维护人民群众的权益。着力把严把好选人用人关,建立健全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充分利用廉政档案信息综合研判,做好廉洁意见回复工作。着力规范问题线索处置办法,严把审查调查安全关,严肃查处各种违纪违法行为,始终坚持对腐败问题的“零容忍”。着力完善巡视巡察制度,坚持巡视整改常态化制度化,注重用好专项巡察、专项督查、专项治理等“短、明、快”的监督措施,着眼防范重点领域、重要岗位和关键环节廉政风险。着力拓宽监督渠道,

实行特约监察员制度,加强自我监督,严防“灯下黑”。纪检监察干部要始终牢记初心使命,发扬新时代斗争精神,切实把监督工作落到实处、做到精细。要突出重点,紧盯重大工程、重点领域、关键岗位,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行业的监督;要找准切入点,在涉及“三重一大”、招标采购、工程建设、干部选拔等重要议题上靠前监督,查找薄弱环节,抓早抓小,防微杜渐;要讲求实效,在落实党委重大决策部署上及时跟进,梳理权力运行的漏洞,扎紧制度的笼子,既发挥监督保障执行的作用,又起到促进完善发展的作用。

在破除“四风”问题上毫不松懈。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要坚持问题导向,认真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持续解决困扰基层的形式主义问题为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提供坚强作风保证的通知》等文件精神,保持战略定力,持续监督落实中央八项规定及其实施细则精神,深挖细查“四风”问题隐形变异的种种表现,坚决防止反弹回潮、卷土重来。以领导班子、主要领导、主管领导为重点,着力整治贯彻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只表态不落实,拍脑袋决策、脱离实际、好大喜功、弄虚作假、敷衍塞责等问题。着力整治维护群众利益不担当、不作为、慢作为、乱作为等问题。着力整治文山会海、检查考核过多过滥、工作过度留痕等困扰基层工作效率工作积极性的形式主义突出问题。着力防范和查处不吃公款吃老板、违规支出变通下账、收受电子红包、分批异地办理酒席、私车公养等隐形变异问题。着力改进工作作风,针对“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中查找出的纪律作风方面突出问题,持之以恒抓整改。要坚持严的主基调,坚守每一个节点,在“长”“常”二字上下更大功夫,坚定斗争精神,对顶风违纪从严查处,对典型案例通报曝光,真正做到化风成俗。

在保持反腐败高压态势上担当作为。反腐败斗争是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方面,也是新形势下进行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的重要内容。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央对反腐败斗争的判断表述随着斗争胜利的进程不断发生变化,2015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五次全会指出,“腐败和反腐败呈胶着状态”;2016年1月,十八届中央纪委六次全会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正在形成”;2016年12月,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中央纪委七次全会报告时指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2017年10月,党的十九大作出“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的重大判断;

2018年7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首次提出,“夺取了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2019年1月11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十九届中央纪委三次全会上讲话“巩固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2020年1月13日,十九届中央纪委四次全会报告指出“进一步巩固和发展反腐败斗争压倒性胜利”。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践行斗争精神必须相当清醒、相当有意志力,坚持有贪肃贪、有腐反腐,保持战略定力,持续强化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以永远在路上的坚韧和执着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要加强对人民群众身边“微腐败”和官僚作风问题的整治力度,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要加强各类系统性反腐力度,依规依纪依法严肃查处贪污贿赂、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等职务违法和职务犯罪,坚决清除甘于被“围猎”的腐败分子,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拉拢腐蚀领导干部,以强有力的正风反腐斗争之势换来海晏河清、朗朗乾坤。

三、纪检监察干部要珍惜伟大时代,把握历史机遇

作为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我们要在“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关键转折时期奋发图强,坚持斗争,积极奋斗,有所作为。

纪检监察机关是党内的“纪律部队”,高素质专业化纪检监察干部必须养成敢于斗争、善于斗争鲜明特征,把忠诚担当、守责尽责内化为个人的性格品

质。新时代的纪检监察干部是“打铁的人”,要维护党的肌体健康,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提供坚强的政治保障和纪律保证,必须努力提高斗争本领、发扬斗争精神、敢于善于斗争、勇于夺取胜利。要始终做到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守忠诚干净担当的境界情怀,树牢为民务实清廉的政治立场,对大是大非问题敢于亮明态度,对歪风邪气问题敢于坚决斗争。同时,不断加强自身修养,提升综合素质,做到执纪执法安全、审查调查文明。

新时代纪检监察干部只有扛起管党治党政治责任,练就过硬本领,把斗争精神寓于职责使命之中,真正当好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以新时代斗争精神推动纪检监察工作高质量发展,不断把全面从严治党向纵深推进。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责任编辑 许峻)

Analysis on the Cultivation of Struggle Spirit of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s in the New Era

GONG Shanxin

(Discipline Inspection Commiss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spirit of struggle is a fine tradition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and an important magic weapon for the party to lead the people of all ethnic groups in the country to win the victory of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and the socialist revolution, as well as the great achievements in the economic and social development of reform and opening up.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has entered a new era. In the critical historical period when the “two centenary” goals are about to be achieved, we should educate, train, motivate and motivate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cadres to maintain their fighting spirit, stick to their original mission, be loyal and clean in their responsibilities, and safeguard the healthy development of the economy and society with the actual results of the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Key words: new era; discipline inspection and supervision; fighting spirit; education

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代谢过程中 相关酶类活性变化研究

张军^a, 姚虹^b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a. 化工食品学院; b. 分析检测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香气是梨果实的一个重要品质特征。经研究证明梨果实香气成分是在果实生长过程中不断形成的,在果实发育过程中酶的活性与香气的形成有直接关系。重点研究脂氧合酶(LOX)、醇脱氢酶(ADH)、醇酰基转移酶(AAT)和 β -葡萄糖苷酶(CB)等与香梨果实最相关的4种酶类。从酶活性趋势线来看,LOX,ADH和CB在香梨花后1个月左右至货架期(2~3个月)总体是先高后低,倾斜向下,变化幅度较大;而ATT变化趋势则与上述3种酶相反,酶活性总体变化出现先低后高的现象。

关键词:梨;香气;关键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21

中图分类号:S66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15-06

梨(*Pyrus spp.* *Rosaceae*)果实具有独特的香气,是构成梨的品质特征的重要因素^[1]。香气物质是在植物生长过程中经过一系列酶促反应形成的各种挥发性化合物^[1-2],是植物的次级代谢产物,其前体物质为碳水化合物、脂肪酸、氨基酸。果实香气的形成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不同发育阶段果实中的关键酶活性不同,所产生的香气物质也不同。一般在果实中香气物质分子可以分为有机酸脂类、醛类、醇、酮、挥发性萜类杂环类化合物等^[3]。对果实香气特征贡献大的香气物质称为果实特征香气物质,即使果实呈现特有香味的一类挥发性物质^[4]。各种挥发性香气小分子来源路径各不相同^[5]。

脂氧合酶(LOX)途径形成大量的直链脂肪族醇、醛、酮和酯类物质^[6]。果实中大量不饱和脂肪酸(亚油酸、亚麻酸)被专一的、高活性脂氧合酶氧化产生一系列小分子醇、酸等,构成了果实脂类香气的主体,还参与了C6己醛和己烯醛的合成^[7],这些化合物对果蔬的“新鲜”风味有重要贡献^[8],如柑橘中的(*E*)-3-己烯醇和己醛^[9-10]。番茄在不同的

成长阶段有特征的挥发性香气成分物质,成熟时有以C6分子的己醇、己醛、(*Z*)-3-己烯醛等为特征的新鲜风味物质^[11]。不饱和脂肪酸经脂氧合酶途径生成氢过氧化物,逐步经过氧化、裂解及脱氢作用转化成相应的醛类和醇类,进一步形成酯类等。LOX是脂肪酸代谢途径中的关键酶,在香气物质形成过程中醇脱氢酶(ADH)、醇酰基转移酶(AAT)等也起到重要作用^[12]。

醇酰基转移酶(AAT)是氨基酸代谢途径产生支链脂肪族醇、醛、酮和酯类物质的关键限速酶。果实中有部分氨基酸在转氨酶的作用下,通过氨基转移作用形成了支链酮酸,支链酮酸与辅酶A(Co-AS)作用生成了酰基Co-AS,然后在AAT的作用下生成酯^[13]。该途径参与香气小分子代谢合成的氨基酸主要有丙氨酸、苯丙氨酸、缬氨酸、半胱氨酸、异亮氨酸和亮氨酸等。AAT是氨基酸代谢途径酯类形成过程中的关键酶^[14],它催化酰基辅酶A中的酰基并转到相应的醇,为下一步酯类合成准备了充足的原料。其中丙氨酸、缬氨酸、异亮氨酸和亮氨酸为

收稿日期:2020-11-10

基金项目: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园艺学重点学科基金(2016-10758-3)

作者简介:张军(1978—),男,河南南阳人,博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食品代谢组学。

甲基支链酯合成的前体物质。部分果实中的酯香型、果香型特征香气成分是通过氨基酸代谢途径产生的,如柑橘^[15]。

醇脱氢酶(ADH)在LOX途径中主要依赖NAD,广泛参与直链醛、支链醛、芳香醛等与对应醇之间的转化,是植物香气物质合成中最重要的酶。在氨基酸代谢中,氨基酸在脱羧酶作用下生成醛,然后在醇脱氢酶的作用下生成酸。另外,单糖经无氧代谢产生丙酮酸,在ADH作用下氧化脱羧形成乙酰辅酶A,进而合成某酸乙酯或乙酸某酯等^[16]。

β -葡萄糖苷酶(CB)作用下的键合态香气也是水果香气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一种潜香型化合物,与植物中的糖类物质通过糖苷键结合形式存在于植物中,一般是 β -D-葡萄糖^[17],不具挥发性,在酸或酶的作用下水解释放后,从水果中挥发出来,可以被人们感受到,这种相对直接被人们感受到的香气就是自由态香气^[18]。目前有人研究认为,键合态香气的数量和种类在个别水果中远高于自由态香气^[19],它们共同作用,构成了水果的基本风味和特征香气^[20]。因此, β -糖苷酶作为外源的水解酶,已被广泛确认能够水解植物中的键合态香气的糖苷键,使香气得到释放^[21]。

库尔勒香梨以独特而浓郁的香味著名,怡人的果实香气可以吸引消费者并增强果品的市场竞争力。近年来,人们对果品香气及贮藏过程中内容物质变化越来越关注,但对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的形成和衰减生理机制的研究分析很少,尤其是对库尔勒香梨香气成分与相关酶的相关性的研究鲜有报道。以库尔勒香梨为试验材料,对其挥发性香气相关酶活性进行系统研究,旨在阐明库尔勒香梨果实挥发性物质代谢调控机理,也为今后新疆梨品种选育、栽培管理、采后贮藏、果实品质改善等技术提供理论依据。

1 材料与方法

1.1 试验材料

供试材料来自新疆库尔勒沙依东园艺场梨园(北纬41°43'56",东经86°1'59";北纬41°43'17",东经86°2'18"),25年左右树龄香梨树(间种授粉树为砀山梨),采样时间选在中午(12:00~14:00)进行,选择生长正常、无病害的库尔勒香梨植株果实。每隔30天左右采样一次,冰盒冰鲜运至昌吉市实验室,放置于-80℃冰箱超低温保存备用。

1.2 试剂与仪器

氢氧化钠、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正丁醇、盐酸、氯化镁、乙醛、柠檬酸、石英砂:均为分析纯,天津

市福晨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亚油酸、Tween 20、聚乙烯吡咯烷酮(PVP)、交联聚乙烯吡咯烷酮(PVP)、TritonX-100、三羟甲基氨基甲烷(Tris)、5,5-二硫代双(2-硝基苯甲酸)(DTNB)、对硝基苯基- β -葡萄糖苷(pNPG)、对硝基苯酚(PNP)、2-吗啉乙磺酸(MES)、二硫苏糖醇(DTT):上海麦克林生化科技有限公司;尼克酰胺腺嘌呤二核苷酸(NADH)、乙酰-CoA:罗氏(中国)有限公司;水:色谱纯。

UV-2450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日本岛津公司;BS210S电子天平:德国Sartorius公司;冷冻离心机:德国Eppendorf公司;HHS-1电热恒温水浴锅:上海齐欣科学仪器有限公司;W-HL328超低温冰箱:中科美菱低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GL-4L冷藏保温箱:广州佳冷冷藏科技有限公司;移液器: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有限公司;10L液氮罐:查特生物医疗(成都)有限公司。

采用Excel进行实验数据处理分析,使用origin 9.0作图。

1.3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LOX酶活性测定

参照詹萍^[22],Liburdi^[23]等方法并做适当修改。

反应底物:在溶有0.1g Tween 20重蒸水中加入50 μ L亚油酸,用NaOH溶液(1 mol/L)滴定至澄清,调节pH在9.0左右,用重蒸水定容至25 mL,冷藏备用。

粗酶液提取:称取10.0g库尔勒香梨,立即在液氮下研磨成粉末,加入1.0g PVP,5 mL预冷的0.005 mol/L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缓冲液(pH 7.0),5 mL TritonX-100(1%),冰浴环境研磨成匀浆,在0℃下于7000 r/min离心30 min,上清液在4℃下于7400 r/min离心15 min,取出上清液,并用相应的缓冲液定容至10 mL,即得粗酶液,4℃保存备用(-30℃冰箱保存)。

LOX酶活性测定:酶反应体系为3 mL,包括2.88 mL pH 7.0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缓冲液(0.05 mol/L),0.1 mL亚油酸反应底物和0.02 mL酶液。反应体系加入酶液后倒转3次(15 s左右),于室温下在波长234 nm处测定吸光度的变化值,即 ΔOD_{234} (每隔20 s记录一次吸光值,共记录3 min)。酶活力以每分钟吸光值变化0.001为一个活性单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作为空白对照。

1.4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ATT酶活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Fellman^[24],张晓萌^[25]等并做适当修改,稍加改进。

反应底物:10mmol/L 正丁醇。

粗酶液的提取:取 3 g 果肉,加 0.1 g PVPP 和 6 mL 0.1mol/L 磷酸缓冲液 (pH 7.0),在冰浴环境充分研磨成匀浆,在 4℃ 下于 16000 r/min 离心 30 min,上清液用于酶活性的测定。

酶活性测定:反应体系由 2.4 mL 的 0.5 mol/L Tris - HCl 缓冲液 (pH7.0),11.6 mmol/L MgCl₂,0.3 mmol/L 乙酰 - CoA,10 mmol/L 正丁醇和 0.6 mL 酶液组成。各组分混合后置于 35℃ 水浴 15 min,然后添加 150 μL 10 mmol/L DTNB,在室温下放置 10 min,用紫外分光光度计在 412 nm 下测定吸光值,重复 3 次。酶活性以 ΔOD_{412} 表示,酶活力以每分钟吸光值变化 0.001 为一个活性单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作为空白对照。

1.5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醇脱氢酶 ADH 活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 Longhurst T J^[26],A Echeverría G^[27] 等方法,做适当修改并改进。

反应底物:0.15mL 的 0.08 mol/L 乙醛。

粗酶液的提取:取 3.0 g 果肉冷冻组织,液氮充分研磨呈粉末状,加入 6 mL 经预冷 (4℃) 的提取液,组成如下:0.1 mol/L MES - Tris 缓冲液 (pH 6.5),2mmol/L DTT,1% PVP。充分混匀、浸提,4℃ 下于 15000 r/min 离心 30 min,上清液用于 ADH 活性测定。

酶活性测定:3 mL 反应体系由 2.4 mL 的 MES - Tris 缓冲液 (pH 6.5),0.15 mL 的 1.6 mmol/L NADH,0.15 mL 的 0.08 mol/L 乙醛和 0.3 mL 的粗酶液组成,反应温度为 30℃,于 340 nm 下测定 ADH 活性。加酶液后 15 s 开始计时,记录 1min 内吸光度 OD 值变化,重复 3 次。酶活力以每分钟吸光值变化 0.001 为一个活性单位。

空白对照:按上述方法处理加热失活的粗酶液,作为空白对照。

1.6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中 β - 葡萄糖苷酶 CB 活性测定

本方法参照詹萍^[28]、李华^[29] 等方法,做适当修改并稍加改进。

粗酶液提取:称取 10.0 g 库尔勒香梨,立即在液氮下研磨成粉末,加入 1.0 g PVP,0.2 g 石英砂,5 mL 预冷的 0.05 mol/L 磷酸氢二钠 - 柠檬酸缓冲液 (pH 6.0),冰浴环境研磨成匀浆,4℃ 下于 10000 r/min 离心 20 min,上清液 4℃ 下于 14400 r/min 离心 10 min,取出上清液,并用缓冲液定容至 10 mL,得粗

酶液。其余保存在 -30℃ 冰箱中备用。

活性测定:在 10 mL 具塞试管中依次加入 0.6 mL 缓冲液、1.0 mL 粗酶提取液和 0.2 mL 10 mmol 对硝基苯基 - β - 葡萄糖苷,迅速盖上试管塞,立即放至 35℃ 水浴中,反应 60 min 后立即加入 2.5 mL 1 mol/L Na₂CO₃ 溶液终止反应,在对硝基苯酚的最佳吸收波长 400 nm 处测吸光值。

空白对照:0.2 mL 的 10 mmol pNPG 用 0.2 mL 磷酸氢二钠 - 柠檬酸缓冲液 (pH6) 代替酶粗提液,其他同上。

对硝基苯酚标准曲线:准确称量对 PNP (WM139.1)139.0 mg,用蒸馏水定容至 1 L。分别吸取 1,2,3,4,5,6 mL 溶液至 100 mL 容量瓶中,用 1 mol/L Na₂CO₃ 溶液定容后混匀。使 1 mL 稀释液中分别含有对硝基苯酚 0.01,0.03,0.05 μmol,利用对硝基苯酚的标准曲线方程计算出所生成的对硝基苯酚的浓度。

2 结果与分析

果实香气是果实性状之一,性状的产生和表现受到各种酶的控制^[30]。本研究选择的果实香气合成代谢的 4 种关键酶类,即 LOX,ATT,ADH 和 CB 在库尔勒香梨香气合成代谢过程中活性变化各有特点,具体说明如下。

2.1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脂氧合酶 LOX 活性变化

LOX 途径是果实香气脂肪酸代谢途径初始过程中重要的限速酶,决定 LOX 途径的顺利进行,为后续的转化过程提供底物,它与植物的器官发育及果实成熟有很大关系^[31]。

由图 1 上可见,库尔勒香梨果实从花后 1 个月左右 LOX 酶活力为 $\Delta OD_{234} 0.0094g^{-1} \cdot min^{-1}$,开始缓慢增加,在 7 月份猛然到达最大 $\Delta OD_{234} 0.0724g^{-1} \cdot min^{-1}$,然后 LOX 酶活性开始下降。从活性变化趋势线上看总体呈现下降趋势,这与果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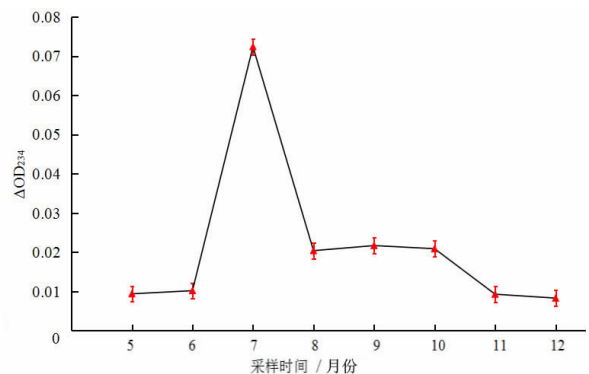


图 1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LOX 酶活性变化

中 LOX 作用底物有关^[32],在植物膜脂中富含的亚油酸和亚麻酸是其主要的反应底物^[33]。在香梨成熟采摘后 10 月份至 12 月份活性一直平缓下降。

2.2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ATT 活性

在香梨发育及其货架期,ATT 的活性变化总体趋势倾斜向上,与 ATT 活性变化趋势走向相反,但是从走势图上看,变化总体上与 LOX 活性变化相类似。AAT 是催化 LOX 酯类合成的最后一步,是参与酯类途径中的最终限速酶,是氨基酸代谢的关键酶,它可以催化醇类底物与酰基 - CoA 酯化为相应的酯类物质^[34],从而生成果实酯类香气成分中的特征香气。

由图 2 可见,香梨果实从花后 1 个月左右 ATT 活力为 $\Delta OD_{412} 0.012g^{-1} \cdot min^{-1}$,6 月份稍微缓慢降低至 $\Delta OD_{412} 0.0102g^{-1} \cdot min^{-1}$,然后开始抬升,至 9 月份到达最大 $\Delta OD_{412} 0.0227g^{-1} \cdot min^{-1}$,然后到达 10 月份 ATT 活性开始平缓下降至 12 月份。在香梨果实发育前期活性变化不稳定,但随着果实成熟逐渐升高随后下降至平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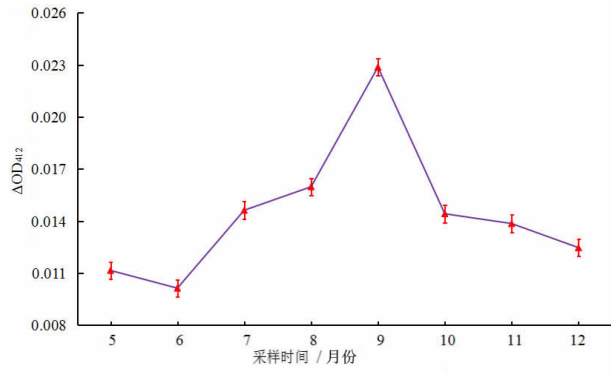


图 2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ATT 酶活性变化

2.3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ADH 活性

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ADH 活性变化较大。参与植物体内各种醇类与相应醛类物质之间的相互转化反应^[35]。从图 3 可见,ADH 活性从香梨果实花后 1 个月左右从最低点 $\Delta OD_{340} 0.0029g^{-1} \cdot min^{-1}$ 开始剧烈增高,7 月份达 $\Delta OD_{340} 0.0346g^{-1} \cdot min^{-1}$ 后开始缓慢下降。8 月份至 10 月份 ADH 酶活降低较为平缓,从 $\Delta OD_{340} 0.0280g^{-1} \cdot min^{-1}$ 缓慢降至 $\Delta OD_{340} 0.0256g^{-1} \cdot min^{-1}$,从香梨生理上说,这段时间香梨开始成熟,果园一般 9 月份至 10 月份开始采摘。ADH 酶活平稳,说明在香梨果实内香气的 LOX 途径、氨基酸途径和糖代谢途径生化反应进行平稳,合成和代谢进入平台期。此后香梨果实 ADH 活性又降低迅速,11 月份降至 $\Delta OD_{340} 0.0129g^{-1} \cdot min^{-1}$,继续降低至 12 月份 ΔOD_{340}

$0.0107g^{-1} \cdot min^{-1}$ 。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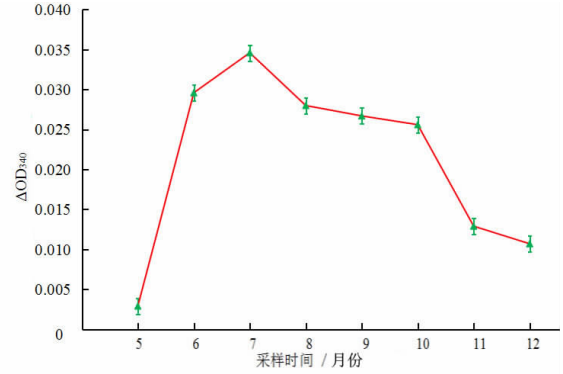


图 3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ADH 酶活性变化

2.4 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CB 活性

研究 CB,即研究 β - 葡萄糖苷酶活性,目的在于分析和寻找键合态香气产生的机理及其与自由态香气的关系。植物中多种次级代谢产物的糖基化复合物,相对应的,植物中必然存在着能够催化这些次级代谢产物糖苷的葡萄糖苷酶^[36]。因此实验以对硝基苯酚做标准曲线,得标准曲线方程 $y = 0.05253x - 0.0003$,相关系数 $R^2 = 0.99989$,考察 β - 糖苷酶的活性,说明相关性极好。通过标准曲线检测香梨坐果 1 个月(5 月中旬)的 CB 活性为 $\Delta OD_{400} 0.1705g^{-1} \cdot min^{-1}$,变化如图 4 所示继续升高,在 6 月中旬达到 $\Delta OD_{400} 0.1990g^{-1} \cdot min^{-1}$,从整个动态图上看 6 月份 β - 葡萄糖苷酶活性最高,并且以此为拐点开始下降,8 月份降至 $\Delta OD_{400} 0.044g^{-1} \cdot min^{-1}$,此后下降趋势平缓,从 8 月份到 11 月份的变化很小。至货架期 12 月份则降至 $\Delta OD_{400} 0.014g^{-1} \cdot min^{-1}$ 。香梨果实整个发育生长阶段以致货架期(保存 3 个月,10 月中旬采收,12 月中旬最后一次检测) β - 葡萄糖苷酶活性呈现下降趋势,在果实膨大期(6 月份)达到最大,随后开始持续下降。总体趋势与前人对京白梨研究一致^[31]。但有些许差异,有待进一步考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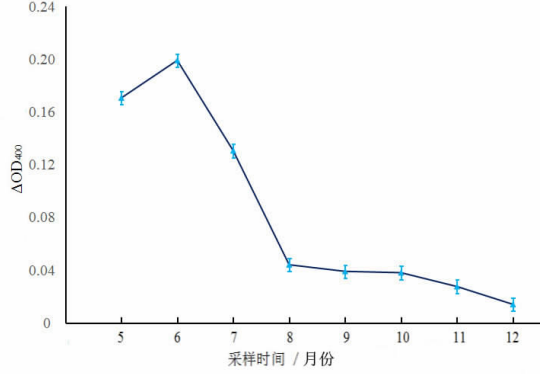


图 4 香梨果实不同时期 CB 酶活性变化

3 讨论

一切生命活动都是在酶的参与下进行的^[37]。果实的香气物质(芳香性挥发物质)是由果实组织中一些前体物质(包括糖、氨基酸、脂肪等)在酶的作用下通过特殊的代谢合成途径形成的^[38-39]。不同的途径酶的作用不同,但是生物的代谢途径是错综复杂的,某种酶既是这个途径的限速酶,也可能是另一个代谢途径的关键酶^[40]。在果实(植物)组织中参与香气合成的关键酶主要有脂氧合酶(LOX)、醇脱氢酶(ADH)和醇酰基转移酶(AAT)等,而 β -葡萄糖苷酶近年来成为与香气代谢相关的研究热点,如范刚^[20]、何芒芒^[21]等对柑橘生长发育过程中 β -葡萄糖苷酶的活性做了系统研究。

本文在总结前人研究的基础上,重点研究了LOX,ADH,ATT和CB等与香梨果实最相关的4种酶类,其中前3种酶和果实的自由态香气相关较为紧密,CB主要目的在于分析香梨生长发育过程中键合态香气的代谢规律。从4种酶活性趋势线来看,LOX,ADH和CB在香梨花后1个月左右至货架期(2~3个月)总体是先高后低,倾斜向下,变化幅度较大;而ATT变化趋势则与上述3种酶相反,酶活性变化出现先低后高的现象。另外,4种酶的活性变化最高点不一定是香梨最佳采摘期,这与前人对其他果实相同酶活性变化的研究结果不一致^[20-21,31,41],变化基本都在香梨最佳采摘期前,即果实的膨大期;酶活性变化趋势与前人研究结果相似。

4 小结

果实的香气代谢属于次生代谢范畴,在各种代谢途径之间酶的作用至关重要,也决定了果实的特征香气^[42]。酶对研究条件要求严格,是极易变性的催化蛋白质,因此在实验操作中必须为其提供一个对于酶本身而言相对适合的环境,尽可能模拟果实的组织体系等。

参考文献:

[1] GONDA I, BAR E, PORTNOY V, et al. Branched Chain and Aromatic Amino Acid Catabolism Into Aroma Volatiles in Cucumis Melo L. Fruit[J]. Journal of Experimental Botany, 2010, 61(4): 1111 - 1123.

[2] SCHWAB W, DAVIDOVICH - RIKANATI R, LEWIN-SOHN E. Biosynthesis of Plant - Derived Flavor Compounds [J]. The Plant Journal, 2008, 54(4): 712 - 732.

[3] 段振华. 高级食品化学[M]. 北京: 中国轻工业出版社, 2012: 247.

[4] 卢娟芳, 郑惠文, 郑巧, 等. 新疆杏果实发育过程中香气

物质的变化及其特征成分的确定[J]. 园艺学报, 2016 (10): 1878 - 1890.

[5] QIN G, TAO S, ZHANG H, et al. Evolution of the Aroma Volatiles of Pear Fruits Supplemented with Fatty Acid Metabolic Precursors [J]. Molecules, 2014, 19(12): 20183 - 20196.

[6] FEUSSNER I, WASTERNAK C. The Lipoygenase Pathway [J]. Annual Review of Plant Biology, 2002, 53(1): 275 - 297.

[7] 曲清莉, 傅茂润, 代红飞. 脂氧合酶(Lox)在脂肪酸氧化中的作用研究进展[J]. 食品研究与开发, 2015(10): 137 - 142.

[8] BAYSAL T, DEMIRD VEN A. Lipoygenase in Fruits and Vegetables: A Review[J]. Enzyme and Microbial Technology, 2007, 40(4): 491 - 496.

[9] SCHIEBERLE P, MESTRES M, BUETTNER A. Characterization of Aroma Compounds in Fresh and Processed Mandarin Oranges[M]//Freshness and Shelf Life of Foods. 2002: 162 - 174.

[10] TIETEL Z, PLOTTO A, FALLIK E, et al. Taste and Aroma of Fresh and Stored Mandarins[J]. Journal of the Science of Food and Agriculture, 2011, 91(1): 14 - 23.

[11] 王利斌, 李雪晖, 石珍源, 等. 番茄果实的芳香物质组成及其影响因素研究进展[J]. 食品科学, 2016: 1 - 18.

[12] PORTA H. Plant Lipoygenases Physiological and Molecular Features [J]. PLANT PHYSIOLOGY, 2002, 130(1): 15 - 21.

[13] 李秋棉, 罗均, 李雪萍, 等. 果实香气物质的合成与代谢研究进展[J]. 广东农业科学, 2012, 39(19): 104 - 107.

[14] 程焕, 陈健乐, 周晓舟, 等. 水果香气物质分析及合成途径研究进展[J]. 中国食品学报, 2016, 16(1): 211 - 218.

[15] ROUSEFF R L, RUIZ PEREZ - CACHO P, JABALPURWALA F. Historical Review of Citrus Flavor Research During the Past 100 Years [J].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Food Chemistry, 2009, 57(18): 8115 - 8124.

[16] 陈美霞. 杏果实风味物质的组成及其遗传特性的研究 [D]. 泰安: 山东农业大学, 2005.

[17] 任婧楠, 董曼, 杨子玉, 等. 树莓汁中键合态香气物质提取方法及糖基组成的研究[J]. 现代食品科技, 2015(8): 316 - 322.

[18] 范刚, 王可兴, 潘思轶. 水果中糖苷键合态香气物质的研究进展 [J]. 中国农业科学, 2010, 43(24): 5100 - 5111.

[19] STAHL - BISKUP E, INTERT F, HOLTHUIJZEN J, et al. Glycosidically Bound Volatiles - A Review 1986—1991 [J]. Flavour and Fragrance Journal, 1993, 8: 61 - 80.

[20] 范刚. 柑橘及其加工制品中游离态和键合态挥发性物质的研究 [D]. 武汉: 华中农业大学, 2010.

[21] 何芒芒. 柑橘中糖苷香气前体物质及 β -葡萄糖苷酶活

- 性变化相关性研究[D]. 武汉:华中农业大学,2013.
- [22] 詹萍,徐将,田洪磊,等. 库尔勒香梨脂氧合酶活性测定及不同贮藏中活性变化研究[J]. 食品科技,2014(2):40-43.
- [23] LIBURDI K, BENUCCI I, LOMBARDELLI C, et al. Identification and Characterization of Lipoxygenase in Fresh Culinary Herb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Food Properties*, 2016, 20(7):1470-1478.
- [24] FELLMANR J K, MILLE T W, MATTINSON D S. Factors that Influence Biosynthesis of Volatile Flavor Compounds in Apple Fruit [J]. *HortScience*, 2000, 35(6):1026-1033.
- [25] 张晓萌. 桃果实成熟过程中香气成分形成及其生理机制研究[D]. 杭州:浙江大学,2005.
- [26] LONGHURST T J, TUNG H F, BRADY C J. Developmental Regulation of the Expression of Alcohol Dehydrogenase in Ripening Tomato Fruits [J]. 1990, 14(6):421-433.
- [27] ECHEVERR A G, GRAELL J, LÓPEZ M L, et al. Volatile Production, Quality and Aroma Related Enzyme Activities During Maturation of Fuji Apples [J]. *Postharvest Biology and Technology*, 2004, 31(3):217-227.
- [28] 詹萍,田洪磊,杜娟. 库尔勒香梨中 B-葡萄糖苷酶活的测定及不同贮藏条件下活性变化的研究[J]. 现代食品科技,2008,24(11):1104-1107.
- [29] 李华,高丽. 葡萄浆果中 B-葡萄糖苷酶活性测定条件的研究[J]. 酿酒科技,2007(8):146-149.
- [30] DELLAPENNA D. Plant Metabolic Engineering [J]. *Plant Physiology*, 2001, 125(1):160-164.
- [31] 魏建梅,齐秀东,张海斌,等. 京白梨果实采后 Pg、糖苷酶和 Lox 活性变化及其基因表达特性[J]. 园艺学报, 2012(1):31-39.
- [32] SIEDOW J N. Plant Lipoxygenase: Structure and Function [J]. *Annual Review of Plant Physiology and Plant Molecular Biology*, 1991, 42(1):145-188.
- [33] 胡廷章,胡宗利,屈霄霄,等. 植物脂肪氧化酶的研究进展[J]. 生物工程学报, 2009, 25(1):1-9.
- [34] 乌云塔娜,康秀,马腾. 中国梨醇-酰基转移酶(Aat)基因的克隆及遗传多态性:第六届全国梨科研、生产与产业化论坛会,保定,2011[C].
- [35] 靳亚忠. 甜瓜醇脱氢酶基因家族成员鉴定、分类及表达调控[D]. 沈阳:沈阳农业大学,2014.
- [36] 李倩. B-葡萄糖苷酶基因在调控果实成熟及内源 ABA 水平中的作用分析[D]. 北京:中国农业大学, 2015.
- [37] 王镜岩. 生物化学:上册[M]. 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 [38] GORMLEY T R. *Aroma in Fruit and Vegetables* [M]. New York: Academic Press, 1981:1-18.
- [39] TOMASBARBERAN, ROBINS F, RICHARD J. *Phytochemistr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1997:398.
- [40] C S, M O J, G P A. *Aroma Biochemistry of Fruits and Vegetables* [J]. *proceedings of the Phytochemical Society of Europe*, 1996(41):125-156.
- [41] 刘鑫泉,段小强,李映志,等. 波罗蜜果实成熟过程中香气物质形成相关酶的活性变化[J]. 安徽农业科学, 2016, 44(13):141-143, 166.
- [42] AMARO A. Modulation of Aroma Volatiles and Phytochemical Quality of Fresh-Cut Melon (*Cucumis Melo L.*) by Oxygen Levels, 1-Methylcyclopropene and Lysophosphatidylethanolamine [D] Universidade Católica Portuguesa, 2012.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the Changes of Related Enzyme Activities During Aroma Metabolism of Korla Fragrant Pear

ZHANG Jun^a, YAO Hong^b

(a.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b. Center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Aroma is an important quality characteristic of pear fruit. It has been proved that the aroma components of pear fruit are formed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growth, and the enzyme activity is directly related to the formation of aroma in the process of fruit development. In this paper, we focused on the four enzymes related to Fragrant Pear Fruit: LOX, ADH, ATT and CB. From the four enzyme activity trend lines, LOX, ADH and CB were first high and then low, inclined downward, and the change range was large; but the change trend of ATT was opposite to the above three enzymes, and the enzyme activity changed first high and then low.

Key words: pear; aroma; key enzyme

微纳米级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复合效益对蓝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马欠, 郭锋锋, 邓敏, 刘燕, 赵菊, 晁江琴, 沈波

(昭通学院 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 云南 昭通 657000)

摘要:通过添加不同浓度和不同粒径的微塑料,研究其对集胞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结果表明,微塑料的浓度和粒径对集胞藻的吸光度(OD_{680})、叶绿素荧光(Fv/Fm)和叶绿素a有影响,当微塑料DEHP浓度超过10mg/L时,浓度越高对集胞藻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纯塑料浓度为10mg/L,粒径为200 μ m时对集胞藻生长产生明显抑制作用。当微塑料浓度超过阈值后,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产生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关键词:微塑料;集胞藻;生长;叶绿素荧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22

中图分类号:X17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21-04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塑料制品由于在日常生活和商业活动中的广泛用途,已成为人类活动不可或缺的一部分。1970年代,美国国家科学院估计每年流入世界海洋的塑料通量为4.5万吨,相当于全球塑料产量的0.1%,2010年全球塑料的年产量已达2.65亿吨。人们对海洋中当前塑料存储量的估计是1970年代对释放到开放海洋中的漂浮塑料的保守一阶估计的100倍^[1]。

进入环境中的塑料会逐渐破碎,最终形成更小的碎片,粒径小于5mm的塑料碎片和颗粒称为微塑料^[2]。塑料及其相关的化学同源物进入陆地和水生栖息地,环境中微塑料的存在已在水生和陆地生态系统中得到广泛应对和证实^[3]。现有研究中发现微塑料的存在对整个生态系统构成了巨大的威胁,对海洋、湖泊、河流、沿海地区甚至极地地区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4]。有学者发现塑料会破碎成微纳米级微塑料,研究微纳米级微塑料成为国际国内的趋势^[5-6]。

浮游生物作为水中食物链的最基础一环,对于水生生态系统功能维系具有关键作用^[7-8],浮游植物是水生生物的物质基础^[9]。叶绿素荧光分析技术

以光合作用理论为基础,利用体内叶绿素为天然探针,研究各种植物光合生理状况及外界因子对其影响的活体测定和诊断技术。叶绿素荧光动力学技术是用于评鉴作物耐受逆境能力的一项热门技术,被称为测定环境胁迫下响应快速、无损伤的探针^[10]。1931年,德国Hirsch和Kautsky发现,绿色植物的叶片、藻液等经过暗适应一段时间后,经可见光照射,绿色植物叶片或藻类会发出微弱的暗红色的荧光信号,荧光信号的强弱随时发生变化,这个变化过程也称为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即Kautsky效应^[11]。

对于叶绿素荧光,多数文献主要是对光响应曲线(OJIP)中 Fv/Fm 这一指标进行解读,并未充分考虑能量分配比率和反应中心比活性参数^[12-13]。以微纳米级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对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为主要研究对象,结合相关研究,重点研究微纳米级微塑料对蓝藻的生长及其叶绿素荧光的影响。此外,考虑到现实环境中塑料材质基本上添加有多种添加剂,因此也对具有多种添加剂的不同微纳米级微塑料对藻的生长及其叶绿素荧光进行研究。通过对微塑料材质进行萃取,检测塑料添加剂。

收稿日期:2020-11-23

基金项目: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2020J0740)

作者简介:马欠(1993—),女,云南昭通人,硕士,昭通学院地理科学与旅游学院教师,研究方向为水环境污染。

1 材料与方法

1.1 实验材料

实验所用的藻种为集胞藻,购自中国科学院武汉水生生物研究所,营养液选用 BG-11 培养。

1.2 实验方法

1.2.1 集胞藻的培养和实验过程

采用 BG-11 培养基进行培养,预选藻种为集胞藻作为受试藻。配置 5L 培养基作为调试藻密度的营养液,所有玻璃器皿都经过灭菌锅消毒处理。初始藻的密度控制为 0.11 (以吸光度表示),选用 3 种微塑料尺寸分别为 200 μm ,300 μm 和 5mm。为了验证微塑料尺寸绝大多数处于该尺寸,使用体式显微镜做粒径分析,设置进入藻液的微塑料最终浓度为 5mg/L 和 250mg/L。研究不同浓度对藻的影响,微塑料浓度分别设置为 0,0.5,5,10,25,50mg/L,每组设置 3 个平行样。测定时间为 1,12,24,48,96h。每天摇晃锥形瓶 3~5 次,然后取样测定藻的吸光度、叶绿素 a、光响应曲线(OJIP)。

1.2.2 各参数的测定

(1) 微塑料添加剂的测定

取非纯及纯的微塑料 1g,倒入带玻璃盖的小试管中,然后加入乙腈饱和正己烷 10mL。超声 1h,然后静止 12h,过 0.22 μm 的有机相滤膜。放入棕色测样瓶,待测。设置气相进样口温度为 250 $^{\circ}\text{C}$,初始温度为 80 $^{\circ}\text{C}$ 。升温至 280 $^{\circ}\text{C}$,保持 15min。设置质谱扫描范围 45~450,与气相运行时间一致。通过匹配库进行塑料添加剂的判断。针对增塑剂类选择离子峰 149 作为判定邻苯二甲酸酯的判断峰。

(2) OD 值的测定

被检测物吸收的光密度,也称为吸光度,检测单位用 OD 值表示。实验开始后在规定时间内取样 1 次,吸取 2.5mL 于比色皿中,紫外分光光度计测量其 OD 值,空白校准用 BG-11 营养液。

(3) 叶绿素荧光参数的测定

取 2.5mL 藻液放入比色皿中,暗适应 5min 后,用叶绿素荧光仪(FL3500,PSI,捷克)直接测得。

1.3 数据处理分析

应用 SPSS20.0 软件对数据进行分析,用 origin8.0 绘图。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浓度和尺寸纯微塑料共同胁迫对集胞藻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不同尺寸纯微塑料对集胞藻 OD 值的影响见图 1。微塑料粒径分别为 200 μm ,350 μm 和 5mm,浓度设置为 50mg/L 和 250mg/L。从图 1 中可以看出,不

同尺寸对吸光度值的影响较小,微塑料浓度为 250mg/L 和粒径为 200 μm 时的 OD 值相对较低,空白组以及藻液微塑料浓度 250mg/L 和粒径 5mm 组的 OD 值相对较高。说明粒径的大小对微藻生长有一定的影响,当微塑料浓度相同时,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的胁迫作用越明显。72h 测得微塑料浓度-粒径分别为 50mg/L-200 μm ,50mg/L-350 μm ,250mg/L-200 μm ,250mg/L-350 μm ,250mg/L-5mm 时,微藻 OD 值分别为 0.42,0.41,0.41,0.42,0.42。OD 值相对较低的两个组为 50mg/L-350 μm 和 250mg/L-200 μm 组,说明微塑料浓度对微藻生长影响较小,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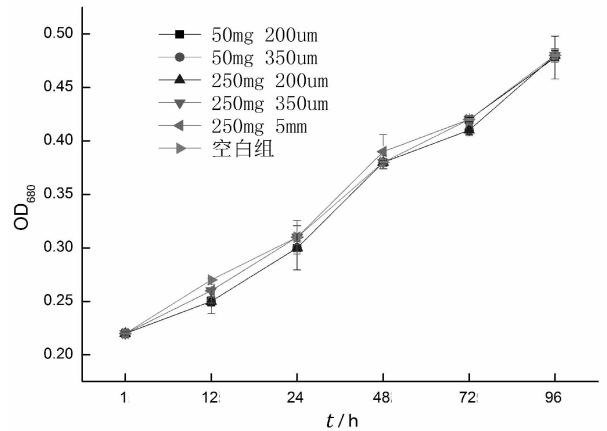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尺寸微塑料集胞藻 OD 值的影响

不同尺寸纯微塑料对集胞藻叶绿素荧光值(Fv/Fm)的影响见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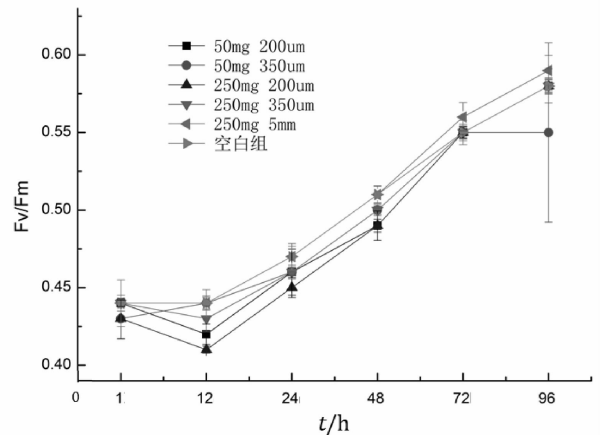


图 2 不同尺寸微塑料集胞藻 Fv/Fm 的影响

72h 前,Fv/Fm 值相对较低的组是微塑料浓度和粒径为 250mg/L-200 μm 组,在相同的浓度条件下,粒径最小的组 Fv/Fm 最低。微塑料粒径相同时,不同微塑料浓度下 Fv/Fm 变化不明显。50mg/L-200 μm 组与 250mg/L-200 μm 组相比较,在相同的微塑料粒径胁迫下,250mg/L-200 μm 组微藻 Fv/

Fm 比 50mg/L - 200um 组相应变低,说明高浓度微塑料对微藻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对比 250mg/L - 200um, 250mg/L - 350um 和 250mg/L - 5mm 组, Fv/Fm 值最低的是 250mg/L - 200um 组, 在同样的微塑料浓度条件下, 微塑料粒径越小, 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从 6 组数据可以看出, Fv/Fm 最低的是 250mg/L - 200um 组, 即微塑料浓度最高和粒径最小, 说明微塑料高浓度低粒径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最明显。

2.2 不同浓度纯微塑料对集胞藻吸光度值(OD₆₈₀)的影响

分别在装有藻液的三角瓶中添加增塑剂 DEHP。DEHP 为无色无臭液体, 不溶于水, 溶于乙醚、乙醇、矿物油等, 由辛醇或异辛醇(2-EH)和邻苯二甲酸制成。将 DEHP 浓度分别设置为 0, 0.5, 5, 10, 25, 50mg/L, 测微藻 OD 值的变化, 判断不同浓度微塑料对微藻生长的影响。从图 3 中可以看出, 微藻 OD 值增长最快的为空白组, 增长最慢的为增塑剂浓度设置为 25mg/L 组和 50mg/L 组, 两组高浓度增塑剂对微藻生长产生一定的抑制作用。通过分析可知, 96h 时, 增塑剂浓度为 0.5, 5, 10, 25, 50mg/L 组的 OD 值分别比空白组减少了 4.44%, 8.19%, 1.87%, 17.36%, 18.54%。50mg/L 组 OD 值减少量最高。由此可知, 微塑料对微藻的生长产生一定影响, 且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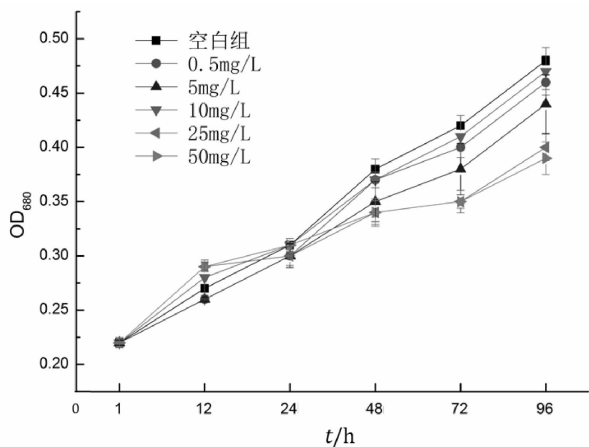


图 3 不同浓度微塑料集胞藻 OD₆₈₀ 的影响

不同浓度 DEHP 对集胞藻叶绿素荧光值 (Fv/Fm) 的影响见图 4, DEHP 浓度分别为 0, 0.5, 5, 10, 25, 50mg/L 的 6 个组中, Fv/Fm 下降最不明显的是空白组, 没有添加增塑剂; 下降最明显的组是 DEHP 浓度为 25mg/L 和 50mg/L 组, 说明 DEHP 浓度为 25mg/L 和 50mg/L 时对集胞藻的生长产生抑制作用。除了空白组 Fv/Fm 缓慢上升外, 其他浓度组都以不同程度下降, 浓度越高下降越明显, 说明微塑

料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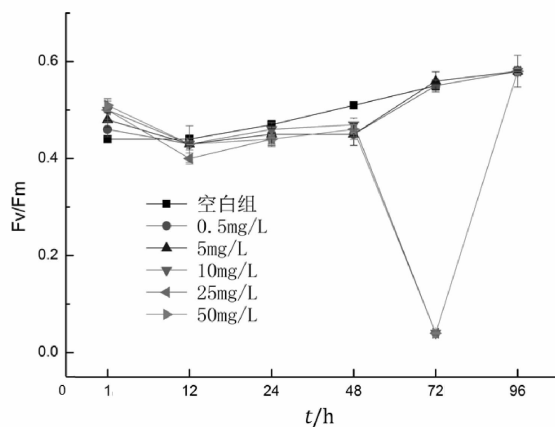


图 4 不同浓度微塑料集胞藻 Fv/Fm 的影响

不同浓度微塑料对集胞藻叶绿素 a 的影响见图 5。从图 5 中可以看出 DEHP 浓度分别为 0, 0.5, 5, 10, 25, 50mg/L 的几个组叶绿素 a 的变化趋势不明显, 只有浓度最高组在 24h 和 120h 为最低值, 其他浓度组变化不明显。说明微塑料需要达到较高浓度, 对微藻叶绿素 a 才能产生影响。

3 讨论

自 20 世纪 50 年代大规模生产塑料以来, 塑料产量每年逐渐接近 3 亿吨。估计到 2050 年, 塑料产量会增加至 330 亿吨。塑料产量增加的同时, 塑料垃圾的排放量也在日益增加, 并且通过偶然的排放和不加区分的丢弃物的随意处置, 塑料垃圾在环境中以无法控制的速度累积。在自然环境下, 这些塑料垃圾由于物理、化学及生物活动可以慢慢降解为极小的颗粒, 分散、汇聚在海洋、湖泊、河口、河底及生物体中, 甚至有可能被迁移到地下系统中。有学者研究这种尺寸较小的塑料碎片(微塑料)沉积体和一些浮游生物的比例相同, 它们可能对广泛的生物体具有生物可利用性, 在一定程度上会带来一些不利的环境效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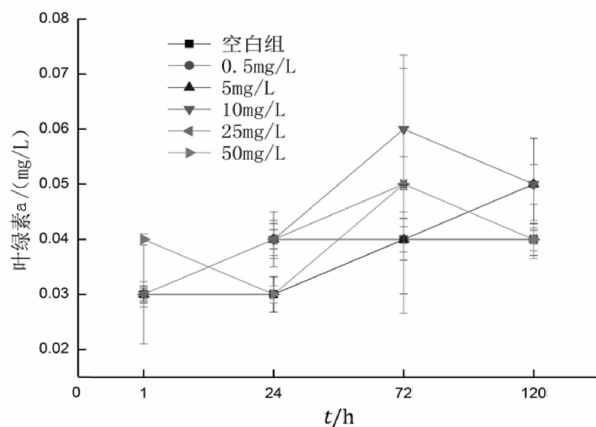


图 5 不同尺寸浓度微塑料集胞藻叶绿素 a 的影响

设置不同的微塑料浓度和不同的微塑料粒径,在固定的时段测量微藻的 OD 值、叶绿素荧光值、叶绿素 a,通过测量可知,微塑料粒径大小和不同浓度均会对微藻的生长产生一定的影响,当浓度一定时,微塑料粒径越小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当粒径大小一定时微塑料浓度越高对微藻生长的抑制作用越明显。在浓度和粒径共同胁迫实验组中,集胞藻生长明显变缓,说明集胞藻生长受到抑制,在浓度组实验中,当微塑料浓度大于 10mg/L 时,浓度越高集胞藻生长受到的抑制作用就越明显。

参考文献:

[1] C6ZAR A, ECHEVARRÍA F, GONZÁLEZ - GORDILLO J I, et al. Plastic debris in the open ocean[J]. Proceedings of the National Academy of Sciences, 2014, 111(28): 10239 - 10244.

[2] 周倩,章海波,李远,等. 海岸环境中微塑料污染及其生态效应研究进展[J]. 2015(33): 3210 - 3220.

[3] BROWNE M A, CRUMP P, NIVEN S J, et al. Accumulation of microplastic on shorelines worldwide: Sources and sinks[J]. Environ Sci Technol, 2011, 45: 9175 - 9179.

[4] AUTA H S, EMENIKE C U, FAUZIAH S H. Distribution and importance of microplastics in the marine environment: a review of the sources, fate, effects, and potential solutions[J]. Environment international, 2017, 102: 165 - 176.

[5] DA COSTA J P, SANTOS P S M, DUARTE A C, et al. (Nano) plastics in the environment - sources, fates and effects[J]. Science of the Total Environment, 2016, 566: 15 - 26.

[6] 孙承君,蒋风华,李景喜,等. 海洋中微塑料的来源,分布及生态环境影响研究进展[J]. 海洋科学进展, 2016, 34(4): 449 - 461.

[7] 程荣,石磊,郑祥. 2017 年水环境科学热点回眸[J]. 科技导报, 2018, 36(1): 176 - 188.

[8] AU S Y, LEE C M, WEINSTEIN J E, et al. Trophic transfer of microplastics in aquatic ecosystems: identifying critical research needs[J]. Integrated environmental assessment and management, 2017, 13(3): 505 - 509.

[9] DIXIT S, SINGH D P. An evaluation of phycoremediation potential of cyanobacterium *Nostoc muscorum*; characterization of heavy metal removal efficiency[J]. Journal of Applied Phycology, 2014, 26(3): 1331 - 1342.

[10] 李鹏民,高辉远, Reto J. Strasser. 快速叶绿素荧光诱导动力学分析在光合作用研究中的应用[J]. 植物生理与分子生物学学报, 2005, 31(6): 559 - 566. 24]

[11] 陈建明,俞晓平,程家安. 叶绿素荧光动力学及其在植物抗逆生理研究中的应用[J]. 浙江农业学报, 2006, 18(1): 51 - 55.

[12] 姜航,丁剑楠,黄叶菁,等. 聚苯乙烯微塑料和罗红霉素对斜生栅藻 (*Scenedesmus obliquus*) 和大型溞 (*Daphnia magna*) 的联合效应研究[J]. 生态环境学报, 2019, 28(7): 1457 - 1465.

[13] ZHANG C, CHEN X, WANG J, et al. Toxic effects of microplastic on marine microalgae *Skeletonema costatum*; interactions between microplastic and algae[J]. Environmental pollution, 2017, 220: 1282 - 1288.

(责任编辑 姚虹)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and Their Additives on Growth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of Cyanobacteria

MA Qian, GUO Fengfeng, DENG Min, LIU Yan, ZHAO Ju, CHAO Jiangqin, SHEN Bo
(School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Tourism, Zhaotong University, Zhaotong, Yunnan 657000, China)

Abstract: The effects of microplastic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particle sizes on the growth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of alga were studied by adding microplastics with different concentrations and particle sizes. Results show that the micro plastic concentration and particle size of the micro plastic to set cell algae absorbance value (OD_{680}) and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Fv/Fm) and chlorophyll a certain impact, as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the micro plastic (DEHP) more than 10 mg/L,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on the collection of algal cell inhibitory effect, the more obvious, pure plastic concentration of 10 mg/L, when particle size of 200 um obvious inhibitory effect on collection of cell growth. When the concentration of microplastics exceeded the threshold, the higher the concentration was, the more obvious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microalgae was. The smaller the particle size of microplastics was, the more obvious the inhibition effect on the growth of microalgae was.

Key words: microplastics; cytoskeletal; growth; chlorophyll fluorescence

基于混合遗传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研究

焦合军,周万春,李渊博

(郑州工程学院 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传统遗传算法应用于机器人路径规划时,收敛速度慢,不适用于障碍物较多的情况。针对这一问题,首先将A*算法用于栅格环境下产生初始种群,然后结合遗传算法进行路径优化,并针对不同地图与传统遗传算法进行比较,通过制定路径长度指标来评判算法。最后通过仿真证明,混合遗传算法搜索效率高、进化速度快,寻找的最优路径可以有效指导移动机器人完成避障任务。

关键词:移动机器人;混合遗传算法;路径规划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0.06.023

中图分类号:TP301.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0)06-0125-04

1 引言

移动机器人的路径规划是机器人导航技术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移动机器人可以在预先设定的条件下,按照一定的规则,从起点到终点并避开障碍物寻找一条最优路径,该路径长度小,消耗时间少。路径规划有全局和局部之分,全局路径规划着眼于已知路径信息,局部路径规划着眼于未知的环境信息^[1]。

目前在移动机器人全局路径规划中,常用的进化算法有遗传算法、人工鱼群算法^[2]、粒子群算法和蚁群算法等。然而,传统的遗传算法求解过程耗时长,生成的路径没能达到最优避障;蚁群算法收敛的速度比较慢,容易出现停滞,陷入局部最优;人工鱼群算法在优化初期有很好的收敛性,后期收敛较慢,并且随着人工鱼的增多,造成存储需求大、计算量大的缺点;粒子群算法有较快逼近最优解的能力,可以对系统参数进行有效的优化,优势在于对连续函数的优化,其缺点是容易早熟收敛,局部寻优能力变差。

本文针对一般的遗传算法进行改进,在遗传操作时加入A*算法,调整交叉和变异的概率,不仅使前期进化能力增强,改进交叉和变异方法,催生新的染色个体能力加强,又提高了算法的搜索效率。

2 路径规划

2.1 环境模型建立

在对机器人路径建模时,首先要对其环境地图进行平面化处理,使用栅格地图是简单有效的方法。在栅格图中,黑格表示障碍物,白格代表机器人可以经过的自由空间。使用序号标记法进行栅格标记,按照从左到右,从上到下的原则依次加1进行标记。在图1所示的模型中,S,2,3,⋯,99,E等称为栅格节点,S为机器人起始点位置,E为目标点位置。给定栅格序号 $T(i,j)$ 与直角坐标点 $P(i,j)[X(i,j), Y(i,j)]$ 的关系如下:

$$\begin{cases} X(i,j) = \text{mod}(T(i,j), 10) - 1 \\ Y(i,j) = \text{floor}(T(i,j), 10) + 1 \\ T(i,j) = X(i,j) + 1 + 10 * (Y(i,j) - 1) \end{cases} \quad (1)$$

2.2 编码方式

遗传算法中的染色体是一组个体编码,针对机器人路径规划问题,我们定义为从起始点到终点的一条路径。为了保证路径的可靠性和实用性,路径中不可出现重复序号和障碍物序号^[3]。如图2所示,一条有效路径可以表示为:S→12→23→33→44→54→65→75→85→86→87→88→98→99→E。

2.3 种群初始化

使用栅格法进行路径规划时,机器人在周围无障

收稿日期:2020-08-28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17B520007);郑州工程学院2020年度大创项目资助(202011068046)

作者简介:焦合军(1981—),男,河南辉县人,博士,郑州工程学院机电与车辆工程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云计算、机器人。

碍的情况下可以向左、左上、左下、右、右上、右下、上、下 8 个方向移动。文中将 A* 算法用于遗传算法的初始化,随机分配一个无障碍点,在已有起始点和终点利用 A* 算法建立链接,具体的实现步骤如下:

第一步 将起点坐标和终点坐标(如图 1 中的 S 和 E)加入染色体编码中;

0	1	2	3	4	5	6	7	8	9	
0	S	2	3	4	5	6			9	10
1	11	12	13	14	15	16			19	20
2										
3			23			26	27	28	29	30
4			33	34		36	37	38	39	40
5	41	42	43	44		46	47	48	49	50
6	51		53	54	55	56	57			
7	61	62	63	64	65	66		68	69	70
8	71	72	73	74	75			78	79	80
9	81	82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E

图 1 机器人路径规划地图模型

第二步 在地图模型中加入 1 个无障碍随机点作为目标点,利用 A* 算法分别建立起始点到该点以及该点到终点的路径,在路径建立过程中避免障碍点和外围区域,之后将起始点和终点链接起来;

第三步 种群要保持染色体的差异性,对路径节点一模一样的进行删除,最终生成一个集合。此刻结束初始化。

S	2	3	4	5	6				9	10
11	12	13	14	15	16				19	20
			23			26	27	28	29	30
			33	34		36	37	38	39	40
41	42	43	44		46	47	48	49	50	
51		53	54	55	56	57				
61	62	63	64	65	66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8	79	80
81	82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E	

图 2 地图序号标记

2.4 适应度函数

采用机器人从起始点到终点的路程作为路径规划的适应度评价,所以在路程的规划指标下,分别得适应度函数为^[4-5]:

$$f = \min \sum \sqrt{(X(i,j) - X(m,n))^2 + (Y(i,j) - Y(m,n))^2} \quad (2)$$

2.5 遗传操作

2.5.1 选择算子

为了选出适应度较好的一部分个体,结合贪心算法,在初始种群中,算出适应度的平均值,每个染色体个体的适应度值与该平均值比较,如果大于平均值,保留该染色体个体,否则,丢弃该个体。每次迭代,重复此操作。这种选择方法,保证了每次迭代使种群向优秀方向过渡。通过与平均值的比较,不仅保证了个体的多样性,而且保证了种群的稳态繁殖。

2.5.2 交叉算子

在种群中找出一对有共同点的染色体,共同点不是起始点和终点,随机选择其中一个共同点,交换这两个染色体的前半部分路径点,染色体交叉示意如图 3 所示,图中 a,c 两个图的染色体在序号点处交叉,生成 b,d 图中两个染色体。

2.5.3 变异操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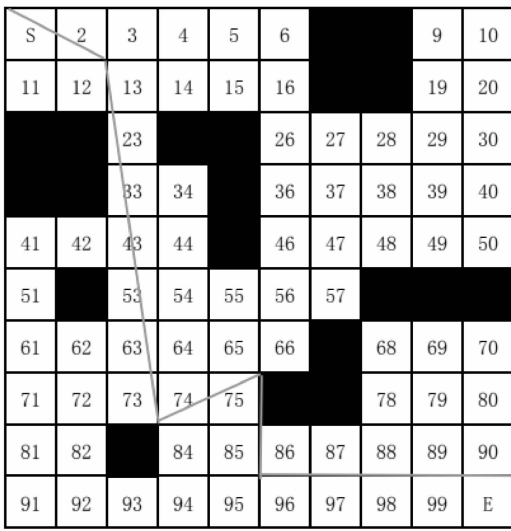
变异操作对遗传算法最优解的产生有积极的作用,变异操作可以防止遗传算法陷入早熟和局部最优的环境。在一条全路径上选取除了起始点和终点的两个随机节点,根据 A* 算法生成一条两个节点间的路径,代替两个节点的原路径。为了避免优秀路径不被破坏,变异操作后期要考虑减少或停止变异操作。例如:个体变异前为 $V = \{S, 11, \dots, 96, 87, 98, 99, E\}$, 变异节点为 96 和 98, 产生的新路径为: $C = \{S, 11, \dots, 96, 97, 98, 99, E\}$ 。

2.7 混合遗传算法流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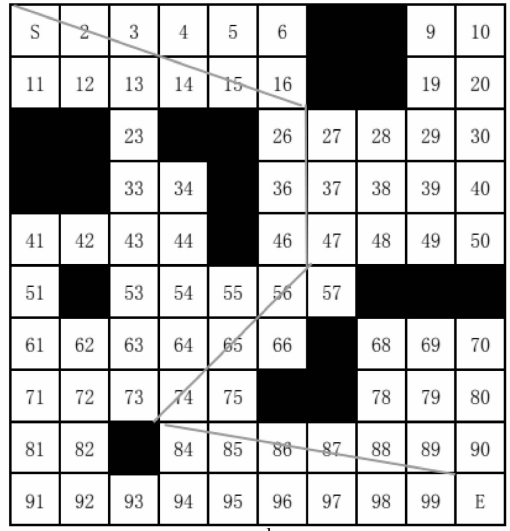
首先利用 A* 算法产生原始种群,并得出各个个体的适应度值,之后选择并以一定概率进行交叉和变异操作找出最优解的个体,最后判断是否符合结束条件,在进行个体适应度数值和最优解之间进行比较,满足结束条件,退出遗传操作,否则继续交叉和变异,生成新一代种群^[6]。该算法的步骤如图 4 所示。

3 仿真分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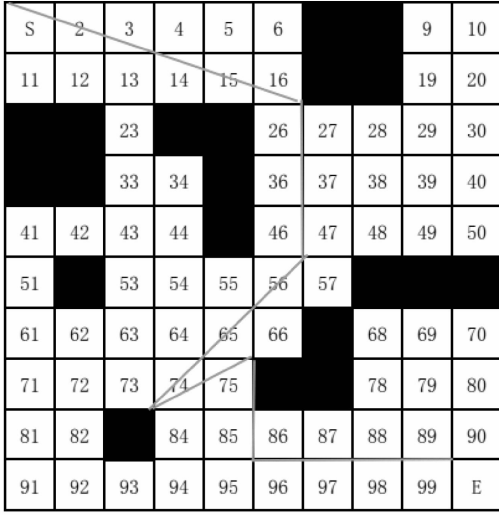
为了证明算法的合理性,本文在 Visual C++ 环境中分别编写了路径规划的一般遗传算法和混合遗传算法,对比两种算法的特点。由于具体尺寸上没有指定,本文用数字表示相关参数。栅格的尺寸为 10×10 , 起点为(0,0), 终点为(9,9), 在 2 个地图环境下得到的路径长度和收敛速度如图 5、6 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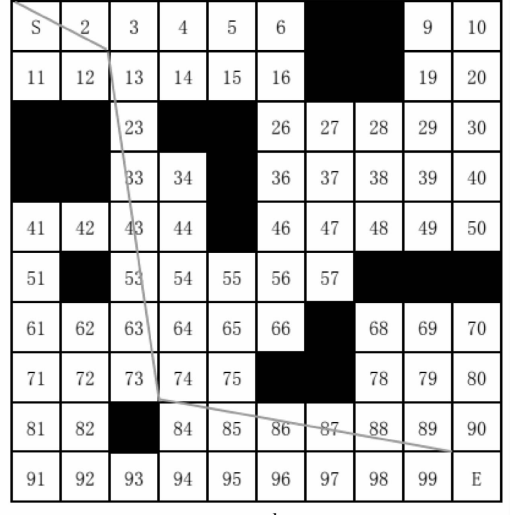
a



b



c



d

图3 交叉操作示意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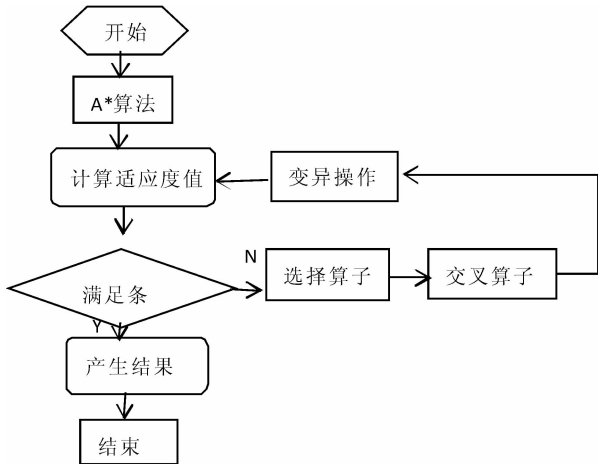


图4 混合遗传算法的步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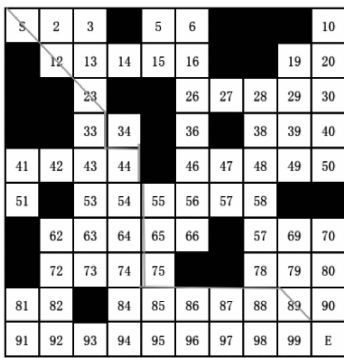
对于一般遗传算法,遗传种群数目为 50,变异和交叉的概率为 0.06 和 0.9,最大迭代数为 50;对于本文提出的算法,种群数目为 50,5 次迭代前交叉率是 0.9,5 代后交叉率为 0.3,5 代前变异率为 0.06,5 代后变异率为 0.01,最大遗传代数为 50。

两种算法结果不同,一般遗传算法最佳路径长 16.5228,混合遗传算法的最优路径长度为 14.8173,一般遗传算法的路径长于混合遗传算法,并且从适应度变化折现中看出,一般遗传很快进入局部最优,一般遗传算法的收敛速度没有混合遗传算法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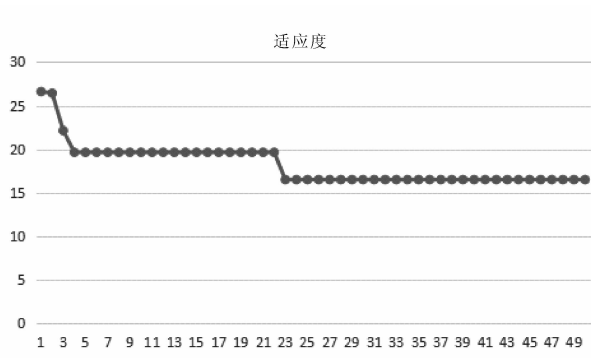
4 结论

本文针对机器人的路径规划,讨论了一种新的混合遗传算法。通过实验对比,混合了 A* 算法的遗传算法在机器人路径规划方面是有效的。该算法有以下特点:

- (1) 引入随机节点,通过 A* 算法保证了种群中染色体的多样性,保证了路径的局部最优。
- (2) 算法中的交叉和变异方法,催生新的染色个体能力强,方便个性差距大的个体出现。
- (3) 算法可以调整交叉和变异概率,算法的前期进化能力较强,算法的求解效率有所提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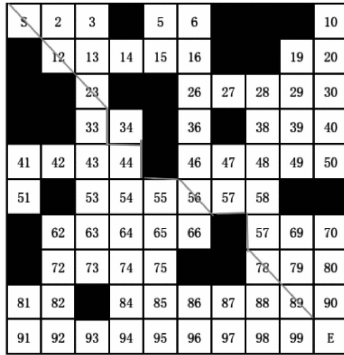


(a) 机器人的运动轨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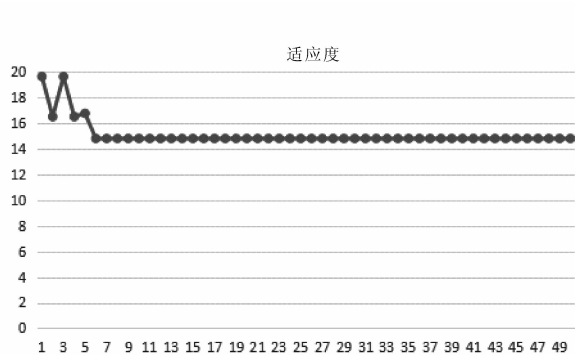


(b) 适应度变化

图5 一般遗传算法仿真结果



(a) 机器人运动轨迹



(b) 适应度变化

图6 混合遗传算法仿真结果

参考文献:

[1] 王永琦, 江潇潇. 基于混合灰狼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J]. 计算机工程与科学, 2020, 42(7): 1294 - 1301.
 [2] 王闯. 人工鱼群算法的分析与改进[D]. 大连: 大连海事大学, 2008.
 [3] 孙波, 姜平, 周根荣, 等. 改进遗传算法在移动机器人路径规划中的应用[J]. 计算机工程与应用, 2019, 55(17): 162 - 168.
 [4] 李天旭, 陈广大. 基于改进遗传算法的室内移动机器人

路径规划[J]. 制造业自动化, 2015(20): 31 - 36.
 [5] FU B, CHEN L, ZHOU Y T, et al. An improved algorithm for the industrial robot path planning with high success rate and short length [J]. Robotics & Autonomous Systems, 2018, 106: 26 - 37.
 [6] PATLE B K, PARHI D R K, JAGADEESH A, et al. Matrix - Binary codes based genetic algorithm for path planning of mobile robot [J]. Computers & Electrical Engineering, 2017, 45: 1 - 22.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Robot Path Planning Based on Hybrid Genetic Algorithm

JIAO Hejun, ZHOU Wanchun, LI Yuanbo

(School of Electro Mechanical and Vehicle Engineer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When the traditional genetic algorithm is applied to robot path planning, the convergence speed is slow, and it is not suitable for the situation with many obstacles. To solve this problem, firstly, A* algorithm is used to generate the initial population in grid environment, and then the genetic algorithm is combined to optimize the path. According to different maps, compared with the traditional genetic algorithm, the path length index is established to evaluate the algorithm. The simulation results show that the hybrid genetic algorithm has high search efficiency and fast evolution speed, and the optimal path can effectively guide the mobile robot to complete the obstacle avoidance task.

Key words: mobile robot; hybrid genetic algorithm; path planning

《中州大学学报》2020 年总目次

· 文艺学与文学评论 ·

记忆的动机、途径与伦理

——从《十七岁》到《模糊》 张翼(1-1)

历史延展中的人性呈现

——谈田中禾长篇小说《模糊》中的人性叙述 刘宏志(1-7)

苏轼的家园意识 刘晗(1-13)

东野圭吾的 *Angel* 与生态悲观主义 常如瑜(1-18)

世纪之交乡土小说的大地“复魅”与生态关切 黄轶(2-1)

如何叙述这个世界

——托卡尔丘克《太古和其他的时间》及其文学探索的价值 方向真(2-7)

普希金作品中“海洋”图像的渊源考察

——以俄罗斯民间文学、编年史、史诗为中心 孙晓博(2-13)

孙方友小说传奇叙事研究 郑积梅(2-19)

礼赞劳动与劳动者

——读路遥《平凡的世界》 艾云(3-1)

路遥研究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卅年重聚说路遥:纪念路遥诞辰七十周年”座谈会综述 陈泽宇(3-13)

“真相”言凿凿,“和解”路漫漫

——由《我的祖国,我的头颅》探索南非种族和解之路 郑梦怀(3-18)

论《四象》的亡灵叙事与情感经纬 丁子钧(3-24)

超越残疾与苦难

——论史铁生的反现代性书写 汪树东(4-1)

诗歌批评:在多元解读中寻觅真相

——由黄理兵《唐诗的真相》谈起 谭邦和(4-9)

跨文化语境下的主体转换与角色认同

——论严歌苓小说中的文化身份建构 冯美(4-15)

“集体记忆”视域下李安电影中的饮食文化探析

——以“家庭三部曲”为例 关键(4-21)

作为媒体人的普希金 耿海英(5-1)

在历史情境中寻找唐诗真相

——以贺知章《回乡偶书》、王维《酬张少府》等为例 黄理兵(5-11)

试论道具在《长生殿》结构线索中的叙事功能 张为(5-17)

京沪播迁:现代文学中心转移的场域观察 蒋进国(6-1)

戏剧题材小说《青衣》与《霸王别姬》比较论 王俊虎,陈楠(6-6)

老舍戏剧创作的个人与时代渊源 董克林(6-11)

丰子恺漫画里的“童心”教育观探析 李信(6-17)

从民间艺人到艺术工作者:以刘志仁为个案研究 赵法发(6-22)

· 经济与管理 ·

人工智能在家庭服务业的应用问题及趋势研究 朱涛,董凡(1-22)

“一带一路”背景下河南省服务业扩大开放环境分析 杨雪,杨娟,刘银双(1-27)

新时代视域下河南省旅游业转型升级发展研究 赵鑫(1-32)

乡村振兴背景下乡村旅游发展的新路径 郭琰(2-23)

环境库兹涅茨曲线视角下河南省大气污染的分析 王芳,邓文刚(2-27)

地方政府和中小企业关于金融扶持中小企业政策的博弈

——基于互联网金融、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背景下不完全信息动态模型 邵凌波,刘江涛,杨卓异(2-31)

关中平原城市群网络结构分析

- 基于金融企业布局的视角 陈少炜,徐良华,褚 钊(2-37)
- 中原高速收费管理模式转型探索与思考 杨 雪,张姝慧,岳道贵,王 菲(3-28)
- 云南省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协调发展研究 韩丽红,潘玉君,杨冬琪(3-33)
- 优化营商环境视域下河南省“放管服”改革的 路径研究 弓顺芳(3-38)
- 基于累积前景理论的建筑物料供应商评价优选模型 王志强,刘 硕,王陶陶,马婷婷(4-26)
- 中部区域旅游经济发展水平的测度与比较研究 齐天锋(4-31)
- 政府基础教育支出对住房价格的影响研究
- 以河南省郑州市为例 王素萍(4-38)
- 基于 RPA 的企业智能财务共享中心建设问题研究 魏佳思(4-42)
- 金融支持与产业结构升级的耦合协调效应研究 张艳平(5-21)
- 商贸流通业发展与中国产业高质量升级
- 基于地级市及以上城市的数据 郑浦阳,牛 君(5-27)
- 我国新型城镇化发展研究的现状与展望
- 一项基于 2008—2018 年 CSSCI 数据的文献计量分析 毛现桩(5-32)
- 广西入境旅游市场时空结构与竞争态分析 孙华强(6-27)
- 对外贸易、人力资本与中国城乡收入差距 宋红军(6-34)
- 疫情常态下以人民为中心的地方财政制度建设
- 以河南为研究视角 王海霞(6-39)
- 智慧城市兴起背景下河南省智慧农业发展研究 邓 岩(6-47)

· 法学研究 ·

- 非演绎类同人作品借用原作元素的知识产权问题新论 蹇佳伶(1-37)
- 执行转破产程序“启动难”的解构与应对 祝 祎(1-43)
- 论我国积极的刑事立法的合理性及其边界 魏瀚中,丁友勤(2-45)
- 区块链技术对法院审判影响研究 康 威(2-54)
- 配偶权解析及其立法保护 祁雪瑞(3-43)
- 互联网金融背景下第三方支付洗钱犯罪的新特征与防控 贺晨霞(3-48)
- 我国基层少数民族地区法治政府建设策略研究 张 霞(3-53)
- 平台垄断下的网络文学作家权益保护 苑言博(4-47)
- 网络信用卡诈骗犯罪的新动向及预防对策 张胜英(4-52)
- 赠与人损害赔偿 责任适用研究
- 以《民法典》658 条、660 条为逻辑起点 裴丽萍,胡芳媛(5-38)
- PPP 协议的法律性质及解纷模式 张 娜(5-43)
- 宽严相济的专利实用性审查标准的构建 刘明江(6-53)
- 地方立法监督机制若干问题研究 张隽琦(6-63)

· 文化遗产与创意 ·

- 新时代民俗剪纸的创新与传承研究 张朝晖(5-48)
- 文化认同理论视域下徽州民谣数字化传承 赵 昕,陶 然(5-53)

· 传媒与艺术 ·

- 国内网络抗争研究的学术图景
- 基于 CNKI 数据库的计量与可视化分析 王凤仙,刘 艺(1-48)
- 中原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新性传承研究
- 以河南“猴加官”非遗项目为例 樊钢亮(1-54)
- 我国旅游产业融合的科学知识图谱分析 周 娜(2-62)
- 我国新媒体广告现状与发展趋势研究 韩燕飞(2-67)
- 移动互联时代村民的媒介接触与信息实践
- 以河南省济源示范区中王村为例 惠 萍,李倩楠(3-59)

新社会阶层网络舆论生态治理研究	王福帅(3-65)
危机传播中民间舆论场的特点、负面影响及管控	
——以新冠肺炎疫情危机为例	刘静,景庆虹(4-78)
传承与变迁:关于“京味文学”图书出版的若干思考	刘燕萍(4-84)
时代主题·民族精神·文化认同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的传播策略探析	高杰(4-88)
媒介技术变革下的网络文化建设研究	周华连(5-58)
“互联网+”时代大学出版社营销模式创新探析	丁忠华(5-64)
万物皆媒视域下高校器物文化的传播价值研究	吕村(6-68)
出版企业影视增值:逻辑、价值与现实路径	于春生,郭婉君(6-73)

· 社会学与历史 ·

“口岸开放与近代民族国家建构”研究综述	庞广仪(1-58)
近代新疆汉族商帮与公共卫生近代化述论	贾秀慧(1-64)
康有为《大同书》的创作及其社会改造思想	曹发军(1-68)
五四社团与改造社会路径研究	曲广华,郭佳男(2-72)
善举抑或侵略:中美庚款兴学性质探析	谭备战,陈改革(2-79)
安西与抗战时期的西北国际交通线	张静,胡金野,齐磊(2-84)
海洋考古视域下环南中国海国家的海贸互动	
——以中国为中心	王丽敏(3-73)
从辽代刺绣的现存实物看其文化遗产价值	叶立群(3-78)
明清时期太平府圩田兴修与发展	丁大涛(3-83)
和谐有序:民间信仰及道德教化功能探析	
——试以江西许真君信仰为例	黄德锋(4-57)
试论近代南浔铁路经营与发展困顿的原因	龚喜林(4-62)
1918年青年学生反日爱国运动述论	申海涛(4-67)
层次化视域下意识形态安全工作的三重内容逻辑	
——根本理念、行动体系、优化路径	刘文博(4-73)
南盘江流域少数民族文化与精准脱贫契合发展研究	彭建兵(5-68)
战国秦汉时期黄河砥柱段漕运的经营	崔建华(5-73)
清末奉天各级审判厅筹建问题再考察	史新恒(6-78)
束河古镇民俗文化资源价值识别与创意开发模式探究	杨洪飞,李庆雷,夏梦蕾(6-83)
关于“推进医养结合”若干问题的思考	王蕾(6-89)

· 语言文化与翻译 ·

语言的产业经济学阐释	毛现桩(1-72)
汉语词汇语义构建的认知理据再探	
——基于语料库的“火”的语义分析	马应聪(1-79)
Verschuieren 语言顺应论在英汉互译教学中的应用实证研究	成汹涌,何婷婷(1-85)
从管理术语及其汉译观中西方学术文化之差异与交融	冯曼(3-89)
生态翻译学“三维”转换视角下的公示语汉英翻译	
——以桂林红色旅游景点为例	黄兰堞(3-95)
基于生态翻译学视域的中原典故英译研究	和伟(5-79)
基于主体自洽原则的《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隐喻翻译研究	宫宇航(5-83)
社会实践网络视角下的政治隐喻翻译机制研究	
——以《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二卷)中的旅行隐喻英译为例	梁娜(5-88)

· 教育与教学 ·

增强高校基层党组织活力的几点思考	苏炜(1-93)
------------------------	----------

高校协同创新运行机制研究	王 琦(1-97)
新时代高职院校育人工作与社会工作的契合性研究	孙 慰(1-102)
教育供给侧改革背景下高校教师队伍建设路径探析	肖志玲,徐 胜(1-107)
新文科背景下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大学英语课程改革的“回归与创新” ——基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实践研究	郭向宇(2-91)
互动教学中农业院校大学生英语学习焦虑现状及对策	张 琴(2-97)
浅谈青年教师指导本科生毕业设计/论文	沈祥建,江思思,廉红蕾(2-102)
基于“1+X”证书的中等职业教育学分银行建设的研究	崔 蕾,陈云雁(2-107)
转型发展视域下新建本科院校教师能力提升路径探析	郎慧国(3-100)
新时代背景下的城乡教育公平问题研究	田 晨(3-105)
基于 OBE 理念的 C 语言程序设计课程改革实践	黄继海,刘秋菊,姜 宇,许镛督(3-110)
关于高校教学现代化趋势的思考	陈志强,朱 涛(4-92)
新媒体时代广播影视节目制作专业的发展路径探究	张永强(4-97)
基于云班课的亲验式教学模式应用研究 ——以《运输管理》课程为例	张媛媛(4-102)
疫情下高校在线教学中学习空间对学习效果的影响分析	胡 钰(4-106)
应用型本科院校毕业生核心竞争力提升路径研究	张 阳,孙晓燕(5-94)
工程背景下特色课程思政建设的探讨与研究	刘 静,孙海玲(5-99)
对《环境保护概论》教材的几点思考	王双成,孙浩冉,魏振枢(5-104)
新型农村社区实施“体医结合”促进老年人健康的研究	王书新(5-110)
以课程建设为引擎推进应用型本科教育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建设	王 俊(6-94)
基于疫情期间互联网+《管理学》理论思想与课程思政教学探讨	杨道富,蔡 琰,杨 鹏(6-100)
新形势下外语学科教师学术能力建构研究	袁金平(6-106)
论新时代教育培养纪检监察干部斗争精神	巩善鑫(6-111)

· 数理工程技术研究 ·

MOFs 材料对 CO ₂ 的吸附分离研究进展	李玉玲,赵雅雯,王承祥(1-112)
圆红冬孢酵母脂肪酸合酶的生物信息学分析	康 静,刘玉青,胡焕焕,丰慧根(1-117)
一种基于中值滤波和小波变换的图像去噪处理算法研究	关雪梅(1-121)
比例边界计算机有限元算法理论及研究发展分析	余芝轩(1-125)
黑胸散白蚁肠道内芽孢杆菌 F8 产纤维素酶发酵工艺研究	冯 冲,李婧雯,夏 雪,顿弘斌,田嘉兴(2-111)
型钢混凝土梁截面抗弯刚度取值方法的分类比较与验证	王艺霖,赵洪凯,李广宁(2-115)
基于 FLAC3D 的某地铁隧道横断面开挖变形规律研究	杨 坦,陈雅君,仇亚伟,蒋亚龙(2-121)
卧式双层埋地罐的工程设计	程涛涛,邵继东(2-125)
混凝土叠合结构叠合面抗剪性能影响因素研究	刘成才(3-115)
钢框架结构建筑检测鉴定与加固设计	司道林(3-119)
梨果实香气物质的研究综述	张 军,李靖靖(3-123)
动载荷对塔式起重机的危害及防止对策	王继东,杨海鹏,孙海玲(4-110)
碳纤维布部分包裹圆钢管混凝土短柱轴压性能试验研究	黄春晓,王 伟,王 颖,潘福婷(4-115)
鲜切山药保鲜剂开发及应用效果研究	郑丽萍,王 皓,李玉玲(4-120)
不同品种山药的质构相关性研究	赵国欣,赵永岗(4-125)
石墨炉原子吸收法测定山药中 6 种金属元素	姚 虹,李颖川(5-115)
异斯特维醇及其衍生物抗肿瘤活性研究进展	刘从军,刘盼萍,柯 明(5-119)
高速铁路用 40m/1000t 级箱梁建造技术的研究	刘向明(5-125)
库尔勒雪梨果实香气代谢过程中相关酶类活性变化研究	张 军,姚 虹(6-115)
微纳米级微塑料及其添加剂复合效益对蓝藻的生长及叶绿素荧光的影响	马 欠,郭锋锋,邓 敏,刘 燕,赵 菊,晁江琴,沈 波(6-121)
基于混合遗传算法的机器人路径规划研究	焦合军,周万春,李渊博(6-125)